

葡語作家叢書

1

文化系列

葡萄牙簡史

J·H·薩拉依瓦

翻譯：李均報 王全禮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文字責任編輯：袁殿池
美術責任編輯：李文俠



（冀）新登字 003 號

Título: História Concisa de Portugal
書名：葡萄牙簡史

Autor: José Hermano Saraiva
作者：J・H・薩拉依瓦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Cultura) Vol. 1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化系列之一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Wang Quanli e Li Jun Bao
中文翻譯：李均報／王全禮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China Zhanwang Press (Beijing – China, 1988)
第一版：中國展望出版社（中國、北京1988）

2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4
第二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972-35-0159-7

葡語作家叢書
葡萄牙簡史
J・H・薩拉依瓦 著
李均報 王全禮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張 265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9.00 元
ISBN 7-80611-220-0/I・191

J·H·薩拉依瓦

葡萄牙簡史

翻譯：李均報
王全禮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目　　錄

1223～1385年　社會的進步與社會衝突

1385～1498年　大西洋問題的解決

1668～1777 年　君主專制制度

1777～1820 年　古代政權的結束

1820～1910 年　君主立憲



起　　源

1　史前狀況

葡萄牙境内發現的是古老的人類生活遺迹，是一些加過工的石塊，它的一端被磨得尖尖的，成爲鬥爭或者勞動的工具。在許多地方，諸如佛爾尼亞岩洞、皮尼希(史前是個島嶼)、卡爾達斯達賴尼亞附近、里斯本市的郊區、阿拉比達和錫尼希，都發現過這種形狀的石器。

在人類發展的漫長過程中，最初使用的也許是自然形成的石器；後來，通過有意識的勞動，使石頭具備一定的形狀；這樣，這些石器便成了考古的標記。用一塊石頭打磨另一塊石頭，使其一端變得鋒利，這是到目前爲止考古學家考證出的最古老的技術。因爲索馬河岸的阿伯維萊城附近發現過大量這樣的石器，所

以人們稱這種技術爲阿伯維萊技術。大約在 40 萬年以前,人類使用的就是這樣的石器;西歐大部分地區都留下了這樣的遺迹。

自此以後,其他技術相繼出現,而且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種比一種完美。每種技術持續的時間大約爲數千年。這些技術的名稱,是考古學家根據大量發現這些歷史遺迹的地區或者城市的現代名字命名的。但是考證每個技術時期的特徵是考古學的課題,而不是歷史學的任務。從葡萄牙人民居住地方的變遷和遠古起源的角度看,應該着重指出的是:1. 所有這些石器技術在我國的領土上都可以找到依據,這說明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各種各樣的人群;2. 這些人群均非土著,而是由其他地方遷移來的。今天,在許多地方,從遺迹比較集中的沿海地區開始,沿着河谷還可以勾劃出當年這些人群擴散到內地的路綫;3. 一般來說,發展並不平衡,某一地區還在繼續使用某一種技術的時候,另外一個地區可能有了其他的技術。這說明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着不同的人群,大概他們都經歷過長期的奮鬥;4. 根據史前文化的差異大致可以把全國劃分成以下幾個部分,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

一萬年前,歐洲的氣候和今天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鉅大的冰塊已經溶化,長毛象和馴鹿已移居到北方。從那時起,人類前進的步伐加快了,由於開始了對自然界的改造,因而留下了許許多多他們生活的痕迹。在特茹河和沙多河的河谷裏曾經發現過成堆的食物殘迹,特別是貝殼。數量之多,說明 這部分人群起碼在這裏居住過數百年乃至數千年。這是葡萄牙國土上定居生活的最早證明。當時對死者已實行土葬,根據對發掘出的骨骸進行的檢查,發現多數人的體型和今天葡萄牙人的體型基本上是相似的:長形頭顱和中等身材。

新石器文化起源於東南亞和小亞細亞一帶，大約在六千年之前，從那兒傳入葡萄牙。衆所週知，新石器一詞表示新的加工石器的技術，即經過磨製的石頭，而不是粗糙打製的石塊。磨製的石器僅僅是新石器時期的無數發明創造之一，雖然這方面的證據最多，但它遠非最重要的發明創造，只是因爲石頭能夠經得住風吹日曬，而其他材料卻早已化爲灰燼。但是織布、製鞋、製陶、染料、裝飾、建房、飼養家禽和播種等技術，卻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葡萄牙史前歷史的獨特特徵——鉅石文化，就是這個時期形成的。目前尚大量存在的石坊(由兩三塊竪石承托一條橫石構成的史前墓)或石屋(由四五塊竪石承托一塊橫石構成的史前墓)，和目前已寥寥無幾的鉅型石柱及石柱圍成的圓圈，就是鉅石文化的遺迹。石坊幾乎遍佈全國各地，但在上阿連特如一帶比較集中。至於石坊的來源，至今還爭論不休、衆說紛紜。有人認爲它淵源於小亞細亞，但是爲什麼在我國的領土上鉅石文化表現得如此巍然壯觀，原因尚不太清楚。

當阿連特如人還在修造這些令人贊嘆的陵墓時，在近東的大地上已經有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城市。這些早期城市裏的有識之士渡過地中海到各地尋求礦石，而伊比利亞半島正是礦産特別豐富的地區。在我國的領土上，特茹河以南蘊藏着大量的銅礦，特茹河以北，有豐富的錫礦。這些礦藏吸引來了第一批移民。卡爾塔紹附近的聖佩得羅新鎮的城堡，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堡遺址：城堡週圍是牆壁很厚的半圓形塔樓，這種塔樓與今日在小亞細亞所見到的十分相似。挖掘中發現了大量磨製的石器、骨器以及許許多多的銅器，而且還發現了煉銅用的陶瓷坩堝。坐落在托雷斯維德拉斯地區的桑布熱羅城堡與此城堡同屬一類。這些

城堡都是外國人修建的，當時他們已經懂得冶煉技術，他們修建城堡目的是爲了儲藏他們用分文不值的劣等貨從内地居民那裏換取來的金銀財寶。直到今天，阿連特如地區還有佩帶"奶珠"的傳統。所謂"奶珠"，就是産婦在哺乳期間佩帶的一串磨製的圓形小石頭，因爲它被認爲有分泌乳汁的魔力。阿連特如地區并不産這樣的石頭，但是在發掘的墓葬中卻不時有所發現，表明這種石珠有可能是外國人用來購買銅礦的貨幣。

與建造托雷斯維德拉斯和卡爾塔紹兩座城堡的同時，在通往銅礦和錫礦礦區的兩條水路的河口，即在特茹河和沙多河的半島上，也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帕爾麥拉、伊什圖里爾、卡蘭格和阿拉普拉亞這四處人工窖洞大概也是這個時期的産物。這是四座群墓，在人的骸骨週圍發現了大量的陶罐，它是當地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物品。因爲罐口朝上，像座鐘，因此人們稱它爲鐘形罐。這些手工藝品刻有花邊，涂着赭、黑和大紅等色彩，是地道的裝飾品。它顯示了當時人們對美的追求，因而它本身也是一種財富。這些精美的手工藝品的製造者已經掌握了冶金技術。這可能是在同外國移民的接觸過程中學會的。在他們的墓穴裏不僅有許多用來磨製的石器用具，甚至還有銅刀和黄金首飾。在這片可以說是天涯盡頭的土地上，這些人稱得上是第一批冶金家了。移民的規模也是十分龐大的，按照墓葬的先後順序，可以劃出一條漫長的路綫；他們通過伊比利亞半島和法國的南部，沿萊茵河逆流而上，順易北河和奥得河而下，直到日德蘭半島、整個英格蘭、大不列顛海岸和法國的諾曼底。對這條路綫有兩種解釋：一些考古學家認爲特茹河流域是這場遷徙活動的起點；另一些考古學家則認爲遷徙活動的中心在中歐，特茹河流域不過是這條漫長道路的終點。

青銅器時代(公元前 2000～前 800 年),可能發生過多次新的遷徙活動,因爲埋葬死者的形式有很大的變化:單獨的墳墓取代了群墓。這個時期,出於防御性的考慮,一些城堡修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段,其房屋是用石頭砌成、屋頂上鋪蓋禾草,這種形式的村落至今還有大量的遺迹存在。

從最遠古到青銅器時代,居民究竟從何處遷徙而來,直到今天考古學家還不能作出確切的回答。尤其是關於早期的遷徙活動,還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自相矛盾的解釋。有的人説遷徙活動起源於非洲,也有人説遷徙活動開始於東歐。但是葡萄牙這塊土地是從四面八方擁來的遷徙者的匯聚處,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遷徙者最終在這塊土地上融合通婚,生男育女。他們之所以在這兒定居,而不像前段路程那樣只是路過而已,是因爲在此遇到了海洋。當時大海是他們不可逾越的障礙,即使面臨入侵者的進攻,已經安家落户的居民也只好忍耐。

因此,葡萄牙人是幾千年來血緣混合和文化不斷融合的産物。史前歷史塑造了葡萄牙人的固定體型,但是並未決定他們的人種。

從公元前 1000 年初開始,克爾特人成群結隊地從中歐擁入葡萄牙。那時他們已經會製做鐵器,因而比當地的定居者佔有明顯的技術優勢。鐵這種金屬比製造青銅的錫和黄銅更爲豐富。因此,鐵不僅用來製作貴重物品,例如裝飾用品和武器,而且還可用來製造耕耘土地的農具。採用新式的農具,可以深耕土地,增加産量,從而減少饑餓,使人口增加。克爾特人同時也是製造金銀首飾的能工巧匠,當時的婦女已經帶上了金耳環。今天葡萄牙的農村婦女仍舊保留着帶耳環的習慣,但是必須仔細觀察才能把二千五百年前的耳環和今天的耳環加以區别。這一點不僅清

楚地表明從前的款式仍在流行，而且表明耳環式樣的演變是何等的緩慢，史前的歷史仍在繼續。克爾特人最初曾不斷地同當地人發生衝突，但是最後終於同他們融合在一起。如果站在城堡的最高處俯瞰，可以看到村子裏一座座圓形房屋中間夾雜着一些小型的長方形的房屋，茅草屋頂上面有兩條流水槽。一個村莊裏有兩種建築格調完全不同的房屋同時存在，這是克爾特人和當地居民，即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和平共處的最好見證。

公元前219年，羅馬軍隊第一次在伊比利亞半島登陸。羅馬人到達時居民的分佈情況大致是：杜羅河以北居住着卡拉伊科人，這是羅馬人對克爾特人的稱呼。最後又稱爲加利西亞人；在杜羅河和特茹河之間，當然遠遠超過了葡萄牙現在的國境綫，居住着盧濟塔尼亞人。羅馬人認爲盧濟塔尼亞人是克爾特—伊比利亞人的支脈，即克爾特人和伊比利亞人的混血種人。他們究竟是被伊比利亞文化同化了的克爾特人（即最先來到這塊土地上的克爾特人的後代，經過數百年的融合，他們已經伊比利亞化了），還是被克爾特人的發達的文化同化了的伊比利亞人，這個問題我們尚未完全弄清。第一種推斷的可能性似乎較大。希臘作家埃斯特拉邦曾經描述過他們使用的工具和生活方式。根據他的描寫，我們得知當時克爾特人已經普遍地應用鐵器；他們的基本生活習慣不同於地中海人民的生活習慣：例如除非有特殊情況，一般他們不飲葡萄酒，只喝一種啤酒之類的飲料；他們不吃橄欖油，但吃奶油；不大量種植小麥，因爲每年他們大部分時間吃的是用櫟實粉做的面包；他們吃的鹽是一種紅色的岩鹽，這也說明他們的祖先不是生活在海邊，因爲沿海有取之不盡的海鹽；他們焚燒屍體，這也是克爾特人的風俗習慣，而伊比利亞人從不這樣做。因此，他們可能是最先到這裏定居的克爾特人的後

裔，但是在後來者的排斥下，被迫遷居到葡萄牙中部土地瘠薄的貧窮山區。這些人曾多次試圖離開貧瘠的山區到土地肥沃的平原生活，這一點正說明山區原本不是他們本來的生存地。羅馬人正是抓住了這些人的心理，給予他們平坦的土地，以此抑制住他們好鬥的本性，終於得以與他們和平相處。

特茹河以南的居民古人稱之爲迪凱爾特人。住在阿爾加維地區的是科尼奥人。科尼布里格和科伊納這兩個地名就是科尼奥人長途跋涉向南部遷移的證明。大概和盧濟塔尼亞人一樣，科尼奥人也是最早來到這裏的克爾特人，由於受到後來者的壓力，才移居南部。

2 羅馬佔領及其文明

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研究早期人類並非一項徒勞的工作，因爲傳統技術的歷史，甚至語言來源的歷史都有着許多不解之謎，而揭示這些難題的答案必須從史前的歷史中去尋找。爲了弄清葡萄牙人的起源，研究遠古時期的歷史意義是極爲重要的，但是羅馬移民大大衝淡了原始村落之間存在着的許多種族上的差異，使土著人的文化有了統一的命名。

在羅馬與卡塔戈的第二次戰爭中，鑒於戰略上的需要，羅馬軍隊首次開進了伊比利亞半島。因爲卡塔戈人在伊比利亞地區招兵買馬，擴充兵員對付羅馬人，所以羅馬人想在這裏狠狠打擊卡塔戈人；這樣就有可能，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對戰爭的結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擊敗卡塔戈人之後，羅馬人勘查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礦産資源，並且繼續留在這裏進行開發。爲此，羅馬人開始逐步蠶食這塊領土，不久以後，幾乎將它全部佔領。只有坎塔布

洛山區沒有被羅馬人佔領,這就是爲什麼至今那兒還使用巴斯克語的原因。巴斯克語是歐洲古羅馬以前的語言中保留下來的爲數極少的語言之一。

羅馬的佔領并不是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的,歷史學家特別强調了盧濟塔尼亞人的反抗。公元前 147～前 139 年,盧濟塔尼亞人在其首領維里亞多的領導下,在伊比利亞半島中部的廣大地區,屢次重挫羅馬軍隊。在整個歐洲抗擊羅馬軍團的地方領袖中,没有一個像維里亞多那樣使羅馬的歷史學家深深嘆服。但是對外來移民的堅決抗擊不僅僅是某個領袖個人的事。事實上,反抗外來入侵者的鬥爭遠在維里亞多誕生前許多年就已經開始,而且在他逝世多年之後這場鬥爭才告結束。公元前 80～前 72 年,羅馬的政治逃犯塞爾托里奥也是借助盧濟塔尼亞人的反抗力量進行反對羅馬的鬥爭的。在這場鬥爭中塞爾托里奥的同盟者是地處地中海東部的蓬圖國國王米特里達特斯,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爲它披露了這種古老關係的連貫性。

但是不能把羅馬人對盧濟塔尼亞發動的戰爭看成是這些入侵者對待伊比利亞半島人民的慣用手法,因爲通常的作法是和平友好,維持許多先前已存在之範例和建立持久的經濟關係。通過這種長達 500 年的接觸,而不是使用激烈的强制手段,羅馬人完全改變了這裏的經濟基礎、村落的格局、社會組織形式、勞動技術、民間的信仰和風俗習慣、甚至使用的語言。

小麥、葡萄酒和橄欖油並不是由羅馬人引進的,但是推廣種植這些農作物的卻是羅馬人,他們擴大種植的目的是爲了出口,不完全是爲了就地食用。這種農業結構上的變化是帶有永久性的,因爲小麥、葡萄和橄欖這三種農作物非常適應當地的氣候和土壤條件。爲了進行這場農業的大改造,土著人民開始被作爲勞

動力使用，這種初期的接觸就是文化同化過程的開始，其後果同樣是永久性的。許多居民走出起伏不平、古城堡星羅棋布的山區，移居到與説拉丁語和行施羅馬法律的城市緊相毗連的平原生活，結束了與外界隔絶的部落自治生活。下山後，這些人改變了住房的式樣，開始用石頭或磚砌牆，用瓦片鋪蓋房頂，不再居住圓形的茅草小屋。當時用的瓦和今天我們所説的"葡萄牙瓦"十分相似。

伊比利亞半島上這些新的領主强迫人民交納賦税，即便是那些固執地不肯下山繼續待在城堡的人也不能幸免。這種收税的制度一方面促使土著人擁有貨幣，在許多古城堡裏都曾發現過羅馬貨幣；另一方面，它引起了集體經營土地的制度向私人經營土地的制度的轉化。葡萄牙歷史學家阿爾伯托·桑帕伊奥詳盡地研究過這個時期。他認爲當時各個集體中都有一個成員（多數情況下是首領）負責交納整個集體的賦税。但是他既是納税者又是收税者，因爲他要求集體内的其他成員按照土地面積的大小和收獲的多寡向他交納一部分收成。今天，我們只能相信這種設想，因爲没有其他資料能夠説明當時的情況到底如何。

有一座原始農牧公社的遺址保留到今天。關於它的起源，衆説紛紜。有人説它是羅馬佔領前本地制度的遺迹，另外一些人認爲它是中世紀政治機構半公社性質的組織的遺迹。這後一種説法比前一種説法更加符合迄今爲止我們已經掌握的歷史資料。但是由於穆斯林的入侵摧毁了原先建立的機構之後，中世紀的政治機構緊跟着就採取了公社生活的組織形式；這説明在羅馬人佔領之前這種生活形式就已經有着潛在的根基。

農業村鎮是經營農業的正常單位。最初都建立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幾個羅馬地主（一個退伍的士兵，一個意大利來的移

民，而後是卡拉伊科人，或者是羅馬化的盧濟塔尼亞人）直接管理，使用奴隸來耕種這些土地。南部的農業村鎮，即阿連特如農場的前身，就是這種一望無際的完全由羅馬佔領者經營的土地。在崎嶇不平的北部丘陵地區，農業村鎮根據地勢自然形成。中部地域狹小，不能滿足大面積經營的需要，因而連同週圍的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塊可耕地，由半自由民耕種。他們世世代代耕耘這些土地，並將一部分收入交給農業村鎮的領主。農業村鎮的領主事實上是土地的主人，他們除了有權得到這份稅賦之外，還擁有一些能夠集中當地的勞動力和社會生活的設施，如奴隸用的磨（可能是給農户磨面用的，盡管他們家家户户都有一盤羅馬殖民之前的手搖磨）、橄欖油榨油機、釀造和貯藏葡萄酒的酒窖、糧倉和耕犁（在特茹河以南這種犁完全代替了羅馬佔領之前使用的犁，可能是克爾特人製造的犁，但是在北部地區農民並沒有使用這種犁，這説明這兒的農民仍然是當地農具的製造者）。

公元初年誕生在加的斯的作家科魯麥拉曾經寫過一篇有關農業的論文。在談到農業村鎮的理想位置時，文章説："離海洋或者能通航的河流不能太遠，以利於農産品出口和必要的商品出口。"事實上，所有農業生產的組織安排都是爲了出口，尤其是爲了向意大利出口，以換取貨幣。當時貨幣大量流通，甚至盧濟塔尼亞的一些城市也可以鑄造硬幣，但是葡萄牙絶大多數的貨幣都是在意大利製造的。爲了便於糧食運輸和人員往來，在葡萄牙修築了一個頗爲完善的道路網，其中許多條道路一直沿用到19世紀；許多羅馬式的大橋，如横跨在塔麥卡河上通往沙韋斯的大橋和架在特茹河上通往阿爾坎塔拉（西班牙）的大橋，迄今還巍然挺立着。

公元69年到73年，綽號爲"老人"的羅馬作家普利尼奥曾

在伊比利亞半島擔任過行政職務。他是這樣概括盧濟塔尼亞的城市的:"整個省劃分爲梅里達、貝雅和聖塔倫3個修道區。居民區共有45個:5個移民區、一個羅馬公民市、3個古拉西奧市和36座交納貢稅的市。"

修道區是一種行政和司法單位。在葡萄牙的領土上,有兩個盧濟塔尼亞修道區(所在地分别爲貝雅和聖塔倫),一個塔拉科奈塞修道區(所在地爲布拉加)。這三個修道區的邊界與今天葡萄牙的國境纔大體吻合。因此一些人認爲,羅馬人的佔領劃定了葡萄牙的國境。

移民區、羅馬公民市和仍然施行古拉西奧市市規的城市,都是些羅馬式的城市。在這些城市裏,多數人講拉丁語,並且按照羅馬人的方式生活。唯一的一座羅馬公民市是里斯本。當時它已經成爲一座鉅大的港口城市,當地的産品通過它運往意大利。而聖塔倫、貝雅和古拉西奧城—埃武臘、貝雅、阿爾卡塞爾杜薩爾市的發展,則主要歸功於糧食的生産。

當地土著人的城市分爲兩類:自由城市和交納貢税的城市。自由市是指那些保持自己的法律和對羅馬的統治保持一定獨立性的土著人居住區。這種優越局面的形成,與羅馬人佔領該地時土著人采取的態度有關:凡是順從者,一律得到自由;凡是反抗者,一律交納賦税,而且受到壓制。從羅馬作家普利尼奧列舉的資料來看,盧濟塔尼亞連一座自由市都不存在。

普利尼奧還説,在布拉加修道區有24座城市,居住着285000名納税者。他没有提到羅馬化的城市,這一點同認爲羅馬的殖民者雖然後來也到了北部地區,但是對北部地區居民殖民化的程度不像對南部地區那樣嚴厲的想法是一致的。没有把布拉加區納入盧濟塔尼亞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種族不同的原

因。這兩個因素——種族的不同和羅馬人影響程度的不同，是解釋今天葡萄牙南北兩部分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別的依據。

3　蠻族入侵　斯維匯王國

5世紀初，蠻族侵入西歐，破壞了羅馬人在葡萄牙領土上建立起來的政治和行政組織。

阿拉諾人、汪達爾人和斯維匯人被匈奴人粗暴地趕出自己的家園後，在歐洲大陸上四處游蕩，以尋找一塊安身立命之地。公元411年，他們成群結隊擁入葡萄牙這片土地。阿拉諾人起源於高加索地區；汪達爾人系斯堪的納維亞血統的日耳曼人；斯維匯人也屬於日耳曼人，據說他們和當時定居在英格蘭的盎格魯人及撒克遜人有血緣關係。

在這些入侵者當中，只有斯維匯人建立了比較長期的政治組織。布拉加的祭司保羅·奧洛西奧目睹了這次入侵，他這樣寫道："他們很快放下了刀劍，扛起了耕犁，並且和當地人交上了朋友。"站穩腳根後，斯維匯人建立了包括加利西亞在內的王國，首都設在布拉加。從此以後，王國的版土不斷擴大，一直延伸到杜羅河以南；這條河也第一次失去了邊界的作用。一些歷史學家認爲，當時杜羅河兩岸人民的往來可能是後來葡萄牙民族形成的最早的根源。

這些蠻族人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極其迅速地佔領了羅馬人統治的省份，他們没有遇到民衆大規模的抵抗，順利地安頓下來。這種局面的形成和羅馬帝國後期的社會狀況有關，嚴重的經濟衰落衝擊着各個城市，破壞了中等階級的生活，農民的處境進

一步惡化。羅馬佔領的後期,大量搜羅奴隸已十分困難,而羅馬的經濟恰恰又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因此,從這時起半自由民開始淪爲半奴隸。奥洛西奥還説,當時那些抱怨苦難(入侵造成的不幸)的人,是被羅馬文明的光芒刺得神魂顛倒了,因而忘記了這種文明是以人民遭受的不平等和貧困爲基礎的。這句話實際上解釋了蠻族人爲什麼能夠如此迅速地在這塊土地上立足的原因。奥洛西奥的著作回擊了羅馬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徒的指責;他們把蠻族入侵和民衆不抵抗的責任歸罪於基督教徒。但是,如果從基督教教義和奴隸制度水火不相容,而奴隸制度又是羅馬經濟的根本基礎這一角度來看,這種指責倒是真實的。奥洛西奥的同時代人聖·熱羅尼莫寫道:羅馬佔領者比蠻族人還要野蠻。

奥洛西奥談到他如何從斯維匯人的刀下逃生時說:趁着茫茫濃霧遮住了追捕者的視綫,他乘一葉扁舟逃跑了。盡管如此,他還是把蠻族人的入侵看成是不公平時代的結束。這也可能是所有基督教徒的看法,他們一方面認爲入侵是上帝對羅馬人的懲罰,同時也把入侵看成是解放和建立一個更公正合理的法律的時機。

隨着蠻族人的入侵,國家的各種機構相繼瓦解,但是教會組織並未受到影響。原來大部分西班牙—羅馬人早已信奉基督教,在葡萄牙的國土上教堂比比皆是。公元5世紀時,斯維匯人和西哥特人相繼信奉基督教。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教會是同人民接觸的唯一機構。它所主張的正義不是像羅馬時代那樣要求全社會服從國家,而是要通過精神修養達到人的解放。這種情況對中世紀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響。

4 西哥特人

公元 416 年，日耳曼血統並已半羅馬化的西哥特人來到伊比利亞半島。這時，爲了繼續生存，羅馬帝國正全力以赴地對付蠻族人的入侵。手段之一就是挑唆一部分蠻族人去反對另一部分蠻族人。

在同盟者的名義下，西哥特人被派遣到伊比利亞半島，任務是驅除阿拉諾人、汪達爾人和斯維匯人。西哥特人很快地戰勝了阿拉諾人和汪達爾人，但同斯維匯人的斗爭卻曠日持久，十分艱難。大約過了 150 年之後(即公元 585 年)，斯維匯人的君主政體才徹底瓦解。

西哥特人的統治大約持續了三個世紀，但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他們留下的遺迹卻很稀少。這是因爲西哥特人數量不多，而且他們的文化水平比當地的人民還要低。

西哥特人没有帶來新的組織形式和新的勞動技術，他們只是沿用先前羅馬人建立的社會和經濟機構爲自己服務。這個時期，羅馬帝國後期業已開始的衰落過程更加嚴重，貿易活動(尤其是出口)停滯，只有政治地位日益上昇的天主教教會維持着文化生活。西哥特人不信奉天主教，他們是些阿里烏斯教派的信徒(公元 4 世紀阿里烏斯提倡的基督教義)。這樣，西哥特人和西班牙—羅馬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難以和睦相處，兩者各有自己的法律，不同的種族禁止通婚。公元 589 年，西哥特人的國王在其主教和貴族的陪同下，宣佈加入天主教。公元 654 年，制定了統一的法律——西哥特大法，讓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全體居民共同遵守，不管他是哪個種族。今天我們還不清楚這套新的法律在人

民的日常生活中實施的程度，因爲當時建立在財產的血緣基礎上的社會隔離根深蒂固，而且土地的主人都是伊比利亞半島居民的後代。

所以，葡萄牙中世紀的社會的基本成份就是由教會、貴族和平民三個階層組成，這個特徵在西哥特人統治伊比利亞半島時期業已形成。

當出身的貴賤和謀取他人勞動成果的經濟權力掛起鈎的時候，便産生了貴族。羅馬時代，農業村鎮的主人是生活在城市裏的資本家，他把鄉村裏的事情交給工頭去辦。工頭雖然生活上比爲他幹活的勞動者富裕，但卻和他們有着許多共同之處，他們同屬一個種族，同講一種語言，有着相同的嗜好和生活習慣。但是蠻族人的入侵打破了這種局面。土地分給了原先在這些土地上幹活的人，而最好最肥沃的土地則歸蠻族人所有。這些日耳曼地主從前既非農民，又非能工巧匠，而只是一些武夫。他們有着高於他人的社會地位，並非因爲他們是腰纏萬貫的富翁，也不是因爲他們受過教育因而具備指揮他人勞動的才能，而只是因爲他們的種族不同。他們甚至開始形成爲一個獨特的法律階層，他們和西班牙—羅馬人所遵循的并非同一法律。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不同，這就是只有他們擁有軍事義務，因此，只有他們才有權使用武器。

西哥特人與羅馬人不同，他們没有受過文化教育。迄今尚未發現西哥特人學校的遺址、作家的手迹和西哥特人文化中心的遺迹。當時的文化知識完全局限在教堂内。卓越的文化人物有兩位，一個是聖多・伊西多洛・德・塞維利亞，另一個是聖・馬爾蒂尼奥・德・杜麥(或德・布拉加)。前者著有《語言學》一書，這部著作帶有百科全書的性質，書中收集了殘存的古典文化，以

免被人遺忘。後者搜集古書,尤其希臘的書籍,建立了一個圖書館,而且也是一位作家。但是我們不能單憑這兩個例子就得出結論,認爲教育曾主動想方設法保存過去的文化。教會使用的語言是拉丁語,熱愛文化的本能有時也促使它收藏和拯救古典書籍,但是基督教的精神是反對異教的,因而也是反對古典的。

麥爾多拉基督教公墓有塊石頭,據說以前是一座十字架的底座,上面雕刻有一段文字:“朝它跪下,這就是戰勝過去的暴君勢力的標誌。倘若你虔誠地在額頭和胸前劃上這樣的標誌,你就不會懼怕另外一個世界的鬼魂和幽靈。”這是一張地道的宣傳廣告。被擊敗的暴君勢力,就是指的羅馬人的奴役。所謂另一個世界的鬼魂和幽靈,指的是異教邪說的殘渣余孽,尤其是那些據說如果人們不供奉它,便要對人進行報復的凶神惡煞。由於前一時期異教邪説泛濫,所以應該取締對家神的供奉。同樣,建立在異教邪說神話基礎上的星期的名稱,也應該用葡萄牙語這種唯一的新拉丁語來代替。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係來自禮拜儀式的術語。教會文化影響程度之深,從地名上可以看出:羅馬的地名全部消失,幾乎没有留下什麼痕迹,這些名字完全被日耳曼或者基督教的名稱所代替。

作爲居民點,教區代替了農業村鎮的職能,居民區的精神領袖由原先的村鎮領主轉到了教區長身上。教區長不再像羅馬統治時代那樣由教徒選舉產生,而是由受過專門文化教育的教士擔任。幾個教區組成一個主教區,教區長隸屬主教的領導,各教區應將教區收入的三分之一上交主教。這筆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因爲善男信女們爲了死後昇入天堂,不惜金錢,盡力捐贈。教廷很早就開始非常嚴格地管理這筆與日俱增的財富,規定所有屬於教會的財產不得出賣。

教會除了掌握能夠控制人們心靈的精神權力和龐大的經濟實力之外,還掌握着具有決定意義的政權。主教會議,特别是全國或各省級的教士會議,不僅有權制定教會内部的法規,而且可以制定全國範圍内都必須遵守的法律。教士會議認爲它的權限大於國王,因爲國王只是凡人,他應當執行代表上帝的教會所發佈的最高旨意。倘若國王有負於這項崇高的職責,就應該被黜免,國王是否稱職,應由教士會議決定。

8世紀初,伊比利亞半島社會組織的基本成份是:經濟上富裕和政治上强大的教會;擁有財産和軍權的貴族;以及受教會控制的平民。這三種成份是中世紀葡萄牙社會的根基。穆斯林的入侵暫時破壞了這種結構,但是摩爾人的統治結束之後,這種結構又再度恢復,並有了一些變化。

5 摩爾人

公元711年,一支主要由柏柏爾人士兵組成的軍隊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開始了對伊比利亞半島的佔領。這時,正值穆罕默德在阿拉伯講道一百周年(公元612年開始)。這一百年足以使阿拉伯人在從印度洋到大西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宣揚自己的宗教和建立政治統治。他們擴張的速度之所以如此驚人,其原因是:鄰近的波斯和拜占庭兩個帝國實力太弱;近東猶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間正在進行一場殘酷的宗教戰爭;在已被佔領的地區,許多地方受壓迫的民衆都把阿拉伯人作爲解放者加以歡迎。

羅馬人、斯維匯人和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亞半島統治的時間都有記載,但是無法確定穆斯林究竟在這裏統治了多少年,或者説多少個世紀,因爲他們統治的時間在各個地區都不一樣。穆斯

林的統治從未到達最北部的地區;公元 809 年,埃布羅河以北的整個國土又重新處在基督教的統治之下;基督教於公元 868 年分別奪回了波爾圖和布拉加;科英布拉和里斯本分別於 1064 年和 1147 年徹底回到基督教的手中;摩爾人統治塞維利亞、科爾多瓦和法魯達六個世紀之久(一直到 13 世紀中葉);他們統治格林納達近八個世紀,直到 15 世紀末才被驅逐。

由於摩爾人在各地區統治的時間長短不一,因而他們對伊比利亞半島人民的影響程度也不一樣。在葡萄牙,杜羅河以北和內地的丘陵地區,他們的影響微不足道;在埃什特里馬杜拉和海濱城市貝拉,他們的影響則比較明顯;在南方各省,尤其是阿爾加維,影響最大。盡管如此,摩爾人也未能改變這裏居民的基本形態。在語言方面的影響也十分有限,語句結構上没有留下什麼痕迹;在詞彙方面,根據語言學者的統計,在葡萄牙語中也只有 300 到 600 個摩爾人的單詞。

分析一下這些詞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一般來說,新的詞彙是爲了表達新的事物,因此,這些單詞的輸入可以使我們大致想象出阿拉伯人給伊比利亞半島帶來了哪些新的東西。葡萄牙語中的阿拉伯語單詞多數是表示植物名稱,尤其是蔬菜名稱的詞,如稻子、豆、生菜、薰衣草、桔子、檸檬、鬱金草、紅蘿卜、萵苣、苗圃、茵陳蒿、玉米穗、橄欖、橄欖油等;有關利用水利資源的詞彙有:泥水匠、沼澤、塘、牧草、蓄水池、水槽、戽斗、水車、噴泉、水輪等;與商業有關的詞彙有:拍賣、貨棧、阿爾姆德(容量單位,相當於 25 公升)、阿洛巴(重量單位,相當於 15 公斤)、阿拉特爾(重量單位,相當於 459 克)、斗、開(表示黃金純度的單位)、口徑、擔(相當於 60 公斤)、令、馬拉維迪(貨幣單位)、塞伊蒂爾(貨幣單位)、包、堆等;科學詞彙有:酒精、數、曆書、舊書、代數、零、頂點、

方位、配劑、糖漿等等。

這些單詞的輸入意味着從羅馬時代開始大幅度衰退的經濟和技術這時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蘇。水車和使用水磨的技術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水力在許多地方可以代替奴隸的勞動,水車提水可以澆灌小片分散的土 地。這兩個因素合在一起,就爲建立獨立於農業村鎮的小型農場創造了條件,方便了小土地經營。與糧食作物相反,蔬菜和果樹只要有市場,種植小片土地就可維持生活。由於具備了灌漑條件,同時城市又需要蔬菜和水果,所以里斯本地區的農民便成了這種個體農業的代表。

摩爾人對待當地人民的態度取決於這些居民對待新的宗教的態度:倘若接受新的宗教,那麼就可以成爲他們大家庭中的一員,和他們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倘若繼續信仰基督教,雖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土地和進行宗教活動(要受到某些限制),但必須交納賦稅;倘若拿起武器反抗,必定遭到鎮壓,即便僥幸活着,也將被作爲奴隸賣掉。

勞爾旺修道院的一份手稿(《見證》,12 世紀抄本,原件是上個世紀的)裏有一段關於爭奪水磨所有權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公元 987 年,摩爾人再度佔領科英布拉,居住在村鎮裏的基督教徒紛紛逃到深山密林中躲藏起來。孔德沙有個叫埃塞拉坷的基督教徒,前去求見摩爾人的首領,表示願意改變信仰,加入伊斯蘭教。他請求摩爾人的首領給他一點人馬。然後他率領着這些軍隊來到山區,設下圈套。然后朝着自己同胞隱藏的山間高聲叫喊:“上帝保祐的人,出來吧,我已經同摩爾人訂了和約!”基督教徒們信以爲真,一個接一個從山裏出來。這時,埃塞拉坷率領摩爾人士兵猛撲過去,抓獲許多人,把他們帶到聖塔倫作爲奴隸賣掉。埃塞拉坷因此獲得一筆鉅款,但是他

把這些錢作爲禮品送到塞維利亞交給了摩爾人的首領。摩爾人首領爲了表示對他的謝意,下令把一些水磨,以及科英布拉地區的許許多多村鎮的土地賞給了埃塞拉坷。據說,在這些水磨的所有權問題上,水磨主人的後代正在同勞爾旺修道院進行爭執;而這些土地,可能屬於被埃塞拉坷賣掉的那些基督教徒的財產。單憑這一份孤立的資料是不能作結論的。但是這份材料說明面對摩爾人的入侵,基督教徒只有三條選擇:1. 像埃塞拉坷那樣改變信仰,這樣不但能保住原有的一切財產,而且靠賣身投靠還可以發一筆横財;2. 像有些基督教徒原先打算的那樣,等待他們的代表同摩爾人進行和談,並答應向摩爾人交納賦稅,以便回到自己的家園過安居樂業的生活;3. 像有些基督教徒那樣,拿起武器抗擊企圖抓獲他們的摩爾人。在最後一種情況下,即便打了勝仗,以後這些人也得逃到摩爾人未曾涉足的北部地區;倘若打了敗仗,就會作爲奴隸被賣掉。

當時,進行武裝抵抗並非普遍現象。據有關戰爭的資料記載,第一場戰鬥中大部分西哥特人士兵不戰而潰;逃跑者多數是些農奴。許多城市不戰而降。居民們有兩條充足的理由不願去冒生命危險:他們以前交税今後仍舊交税,把税交給摩爾人領主還是基督教徒的主人,都是一回事;雖然摩爾人要求他們加入新的宗教,但並不要求他們那么虔誠。就像後來的猶太人那樣,摩爾人曾多次抱怨說許多基督教徒表面上改變了信仰,但心靈深處仍舊是虔誠的基督徒。再說,改變信仰並非强制,寺院和教堂的大門同時敞開着。而且没有過多長時間,以前的基督教徒們就發現福音和古蘭經的信奉者之間的差異並不像他們原先想象得那麼大。但事實上摩爾人歧視改變信仰者,常常不公正地對待他們。

6 農村的解體 鄉村會議

我們已經講過，在西哥特人的社會裏貴族是職業軍人，按照法律規定，在戰爭中應由他們而不是農奴跟隨國王出征打仗。當然，貴族出征，身邊必然帶着許多家奴幫助他和侍候他。這種貴族出征攜帶大批農奴服侍的傳統在中世紀的軍事組織裏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但是真正打仗的是貴族領主，所以首先遭到戰爭災難的，也是貴族。戰爭毀掉的是貴族階級。

由於戰爭，許多農村失去了領主。没有資料可以證明穆斯林佔領者曾經到過農村。因爲宗教禁止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飲酒，所以他們不從事葡萄酒的生産。在糧食的種植方面，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既未留下物質的東西，亦未留下什麼詞彙；非洲不需要伊比利亞半島的小麥。特别是在特茹河以北地區，生活條件不適宜撒拉遜農民生存，因爲不僅土地零散，而且週圍的人們對他們都懷有敵意。

戰爭爆發後，留在農業村裏的不是領主，而是農奴。當時“農奴”一詞的含義很廣，包括物質生活水平稍微高於農奴的、有小片土地的自耕農。城市生活的振興促進了農業生産，許多古老的羅馬城市，如錫爾維什、麥爾多拉、巴達霍斯、阿爾卡塞杜薩爾、聖塔倫、里斯本、科英布拉等，又成了重要的貿易中心。

大多數自耕農没有應征，繼續在農村生活，但是他們不再受貴族的管轄。村裏雖然没有了領主，但是仍然有許多公共的事宜要解決，如經濟開發（公共的牧場、輪耕、釀酒、糧食的儲存）、公共生活（秩序、防御、交税）等等。這些問題關係到大家的切身利益，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更大的權威獨自做出決定。在這種情况

下，就產生了居民會議，建立了居民共同的權力機構。

在一些文件資料裏把這種村鎮居民會議説成是行使地方人民權力的新形式。

但是不能就此一概而論，例如説這種居民會議是葡萄牙中世紀議會的起源。在一些最重要的城市，中世紀議會的起源，很可能産生於有産者的組織。在西歐就是這樣，那裏掀起的公社運動，矛頭指向過時的、不適應新時代的封建專制。波爾圖發生類似的運動，在反對主教，即城市主宰的鬥爭中成立了由市民組成的市政機構。至於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兩市的情況，我們尚不清楚。但是，一般來説，我們認爲居民會議最初並不是反對領主鬥爭的産物，而是在摩爾人入侵，領主的權力消失之後的間隙中應運而生的。中世紀房屋的遺迹中没有一座樓宇作過議會大廈，這個事實也間接地證實我們的議會起源於農村，而不是城市。在馬德拉群島，居民們聚集在露天或樹蔭下開會的傳統一直持續到15世紀。唯一的例外是所謂的布拉甘薩市政大廈，不過這只是現代學者的杜撰，因爲這座建築物原來並不是用來召開會議，而是用來防護蓄水池的。

7 “收復”

穆斯林并没有佔領貧瘠、崎嶇不平和人烟稀少的阿斯圖里亞斯山區。一個富有神話色彩的傳説中説，摩爾人入侵後，西哥特人的貴族紛紛逃往山中，其中有個貴族叫彼拉伊奥，率領其他逃亡者開展了一場“收復”失地的運動。事實上，誰也説不清這個彼拉伊奥是什麼人。他的名字也不是哥特人的姓氏。9世紀末和10世紀編寫的一些小型編年史裏，作者各自按照自己的想

法,力圖把這個人同古代西哥特的國王聯係起來,並以此說明這些山區勇士同西班牙基督教的"復辟"運動之間有着某種聯係。當時的一個阿拉伯作家說,彼拉伊奧是加利西亞人。現代的一個歷史學家猜測,彼拉伊奧可能是個在君主政體崩潰以後的危機時期贏得了自己同伴擁戴的農奴;還有一個現代的歷史學家認爲,從他的名字結尾來看彼拉伊奧可能是土生土長的阿斯圖里亞斯山人。盡管有關彼拉伊奧的說法很多,但是有一點應該肯定,那就是所謂西哥特人貴族的反抗只不過是圍繞着一個地方首領鬧地方獨立的開始。

遠在公元 750 年之前,駐紮在最北部地區(包括加利西亞在內)的柏柏爾族士兵就舉行過反對阿拉伯人的起義;由於這個地區阿拉伯人爲數不多,所以他們把叙利亞軍隊調來鎮壓這次起義。接着爆發了長期的殘酷的國内戰爭,結果,杜羅河以北的土地完全擺脱或者幾乎完全擺脱了入侵者的統治,因爲駐紮在那兒的柏柏爾人開往南部,以便對阿拉伯人作戰。

這樣,北部地區的西班牙—哥特人開始揚眉吐氣,並且站到阿斯圖里亞斯人一邊,共同反對摩爾人。加利西亞是伊比利亞半島上摩爾人和基督教徒之間戰鬥最激烈、毁壞性最大的地區之一。這種情況對於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某些社會特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響,後來成爲葡萄牙中世紀社會的起源。

在 8 世紀結束之前,主要是摩爾人因國内戰爭撤走了他們的軍隊,其次是因爲基督教不斷的收復失地,伊比利亞半島被分成兩個地區,界綫從科英布拉附近劃起,沿着蒙得戈河,然後穿過塔拉韋拉、托萊多、圖德拉和潘普洛納。除了信奉教會以外,兩個地區的人民不受任何一個固定的常設機構的管轄。有些大教堂的主教已經離開自己的崗位(其中有波爾圖和布拉加大教堂

的主教),但是據說天主教的宗教活動從未完全中斷。

一些歷史學家,其中包括亞力山大·埃爾庫蘭諾,逐字逐句從有關收復時期的編年史書上摘抄了幾句話,特別是薩拉曼卡的主教塞巴斯蒂昂說的那幾句。他說是阿豐索一世(柏柏爾人士兵起義時的一個阿斯圖里亞斯人首領)收復了包括整個加利西亞、米紐、村羅河和一部分現在屬於上貝拉的廣大地區,處決了這裏的摩爾人,並把所有的基督教徒帶到了阿斯圖里亞斯。這就是著名的製造無人區論的來源。既然摩爾人全部被殺,基督教徒全部被帶走,那麼這塊土地也就荒無人烟,社會生活完全中斷;直到這裏最終併入新的基督教王國之後,社會生活才得到恢復。

這種製造無人區的說法後來得到了糾正。當時之所以把基督教徒帶到北部,是因爲哥特人的封建制度正在恢復,農田需要勞力。在死者和傷者之中,總會有人死裏逃生。我們知道,即便今天投擲凝固汽油彈,把大地焚燒一遍,或者密密麻麻地佈滿炸彈,也很難把要頑强活下去的人民滅絕,更何況中世紀戰爭的毀壞能力是極其有限的。所以,盡管當時摩爾人和基督教徒不止一次掃蕩和掠奪這片領土,只不過說明這裏有利可圖,同時這種掠奪也說明這裏並非無人區,而是仍舊有人繼續生活。每當軍隊逼近(有時是摩爾人,有時是基督教徒,但不管是誰,都把自己打扮成是解放者),居民們大概也採用我們前面說過的科英布拉人的辦法,逃往山區隱藏起來,等到這些劫掠者離去後,再回來重建家園和重新播種。這樣,生活的艱難逐漸加强了他們自發的組織形式和人民的政權。

關於這個時期的社會情況,我們瞭解甚少,因爲現有的資料太單薄,主要是記載了歷屆國王的名字以及他們的軍事業績。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有關農奴和領主之間劇烈衝突的記載。上面提

到的薩拉曼卡主教塞巴斯蒂昂曾講述過(此外,阿爾貝達編年史中也有記載,這可能是9世紀的作品,寫於阿爾貝達修道院)一場游民起義,這些游民就是指從前的奴隸的後裔。他説,他們拿起武器,奮勇反抗領主,但是他們失敗了,所以"又重新淪爲奴隸"。還有一些資料提到下層民衆反對貴族的事件。在有些地方還發生過人民反對把他們居住的地區併入基督教統治區的運動。但是這些起義或者暴動都没有宗教背景,因爲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民篤信伊斯蘭教。"收復者"不承認這些地方上成立的居民會議。戰爭的目的只有一個,即佔領土地和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顯然,"十字軍"的思想是在以後的十字軍時代(第一次十字軍東侵——1096年)才出現的。收復失地後要舉行隆重的儀式,鳴號和昇王旗。在荒原上舉行這種儀式顯然大可不必,但也並非毫無意義。它是建立一種既是宗教,又是政治和社會政權的標誌,是福音書戰勝古蘭經的標誌,是新基督教國家戰勝撒拉遜人統治的標誌,同時也是領主社會戰勝地方割據社會的標誌。

8 新的王國和伯爵領地

波圖卡萊領地

在撒拉遜人統治逐漸瓦解的地方,或者説在被基督教徒收復的地方,先前的政權機構並没有原封不動的"復辟",而是根據情況建立了以地方首領爲代表的政權機構。這些機構由於從屬關係不清,因而常常發生時而服從、時而不聽指揮的現象。

伊比利亞半島上新的基督教國家是按以下三個地方爲中心建立起來的:阿斯圖里亞斯地區。以它爲中心建立了奧維多王

國，後來又建立了萊昂王國和卡斯蒂利亞領地。卡斯蒂利亞領地獨立了幾年之後，成爲一個王國，1037年併入萊昂王國。比利牛斯地區。這裏先後成立了納瓦拉和阿拉貢王國以及幾個基本上是獨立的領地。巴塞羅那地區。法蘭克族在這兒起過重要的作用。這裏的政治演變在許多方面是不同於西班牙其他地區的。

當時，各地方國家政權機構都是不完善的。很少有書面的文件，也没有統一的法律。貴族的領地有些是受命於國王，有些則是貴族自己搶佔的。在西班牙，按照貴族的傳統，他們認爲自己對國王不負有任何義務，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這些統治者的稱呼是伯爵或地方最高執行官，他們是地主、武士、地方長官和强盜的混合體。但是只要國王下令，他們便會奔赴戰場，或者出席國王召集的重要會議。但是這些伯爵之間互相廝殺，有的舉兵反對國王，甚至和摩爾人勾結在一起反對基督教國王的事也是常見的。10世紀末，在摩爾人將領阿爾曼索爾洗劫坎波斯特拉市(當時它已經是朝聖的中心)和搶掠大教堂大鐘的事件中，就有許多基督教徒伯爵參與。

當時經常提到的加利西亞的政局也是如此。它後來成爲一個王國，但以前只是一個伯爵領地的地位。籠統地講，它的邊界一直延伸到杜羅河，但是在它的腹地還有一些地盤或者領地是受萊昂國王管轄的伯爵統治。

9世紀末，開始出現波圖卡萊伯爵領地。它的邊界雖然非常不明確，但無疑包括米紐和杜羅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人們之所以稱它波圖卡萊伯爵領地，是因爲位於杜羅河入海口附近有一個主要的村莊波圖卡萊鎮的緣故。該鎮於9世紀中葉被維瑪拉·皮列士伯爵“收復”並引來了居民的。伯爵的後代、著名的姆瑪多

娜女伯爵在吉馬良斯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並讓人建造聖馬麥德城堡。這個城堡就是波圖卡萊鎮的起源,後來成爲波圖卡萊伯爵領地的首府,並在葡萄牙國家形成的初期起過重要的政治作用。姆瑪多娜女伯爵的兒子、孫子和玄孫都先後統治過這片領地。他們享有半獨立的權利,政治力量日漸强大。姆瑪多娜的兒子貢薩洛・蒙代斯伯爵曾把自己喜歡的人加冕爲萊昂的國王。强大的蒙代斯家族曾經幫助D・阿豐索・恩里格斯贏得獨立。現代的歷史學家要求大家注意研究這個半獨立的家族世襲政權對葡萄牙君主制度政治獨立的影響,是有道理的。

再靠南的地區,也建立了一個伯爵領地,首府設在科英布拉;其政權長期以來也是由一家波圖卡萊貴族控制,直到後來該領地重新落入撒拉遜人之手。公元1063或者1064年,該地區被徹底收復,政權交給了在穆斯林面前卑躬屈節的基督教徒塞斯南多,在杜羅河以南這個獨特的社會裏,他成了顯赫一時的人物。塞斯南多誕生在滕士加爾,可能是猶太人的後代,父親叫達維德,母親名叫蘇珊娜,都是希伯來人的名字。在摩爾人進行的一次掃蕩中,塞斯南多成了俘虜,被帶往塞維利亞,在那裏他背叛了基督教義。但從此他卻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當上了塞維利亞大臣。那時候基督教徒背棄原來的信仰轉而爲摩爾人效勞撈取高官厚祿的事是常有的;同樣,一些摩爾人受到基督教國王的重用,委以要職,也是屢見不鮮的。但是這位塞斯南多大臣後來又搖身一變,再次改變信仰,投靠了萊昂國王費爾南多。根據當時的傳聞,是他爲萊昂國王出謀劃策,使其收復科英布拉的。的確,科英布拉在經過長期的圍攻之後,又落入基督教徒手中,這位昔日曾任摩爾人大臣的塞斯南多統治科英布拉直到逝世(1091年)爲止。在此期間,塞斯南多把他的一個女兒嫁給了波

圖卡萊伯爵努諾・蒙代斯爲妻。公元1071年,這位伯爵策動一場叛亂反對加利西亞的國王,結果死於沙場。至於這位狡黠的、反復無常的塞斯南多在這場企圖割據的叛亂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則尚未弄清。但是他在統治科英布拉期間,政績昭著:修築了城牆,恢復了主教教區,不顧羅馬的抗議爲主教區挑選了主教(由於這場衝突產生了D・阿豐索・恩里格斯是黑主教的傳說),爲內地許多地方遷移了居民。在大約三十年中間,從杜羅河南部到科英布拉以南的塞伊亞、洛烏沙、索烏利、直到大西洋之濱,當時的漁港馬利尼亞達斯翁達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塞斯南多可以說是個小小的國王。臨死之際,他把自己的一個女婿安插到科英布拉的政權機關,但是這時萊昂的國王開始奉行統一政策,竭力阻撓伯爵世襲制的實施。

但是11世紀末,萊昂和卡斯蒂利亞的政治狀況已經起了變化,統治機構完善,克盧尼教派的影響已波及到此。佩拉久教派的野蠻時期已成爲遙遠的往事。在基督教的歐洲,萊昂和卡斯蒂利亞的阿豐索六世已擁有强大的力量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爲興建當時基督教最爲雄偉壯麗的克盧尼三世教堂提供了大量資金。

阿豐索六世同克盧尼教派及其領袖聖烏高的這種關係,可能是上等貴族包爾戈尼亞公爵家族中的D・賴蒙多和D・恩里格兩位貴族來到伊比利亞半島的原因。阿豐索六世把女兒烏拉卡嫁給D・賴蒙多,把私生女D・特列莎嫁給了D・恩里格。D・烏拉卡後來繼承了王位。D・阿豐索六世把加利西亞的政權交給了女婿D・賴蒙多,把現在包括杜羅河南北兩個從前的伯爵領地的波圖卡萊領地交給女婿D・恩里格。

這些邊陲地區過去不止一次地鬧地方割據,阿豐索六世任

命王室成員取代地方家族執政，可能是爲了剎住地方自治的傾向。但是，如果這就是他當年的打算的話，後來的事實并未使他如願，因爲南北聯合是葡萄牙獨立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1128～1223年

國家的獨立和國家組織

9　獨立的政治過程

從什麽時候開始葡萄牙才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爲了尋求答案，無數著作家一直在潛心研究。他們認爲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是困難的，因爲葡萄牙的獨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政治概念非常明確、宣佈獨立的時刻十分清楚。葡萄牙的獨立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經過了許多階段，其中最重要的階段有：1128年阿豐索・恩里格斯的起義和奪取波圖卡萊領地的政權、1137年的圖伊和約、1143年的薩摩拉會議和宣誓聽命於教皇、1157年阿豐索七世逝世後皇帝稱號的廢除、1179年教皇的聖諭和教廷對新的君主制度的承認。

葡萄牙的獨立與伊比利亞半島上各個基督教王國的政治狀

況是密切相關的。國王阿豐索六世把自己的權力延伸到大半個西班牙。1087年，他使用的頭銜是“西班牙國全權皇帝”，1091年用的頭銜是“西班牙皇帝”。這兩個莊嚴的頭銜反映出他野心勃勃地想把伊比利亞半島上縱橫交錯的國界抹去，或者起碼使這些國界變得十分淡漠，在服從於一個皇帝權力的基礎上把伊比利亞半島變成一個政治整體，也就是說伊比利亞半島上只有一個皇帝，其餘王室都是他的附庸。但是1109年阿豐索六世死後反對萊昂人權力與日俱增的强大浪潮席卷各地。多年來王位繼承人烏拉卡女王不但與阿拉貢的國王爭奪基督教的西班牙的政治領導權，而且還同坎波斯特拉的大主教爭奪加利西亞的管轄權。阿斯圖里亞斯伯爵D·阿豐索·恩里格斯舉行起義，企圖與皇帝平起平坐。起義失敗後，他逃到葡萄牙，被圍困在吉馬良斯，關於艾卡斯·摩尼司忠心耿耿的傳說就起源於這次著名的包圍。艾卡斯·摩尼司是波圖卡萊領地的一個富豪，與蒙代斯伯爵世家關係密切，而這個傳說還涉及到我們熟悉的關於阿豐索六世妥協的故事。但是吉馬良斯的有産者全力支持阿豐索·恩里格斯親王的起義，這可不是傳説，而是確鑿的事實。1128年，在批准地方行政法時，D·阿豐索·恩里格斯明確地提到了這一支持。1130年，法律規定不經居民同意任何人不得在吉馬良斯鎮修建住宅，唯獨D·阿豐索·恩里格斯享有例外的特權。

萊昂和卡斯蒂利亞的國王好不容易才把這場旨在要求地方自治的運動暫時平息下去。1135年6月，阿豐索六世的外孫，即統治過加利西亞的賴蒙多伯爵和烏拉卡女王的兒子在萊昂的主教堂舉行極其隆重的加冕典禮，自封爲“西班牙皇帝”，凡隸屬於他的其他王國的國王和伯爵全部出席了典禮儀式，唯獨阿豐索·恩里格斯拒絶參加，這一對抗舉動是葡萄牙開始獨立的最

早和最有代表性的標誌之一。

從此以後的數年中，西班牙皇帝和葡萄牙親王之間的戰爭連年不斷。有關這次戰爭的記載卷帙浩繁，但是這些文件過於簡單，往往只有隻言片語。但是人們就是根據這些隻言片語，加以發揮，寫成了長篇鉅著。這些作品的主題都是圍繞着一切爲了爭取葡萄牙獨立這個中心思想。可以肯定的是葡萄牙人在上米紐地區采取了軍事行動，圖伊成了這次分裂的焦點。1137 年恢復了和平（圖伊和約），阿豐索・恩里格斯答應對皇帝"忠誠、保障安全和協助他對付敵人"。

1140 年，葡萄牙首領 D・阿豐索・恩里格斯宣佈稱王（1139 年的文件上已經用了國王的稱號，但人們對這個日期的確切性有疑問）。在此之前，這個領地的首腦是以王子或親王的身份出現的。但這只不過是王族身世的世襲。事實上，他確實是阿豐索六世的外孫，他的母親因爲是國王的女兒，也多次署名"女王"。宣佈稱王是一種進展，但它本身并不意味着王國已經獲得獨立。我們已經講過，從 1135 年起阿豐索七世自稱是整個西班牙的皇帝，許多隸屬於他的親王都成了國王，這件事不僅沒有損害反而有助於他保持皇帝權力的完整性。

1143 年，在爭取獨立的政治鬥爭中發生過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事情：D・阿豐索・恩里格斯和"西班牙皇帝"在薩摩拉會晤，參加會議的還有以教皇大使身份來伊比利亞半島的羅馬紅衣主教，他是來主持召開巴利阿多里德教士會議的。很有可能（因爲沒有證據）他從羅馬帶來了調解兩位基督教親王的指示，因爲他們之間不和只會使摩爾人從中漁利；羅馬不能對西班牙所發生的一切熟視無睹，因爲基督教的中心地之一——坎波斯特拉聖殿就在加利西亞。

我們不知道這次薩摩拉會議是否達成了什麼協議，因爲到目前爲止尚未發現過任何協議的條文。但是有文件證明，會議一結束，葡萄牙的國王 D・阿豐索・恩里格斯立即給羅馬寄去一份聲明，莊嚴宣稱：他和他的繼承人將是羅馬教皇的“納貢者”，而且還聲明只要教皇維護他的權利不受其他教會或者政治權力的侵犯，他將永遠是“教皇和聖・彼得的信徒和衛士”。就在這個聲明裏，D・阿豐索・恩里格斯答應交納四盎司黃金（約 122 克），後來增加到兩個馬克（約 465 克黃金）。

聲明的原文如下：

> 阿豐索・恩里格斯，經伊諾塞西奧二世的批准，爲自己和他的國家爭得了享有羅馬自由法的特權。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凡是享有羅馬自由法特權的修道院、主教區或者王國，就不再受以前的地方政權和教會權力機構的管轄，從今以後，它只承認羅馬教廷及其大使的領導，並向教廷交納少量的貢稅（貢薩卡・德・阿塞維多，Ⅳ，29）。

葡萄牙獨立過程中的最後一件事，是羅馬教皇對 D・阿豐索・恩里格斯王位的正式承認。這件事發生在 1179 年，也就是 D・阿豐索・恩里格斯王朝快要結束的時候；在正式承認之前，羅馬的外交官員巧妙地避免稱 D・阿豐索・恩里格斯爲國王。後來 D・阿豐索・恩里格斯拿出一千枚金幣換得了羅馬的讓步。當然羅馬稱不稱 D・阿豐索・恩里格斯爲國王，對於鞏固葡萄牙的獨立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爲獨立已是既成的事實。西班牙已經不存在“皇帝”。那種按照封建意識，企圖把伊比利亞半島變成一個統一體的勢力已阻擋不住分裂的趨向。D・阿豐索

・恩里格斯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幾個國王之一，1179 年通過長期英明的領導證明他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君主。

10 人民和獨立

以上講的是獨立的政治過程。但是靠哪些力量贏得了獨立呢？是哪些力量促成了這種政治過程的發生並使其持續了下來呢？

每個著作家都有自己的見解。17 世紀，有人把奧里克戰役的出奇制勝説成是國家獨立的真正基礎。後來又相繼出現了其他一些看法，諸如波圖卡萊男爵同加利西亞男爵的衝突（由於D・特列莎女伯爵依靠加利西亞男爵，因而激起了兒子的反對），葡萄牙的主教想使自己的主教區獨立於萊昂主教區而提供的支持，沿海居民的活動和早已開展的貿易往來，等等。

所有這些見解都有正確的成份，但是如果不把人民的力量，不把生活在這塊領土上的人民的社會狀況也包括進去，那麼國家獨立的因素就永遠不可能完整。D・阿豐索・恩里格斯用自己的智慧，乘阿豐索六世死後出現的政治危機，趁封建諸侯爭權奪利之機，建立王國，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機構能維持數百年之久，説明國家的背後有人支持，使它能夠繼續存在。

造成忽視人民在葡萄牙獨立過程中的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因爲缺乏文字記載資料。現有的文字記載，涉及的幾乎全部是教會或者產業主。因此，一般提到的是地主階級，尤其是教會。當時會寫字的人只有教士。修道院很早以前就建立了自己的資料室。因此，一般來説編寫一部修道院的歷史比寫一部城市的

歷史要容易得多，編一部教堂神父的歷史自然也要比編寫一部地區的歷史容易些。所以單從文字記載來看，没有資料和没有歷史，造成了對歷史的看法不全面或者曲解，認爲人民幾乎没有起任何作用。

但是有迹象表明，無論從這塊土地上的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對開始的獨立的支持的態度來看，人民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失地收復後，貴族的權力得到了恢復，但它的統治隨着向南部的延伸而漸減弱：加利西亞地區統治較嚴，杜羅河和米紐之間地區次之，杜羅河以南由於人民居住分散，既没有領主又無市政組織，所以這兒幾乎感覺不到貴族階級的統治。從杜羅河南北兩岸以“鎮”和“宮”兩詞稱呼的地名的百分比來看，仍舊保留着這種統治程度差異的痕迹。“鎮”來自古羅馬的殖民點，而“宮”則表示有了新的領主的“鎮”，領主居住在“宮”裏。根據奧爾蘭多·里貝羅的統計，在我國杜羅河以北的領土上，共有 353 個“鎮”，有 328 個“宮”。在貝拉地區，它們之間的比例有了很大的變化，“鎮”有 217 個，“宮”有 78 個。因此，在南方領主的數目比在北方要少得多。

比特立亞斯（中世紀的自由城市——譯者）的坐落位置也證實了上述情況。比特立亞斯是一種介於鄉鎮和封建領地之間的一種市鎮。鄉村或者地區的居民雖然受某一個貴族領主的管轄，但是居民有選舉他或不選舉他的權力。比特立亞斯在加利西亞地區是比比皆是，在米紐地區已屬罕見，在杜羅河以南幾乎看不到這種市鎮。在這些地區，隨着比特立亞斯數目的減少，居民集體行使權力的鄉鎮或者居民點的比例則逐漸增加。

D·阿豐索·恩里格斯誕生時已有大量的鄉鎮存在。科英

布拉及其地區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1111 年的起義是科英布拉市生氣勃勃的象徵；在這次起義中市民們顯示了强大的力量，不僅爭取制定了一部新的地方行政法，使居民們有了更多的權益，而且還拒絕了兩名城市人民深惡痛絶的稅務官進入科英布拉。1145 年科英布拉市自治權擴大的另一個事實就是它有權禁止其公民前往耶路撒冷，即禁止他們應徵參加第二次十字軍東侵。至於吉馬良斯的市民在支持 D・阿豐索・恩里格斯爭取獨立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有兩種地區，一種是領主佔統治地位、人民處在附庸地位，並有各種奴隸性規定的地區，另一種是人民享有自治權利、社會生活比較自由的地區，這兩種地區的同時存在不能不被認爲是獨立的社會因素。當時，國王的權威是平衡各個對立階級的利益的唯一力量，也是保證人民反對特權階級的壓迫、爭取社會進步的唯一力量。

另一方面，市政組織則向國王提供軍事力量，使其成爲一個能夠壓倒所有其他貴族勢力的貴族，這是王室權威的根本基礎。

從現在的資料來看，D・阿豐索・恩里格斯在歷次戰爭中所調用的軍隊都是各市的軍隊。佔領聖塔倫的科英布拉的軍隊，跟隨"無所畏懼"的熱拉爾多在阿連特如南征北戰的也是科英布拉的士兵；費爾南・貢薩爾維斯佔領貝雅時率領的是聖塔倫的平民騎士。D・阿豐索・恩里格斯第一次企圖攻佔阿爾卡塞爾杜薩爾時帶領的是手執盾、矛和刀劍的平民騎士，他們不像貴族騎士那樣佩帶胸甲。攻佔里斯本的軍隊也是從各地調集來的。在圍攻過程中 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允許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因爲按照地方行政法的規定，他們已經服滿了他們

應服若干星期兵役的期限，國王尊重他們享有的權利。

11 佔領領土

D·阿豐索·恩里格斯宣佈稱王的時候，這個新王國的邊界從科英布拉稍南一點的地方（萊里亞城堡是戰鬥的前沿陣地）起，穿過洛烏薩山，一直延伸到下貝拉平原，這裏既非摩爾人佔領區也非基督教佔領區。

1147年，佔領聖塔倫和里斯本，以及佔領里斯本後又相繼攻佔辛特拉、阿爾馬達和帕爾麥拉，是這片領土擴張的第一步。1249年，最後佔領了法魯。這種搶佔領土的時期大約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中間也有較長的和平時期，以及由於摩爾人的反攻而造成的失利，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1190～1191年，摩爾人又重新佔領了特茹河以南的領土。

當時和我國毗鄰的是些弱小的伊斯蘭諸侯國（11世紀伊斯蘭統治解體之後西班牙分裂成若干諸侯國），它們內部空虛而且四分五裂，盡管如此，葡萄牙也無力組織一支足夠的軍事力量對它們進行討伐，因此不得不多次伸手向前往巴勒斯坦在我國港口作短暫停留的北歐軍隊求援。D·阿豐索·恩里格斯向他們提出希望他們給予軍事合作，幫助佔領他想佔領的城市。肩負這些使命的外交官是些主教，他們在說服十字軍的首領時說：同西班牙的異教徒打仗，同解放聖地一樣神聖，同時答應一旦攻佔了這些城市，十字軍可以進行搶劫，作爲犒賞。D·阿豐索·恩里格斯於1147年佔領了里斯本，D·桑紹於1187年佔領了阿沃爾和錫爾維什，D·阿豐索二世於1217年佔領了阿爾卡塞爾杜薩爾。

沒有資料記載葡萄牙人單獨地包圍過什麼城市，因爲要包圍一個城市必須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葡萄牙人在沒有十字軍的支援而孤軍作戰時，往往采用奇襲的戰術。佔領聖塔倫和埃武臘用的就是這種戰術。12 世紀末或 13 世紀初，《聖・特奧托尼奧生平》一書說 D・阿豐索・恩里格斯發明一種偷襲作戰新法。所謂偷襲不只意味着盜賊的那種偷襲，還意味着用少數人馬進行突然的、出其不意的軍事行動。這種戰術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爲它別具一格，不同於其他國王的作戰手法。這種戰術上的差異也是開國國王 D・阿豐索・恩里格斯所依靠的軍隊具有人民性的又一證明。《哥特人的編年史》在提到“無所畏懼”的熱拉爾多統率的軍隊時，說它是一幫自募糧餉打仗的强盜。但是很有可能是 D・阿豐索・恩里格斯爲他提供了軍餉，讓他在政治協定不允許國王作戰的土地上爲國王打仗。熱拉爾多一直把摩爾人驅趕到埃什特里馬杜拉境內的特魯希略。按規定，其佔領權應屬卡斯蒂利亞國王。但是熱拉爾多并非貴族，而是一支奇特的、與封建帝王近衛軍毫無相似之處的軍隊的著名將領。

13 世紀上半葉，佔領領土的戰爭進入了第二階段。弱小的穆斯林國家正在分崩離析，而且互相厮殺，這就爲葡萄牙向南推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D・桑紹二世統治期間，由於大貴族階級在政治上佔優勢，所以這個時期的征討戰爭格外頻繁。1229 年佔領了埃爾瓦什和茹洛麥尼亞，1232 年佔領了莫拉和塞爾帕，1234 年佔領了阿爾儒斯特雷爾，1240 年佔領了麥爾多拉和艾亞蒙特。D・阿豐索・德・博羅尼亞執政期間，佔領了阿爾加維，1249 年佔領了法魯，1250 年佔領了整個阿爾加維西部。當時的一樁奇聞是波爾圖市的民兵并沒有去攻佔法魯，而是拿錢買下了這座城市。

在阿連特如和阿爾加維地區，有一部分地方不是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直接佔領的，而是由修道院的騎士團，尤其是聖地亞哥的騎士佔領的。爲了酬謝他們，D·阿豐索·恩里格斯贈送了大批帶有半封建性質的禮品，其中包括把佔領的土地交給修道院管理。這樣，寺院就成了地主，他們經營土地的方式是把大片土地租賃給農場主。有些人認爲，這樣做的結果阻礙了平民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爲阿連特如的大地主所有制提供了方便。

葡萄牙對阿爾加維的佔領引起了同卡斯蒂利亞的衝突。卡斯蒂利亞認爲這個地區歸它所有。爲了換取卡斯蒂利亞國王的軍事支援，D·桑紹二世似乎承認過這種要求。正因爲如此，内戰剛一結束，D·阿豐索就急於佔領尚在摩爾人手裏的地盤，以便使卡斯蒂利亞人面對既成事實。

卡斯蒂利亞國王堅持自己的權利，因此發生了一場短期的戰爭（1252～1253），爾後又開始談判。1267年，在巴達霍斯簽訂條約，規定從卡伊亞河到大西洋，兩國以瓜迪亞納河爲界。這樣，葡萄牙放棄了阿拉塞納地區，卡斯蒂利亞也情願舍棄阿爾加維。於是當時的國土與今天的面積已十分相似。後來又提出了里巴果阿的問題（根據1297年簽訂的阿爾卡尼條約，薩布伽爾、卡什特洛羅德里洛、阿爾梅達等地方歸葡萄牙所有）。兩國的邊界就此劃定。

12　奥里克之戰：事實和神話

奥里克戰鬥發生在D·阿豐索·恩里格斯開始使用國王頭銜的前一年，即1139年的7月25日。在歷時數百年的抗擊摩

爾人的戰爭史上，這是最爲著名的一役。

這場戰鬥之所以出名，原因有三個：事實，神話和揭穿神話。

事實是當時基督教徒經常進入摩爾人的居住地搶牲畜、抓奴隸和搶劫財物，因而導致了同摩爾人的戰爭。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有一次一支摩爾人的軍隊堵住了基督教軍隊的去路，雖然這些人在數量上處於很大的劣勢，但是仍然把摩爾人打得落花流水。

這次戰鬥可能發生在奧里克，即現在的下阿連特如，中世紀稱奧里克。這個地方引起了歷史學家一場大的爭論，因爲當時最遠的邊界是萊里亞，D・阿豐索・恩里格斯竟敢冒險到如此遙遠的地方作戰，歷史學家對此感到迷惑不解。但是D・阿豐索・恩里格斯侵佔的地方似乎還有比此更遠的。12世紀末《聖・特奧托尼奧生平》一書的手抄本說，有一次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軍隊甚至到達了塞維利亞附近。在他統治期間，王位的繼承人也曾到過塞維利亞郊區搶劫，有資料說，他殺了許多人，以致死者的鮮血都染紅了瓜達爾基維爾河的河水……

關於奧里克之役，可以說得確切的事不多。各種說法都强調摩爾人的數量，但是這些描寫都是誇大其詞。一篇文章說摩爾人的軍隊有一萬人，另外一些資料則說有四萬人。後來，葡萄牙的編年史作者在四萬後面又加了一個零，結果成了40萬人。毫無疑問，這場輝煌的戰果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過多年之後，國王的官員曾到此調查，爲此，詢問了村上年邁的老人。當問一位老人發生戰鬥那年他幾歲的時候，他回答說不知道。但是他卻能回憶起奧里克戰鬥那陣子他是個20歲左右的小夥子。

圍繞着這個中心，人們盡情發揮，結果成了一個神話，並在葡萄牙的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

這個神話源於何時，誰也説不清，很可能就源於戰鬥的當天。説來也巧，戰鬥打響那天教堂正在集會紀念坎波斯特拉當聖地亞哥節。在民間傳説中，聖地亞哥被認爲是基督教徒在同摩爾人作戰中的保護神，他是“摩爾人的剋星”。那天是紀念他的日子，他一定會騎上一頭雪白的大馬前來協助基督教徒。聖地亞哥的這些聖迹在加利西亞是家喻户曉，而且早已傳到了葡萄牙。科英布拉的人民也知道這些故事；當萊昂的費爾南多一世從摩爾人的手裏奪取這座城市時，“摩爾人的剋星”就曾出現過，因爲那天也是他的紀念日。人們没有忘卻此事，那些傳經佈道的人更是銘記在心。13世紀，科英布拉有個偉大的傳教士，名叫弗列伊·帕伊奥，在他的佈道手稿中有一篇講的就是這件事。但是這並不是他編造的，因爲12世紀初西蘭塞寫的編年史中就有過這樣的記載。

初期，奥里克戰鬥的事迹不過是聖地亞哥的無數個聖迹之一，因爲在葡萄牙發現了許多塊記載着其他聖迹的墓碑。在這些碑石上繪有這個聖人砍殺摩爾人頭顱的情景，其中有一塊後來定爲埃武臘市的市徽。這些墓碑不僅形狀上和加利西亞各地發現的墓碑相似，而且紀念的事迹也相差無幾。但是，其中有一塊與衆不同：在聖人寶劍的上方，空中懸挂着一塊繪有五個盾牌的國徽。很早以前，傳説就把這種徽誌與奥里克聯係在一起。在葡萄牙早期的資料中，如《聖·特奥托尼奥生平》一書，在講到奥里克的聖迹時是這樣説的：那天恰好是聖地亞哥的紀念日，靠他的幫助和保祐，才取得了勝利。

後來，“摩爾人的剋星”聖地亞哥從神話裏消失了。原因是

在我國同卡斯蒂利亞的戰爭中他成了我們敵人的保護神，因爲必須用英格蘭人借給我們的聖·喬治代替他。同卡斯蒂利亞戰爭的勝利，象徵着我國獨立的開始，而當時要求獨立則被説成是反對卡斯蒂利亞。所以把對卡斯蒂利亞戰爭的勝利歸功於一個卡斯蒂利亞化的聖人，顯然是難以接受的。在 1419 年編寫的一部葡萄牙前七任國王的編年史中，第一次對奧里克戰鬥的奇迹作了完整的描述。《聖·特奥托尼奥生平》一書中説，D·阿豐索·恩里格斯竭力爲他的士兵打氣，對他們説上帝會幫助他們的，今天是聖地亞哥的紀念日，他會指引我們的。但是後來這段故事又進一步發展，把奇迹完全歸功於基督。1419 年的説法成了後來種種説法的根據，但是這些説法已經不再提聖地亞哥的名字了。

15 世紀的反對卡斯蒂利亞的思潮使奧里克戰鬥的神話發生了第一次變化；17 世紀的反對西班牙的思潮，給這個神話帶來了第二次變化。以後，在阿爾科巴薩制定的“法律文件”發展并確認了這個神話。從此以後，奧里克成了一種政治依據；上帝親自干與這場戰鬥，説明葡萄牙的獨立是上帝宇宙計劃的一部分，因此是永恒的。在整個菲利普統治時期，這個神話在人民中間廣爲傳播，成了反抗的信條。

奧里克神話出名的第三個原因，是揭穿這個神話所引起的風波。早在歷史學家艾爾庫蘭諾之前許多年，這件事的歷史真實性已被否定。例如，在《葡萄牙歷史》第一卷出版前一百年，即 1746 年出版的《真正的研究方法》一書裏，路易斯·安東尼奧·維爾内就否定了它的真實性。不過當時他的越軌行爲没有引起爆炸性的文件衝突，他的不虔誠的作法亦未激起抗議的呼聲。艾爾庫蘭諾稱這個神話爲寓言，因此引起極其强烈的反對，

他被指責爲信仰的大敵，真理的大敵，國家榮譽的詆毁者。後來艾爾庫蘭諾發表了兩本著名的小册子作爲回答：《我和教會》和《論戰》。這場論戰持續了很長時間，幾乎和奧里克戰鬥享有同樣的盛名。這場論戰就是對一百多年前葡萄牙文化界思想狀况的最好的説明。

13 社會各階級

小學課本把古代社會的階級分爲教士、貴族和平民。五百年前，費爾南·羅佩斯使用了一個最爲簡單、最爲確切的概念，即大人物和小百姓。12 世紀對社會的劃分是：免税者、平民和半奴隸。

免税者係特别受到優惠的階級。所謂免税是指不從自己土地的收益中拿出任何部分交給國王，原因是地主代行了國王的統治權力，因此，應該得到一部分收益。根據地主的身份這種不向國王交納税收的土地稱爲教會屬地或貴族屬地。

1. 教士

在基督教的教徒當中，唯獨教士具備文化素養。他們組織健全，有自己的權利，有等級之分。他們行使的權力，其來源不同於政權。在世界上，教會代表上帝，而上帝則高於所有的國王。因此教會的權力總要超越國王的權力。這就是爲什麽歐洲的幾場大的政治鬥爭都發生在教皇（即宗教的權力）和帝國（即政權）之間的根本原因。

在葡萄牙，第一任國王 D·阿豐索·恩里格斯在這方面奉行了一條極其巧妙的政策。他保護教會，因而得到勢力强大的

教會當局的支持。在他登上國王的寶座之前，簽署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文件：承認布拉加大主教享有一切大的特權，授予他爲籌資修建主教堂而鑄造貨幣的權利（D・阿豐索・恩里格斯說這是仿效他祖父的榜樣，在建造坎波斯特拉主教堂時有過先例），并且許諾說一旦他當上國王，保留大主教原先對布拉加市享有的一些權利，絕不同他爭奪，以此來換取大主教的幫助。雙方都恪守協定。帕伊奧・蒙代斯大主教是波圖卡萊伯爵蒙代斯家族的成員，他和他之後的D・若奧・彼古里亞爾大主教都是D・阿豐索・恩里格斯爭取獨立鬥爭的主要支持者。他登基後，從未和教會發生過爭執，並且大量捐贈，擴大了教會的財產。在葡萄牙，教會和政府爭權奪利的鬥爭，是以後幾個朝代的事，13世紀自始至終充滿了這種鬥爭。

2. 貴族

教士是一個大門敞開的社會階級，因而是才華之士的自然歸宿。貴族則不然，它是一個由出身決定的社會階級。當然，國王也賜封貴族，但是一般而論，只有貴族的兒子才能繼承貴族的頭銜。

貴族分爲幾個等級：統轄較多土地的大貴族，亦稱富豪；出身名門望族的享有有限繼承權的貴族；騎士——他們生於貴族之家，但是往往除了一匹出征打仗的戰馬和自己的身軀之外，一無所有。

貴族不必參加勞動。當然，要想過不勞而獲的生活，必須要有某項收入。而要得到收入，必須擁有一片土地和在土地上幹活的人，只有具備了這樣的條件，貴族才能坐享其成。不過當時貴族的經濟困難日益嚴重，原因有三個：1. 土地代代瓜分，

越分越小；2. 在貴族土地上幹活的人不斷逃到比較自由的地區；3. 生活的費用不斷地提高。

貴族生來就是靠土地收入生活的。他只要發號施令就可以了，連一分錢的工錢都不用支付，因爲幹活的人全是他的僕人。但是葡萄牙誕生後，這種局面日漸消失，自由人的勞動，也就是要求付報酬的勞動日益成爲生產的基礎。當時支付報酬的主要形式有兩種：1. 把相當大的一部分勞動成果作爲報酬付給勞動者（從這時開始，租賃土地合同有了飛躍的發展）；2. 付錢，或付給等價的物品。支付貨幣也是爲了換取土地不能生產的物品，如武器、馬匹、衣服、裝飾品、鐵器、建築材料等。在 12 世紀，需要用錢購買的物品的品種不斷增加。

這樣，貴族逐漸變成了平民勞動力的僱傭者。對此，貴族當然咬牙切齒，因爲在他們看來，平民養活貴族，貴族在平民家裏吃住以及平民爲貴族無償地勞動，是他們的天然權利。貴族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們不願意輕易地放棄這種地位。平民的看法與此針鋒相對，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持續了數百年之久。

3. 平民

平民構成了另外一個天地。

“平民”這個稱號包括許多人群和五花八門的行業。就其特徵而論，應分爲農村的富裕平民和農村的貧窮平民。城市的平民（後來稱市民）也有富裕的（今天稱有產者）和貧窮的（費爾南·羅佩斯稱之爲小百姓）之分。平民有一共性，這就是他們不是貴族，而是些自由民。他們勞動是爲了謀生（這是不同於貴族的地方），但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勞動的地方，可以自由

要價錢（這是不同於半農奴的地方）。

根據地方行政法的規定，按照收入的多寡，平民劃分爲騎士和步兵。富裕的平民必須飼養馬匹和備有兵器，以準備隨時應徵，貧窮的平民則要徒步應徵。但是，有意思的是騎士這個意味着貴族的詞，現在用來表示富裕的平民了。

的確，富裕的平民在人民中間開始起小貴族的作用了。雖然富裕的平民和其他的平民一樣在國王下令大興土木的工地上服勞役，但是他們的工作只不過揮舞棍棒督促其他平民幹活而已。13世紀，在馬爾望工地上曾經發生過强迫富裕的平民去拉水的事，他們對此曾提出控訴。

富裕的平民，是第一批來到這塊土地上、在此安家落户、發迹和取得城市管轄權的那些客籍者的後代。現在他們把持權力，并把這種權力行使到後來的小百姓身上。這兩部分人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據1227年一份文件的記載，里斯本的法官不敢受理窮人遞交的狀子，因爲有權勢的平民從中阻攔。據我所知，這是最早提到里斯本小百姓的一份資料。國王認爲貧窮的平民有理，因此下令把那些阻撓對窮人做出公平合理判決的權貴驅逐出里斯本，並没收其全部財産。14世紀末爆發的那場緊張衝突的起源就在於此。

4. 半農奴

半農奴係收復領土時期已經居住并繼續居住在這裏的居民的後代。佔領這塊土地的貴族，或是接受國王的饋贈而擁有土地的貴族，成爲這塊土地和在土地上勞動的人的主人。半農奴不是奴隸，不能買賣，盡管在買賣土地時誰都明白這是包括他們在内的。半農奴勞動的成果被送進主人的地窖，或運進主人

的糧倉。由於他們的勞動，土地才能生長出莊稼，因此，人們往往把半農奴看成是領主財産的組成部分。倘若一塊土地没有半農奴進行耕種，那麼這塊土地就賣不出大價錢，其原因就是收益不大。當國王使用抄家的辦法懲辦一個富豪的時候，對他家裏的人採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半農奴，是把他們連同牲畜一起帶走；對待平民，則僅僅是收繳他們的武器和手中的錢。

和其他階級一樣，半農奴處在迅速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是上昇性的。有的半農奴離開祖居，到貝拉盆地開墾荒地，在那裏安家落户，昇遷爲平民。有的半農奴靠一把鋤頭，外出扛活願意給誰幹活就給誰幹。貴族企圖反對半農奴離開他的土地，然而歷屆國王都支持半農奴的行爲。1211 年，最早一部成文的法律規定："凡是自由的人皆可選擇自己中意的主人……我們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爲了保障自由，使自由人可以幹自己稱心如意的事。倘若有哪個貴族阻撓此事，罰款五百大洋；如果接連罰款三次仍不悔改，將被驅逐出境並没收其全部家産。"

5. 奴隸

1211 年的法律説"凡是自由的人"，這句話意味着並非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那些没有自由的人指的就是奴隸。當時的奴隸已經不是一種階級，而是一種可能陷入的處境，類似今天判處的終生强制性勞動。奴隸係戰爭中抓獲的摩爾人。每年春天，基督教徒都要對摩爾人居住的地方進行掃蕩，其目的就是要抓人到領主的土地上來幹活，因爲這些土地上的半農奴的人數日益減少，而自由人又不肯來這裏幹活。盡管基督教譴責對基督教徒進行奴役，但是根據許多文件的記載，摩爾人基督教徒大

多是些奴隸。也有不少資料説爲了防止奴隸逃跑，他們是帶着鎖鏈或者是被綁在一起幹活的。可惜我們今天無法計算出奴隸的數目或者計算出他們佔整個人口的比例。

14　貴族的習慣

最早的一些《家譜》都是從14世紀初寫起的。對於在這個時期以前所發生的事，則采取傳奇的手法描寫。然而即便去掉這些傳奇成份，閱讀這些《家譜》也能對君主制建立後的頭幾個世紀内統治階級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方法有個大概的瞭解。下面是一些例子：

阿豐索六世，即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祖父時代，麥恩·蘇亞雷斯伯爵和他的連襟，也是一個伯爵，在你爭我奪諾維拉斯鎮，互不相讓。後來，國王任命麥恩·蘇亞雷斯當了葡萄牙地區的總督。於是他利用職權前往諾維拉鎮，逮捕了連襟及同他一起在房間睡覺的另外七位伯爵，下令將他們的眼睛挖掉。後來，有一次麥恩·蘇亞雷斯去波爾特拉德瓦德打獵，被其中挖去眼睛的一個伯爵的僕人碰見，這個僕人曾當過騎士，於是一刀結果了麥恩·蘇亞雷斯。過了多少年之後，D·阿豐索·恩里格斯登上了葡萄牙王位。有一次他去烏尼奥莊園探望D·貢薩洛·德·索烏扎伯爵。當伯爵去爲他準備酒菜的時候，國王乘機同伯爵夫人行房。伯爵端着飯菜回來看到這種場面，十分惱怒，但是强按捺住胸中的怒火，説道："請起來吧，陛下，飯菜做好了。"當國王坐下來開始用餐的時候，伯爵命令僕人把伯爵夫人渾身的毛髮全部除掉，然后讓她臉朝後騎在一頭馱驢上，打發她回娘家。還有一種説法，説伯爵强迫夫人同家裏的所有男

僕發生兩性關係。當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聽說此事後勃然大怒，說："D·貢薩洛，你要知道我祖父的一個總督一次就挖掉了七個伯爵的眼睛！"但是伯爵回答說："是的，陛下，正是由於他不分青紅皂白亂挖一通，結果也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下面是一段關於"勇士"D·費爾南·蒙代斯的一件軼聞趣事。他是D·阿豐索·恩里格斯手下一個税務官的兒子。《家譜》一書說："因爲他的教母在他和他的情婦之間撥弄是非，他便將教母活活打死，然後用熊皮裹住縫好，拖去喂狗。他還因爲手指上長了骨刺竟用斧頭將整個手指剁去。有一次，D·費爾南·蒙代斯和葡萄牙首任國王D·阿豐索·恩里格斯以及已經嫁給D·桑紹·努内斯爲妻的國王的妹妹同桌吃飯，國王的妹妹笑D·費爾南·蒙代斯嘴角流出了一點奶油，結果他勃然大怒，當着國王的面殺死了國王的妹妹。"

下面是關於D·佩得羅·諾瓦伊斯是如何發迹的一段記載："他原先一貧如洗。爲了糊口，參加了對摩爾人居住地的侵擾掠奪活動。戰鬥中被摩爾人俘虜，過了多年的囚徒生活。後來，他把'自己的身體'抵押給一些專門經營贖買戰俘爲生的人，這些人花錢把他從摩爾人手裏贖出。D·佩得羅·諾瓦伊斯獲得自由後，立即謁見萊昂的D·阿豐索國王，請求爲他寫封推薦信給貴族、騎士團和市區的長官，以便他去尋求這些人的幫助，使他解脱沉重的債務。手持着國王的信件，佩得羅·諾瓦伊斯跑遍各地，如卡斯蒂利亞、萊昂、加利西亞和葡萄牙，募得了大量資金，還清了抵押後還剩許多。當時玉米價格低廉，佩得羅·諾瓦伊斯把剩下的錢全部買了玉米貯存起來，隨後去幫助'加利西亞的豪富'做工，以等待歉年薄收年景的到來。不出他所料，有一年歉收，眼看許多人將被餓死，面包的價格飛

漲，佩得羅・諾瓦伊斯抓住時機，把囤積的玉米全部拋出，發了橫財，躍爲富翁。

最後一個例子是佩雷拉斯家族，也就是努諾・阿爾瓦列斯先輩的歷史。

佩雷拉斯家族中，最先在葡萄牙安家落户的是貢薩洛・羅德里格斯。他參加過對摩爾人居住區的掠奪，但是當他們這群騎士瓜分搶劫來的物品時，他認爲分給他的東西比他應該得到的要少，因此對主持分贓的貴族出言不遜，說他盛氣凌人，意思是說，這個貴族只是從勝利者的地位，而不是以戰士的角度看待他。這個遭到辱駡的貴族的一個隨身騎士在場，看到主人挨駡，氣忿不過，拔刀朝貢薩洛・羅德里格斯砍去。誰知貢薩洛・羅德里格斯手疾眼快，一刀下去把這個騎士從肩膀到腰劈成兩半。爲此，貢薩洛・羅德里格斯被判處死刑，但是後來這個殺人凶手逃到了葡萄牙，D・桑紹二世把帕爾梅拉的一塊屬地贈送給他，貢薩洛・羅德里格斯在這兒建立了一座城堡。他下一代的代表人物是"久經沙場"的羅德里戈・貢薩爾維斯。

羅德里戈・貢薩爾維斯的夫人住在蘭尼奧索城堡。一天她同保烏洛的修士私通的事傳入他的耳朵。羅德里戈・貢薩爾維斯急忙跑回家，把城堡的大門統統鎖上，"一把火將夫人、修士、男僕、女僕、牲畜、狗、貓、鷄……凡是活物，化爲灰燼，把他的卧室、衣物、床、……一件不留，統統燒光。"事後，有人問羅德里戈・貢薩爾維斯爲什麼要把所有的人都燒死而不單單燒死婬婦和姦夫。他回答說這椿醜事已經發生了十六天，住在城堡裏的人早就應該有所懷疑，但是他們没有向他報告。

羅德里戈・貢薩爾維斯後來又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叫佩得羅・羅德里戈斯・佩雷拉。他與表弟佩得羅・波伊亞列斯結下

私怨，最後在特拉斯科尼奧（位於帕索德索烏扎和瓦龍戈之間）進行決鬥，佩得羅・羅德里戈斯殺死了表弟，雙方的貴族也死傷無數。

佩得羅・羅德里戈斯・佩雷拉的兒子是個大富翁。一天，在佩雷拉的一棵大槲樹下，他提供了 64 匹馬。事實上，只有 32 匹，因爲他送了兩次，所以變成了 64 匹。“他把 32 匹馬送人後，立即又從這些人手裏把馬買回，然後又送給那些願意耕種他的土地的人。”也就是說，佩得羅・羅德里戈斯・佩雷拉的兒子用 32 匹馬得到了 64 個在他田地上幹活的邑民。

由於他有萬貫家產，所以能把兒子送到薩拉曼卡大學學習，而這次學習成了兒子青雲直上的階梯，後來當上了布拉加的大主教，在 D・狄尼斯和未來的 D・阿豐索四世之間發生戰爭時，他是調停人。遠在大學學習時期，他就有了一個兒子，名叫阿爾瓦洛・貢薩爾維斯・佩雷拉。18 歲時，兒子當選爲慈善院的院長。這家慈善院一共收養了 32 個私生子，其中一個就是努諾・阿爾瓦列斯・佩雷拉。

15　13 世紀一個富豪的家產

D・桑紹一世決定懲辦一個富豪，究竟爲什麼原因，到如今仍然是個謎。國王命令抄了這個富豪的家，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就銷毀。這個貴族想對此提出控訴，但是他不但不會寫字，就連他手下的人也都是目不識丁。無奈，他只好到修道院求修士代筆。這份資料保留到今天，其內容如下：

這是一則國王 D・桑紹對 D・洛倫索・費爾南德斯進

行肆虐的新聞。搶走他的十莫約（容量單位，一莫約合 258 公斤——譯者）面包和葡萄酒、25 個大木箱和木桶、40 個盾、兩個鴨絨褥墊、兩個鴨絨枕頭、11 張牀和木櫈、鍋、桌子、粥盆、杯子、鐵盔、十頭猪、大群綿羊和山羊，等等。他對當時在場的人都不放過，除搶走他們的武器外，還搜查了他們的腰包，搶走了他們的 15 個莫拉貝蒂諾（一種銀幣——譯者）。搗毀了 70 處田舍，毀壞了所有的果實和田裏的莊稼，殺害了 100 名下人。隨後，一把火燒毀了庫尼亞場院及場院內的一切設施。城堡的塔樓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且把無法破壞的東西放火燒毀，以致永遠也不能再修復。其損失達 1500 多莫拉貝蒂諾。塔樓前面的一些田舍亦被燒成廢墟。此外，還搶走了一個善良能幹的僕人。但願讀到這一消息的人都知道，我洛倫索·費爾南德斯既沒有做過一件錯事，也沒有說過一句錯話，他們没有任何理由來對我進行如此窮凶極惡的破壞。

這段文字詳細記載了 12 世紀末或 13 世紀初一個豪紳的家產。庫尼亞阿維尼亞坐落在吉馬良斯地區，是庫尼亞家族的第一座城堡，大財主洛倫索·費爾南德斯在這裏有七十處田舍，全由田客耕種，他們得把土地上的全部收成交給土地的主人。

所謂田舍，即一年中間一家一户可以租耕的土地。田舍的面積可以相當於一個小農場，可以是一個大農場的一部分，也可由若干塊零星的小塊土地組成。後一種情形在當時更爲普遍。大塊的土地很多，但一望無亘的大農場則寥寥無幾。由於土地分散，一家一户獨自營生，誰家也養不起牛群，更談不到使用犁了，一把鋤頭就解決問題。他們只能養豬、山羊和綿羊，但

數量有限。

桑紹一世沒收富豪洛倫索·費爾南德斯的財産時在地窖和糧倉裏發現儲存着大量物資：70莫約葡萄酒和糧食。莫約既是固體的體積單位，也是液體的容積單位。用作體積單位時，莫約可分爲斗；用作容積單位時，莫約可分爲阿爾穆德（一個阿爾穆德相當於25公升——譯者）。一莫約相當於多少斗，要依據地區來定，一般來説約合64斗。如果説一斗大約相當於15公升的話，那麽70莫約大致等於67200公升。這個數字不是指生産效率，與産量毫無關係。它只説明當時人們有一種在豐收年景把小麥囤集起來以便到歉年時高價出售。

所謂家具，不過是幾張木牀、木桌和凳子。大木箱是用來保存糧食的，木桶用來盛葡萄酒。用木櫃裝衣服和坐靠背椅是多年以後的事。16世紀，吉爾·維森特劇中的農民還不知道椅子是幹什麽用的。今天，沿着牆壁放置的長條凳子仍然是農村裏許多小酒店的主要設施。至於兩張鴨絨褥墊和兩個鴨絨枕頭，在當時可算是豪華的奢侈品了，只有居住在塔樓上的地主才能享有此物。桌子和牀也是只有地主的府第才有的家具。田舍的農民都住在低矮的草窩棚裏，夜宿在草薦上或者光秃秃的地面上，因爲麥秸和玉米秸在當時都是作飼料用的。

貴族洛倫索·費爾南德斯還有一所莊園，四週是民舍。莊園裏的高大塔樓聳立在四週是茅草屋頂的中央。

莊園裏主要是些農業設施，如糧囤、地窖、農具房、僕人住房，或者貴族稱之爲“他的人”的住房。

奉國王D·桑紹一世聖旨前來抄家的人，對待田客和僕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對待田客是連同牲畜一同帶走，因爲他們是這個富豪的財産的一部分，對於僕人，則只搶走他們的武

器和身上的錢，原因是田客不屬自由民，而僕人則屬自由民，唯一的奴隸，也同田客一起被帶走。

最有意思的是計算毀壞塔樓造成的損失。貴族洛倫索·費爾南德斯抱怨說，就是花上1500莫拉貝蒂諾也難再把這座塔樓修葺一新。莫拉貝蒂諾可能是一種銀幣，即便如此，這也是個相當龐大的數目，大約有23公斤左右。然而當時幾乎所有的建築材料都用不着花錢買，石頭可以隨意採掘，梁椽可以在森林裏砍伐，要花錢的僅僅是僱傭勞動力而已。花錢僱請勞動力說明社會上有一批靠工錢維持生活、富豪不付錢便不能佔有其勞動的工人存在。這些工人係從前的平民，即散工。我們知道平民的前身是半農奴。半農奴離開了貴族和地主的土地才逐漸遷昇到平民的地位，後面我們將會看到由於貴族和地主不能支配這些半農奴的勞動而抱怨的情景。盡管證實工人在葡萄牙存在的有關資料不多，但是我們知道，13世紀中葉在卡斯蒂利亞召開的舍列斯議會（1268年）上，分門別類地規定了民用建築工人的工資，工種爲瓦匠、木匠、砌石匠、抹灰匠和壘泥牆的匠人。工資也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區別，如卡斯蒂利亞、萊昂、埃什特里馬杜拉、安達盧西亞，各的各有標準。毫無疑問，這些建築工人就是我們以後要講到的那些在14世紀的政治危機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工匠師傅的前輩。

16 生產、貿易及貨幣

葡萄牙誕生時，國家的農業生產主要是爲了做面包和釀葡萄酒。

面包有兩種：半白面的面包和三分之一白面的面包。所謂

半白面的面包，是指用一半小麥面一半玉米面做的面包，所謂三分之一白面面包，即用三分之一小麥面和三分之二玉米面做的面包。也生產純玉米面的面包，但是“面包”一詞來自拉丁語，而“玉米面包”一詞來自日耳曼語。玉米面包雖然是特茹河以北人民的主食，但是玉米在農業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卻是後來的事。16 世紀中葉，玉米這種作物才從中美洲傳入葡萄牙，17 和 18 兩個世紀，逐步推廣播種。當時用玉米、黑麥甚至大麥面製作面包，説明那時小麥的生產還不能滿足人民消費的需要，因爲凡是盛產小麥的地區，人民是不吃其他糧食製作的面包的。在葡萄牙的農業經濟中缺乏小麥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

葡萄酒也是經常提到的一種生產。12 世紀的許多農業經營合同裏，都把種植葡萄作爲一條必不可少的規定。領土收復之後，這種作物才得到了廣泛的推廣，並且從一開始，它就與貿易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雖然古蘭經禁止摩爾人飲酒，但是當基督教徒來到他們居住的土地上時，仍然看到許多葡萄園。似乎摩爾人並不嚴格遵守宗教的禁令，而且在摩爾人統治的地區，仍然生活着許多基督教徒，他們可以恣意暢飲。

田產契約要列出具體内容是當時的習慣做法。不過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些“房屋、葡萄樹、森林、果園、已開墾的土地、待開墾的土地。”這是一套立契官的俗語，但也反映出了農村的面貌。雖然很少提到橄欖樹，可是在里斯本的地方行政法（1179 年）和阿爾馬達的地方行政法（1190 年）裏已經把橄欖油列爲重要的生產，從此以後，油橄欖樹的栽種面積與日俱增。

狩獵、捕魚及一些其他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活動是農業生產的補充，它保障了當地的需要，又使整個生產的狀況更加完備、齊全。家庭副業中最主要的是織蔴，這是婦女們經常性的

勞動。當然，也紡織綿羊毛和用簡陋的土織布機織羊毛粗布和粗絨布。這些土布紋理粗糙，和外國進口的紋密質細的布匹相比，是相形見絀的。13 世紀中葉，國王已經非常重視進口外國毛料所提供的收益。

16 世紀若奧·德·巴洛斯編寫的《地理》一書說，在莫斯，一些婦女一邊雙手搓綫，一邊腳踩皮老虎，幫助在爐邊打鐵的丈夫工作。這種景况到了 12 世紀并無多大改觀。莫斯地處蒙科爾沃，是最早開始煉鐵的地區。雖然從羅馬時代開始的冶金業和煉銅業已經消失，但煉鐵業一直繼續至今，原因是耕田種地需要鐵製農具。一個鐵匠鋪既是鐵匠的工作間，又是他的住家。當時鐵匠的主要產品就是犁鏵和馬掌。13 世紀，里巴科阿地區的一種風俗習慣反映了古老的傳統：一個村莊上的鐵匠只要有 15 個打好的犁鏵擺在鋪裏，一個鎮上的鐵匠只要有 30 個打好的犁鏵擺在鋪裏，他們就可以免服市政機關規定的某些最繁重的勞役。從這種規定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鐵匠的生產規模是多麼的小，生產的手工程度又是多麼高。有個别手藝精湛的鐵匠，或者在較大村莊裏幹活的鐵匠，還會鍛造一些武器。當時把鍛打刀劍的冶煉工人稱爲鑄劍匠人。“鑄劍匠人”一詞來自阿拉伯語，後來葡萄牙語化了。稱鍛造農具的人爲鐵匠。“鐵匠”一詞直接來自拉丁語。這兩個詞的來源表明，先進的冶煉技術是和阿拉伯人連在一起的。

陶瓷製造業的情况和冶鐵業相似，許多精致美麗的瓷器都是出自摩爾人之手，其中有些珍品至今還陳列在西班牙的博物館裏。葡萄牙的陶瓷製造業只能燒出一些粗俗簡陋的產品，如湯鉢、菜盆等，既沒有花紋圖案，有時甚至連釉都不涂。大家知道，在收復的土地上大部分摩爾人留了下來，大概他們大多

是生活拮据的窮人。因此主人的更迭對他們沒有絲毫的損失。但是各種迹象表明，還是有一些工匠大師帶着自己的製瓷和煉鐵技術離開了這裏。

當時貿易活動比手工業生產更爲活躍，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經營貿易的是些猶太人。大家知道，他們大都留在被收復的城市裏，在那裏繼續做自己的生意。

內地的貿易是由流動商販從事的，他們把貨物裝在馬背上走鄉串村。地方行政法裏多次提到他們馱運商品和使用的單位是馬馱和驢馱兩種。這些流動商販趕着馬或驢跑遍各個農村，從農民手裏收購各種農產品，然後運到各地出售。當時的集市貿易不十分發達，集市市場非常之少，只是到了13世紀，市場才大量增加。在集市上，當地產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商販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做買賣，因爲國王的法律規定，凡在集市上侵犯商販利益者，嚴懲不貸。

據資料記載，12世紀已經有了海上出口貿易，但是這些資料太單薄，尚不足以證明當時沿海地區的貿易活動已十分繁忙，然而這些資料證實了這種貿易活動是葡萄牙獨立的決定因素之一。沿海一帶時常有摩爾人的海盜船隻出没，這表明海上貿易的存在；由於海盜經常搶劫沿海的城鎮，所以一些主要的城市（里斯本除外）都未建在海邊，而是建在內地可以航行的河流兩岸。有資料記載，1194年有一艘滿載蜜糖、橄欖油和木材的葡萄牙貨船在駛往弗朗德勒途中沉没。也有資料説，12世紀中葉葡萄牙的商人已經在希臘的薩洛尼卡集市上做買賣，而這時的薩洛尼卡已經是與東方進行貿易的重要中心。有迹象表明，12世紀後半葉葡萄牙人出現在里爾的市場上。1211年，國王D・阿豐索二世頒布了一項法律，規定物主贖回打撈的沉船貨物時

免納賦稅。這件事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可見當時的海上運輸已有相當可觀的規模。

貨幣的大量流通也是貿易活動繁榮的結果。12 世紀，在大約一半的非官方資料裏商品是全部或者部分地以貨幣標價的。關於 D・阿豐索・恩里格斯錢財的種種傳聞，也表明他擁有大量的貨幣。12 世紀一個英格蘭的編年史作者說，1169 年 D・阿豐索・恩里格斯在巴達霍斯被萊昂國的國王俘獲。爲了贖身，他拿出 35 馱金子，其中是 20 馬馱，15 驢馱。按照當時的習慣，一馬馱相當於 200 公斤，一驢馱相當於 160 公斤。35 馱相當於 2689 公斤黃金。十年後，D・阿豐索・恩里格斯在遺囑中提到了他的 535 公斤金幣，他說這個數字僅僅“是我的財產的一部分”。五年後，即 1184 年，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一個女兒和弗朗德勒的伯爵成親，他給了女兒一份非常豐厚的嫁妝。當時一個編年史作者形容說，他用黃金、金絲錦緞、絲綢等“西班牙半島上的財寶”塞滿了外國的船隊。1190 年，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繼承人在書寫第一份遺囑時，也擁有一筆鉅大的財產。

由於 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年年都要洗劫摩爾人居住的地區，帶回大量的財物，如糧食、牛羊、奴隸和黃金等，所以總是以此來解釋國王擁有大量財富的原因。但是這種解釋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因爲當時洗劫的主要是農村，不是城市，而商人和黃金往往集中在城市裏。再者，人們都知道，1169 年在圍攻巴達霍斯時 D・阿豐索・恩里格斯身負重傷，不能再跨上戰馬。對他來說，向外掠奪的生涯已到此結束，然而他的財寶仍在不斷地增加。

王室的文件可能要比一些嚴肅認真的歷史學家搜集到的傳說更有說服力。王室的文件在解釋國王財產的來源時說，國王

收入的來源有：市政稅收、國王資產的收入、商業稅收、出賣免稅權（屬地證書）的大量收入等。國王財產的迅速積累實質上暴露一個問題：即國王是只進不出，從不把他的收入進行分配。這一點説明了在葡萄牙建國的初期貴族只是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國王依靠民衆的力量，而避開貴族的勢力，才使他迅速富裕起來。

17 12世紀的一項“投資計劃”

1179年，D·阿豐索·恩里格斯對他死後如何使用他存放在科英布拉聖十字修道院裹的錢財作了安排。這份文件比口頭更能説清當時葡萄牙的概況。

“……我，阿豐索，葡萄牙人的國王，考慮到我的死期，即最後審判的日子已經迫近，屆時每個人將按其生前所做好事或壞事的多寡受到獎懲。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拿出我的一部分財產，即我寄存在聖十字修道院裹的兩萬兩千馬拉維迪（古貨幣，一馬拉維迪等於70雷伊斯——譯者）作如下的分配，以造福於我的靈魂：首先給耶路撒冷慈善院八千毛斯毛迪和四百銀馬克，因爲差24馬克，我再給162馬拉維迪和六千大馬拉維迪；爲修建里斯本的聖瑪麗婭教堂，1000馬拉維迪；爲修建阿爾科巴薩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埃武臘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科英布拉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波爾圖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布拉加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維塞烏教堂，500馬拉維迪；爲修建拉麥戈教堂，500馬拉維迪；給那些爲我

經常捐款的修道院，3210 馬拉維迪；我已經給了塔洛烏卡聖若奧修道院的院長和修士 3000 馬拉維迪，這筆錢是讓他們在杜羅河上修橋用的；除了把我生前屬於我的摩爾人、馬匹和毛驢留給聖十字修道院外，我再給該修道院一千大馬拉維迪和一千毛斯毛迪，但差十個半不够這一整數；我已經給埃武臘的統帥貢薩洛·維埃卡斯一萬馬拉維迪，這筆錢是讓他修建該城的公共設施和防御工事用的；給了里斯本主教區居住的貧民一千馬拉維迪；給了生活在聖塔倫、科盧什、阿布蘭特斯、托馬爾、托列斯諾瓦斯、歐勒、萊里亞和彭巴爾地區的貧民一千馬拉維迪；給了居住在布拉加大主教、波爾圖大主教區和圖伊主教區的貧民三千馬拉維迪；給了吉馬良斯的新慈善院、聖塔倫慈善院和里斯本慈善院各 260 馬拉維迪。此遺贈書立於 1179 年 2 月。”

當時，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個人的財產和國家的財產是混在一起的。他分配寄存在科英布拉聖十字修道院這部分錢財的方式彷佛是一項投資計劃，或者說是國王認爲必需花掉的一筆額外開支。

對此，讀者肯定會問：這些錢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貨幣相當於多少錢？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因爲雖然一個金馬克（229.4克）相當於 15 馬拉維迪，但是當時金子的價值不同於今天；再者，由於成本不同，全國各地的價格也不統一，當時商品的價格是非常貴的，自由民生產的手工藝品也比較貴，但是土產品（土地上自然生長的和人工栽培的）的價格就十分低廉。

遺囑裏有兩宗鉅款，一宗是給卡拉特拉瓦軍團的統帥爲修築埃武臘的防御工事用的一萬馬拉維迪（此軍團總部最初設在

埃武臘，後來遷到阿維斯，所以也稱阿維斯軍團)；另一宗是給慈善院用的六千馬拉維迪。當時，摩爾人的進攻已迫近眉睫，遺囑寫好的第二年，埃武臘遭到摩爾人的包圍，但是全市人民勝利地抗擊了這場進攻。原因之一，就是用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這筆遺金修築了一段城牆。該軍團最後駐紮在聖塔倫，成爲一支强大的基督教駐防軍。聖塔倫市四週的城牆也是第一任國王統治時期修築的，聖·若奧·德·阿爾浦修道院也可能是修士騎兵用這筆鉅款在這個時期建成的。

除了阿爾科巴薩的工程（按照法國藝術家的設計修建的教堂）外，布拉加、波爾圖、科英布拉、維塞烏、拉麥戈、里斯本和埃武臘的教堂也正在籌建之中。這些城市都是主教管轄的城市，所以國王在遺囑中的贈款可能都是用來興建主教堂的。彷彿要重建國家似的，國王捐贈這筆鉅款修建豪華的羅馬教堂。這些教堂將成爲主教轄區的總部。大家知道，當時布拉加已經有了一座主教堂，所以這裏的問題只是擴建。中世紀的主教轄區這裏都提到了，唯獨瓜爾達和席爾維什兩地没有提及。當時的瓜爾達是個人烟稀少、基督教徒和摩爾人還在爭奪的地區。20年之後，桑紹一世才在這裏建立了城市，但主教轄區的總部那時仍設置在伊達尼亞。席爾維什也是桑紹一世在主教轄區總部所在地興建的城市。後來，這座城市又落入摩爾人的手中，D·阿豐索三世徹底地收復了阿爾加維之後，這座城池才再次光復。

有三筆遺金是分別贈給里斯本、聖塔倫和吉馬良斯的三所慈善院的。在桑紹一世的遺囑裏也提到了其他慈善院。慈善院係朝聖者居住的客棧。給貧民的救濟金都指明了所在地區，這些地區都是剛剛從摩爾人手裏奪回的土地，救濟目的是希望他們不要離開這兒。

捐建工程中的最大一宗遺金，是給塔洛烏卡修道院，要他們負責修建杜羅河大橋。從前有人對我説，在離麥桑弗里奧不遠的巴爾克伊羅斯，有一座中世紀的大橋遺迹，它可能就是國王D·阿豐索·恩里格斯吩咐修建的那座橋梁。葡萄牙的誕生靠南北的聯合，爲此南北溝通一直是國王最關心的事情之一。在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兒子的遺囑裏，也有一筆修建大橋的遺金，這座橋就是横跨在科英布拉附近的蒙得戈河上的大橋。

18　文化：矛盾與破壞

12世紀的葡萄牙人民同時受着天主教、伊斯蘭教和希伯來這三種互相對立的文化的熏陶。這種矛盾在塑造葡萄牙人民的氣質方面有深遠的影響。

1. 基督教文化

教會曾經代表過官方文化。不管對於上層社會，還是對於農村的人民，教會都起着唯一的有組織的文化傳播者的作用。作爲一個集權的組織，教會的歷史比君主制更爲久遠，最早的一批主教管轄區可追溯到羅馬時代。在斯維匯人和西哥特人統治時期，幾乎無法區分國家的政治機構和教會組織。西哥特人的教士會議既是教會人員的立法機關，也是全體人民的立法機關，這個時代的無數作家都屬教會。

阿拉伯人的入侵没有打破這種局面。入侵時期，各教區的聖堂神像没有更换，這意味着原來的宗教信仰没有中斷，没有造成過許多年後再恢復原來信仰的惡果。信仰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牽涉到推廣某種世界觀、某種道德生活觀、以及有關

聖人生活的知識。

宗教思想感情的濃厚程度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朝聖和大量興建宗教性的建築就是這些表現的一些方面。

從11世紀初開始，在加利西亞地區坎波斯特拉的聖地亞哥已成爲基督教的中心之一。歐洲各地的朝聖者紛至沓來。從這時起，人民把聖地亞哥之路稱爲銀河，大量的金銀財寶源源不斷地流向這裏，在這個世界的盡頭建立起了中世紀最爲雄偉壯觀的建築，並在從加利西亞到比利牛斯山之間的廣闊地區修建了許多高大的教堂和修道院。

布拉加企圖在信仰聖地亞哥的活動上同坎波斯特拉展開一場競爭，結果没有成功。毛里西奥・布爾迪諾大主教爲了招徠朝聖者，向他們出示了聖地亞哥的頭顱（據傳説，聖地亞哥是被砍頭的，埋葬在坎波斯特拉的屍體没有頭顱）。後來，這個大主教甚至弄來了另外一具名字也叫聖地亞哥的聖人屍體。這次遺體之戰的失敗與毛里西奥・布爾迪諾大主教個人的命運不無關係；他後來被任命爲教皇駐德國的特使，因爲擁護德國皇帝，被這個皇帝封爲格列戈里奥教皇七世，因此被羅馬教皇革出教門，遭到人們的唾棄，最後死在意大利的一座牢獄裏。

12世紀是進行宗教建築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修築的教堂之多是葡萄牙歷史上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布拉加、波爾圖、維塞烏、拉麥戈、科英布拉和里斯本的主教堂，高大雄偉的阿爾科巴薩修道院和科英布拉的聖十字修道院，這些鉅大的羅馬式建築幾乎都是這個時代竣工或動工的。除了這些大型建築之外，小教堂也遍地林立，從12世紀到13世紀，共修建小教堂近200座。國王D・阿豐索・恩里格斯資助興建了阿爾科巴薩和聖十字等主教堂和修道院，然而其他一些建築則是靠那些善

男信女的集資修建起來的。

2. 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莫薩阿拉伯人的形成、穆德哈爾人的定居以及同阿拉伯大型文化中心的交往。

莫薩阿拉伯人是指那些居住地被撒拉遜人佔領後仍然繼續生活在那兒的基督教徒。雖然他們保持着原先的信仰，但是生活方式卻徹底改變了，以致完全同阿拉伯人一樣。他們在語言、衣着、飲食、勞動技術和個人的生活習慣等方面都被同化。至於在思維方法和體型上同化的程度如何，我們尚不清楚。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莫薩阿拉伯人，哪些是穆斯林。有一次他掃蕩摩爾人的居住地，除了婦女和兒童外，抓回了一千多名俘虜，路上被聖十字修道院的院長阻攔住，說他沒有權力抓捕基督教徒。同一份資料，即《聖・特奧多尼奧的生平》一書還說，這些俘虜以後沒有返回自己的家園。在這位院長的慷慨幫助下，他們留在科英布拉安家落户，靠耕耘聖十字修道院的土地，而不是國王的土地生活。

從種族的涵義上說，穆德哈爾人是指那些通過某種協定或條約願意服從信仰基督教的統治者的阿拉伯人（16 世紀，用安分守己的摩爾人一詞來表達這個涵義）。收復失地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世紀內，基督教徒總是把摩爾人統統殺死；但是，很快他們就意識到了現成的勞動力的價值。當費爾南多一世於 1058 年佔領維塞烏時，戰敗者一律不殺，被作爲奴隸留了下來。這種人道主義當然是出於對勞動力的需要。1064 年，在佔領科英布拉時，曾允許保留 5000 人的性命。

D・阿豐索・恩里格斯在佔領里斯本地區後，對留下的摩

爾人採取了保護政策。1170 年的安全法規定，禁止基督教徒或者猶太人虐待摩爾人。毫無疑問，這使許多摩爾人留在原地，并因此對里斯本地區後來的種族類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到 1484 年，在卡馬拉特附近的桑布熱羅地區，幾乎所有的葡萄園的主人都是摩爾人，當時錫爾維什的基督教徒抱怨說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操縱在摩爾人手中。

文化的交往也是通過宗教活動的途徑實現的。萊昂的阿豐索三世把自己的兒子，即王位的繼承人派到當時一個摩爾人王國的首都薩拉戈薩學習。阿豐索・恩里格斯的祖父阿豐索六世曾在托萊多按照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多年，而且還同一個撒拉遜女人生了一個孩子，因爲兒子夭折，没有能繼承王位。統治過科英布拉的塞斯南多伯爵就是個莫薩阿拉伯人。歷史學家艾爾庫蘭諾指出，這個伯爵制定的文件好像是從原來的阿拉伯文翻成拉丁文的。塞斯南多伯爵早年在塞維利亞學習，當時這座城市已經是極其活躍的文化中心，影響波及到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南部。在這個西班牙—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時代，涌現出了無數文壇鉅擘，其中有些人就誕生在葡萄牙的國土上，如出生在埃武臘的詩人阿伯納布東、出生在貝雅的詩人阿爾姆塔米德、出生在聖塔倫的詩人伊布恩・撒拉。醫學、哲學、法律學、歷史學、天文學和神學等領域内，也都涌現出了一批傑出的專家學者，如阿拉伯人阿維羅伊斯（1126～1198 年）和猶太人邁莫尼德斯（1135～1204 年）是研究歐洲思想史的專家。這種比較發達的文化狀況必然會影響到一部分人民，所以在談到錫爾維什的人民時，阿拉伯的地理學家說："無論是普通的老百姓，還是上層階級，都善於辭令，能背誦詩句。"

3. 猶太人文化

早在羅馬時期，猶太人就開始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生活。他們時而得到寬容，時而遭到迫害。西哥特人統治時期，猶太人的居民區已經很多，而且人數可觀。他們往往代表着文化的精英。塔爾姆德説過："凡是兒童不入學的城市，注定是要滅亡的。"

12世紀，在阿拉伯人統治的地區，猶太人遭到殘酷的迫害，許多人紛紛逃亡到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阿豐索六世收容了猶太人，爲他們提供了方便，並起用他們來培養管理國家的高級官員。後來D·阿豐索·恩里格斯也承襲了這條路綫。據説，在佔領了聖塔倫後，D·阿豐索·恩里格斯贈給一位有名望的猶太人三處田莊，這個猶太人的一個兒子還擔任了桑紹一世的要職——税務官。直到14世紀，歷任國王都執行這種方針：凡是需要具備高深學識的職業，都讓猶太人幹，尤其是在醫界和大部分商界。盡管教會指責猶太人，人民孤立猶太人，但是從知識和金錢角度來看，猶太人仍然屬於上層階層，是個特權階層。

這三種文化之間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它們都帶有宗教色彩。然而這三種文化的信奉者卻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收復戰爭一開始，就對摩爾人的文化進行了殘酷的破壞，凡是帶有他們信奉的宗教色彩的物品，或是帶有象徵着他們的文化的東西，都一律毁掉。因此没有一座清真寺（麥爾多拉的特殊情況除外）、没有一部古蘭經的手稿，甚至阿拉伯人聚居地的那些最常見的裝飾品，都没有一件保留到今天。就連阿拉伯雕刻家雕鑿的石碑或者石碑的殘片，今天也是罕見之物。猶太人的情況也與此類似。數年之前，托馬爾的一個博物館開館，原先希望把猶太人的光輝燦爛的文化遺迹都收藏起來，但是展出的不過是三四塊墓碑（之所以未被砸毁，是因爲它們埋藏在地下）。

凡是與基督教文化相對立的其他文化，一律全部毀掉，這種作法在葡萄牙誕生時尚在進行。葡萄牙誕生後，在各種各樣的藉口和幌子下，又繼續了很長一段時間。15世紀末，對摩爾人和猶太人的驅逐和建立宗教裁判所就是繼續破壞這些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現。當時，誰家裏有個埃斯特雷莫兹的泥塑就是一件危險的事，就會有人到宗教裁判所裏揭發。那時和現在一樣，泥塑的是些牛，但是人們往往把“摩西五書”或者“猶太人的聖書”與“母牛”這兩個音同義不同的詞混在一起。這雖然是件荒唐可笑的事，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對這種文化的破壞達到了何等殘酷和瘋狂的地步。

這三種文化之間的矛盾、對文化滅絕性的破壞，以及從技術和文學角度來看代表着最落後的文化的一方的勝利，在葡萄牙人的氣質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宗教上不能容忍其它信仰、思想上沙文主義、總想用一種信仰統一全國。他們對理想總是持懷疑態度、對僞善和投機則持默許態度、對文化創新一貫抱不相信的看法、老是懷疑這些創新有礙於國家的安全和民族道德的統一。

口頭上信仰這句話就是這種情況的最好概括。這句話作爲俗語永遠記入了葡萄牙語。奥斯伯爾諾在一封有名的書信裏對當時佔領里斯本的情景作了記述。他説，當基督教徒控制這座城市後，一場可怕的瘟疫襲擊了摩爾人。他們親吻着十字架，祈求着聖母瑪麗婭的賜福，就這樣幾百人死於非命。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猶太人邁莫尼德斯寫了《關於叛教的使徒書》一書。他主張把猶太教埋藏在心裏，也就是主張心靈深處信仰一種宗教而表面上信奉另一種宗教的精神權利。在塞維利亞，阿維羅伊斯發表了關於雙重真理的演説，就是説從理智的角度來看，一

種論斷是正確的，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則並非如此；反之，從理智上來看它是錯的，而從信仰的觀點來看則是對的。後來，賴蒙多・魯羅進一步發揮了這種設想，並且在葡萄牙得到了共鳴。

在葡萄牙這樣一個國度裏，爲了免遭迫害，大多數人不得不表面上信奉他們並不相信的宗教，過着没有真正信仰的生活即口頭信仰的生活。這種局面持續了許多世紀，這不過是剛剛開始的階段。

1223～1385年

社會的進步與社會衝突

19　1211～1216年的內戰 早期的法律

整個13世紀前半葉充滿了以階級對抗爲基礎的激烈衝突。一直到D・阿豐索三世在1248年奪得政權爲止，這些衝突幾乎沒有間斷。

D・阿豐索二世統治的時間雖然短暫（1211～1222年），但是自始至終都在反對特權階級。這場鬥爭的主要方面是：1211～1216年的內戰、同教會上層的衝突及爲制止貴族和教會的胡作非爲而頒佈的一部內容廣泛而嚴厲的法律。

內戰是由D・桑紹一世的遺囑引起的。在遺囑中，他留給公主們一部分財產，其中包括阿蘭克爾和蒙特摩爾奧維里奧這兩座建有城堡的村莊。公主們認爲，既然她們繼承了這些土地，她

們就享有一切權力，包括在這裏行使國家主權。但是國王 D・阿豐索二世認爲，這樣的遺產不能成爲肢解整個王國的領土的理由，他有權在這些土地上行使國王的權力。可是大部分貴族，甚至連那些因爲對 D・阿豐索二世不滿而逃往卡斯蒂利亞避難的貴族也回國支持公主們的做法。萊昂國王把自己的軍隊交給了葡萄牙的上層貴族，讓他們進行反叛活動。國王的軍隊被擊敗了，似乎貴族們佔領了科英布拉（這個城市起着首都的作用）。D・阿豐索二世的處境十分困難，逃到了吉馬良斯。正當這場衝突的最緊要的時刻，葡萄牙又向納瓦斯德托洛薩發動了進攻，這樣就使國王失去了各城市民軍的支持；因爲這些民軍參加了納瓦斯德托洛薩戰役，而且作戰勇猛頑强。

後來，教皇伊諾塞西奥三世干預這場衝突，給 D・阿豐索二世提出了一個他用武力無法解決的方案，即所謂勝敗各半的方案。這個解決辦法的具體內容是：D・阿豐索二世拿出一筆鉅款給公主們，作爲在屬於她們的領土上進行戰爭所造成的損失的賠償；參加叛亂的兩個城堡交給聖殿騎士團（隸屬於教皇）駐守；保證公主們得到她們土地上的一切收益，但是公主們必須承認只有國王 D・阿豐索二世才有權在她們繼承的土地上行使國王的權力。

國王 D・阿豐索二世同教會的矛盾也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雙方都訴諸了武力。

國王的政策是逐步限制教會享受的豁免權：教會人員必須服從王法，居住在屬於修道院和教堂土地上的居民也應在王室的建築工地上服勞役，取締捐贈和其他牟取財富的手段。在“攤派捐稅”問題上，國王與教會暗中產生了摩擦。所謂攤派捐稅，就是國王每到一個村莊，那裏的人民必須交納的供養國王

及其王室的那部分糧食。這種特權是有其實際的意義的，因爲國王及其小朝廷經常不斷走動，從這個村到那個村。但是更爲重要的，是其政治意義，因爲它意味着D·阿豐索二世所到之處，他都是那里的國王，即便那些屬於教會或貴族因而享有捐稅豁免權的領土也不例外。

因此，布拉加的大主教竭力主張，凡是大主教管區的土地不該向國王交納捐稅。後來矛盾進一步激化，這個大主教把D·阿豐索二世革除教門，然而國王則命令科英布拉和吉馬良斯兩個市鎮的民軍大舉進犯大主教管轄的土地，砸毀了糧倉，踏平了葡萄園和良田。這時，貴族的一支軍隊從北部邊界進來，搗毀了國王的農田，衝突愈演愈烈。問題又提交給教皇，但是一直得不到解決，直到1212年D·阿豐索二世逝世時，這場爭端尚在懸着，因此，D·阿豐索二世的遺體不能按照基督教的儀式進行安葬。

反對貴族和教會的封建主義傾向的鬥爭還表現在一系列的法律措施上。財產轉讓法（以後幾代王朝繼續沿用的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部）禁止教會購置不動產。調查法就是由王室官吏組成的委員會在各地進行調查的權力規定。調查的目的是弄清這些地產的法律地位和土地的主人享受賦稅豁免權和其他特權的依據。確認法就是承認以前歷代王朝的捐贈和授予的各種特權。這些特權或者由現任的國王予以確認，或者經過驗證有關的證明文件之後給予確認。

D·阿豐索二世是第一個採用這些行政措施的國王，但是使這些措施真正發揮其作用，成爲保衛王室的權利和制止特權階級濫施淫威的有效工具的，卻是D·阿豐索三世、D·迪尼斯和D·阿豐索四世統治時期的事。

D·阿豐索二世一登上國王的寶座，立即在科英布拉召開修道院院長、豪紳和其他貴族的聯席會議。這是保存到今天的第一個有文字資料記載的會議，所以習慣地把它看成是葡萄牙的第一次議會。但是議會的傳統還是來自西哥特人的君主制；從10世紀開始，在萊昂王朝就有關於議會的記載；也就是王室會議，出席會議的是擔任王室官職的男爵、大貴族、土地掌管、修道院院長和王室成員，這些人多次共同簽署D·阿豐索·恩里格斯的法律文件。這説明從第一代王朝開始，這類會議就已經存在。

許多歷史學家把1211年召開的科英布拉議會同一系列葡萄牙最古老的法律的公佈聯係起來。如果説這些法律是D·阿豐索二世時代的產物，而且可能是在不同的時機公佈的，那么這種聯係是有道理的。這些法律的宗旨是保護國王的財產、禁止王室官吏横行霸道和保障個人的人身自由。例如，禁止豪富像以前那樣用低於實際的價格購置糧食，允許自由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主人，禁止騎士任意霸佔平民的財富，這些規定的意圖十分清楚，就是要保護人民大衆不受權貴的欺凌。確認法的前言裏説："因爲我們應該爲貧苦人民效勞，應該保護他們不受有權勢者的欺凌……"

20 領主的無政府主義和1245～1247年的革命

D·阿豐索二世爲反對封建割據勢力進行的不懈努力在他死後（1223年）便引起了領主們的反對。D·阿豐索二世死後，桑紹二世繼承王位。因爲新國王年幼，男爵包攬大權，隨便發

號施令。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表現在没有成文的法律、王室的掌璽部缺乏登記制度、不再執行確認法和調查法、以及連綿不斷的個人戰爭，等等。

桑紹二世執政期間，只是於1229年在科英布拉召開過一次議會，這次議會之所以召開，是因爲教皇的大使來到葡萄牙想平息内戰和恢復社會秩序的緣故。顯然，由於這位大使的勸解，才批准了一部分地方行政法規。

幾名主教、對現狀不滿的貴族和各市、鎮的人民代表聯名在羅馬上告，説國内亂七八糟，到處搞無政府主義和暴力。教皇伊諾塞西奥四世聽説後，把政權從葡萄牙國王手裏收回，交給了國王最年輕的弟弟D·阿豐索掌管。D·阿豐索，即博羅尼亞伯爵，曾在法國生活多年。回國之前，他當着從前離開葡萄牙來到法國的幾位葡萄牙主教的面，簽署了一個條約，答應不僅尊重教會的賦税豁免權，而且還許諾保留各居民區、市鎮、騎士和人民的優良習俗以及他們的祖父及曾祖父答應的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租約。

D·阿豐索没帶一兵一卒隻身在里斯本上岸，立刻受到全市人民的歡迎。D·桑紹不聽從教皇的決定，準備武力反抗。戰爭打了兩年，不少的貴族支持D·桑紹；但是鄉鎮的人民站在D·阿豐索一邊，他們佔領了許多座城堡，趕跑了忠於被廢黜的國王D·桑紹的司令官。

1419年的《編年史》是記述這些事件的最早的一部史書。書中闡明了戰爭的性質。按其性質而論，這場戰爭和下一世紀末那場把阿維斯統帥推上國王寶座的内戰有許多相似之處。書中説："……聽到博羅尼亞伯爵返回葡萄牙，人人興高采烈。他們期望這位伯爵能夠把壓在人們頭上的沉重負擔徹底解除，所以

許多鄉鎮和地方的人民都衷心擁護這位伯爵”。另一段說：“國王D·桑紹遭到人民的唾棄。”

這場内戰中出現了許多生動有趣的事件，並因此產生了一些傳説，在文學上也引起了反響。其中最著名的是關於科英布拉城堡司令的傳説。這個司令忠於D·桑紹，直到這個被廢黜的國王逝世，他象徵性地把城堡的鑰匙奉還給這位國王之後，才交出了城堡。這種作法體現了封建的道德觀，在詩歌集或者貴顯錄内把這種舉動看作是城堡司令的叛逆。另一個有意義的傳説是把聖塔倫的弗列伊·吉爾這個半真實半神話的人物同這場革命聯係起來。弗列伊·吉爾是個教徒，有可能是他和另外幾個教徒一道把教皇廢黜國王的聖諭交給了D·桑紹。據傳説，弗列伊·吉爾在法國曾同魔鬼訂立過條約，但是後來弗列伊·吉爾成了聖人。自然，對於勝利的一方，他是聖人；但是對戰敗的一方來説他則是魔鬼。

這場革命的勝利意味着恢復了國王與人民階層的聯合，團結一致共同反對特權階級日益增長的壓力的政治路綫。

戰爭結束後，D·阿豐索三世立即召開議會。從議會的紀要來看，出席議會的有鄉鎮和城市的代表，即内戰中支持D·阿豐索三世的農村和城市資產階級的代表。雖然突出地提到了1254年召開的萊里亞議會，但是可以肯定地説在1250年舉行的吉馬良斯議會上已經有人民的代表參加了。

1258年，普遍實施了調查法。調查的結果爲大規模地改組政府機構提供了基礎，剎住了貴族欺詐平民百姓的風氣，各個城市的權利進一步得到了保障。1419年的《編年史》説：“國王整頓了國家事務，整個國家秩序井然，一派安寧。D·阿豐索三世把他哥哥D·桑紹·卡帕羅國王統治時期荒廢的農田重整一

新。"

1279 年,D·阿豐索三世逝世,但是他的政治路綫在他的繼承人 D·迪尼斯統治的前半時期并未改變。D·迪尼斯登上王位後,首先遇到的就是一部分貴族的反對,爲首的是與他爭奪王位的弟弟。但是國王有力量鎮壓不安分的貴族在 1281、1287 和 1299 年舉行的三次叛亂活動。這些反叛的貴族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相反,還遭到"各地鄉鎮"的反對;1287 年發生的著名的"裁縫戰鬥"就是其中一例。

政治上的太平使國家有了全面的發展,經濟活動加强了,國家的管理機構得到了改善,文化上也有了進步。就其特點而論,13 世紀上半葉和下半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上半葉戰事連綿不斷,貴族横行霸道,而下半葉則是社會和政治安定時期。

21 1320～1324 年的内戰
D·阿豐索四世時期

在 15 世紀的頭 25 年内編寫的《D·迪尼斯編年史》一書中,作者引用了從前的一部編年史的一段話:"傳説,(自從有了私生子以後),他就不再致力於他的國土上的秩序和安寧了"。

許多事實表明,在 D·迪尼斯統治的後半個時期,政治上發生了變化:他改變了 1245～1247 年革命所確定的政治方針,如停止召開議會,國王又給貴族大量的饋贈,以及 1295～1297 年又同卡斯蒂利亞發生戰爭,等等。盡管國王 D·迪尼斯竭力制止,大貴族們還是篡奪了國王的特權,如封授騎士稱號和進行終審判決。D·阿豐索三世和 D·迪尼斯長時期的和平統治,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飛躍發展,但是政治上的安定也鞏固了貴族

階級的地位，使他們增加了對其他階級的壓迫。

1320～1324 年的內戰自然與貴族地位的鞏固有關；這場戰爭席捲了全國，雖然中間也有短暫的和平時期，戰爭的直接起因是D·阿豐索王子（未來的D·阿豐索四世）認爲D·迪尼斯挑選他的弟弟，私生子D·阿豐索·桑舍斯繼承王位是企圖汚辱他，因而舉兵叛亂。但是根據所知道的少數資料的記載，這場鬥爭遠遠超出了家庭問題的範圍。當時國家分爲兩大派，叛亂的王子得到了各地鄉鎮勢力的支持。叛亂的發動者原先是個平民，但後來是貝雅的律師，他父親是個木匠。D·阿豐索王子任命他爲掌璽大臣。當時有很多人指責他，說他不僅用"花言巧語"迷惑許多鄉鎮的人民，而且還蒙騙了無數的貴族。參加叛亂的人不僅指責國王D·迪尼斯偏愛D·阿豐索·桑舍斯，而且還說國內已無正義可言。葡萄牙語"正義"一詞的意思當時是指社會秩序，即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和睦相處。

依靠人民力量的支持（他們趕走了一些城堡的司令官），阿豐索王子佔領了萊里亞、科英布拉、蒙特摩爾奧維里奧、費拉、加亞和波爾圖等地。吉馬良斯的居民答應把該鎮交給阿豐索王子，但是有一個貴族忠於國王，他率領一批騎士起來反對，致使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人民群衆對這個貴族咬牙切齒，D·迪尼斯國王擔心當地人民會將他殺掉，所以下令他加固其住宅。在第二個回合的戰役中，阿豐索王子向里斯本挺進，D·迪尼斯國王率領着該市的軍隊出來迎戰，但是戰鬥中這支軍隊嘩變，投奔了D·阿豐索王子。最後一場戰鬥發生在聖塔倫，該市也是擁護王子的。D·迪尼斯國王率領着他的騎士衝入該市這是違背市民願望的，經過一場血戰，他終於被迫讓步，下令把D·阿豐索·桑舍斯驅逐出國，沒收他的財產，並且把那個保衛吉馬良

斯鎮有功的貴族解職。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互相原諒了以前攻擊。不久以後，D・迪尼斯便與世長辭（1325 年）。

D・阿豐索王子一派勝利了。他一上臺就確定了施政方針：召開議會，制止貴族篡權肆虐，取消了前王朝在後二十年中的授封的教會屬地和貴族屬地。

D・阿豐索・桑舍斯和許多貴族逃到了卡斯蒂利亞。他們曾多次發動戰爭，企圖捲土重來，但是由於得不到國內人民的支持，所以這些戰爭只不過是些邊境上的一些騷擾而已。D・迪尼斯的另一個私生子被指控與叛亂分子有勾結行爲，審判後被斬首。一份像是政治宣言的判決書說："國王的存在，是爲了給每個人以平等的權利。根據這種權利，人民便享有生活、恩惠和福利。背叛國王就是最嚴重的犯罪，既是反對上帝、也是反對在世界上代表上帝的國王，也是反對熱愛國王生命、利益、榮譽和身體的人民，因爲國王就是人民的性命、人民的利益和榮譽。"

這時王室中贊成羅馬法律中央集權精神的法學家。數量不斷增加，他們的影響非常清楚地表現在一部旨在改善司法體制的立法著作裏。這部立法著作逐漸集中了司法權力。外來法官制，即由國王任命法官的制度就是從這個朝代開始的。國王任命的法官逐步取代了各鄉鎮居民選舉產生的法官。D・阿豐索王朝末期編寫的《法官守則》一書指出，實行外來法官制是爲了把建立社會秩序作爲國家的職責；禁止權貴干涉司法活動，違者嚴懲不貸；嚴禁貴族爲報私仇進行格鬥廝殺，違者將被處以極刑。

D・阿豐索非常關心的事情之一，是貴族和平民之間平等相待，以求建立和睦的社會氣氛。在 1352 年召開的里斯本議會

之後所通過的決議裏規定(這次議會是爲了解決1348年黑死病所造成的農村勞動力不足而召開的),要遵守以前有關徒工義務勞動的條文。但是在人民中又提倡徒工和師傅平等，以便促使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平等。

D·佩得羅一世時期（1357～1367年）堅持了這條路綫。“公正的人”這個綽號就是由於他繼續這條路綫而得名的。費爾南·羅佩斯寫道，人民説D·佩得羅國王統治的十年是葡萄牙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十年。這種感情表達了人民對這個時代的懷念，因爲國王與人民力量聯合起來的時代再未重現過。

22 對外政策　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悲劇

D·阿豐索四世統治期間進行了兩起戰爭，因此後人稱這個國王爲“勇敢的人”。

第一起是與卡斯蒂利亞的戰爭(1336～1338年)。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與婚姻政策有關，通過締結姻緣結成聯盟或者政治集團是當時伊比利亞半島上各國君主常用的手法。阿豐索四世把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卡斯蒂利亞國王爲妻，但是女兒遭到了國王的虐待，並被遺棄。另一方面，D·阿豐索四世使未來的王位繼承人D·佩得羅親王同西班牙一個貴族的女兒訂下了婚約。但是後來這個貴族率領一些封建貴族反對D·阿豐索四世，因此兩人結下怨恨。葡萄牙國王當然不能再允許自己仇人的女兒進入葡萄牙的國土。這場戰爭除了在邊境上造成大量的破壞外，卡斯蒂利亞軍隊還一直進犯到波爾圖附近，才遭到葡萄牙軍隊的截擊。除了陸戰，還有大規模的海戰，葡萄牙的艦隊在

阿爾加維的聖維森特角附近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實際上，在D·迪尼斯以及D·費爾南多對卡斯蒂利亞的戰爭中，海上已經發生過一定規模的戰鬥。葡萄牙的艦隻曾經破壞過西班牙的港口，但這大概只是反映了貿易上的競爭。後來由於教皇干預此事，雙方進行了和談，談判的結果對雙方都没有帶來多大的好處。

1340年，一支摩洛哥國王的軍隊登上伊比利亞半島，夥同格拉納達國王的軍隊共同侵犯基督教的國土。卡斯蒂利亞國王向葡萄牙國王伸手求援。兩國軍隊聯合起來在薩拉多河岸同侵略軍展開戰鬥，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而結束了撒拉遜人捲土重來的嚴重威脅。一位未留下姓名的葡萄牙作家可能親自參加了這場戰鬥，所以把它描寫得十分生動，他的文章有葡萄牙中世紀散文之冠 的美稱。

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死發生在D·阿豐索四世執政時期。盡管這件事没有多大的政治意義，但是情節動人，影響久遠，因而在這部歷史裏也值得簡單一提。

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生在加利西亞一個有權勢的貴族之家。她是卡斯蒂利亞國王桑紹四世的私生女，與阿爾布克爾克家族也有一些關係。前面講過，D·阿豐索四世對D·迪尼斯的私生子阿豐索·桑舍斯恨之入骨，因爲他使全國捲入了一場內戰。就是這個阿豐索·桑舍斯和阿爾布克爾克城堡的女主人結成了夫妻。人們説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稱這位女主人爲媽媽，因爲是她哺養了因內司·德·卡斯特羅。

1350年，卡斯蒂利亞爆發了大地主反對國王佩得羅一世的起義：起義的首領正是阿豐索·桑舍斯的兒子若奧·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也就是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弟弟”。這個弟弟無疑給因內司施加了壓力，讓她説服與其同居的D·

佩得羅王子捲入卡斯蒂利亞内戰。

若奥·達司·列格拉斯在科英布拉議會上發表的著名演説中揭露説，在D·因内司死的前3年，即1351年，D·阿豐索四世曾給當時在梵蒂岡的布拉加大主教寫信，要他説服教皇不要批准D·佩得羅同D·因内司的婚事。信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了若奥·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的詭計："……王子的幾個非直系親屬正在同她幹一件不理智的事。"所謂不理智的事，就是禁止做的事。非直系親屬，指的是若奥·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和D·佩得羅王子是叔伯弟兄。

還有一件事可以説明因内司·德·卡斯特羅在這場政治陰謀中起過重要作用。這就是1354年卡斯蒂利亞國王同她的妹妹若安娜·德·卡斯特羅的婚姻。國王原打算通過這場婚事取得卡斯特羅家族的支持，避免葡萄牙可能發動的入侵。但是，在結婚的當天，國王聽説阿爾布克爾克組織了一個新的貴族聯盟反對他，參加這個聯盟的有國王的兩個弟弟，都是私生子（其中一個叫恩里格·德·特拉斯搭馬拉，他爾後成了起義的領袖，殺死了"殘酷的人"佩得羅後，繼承了王位）。他放棄了這樁婚事，從而加劇了局勢的嚴重性。若安娜的兄弟們利用葡萄牙領土同"殘酷的人"佩得羅作對。同年，即1354年，若奥·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堅持起義者同葡萄牙結盟的計劃，並派因内司·德·卡斯特羅的一個弟弟前來葡萄牙，建議D·佩得羅王子宣佈爲卡斯蒂利亞的國王（D·佩得羅的母親D·帕阿特里絲王后是桑紹四世的女兒），因爲他是國王桑紹四世的外孫。D·佩得羅王子有意接受這項建議，但是阿豐索四世堅決反對他這樣做，這樣我國才没有捲入卡斯蒂利亞内戰。

爲了阻止D·佩得羅王子接受出任卡斯蒂利亞國王的建

議，D·阿豐索四世決定利用他不在科英布拉的時機處死因內司·德·卡斯特羅。1355年1月7日，在科英布拉的聖克拉拉王宮將其斬首。王子認爲國王處理此事不合情理，因而宣佈起義。王子的部隊主要由葡萄牙和加利西亞的貴族組成（加利西亞的貴族中包括有卡斯特羅家族）。數月內戰火遍及全國各地。王子的軍隊因爲垂涎波爾圖居民的財富，將該城圍困達數個星期之久。爲了保衛波爾圖，市民們把停泊在杜羅河上船隻的旗幟都扯下來填塞城牆的裂隙。《D·佩得羅伯爵家譜》一書中這段離奇的情節大概是爲了表明人民的力量參與了捍衛國王的鬥爭。

國王與王子的這場衝突最後達成了和解。"葡萄牙人民看到國內一片廢墟，要求和解，說他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阿賽奈伊洛的這一段話，似乎是要指出是在人民力量的要求下才恢復了和平。

盡管D·佩得羅王子做出種種既往不咎的莊重誓言，他一上臺，就要求卡斯蒂利亞的國王交出那些參與處死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D·阿豐索四世的御前大臣，並且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一一處死。這件事使當時的人大爲震驚。1360年，D·佩得羅宣佈說他早已和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秘密結婚，並且下令在阿爾科巴薩爲她修建一座在葡萄牙陵墓藝術中佔據鰲頭的墳墓。竣工後，立即把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屍體從科英布拉遷到此地安葬。

D·佩得羅王子狂熱的愛情、他與國王的衝突、導致因內司·德·卡斯特羅死亡的政治原因、大部分貴族的同情、國內戰爭、殘酷的報復手段、遷移屍體的隆重儀式、陵墓的宏偉及其藝術價值，這一系列的事實彙成了一個奇妙的傳說，在人民中

間廣爲流傳。傳說中包括許多毫無根據的情節，如封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爲王后，親吻屍體的手背等。安東尼奧·費列伊拉的劇作《卡斯特羅》，特別是充滿了動人詩句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這兩部名著爲在國內和國外傳播這一情節作出了鉅大的貢獻。據本世紀初調查，圍繞這個主題，僅用意大利語譜寫的樂曲或芭蕾舞曲就有 126 首。這個傳說從文學著作搬上銀幕並成了造型藝術的題材，對民間戲劇也有着深刻的影響。

23 貨幣經濟的發展

13 世紀和 14 世紀，國內和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商業活動和農業的關係日益密切。這並非葡萄牙獨有的現象，而是整個西歐的共同傾向。這個時期葡萄牙在這方面的發展是把國家的生產和消費納入了歐洲經濟的範疇。

1245～1247 年的政治危機之後，集市的數量迅速增加，從 13 世紀中葉到末葉，大約建立了 30 個，有關建立貿易集市的資料都說這是國王倡議的。1269 年的一份資料說，科英布拉的資產者"既未受壓力，也未受到蒙騙，而是自願"集會，贊成擁護國王 D·阿豐索三世關於在該市的阿爾麥迪納區建立一個集貿市場的決定。

集市貿易起了重要的經濟和社會作用。人們可以在市場上用農產品換取貨幣，用以購買土地不生產的商品。哪些產品應當交稅，集市條約或者土地租佃契約上都有明確規定，從這些規定所列舉的產品，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集市貿易的狀況。例如貝雅的土地租佃契約規定，下列物品必須交稅：各種牲畜（馬、騾、驢、牛、羊、豬）；用於狩獵的禽獸；能飛翔的鵰和

隼及追踪兔子的白鼬；鷄、鴨、石鷄；白色的皮革和染成紅色的熟皮革、待鞣製的生皮革、兔皮和其他獸皮；幹魚、咸魚、貝類（螃蟹和海扇）；蔬菜：青豆、大蒜、洋葱、青菜；鮮果、幹果、栗子、核桃、青果、葫蘆子等；橄欖油、葡萄酒、蜂蜜、蠟、鹽、辣椒、小茴香；手工業品和建築材料：木材、瓦、粘土、瀝青、生鐵、圓鐵、農具、牛鈴和羊鈴、馬刺和馬嚼、鎖；豬板油、搓繩用的紅莖針茅草、畜草；某些日用品：篩子、面籮、櫃、木糧倉、手提布袋、背囊；毛綫和麻繩、褲子布、帶色布、成衣、鞋。

科英布拉的商人跑遍内地的集貿市場，兜售他們進口的貨物並收購他們準備出口的物品。造船技術從 13 世紀初開始迅速發展，船帆的面積增加，船舵的位置固定，不僅加快了船的航行速度，而且也增加了船的載重量。1255 年，在新加亞鎮的地方行政法裏第一次出現了“三桅帆船”一詞。許多資料表明，當時海上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1226 年，有一百多名葡萄牙海員得到了英國國王頒發的躲避海盜搶劫的自由通行證。1293 年，D·迪尼斯確認（不是成立）了海上貿易基金會。這個組織的基金來自海上貿易，按所得利潤的百分比提成，這筆錢主要用來補償商人的船隻在海上出事所造成的損失。整個 14 世紀期間，我國港口的貿易活動增加，里斯本成了大商埠，貿易活動居全國之首，具備了首都的地位。

貿易往來的加强，使城市商人對農村的壓力日益加重，爲了出口，商人必須從農村采購到更多的産品。當時出口的主要産品是葡萄酒和橄欖油。爲了發展這兩種商品的生産，勢必損害國内消耗的消費品，如糧食的生産。新開墾的土地只願意用來種植橄欖和葡萄，而不願意種植糧食等老的作物。有些土地

盡管已經種上糧食，也寧肯使其荒蕪，甚至將其拔掉，來栽種橄欖或葡萄。所以一直到發現時期的初期，面包供不應求的現象十分突出。

在商人的刺激下，農產品逐漸失去了單純生活資料的性質，開始具有新的價值，即貿易工具的價值。也就是說農產品不單是爲了提供糧食，而且還用來創造利潤。因此，價格問題成了生產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生產者必須設法生產廉價的產品，因爲收購者所提的價格是根據貨物出口地區的國際價格確定的，同時還得把海上運費和商人的利潤計算在內。這樣就必然要大大壓低生產者所得的那部分利潤；反映到工錢上，就是農場主想方設法招僱廉價勞動力，起碼是不願意再出高價僱工。

但是農產品的剩餘價值主要落到了城市商人的手裏了，即經營出口的實業家手裏了，形成了以農村爲基礎的城市資本主義。對貨幣的需要越來越迫切，甚至農民没有它也無法生存。13世紀初，《卡斯特羅·羅得里戈的習慣》一書談到了關於播種貸款和取締投機倒把活動的努力。1321年，人民在議會裏抱怨猶太人資本家使許多農場主破了產，因爲這些資本家不滿足於三分之一的利潤。在1364年召開的里斯本議會上，大家紛紛要求有錢的人（猶太人）從事農業和畜牧業，因爲“他們有錢，他們能幹好這些事。”這種要求並非新鮮事兒，因爲從前D·迪尼斯也曾利用猶太人的大量資本來種植特拉什奧什蒙特什地區的葡萄園。這些事實表明，14世紀中葉貨幣經濟對農業經濟的支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葡萄牙出口的主要產品有葡萄酒、橄欖油和食鹽，其次有軟木、葡萄幹、水果、皮革和蠟。進口的主要商品有優質的布匹（錦緞、刺綉、絲綢、毛料）、武器、金屬、香料、糧食、北

部的木材、熏魚和碱魚。國王的税收政策是鼓勵進口，每艘船隻返航時所載貨物的價值不得低於出航時的價值，因爲關税在入境時交納，出境時不納税，這樣就間接地收繳了全部的出口税。因爲進口的商品中多數是些貴重的工業品，所以没過多久，這些進口貨的價值便低於出口的原料的價值了。於是國王便開始徵收補差税，即差額税。這樣，我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的局面從中世紀就開始有了。這種狀况，一方面是生産出口商品的階級的生活水平同消費進口商品的階級的生活水平之間差距太大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造成這種生活水平懸殊的一種因素。

24 富豪與貧民

經濟的變化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後果：貴族日益貧困，資産者日益富裕；農場主千方百計給貴族地主少交地租和給僱傭勞工少付工錢，因而同兩者都不斷産生矛盾；由於城市的擴大和勞動力的日益缺乏，在農場裏工作的勞工也開始進行反抗。

生活的變化越來越要求貴族擁有大量的貨幣，要購置貴族的生活用品，如華麗的衣裝、鍍金的馬鐙和馬鞍、牀單和被褥、身上搽的香水等，就得付給在里斯本經商的葡萄牙、熱那亞、威尼斯、比斯開、佛蘭德、英國等國商人金幣或者銀幣，而不能再用糧食交換。爲了維護他們岌岌可危的經濟地位，貴族採用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長期租賃土地、長子繼承權、津貼金、暴力，甚至在個别情况下親自躬耕。

我們已經講過，還在上個世紀貴族所有制和平民所有制就有了競爭。競爭的結果是爲貴族幹活的勞動者大量減少。爲了

彌補自由勞力的不足，有一段時間他們曾發動戰爭，抓獲摩爾人；但是到了 13 世紀中葉，搶佔領土和劫人抓夫的時代已告結束。爲了把勞動者吸引到自己的土地上，或者使勞動者不離開自己的土地，貴族地主給予這些勞動者的報酬就不能低於他們在平民土地上幹活時所得到的工錢。爲此，貴族地主把土地的使用權完全交給了勞動者，並不再對農業經營進行任何干涉，只等待着勞動者每年交給他一部分收獲作爲租金，這就是長期租賃制。合同是長期的，終身的，或者是幾代人的，但是長期租賃土地的地租不變，它是根據簽訂合同時土地的產量計算並固定下來的。因此，到了 14 世紀，許多貴族拿的還是 13 世紀時確定的地租。所有的東西都漲價了，唯獨貴族的收入没有變動。

隨着時間的流逝，貴族的土地逐漸被分成零星的小塊。因爲地主死後，兒女們要分家產，貴族的子孫有淪爲窮光蛋的危險。爲防止因分家而造成的貧困，建立了長子繼承權的制度，這樣就使某些財產永遠受法律的保護，貴族生前不准轉讓，死後也不許分配。假若一個貴族有幾個兒子，只有長子有權繼承有關的財產。長子繼承權起到了鞏固貴族階級的社會地位的作用；從中世紀建立這種制度開始，長子繼承權在有些家庭裏一直延續到 1863 年自由黨人的立法，廢除長子繼承權後才結束。

在佔領領土的戰爭結束之後，雖然作爲軍人的貴族已大大失去他們的重要作用，雖然他們不具備在國家機關擔任官職的才能，但是國王離開他們卻無法生活。貴族是受到國家尊重，是王位週圍不可少的人；所以雖然戰爭結束了，作爲兵役費用，國王照舊給貴族發放報酬，即津貼金。14 世紀，津貼金大幅度地增加，與此同時，資產者反對發放這筆費用的浪潮也不斷高漲；他們認爲增加津貼金等於把應該歸他們的錢給了一個無所事事

的階層。D·費爾南多時代，這種爭論尤其激烈。阿維斯統帥登上國王的寶座之後，立即取締了津貼金，實行軍餉制，也就是只有服兵役的人才能得到報酬。幾年以後，他感到自己的王位已經穩定，又重新發放津貼金。

生活的困難使貴族多次産生了想依賴農民生活的念頭，因而引起了農民的不滿和反抗。《阿豐索法典》裏有一段關於貴族横行霸道的記載："貴族們結幫成群，有的騎着馬，有的步行，從這個村到那個村，吃農民的面包，拿農民的口糧和留作種子的大麥喂馬，宰殺農民的耕牛，不顧農民的反對，任意拿取農民的財物，而且分文不付。"還有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就是投宿：貴族認爲他們在國内旅行時有權在任何農民家裏住宿。住宿期間，他們强取農民的糧食、衣服、柴草和牛羊。這種行徑激起了農民的不滿。阿爾特爾多紹的農民遭到貴族的屠殺就是這種殘暴行爲的證明。事情的經過是：一個阿連特如的貴族想在阿爾特爾多紹鎮上投宿，但是遭到了農民的拒絶。後來這個貴族將此事上告國王，但國王認爲農民做得有理。於是這個貴族惱羞成怒，糾集了一群歹徒，奇襲阿爾特爾多紹鎮，殺了12個農民，都是管理這個鄉的富裕的農民。

爲了擺脱困境，貴族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勞動。事實上，一些貴族已經這樣做了。但是如果參加了勞動，就得丢掉貴族的尊嚴。14世紀初，一個調查委員會的法官在國内進行了調查，他發現一些貴族像平民一樣地幹活，於是就把問題提到了國王那裏。國王在决定裏説："既然他們不過貴族的生活，就不能享受貴族的榮譽。"但是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情况：爲自己幹活，還是爲他人幹活。如果是因爲生活拮据，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還有可能保持貴族的稱號；倘若是從事機械工作，如鐵匠、鞋匠、

裁縫或者製蠟工人，則要失去原來的貴族稱號。

與貴族階級日趨貧困的同時，正在涌現出一個新的豪富階級，這就是城市裏的商人和農村裏的大農場主。金融資產者和農業資產者的利益並不一致，因爲一方賺的錢正是另一方所失去的。但是在人民的力量戰勝了D·桑紹二世的封建割據，開創了和平時期之後，貨幣資產者和農業資產者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大資產階級和富有的貴族競相比闊。像貴族一樣，大資產階級也穿上了緋紅色的貂皮披風，水獺皮袖和水獺皮領的英國細毛大衣，繫着銀質腰帶和挎着鍍金的佩劍。講究豪華排場的競賽愈演愈烈，以致國王不得不出面干涉，以免資產者和貴族富户混淆不清。1340年頒佈了一項禮儀條例，規定了各社會階級衣着的數量和所用布匹的質量。但是盡管有種種禁令，資產者服裝的豪華程度，仍然允許同貴族騎士一樣，僅僅稍低於富豪。資產者的夫人可以戴有金絲的面紗。資產者本人可以使用鍍金的馬鞍和馬鐙；"倘若他們願意也可以佩帶與貴族的護身劍價值相當的佩劍。"佩劍是一個象徵性的物品，是貴族身份的標志。資產者總想把自己打扮成貴族模樣。1305年的一項法律提到了一件荒唐可笑的事：貴族富豪把一些鄉的資產者封爲騎士，這樣做是違犯法律的，因爲法律規定只有國王才擁有這種權力。

城市的資產者和城市裏的平民有矛盾，同樣，農村裏的資產者和農村裏的平民也有矛盾。城市迅速擴大，1374年，國王下令在里斯本修築一道新的城牆，因爲城市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摩爾人修的老城牆的界限，新城牆範圍内的面積大約相當於老城面積的十倍。城市迅速發展的基礎是商業的發展，當然，與貧苦的農民流入城内尋求比較好的生活條件也有一定的關係。

過去在農村幹活的青年人紛紛擁入城市，當馭手、小商小販、手工匠人的學徒、傭人、臨時工，有的也淪爲乞丐，流浪在街頭。但是正是因爲有了這些職業供他們選擇，這些農村青年因此也獲得了解放。

13世紀末，里斯本已經有了一批工匠師傅出身的富人，即靠自己的手工勞動，而不是靠經商擢昇到資產階級地位的資產者。這些工匠師傅領導着一大群匠人或工頭、學徒和傭人。他們是城市人民中的一個重要階層，並且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在市政廳發號施令。工匠師傅和由工匠師傅資助的宗教性組織也曾管理過一些街道，但是城市的政權一直掌握在真正資產者的手裏；那些爲外貿出口的船隻安排貨源、發放貸款的人被選爲議會的成員，他們用懷疑和不信任的眼光來看待手工藝人的“聯合組織”。

在農村，農業的經營權集中在農場主手裏，他們也同樣壟斷着鄉鎮的政權。農場主嫉妒沿海城市的資產者，抱怨自己“離海太遠，而那裏的好處都給資產者撈走了。”也就是說靠海洋的資產者發了財。但是最嚴重的矛盾還是這些農場主與農村勞動者的矛盾，因爲他們不像從前那樣俯首貼耳地幹活了。

25 黑死病與勞工問題

1348年，整個歐洲遭到一場可怕的瘟疫——黑死病的侵襲，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在一些地區，甚至有一半人喪生。現代的歷史學家認爲這場傳染病是14世紀後半葉歐洲農村嚴重危機的根源。這場瘟疫造成的社會後果如此嚴重，以致有人把它看成是中世紀和現代的分水嶺。

有關黑死病在葡萄牙蔓延的記載不多，最詳細的資料是一家修道院的編年史，但是這部編年史是事過多年之後編寫的，上面說："9月份開始，這場瘟疫在聖米格爾蔓延。如同在其他地區一樣，造成大量的死亡。黑死病持續了三個月，死亡人數達二分之一。主要病症是腹股溝和腋下紅腫。"另外一份材料也是修道院的編年史，不過記載的是有關黑死病在科英布拉發生的情況。材料說在科英布拉有十分之一的人沒有熬過來，也就是說十分之一的人沒有逃脫死神的魔爪。

但是這兩份材料講的是全世界的情況，不是專講葡萄牙的；很有可能只是這場席捲整個歐洲的鉅大恐怖引起的反響。此外，許多材料裏都談到了勞動力的減少，但是減少的原因並不是因爲黑死病，而是因爲不擁戴農場主。1349年的法律前言有點像官方的報告，它對勞動力減少的問題是這樣說的：

> 向你們，法官、市政議員和農場主致敬。你們知道，我已經獲悉在黑死病發生之前，這個鎮上的男男女女都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掙錢。人人都用自己的專長或者職業爲這個鄉做出了必要的貢獻。現在，由於一些人的死亡，一部分人得到了一些財產，便自以爲了不起，不願意繼續從事以前的事業，因此，使本鎮的居民蒙受到鉅大的損失。另外還有一些人從前一直從事挖掘、修剪樹木花草、耕種、收割、收摘葡萄、放牧牛羊或者從事本鎮需要的其他工作，但是現在如果不按照他們提出的要求支付工錢，他們就拒絕幹這些活兒。由於他們的要價太高，葡萄園、農場、牧場等等的主人認爲將來的收益還不够支付這筆開支，於是便不再種植葡萄和經營農場了。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國王頒佈法令，要求每個教區的農場主調查清楚在黑死病發生之前哪些人是一貫勞動的，現在有否正當的理由不再從事勞動。倘若理由不充分，農場主可以拿出自己認爲是合理的工錢强迫他們繼續幹活。

這是第一次發佈强迫勞動的法令。從此以後，關於這個問題還頒佈過一系列法律措施。從這裏可以看出，法律是無論如何也阻擋不住社會變革的洪流的。

勞動力問題在黑死病發生之前就已經嚴重存在，黑死病之後，更加尖鋭化了。在農村，自由民的勞動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福利勞動、工錢勞動和日工資勞動。對這三個階段的演變過程，我們還不十分清楚，因爲我國古代的歷史學家特别重視對戰爭的政治危機的研究，而對於引起戰爭和政治危機的原因卻重視不夠。所謂福利勞動，就是爲换取主人的保護而付出的勞動。主人給勞動者的福利包括給飯吃、給衣穿和給鞋穿。這三條義務後來逐漸固定下來，福利的形式變成了給幾米布和兩雙鞋或者其它物品。這就是貨幣經濟之前的制度。13 世紀中葉，這種制度開始瓦解，因爲 1253 年内戰剛剛結束，便頒佈了一項規定價格的法律，實行混合報酬：一部分給實物，衣服和鞋，另一部分給錢。實行工錢制度後，僱傭勞動以年爲期，工錢爲年薪。按照 13 世紀埃武臘的租佃契約，如果主人不到一年解雇勞工，他必須付給勞工全年的工錢。14 世紀中葉，法令規定，如果被僱的勞工合同未到期就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應受到鞭笞和游街示衆的處分。但是主人不得强迫勞工爲他連續幹活三年以上。當時僱傭年工越來越困難，1349 年的法律提到勞動者只願意按月或者按星期簽訂合同。這樣，到了工作繁忙的季節，他

們可以甩手不幹。最後一個階段是按日計工，即按天計算工錢。昔日的奴隸成了今天的農村無產者。地主稱他們爲零工。這些人成了農村的庶民。地主把他們看成是一種威脅和不安定的因素。爲了對付這些人，地主利用他們所把持的鄉鎮政權，徵收工錢稅，進行注册登記，不許他們離開家鄉，甚至還要求議會重新實行按年計算工錢的老法令强迫勞動者爲自己幹活。

地主的這些努力雖然都是枉費心機，但是這種鬥爭卻在農村造成了社會的緊張局勢，導致了 1383～1385 年的危機。

26 文化的變化

1. 抒情體的結束和小說的興起

同政治的發展一樣，文化的發展也經歷了許多突然的變化。

13 世紀的文學作品（修道院的文學創作除外）完全是口頭文學。詩是供吟咏的，配樂詩是爲跳舞助興的。在《詩歌集》一書中收集了幾千首簡單的歌曲，使我們今天仍然有可能欣賞最古老的葡萄牙詩人的作品。按照年代順序排列，最老的詩人是帕伊奥·蘇亞雷斯·德·塔維洛斯。他誕生於 1141 年，即 D·阿豐索·恩里格斯開始執政的年代。

直到 13 世紀中葉，達官貴人的詩歌和普通老百姓的詩歌之間可能還沒有多大的差别。《朋友歌》（之所以這樣取名是因爲這些歌曲的内容都是女性呼喚男友的聲音）來自民間，可能是古代基督教文化、摩爾人的文化和猶太人文化的混合形式，取材是加利西亞農村和沿海地區的民間題材，但演唱卻是猶太人模倣阿拉伯人的腔調。這是加利西亞—葡萄牙抒情體時期的獨特之處，是歐洲文學上没有的現象。

但是在 1245～1247 年的内戰之後，這種抒情體的純潔性遭到了破壞。D·阿豐索三世在法國生活過多年，回國時帶回了華麗、高雅、深奥和矯揉造作的普羅旺斯的詩風。詩的主題也發生了變化，多數的主題已不再是彌撒前的朝集、朝聖、泉水和海上航行的船夫曲，而是些宮廷愛情，即宮廷裏庸俗、甚至有點淫蕩的求愛情景。《愛情歌》就是這種新詩風的代表作，内容是男人向戀人暢叙衷腸的聲音。這種新的詩體之所以能很快流行（它並没有把舊體詩完全排擠掉，甚至在宮廷内還繼續做舊詞），可能與 1245～1247 年革命後大批更新政界人士有關。

這個時期的創作如雨後春笋，大量涌現。今天還保留有二千多首詩作。據説人人都能作詩。甚至連國王都成了詩人。D·桑紹一世作過一首長詩，D·迪尼斯和他祖父阿豐索十世一樣，也是位傑出的詩人，是著名的《聖瑪麗婭之歌》的作者。但是忽然萬籟俱寂，再也聽不到吟哦詩句的聲音。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直到 1516 年才出版了《詩歌全集》，吟咏聲才又重新響徹詩壇。這部詩歌集還收集了 15 世紀後半葉的創作。D·迪尼斯 1325 年謝世，詩聲的啞然似乎與他的統治時期的告終有關，但是究竟爲什麼吟咏詩句的聲音曾一度消失，這個謎至今尚未找到答案。

有資料説是因爲從這個時期開始了嚴格的道德檢查，法律禁止或者制裁誘惑、通姦、賣淫和淫蕩的詩句（給王子取樂吟詩的教士屬浪蕩人之列）。也可能是因爲朝廷裏的人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正如我們前面講過的，D·阿豐索四世的上臺意味着反對專制政體的政治派别的勝利。當時方濟各會和多明戈會這兩個教派正處在興盛時期，擁有鉅大的精神權力，詩人創作的

衰落也可能與此有關。抒情詩的衰亡也可能和新的經濟形勢有聯係。當時的海上貿易已十分繁榮，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文化活動的形式變成了今天這樣的書寫和閱讀，代替了吟唱和聽。但是這是一種消費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文化，而它所消費的則是從國外進口的故事：不列顛體裁的騎士小說（即一套關於阿瑟王及其騎士保衛遭到侵略的不列顛的傳奇）。這些傳奇依據的歷史事實發生在1200年左右，到1300年形成了情節完整的神話故事，並且廣爲流傳。

騎士小說風靡一時，成爲騎士和資產者最喜歡的讀物。資產者之所以愛讀這類著作，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加入騎士的行列。努諾・阿爾瓦列斯大約生於1360年，從小就非常愛聽有關騎士的故事，尤其是愛聽有關阿瑟王的同伴伽拉阿什的故事。

正當人們熱衷於閱讀騎士小說的時候，第一批歷史書籍，如各種《家譜》也應運而生。這類書籍是貴族本人寫的或者是貴族請人代寫的，目的是理清自己的親屬，或者肯定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是他們把土地從摩爾人手裏奪回來的，也是他們協助國王成爲國王的。在貴族階級正在遭受貧窮威脅的時代，在貴族階級已預感到資產階級的政治作用正在超過他們的時代，這種自我標榜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第一部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家譜，是《D・佩得羅伯爵家譜》。D・佩得羅是D・迪尼斯的一個私生子，貝雅那個木匠的兒子領導的那場運動勝利之後，把他連同其他許多貴族一道趕出宮廷，使他過着半流放式的生活。他的家譜使人明白，這些《家譜》都是編年史的胚胎。此外，D・佩得羅還親自組織編寫了《西班牙的總編年史》(1344年)。這本書是第一部用葡萄牙文寫的大型編年史。

2. 口頭文學

並非所有的口頭文學都有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命運，享有這種待遇的只有宮廷內的口頭文學，而人民中間，如流傳在集市、鄉鎮和船隻上的口頭文學，則全部散失了。另外，爲使王宮貴族享樂和爲豐富民間的文藝生活，一些民間藝人講唱的奇迹事、英雄豪傑和聖人生活之類的叙事詩，也都没有記載下來。但是只有一個例外，而且極其重要，因爲它向我們表明了人民歌頌的英雄之一就是D·阿豐索·恩里格斯，同時也表明了人民懷念這位國王的形式。科英布拉聖十字修道院的修士們收集的散文詩形式的民歌長期以來都用來對這位開國國王歌功頌德。這種民歌可能產生於13世紀上半葉，因爲它的内容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社會鬥爭。下面是D·恩里格伯爵給葡萄牙的締造者D·阿豐索·恩里格斯留下的綱領和政治遺囑：

你要成爲貴族的朋友，把你的權力交給他們，你要尊重各個鄉鎮的榮譽，要使貴族和平民享有同樣的權利。

不要受他人的唆使或者爲滿足自己的私欲而放棄正義，如果今天你没有主持公道，哪怕只是一絲一毫的不公道，明天你的心靈裏就會打開缺口。

所以，我的孩子，你要把正義兩字牢記在心頭，上帝和百姓就會同你在一起。

3. 宗教文化　哥特形式

宗教文化在修道院院内迅速發展。阿爾科巴薩修道院和科英布拉的聖十字修道院的作用尤其重要。這個時期的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聖·安東尼奥就曾在聖十字修道院學習過。12世紀

末，他出生在里斯本，經歷極不平凡：曾在北非當過傳教士，後來到了意大利，結識了聖·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盡管聖·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反對經院神學，但是仍然被這個葡萄牙教士宣講的充滿熱情和人道主義的神學所感動，所以決定聘請聖·安東尼奧爲他的年青的革命的修會會員講授神學。聖·安東尼奧在法國和意大利各個城市的講道深深地打動了人們的心靈。在他逝世一年之後（1231 年），教會宣佈他爲聖人。聖·安東尼奧傳經佈道的一部分提要被編輯成書，其中的一些話發人深省。方濟各會的教義之所以在人民中間受到歡迎，在於它的社會內容，在於它譴責富貴，在於它頌揚貧賤。當時非常時興大紅袍，我們的這位聖人竟對穿着這種長袍的闊老們說："你們身上穿的長袍是紅色的，但是不是用紅色染料染成的，而用窮人的鮮血染成的！"

這個時期的另外一位偉大人物也與教會有關，但卻不是因爲傳教。這個人是佩得羅·伊思潘諾。他是里斯本一個醫生的兒子（當時，幾乎所有的醫生都是猶太人），通曉阿拉伯科學。是個天才的普及學家。他編著的書籍幾個世紀以來都是教學的基礎教材。印刷術發明後，這些書籍在許多國家被多次翻印。最著名的一部書是《貧窮的財寶》。作者想通過這本書使所有的人都懂得醫學知識。另外一部著作是《邏輯學概要》，伊思潘諾用兒童都能看懂的淺顯通俗的文字闡明了邏輯學的原理。700 年前，他在這本書裏闡述的演繹推理的記憶法，至今仍在許多所學校裏講授。1276 年，佩得羅·伊思潘諾被選爲教皇，稱若奧 21 世。

13 世紀教會的影響也是文化的鉅大變化的另一個方面：即由羅馬形式轉變爲哥特形式。第一批哥特式教堂是方濟各會和

多明戈會這兩個新的教團興建的。在葡萄牙，這兩個教派成立於 1220 年左右，這個時期社會局勢非常緊張。這兩個新的組織，尤其是方濟各會，也是在緊張的形勢中誕生的。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富豪反對貧民，也像在葡萄牙富豪反對貧民一樣，聖·弗朗西斯科把他的會員稱爲貧民修士，把他的會員同庶民百姓放在一起。在葡萄牙的人民鬥爭中，方濟各會的會員究竟起了哪些作用，我們還不是十分清楚，這種情況不足爲怪，因爲我們的歷史學家根本不知道進行過哪些人民鬥爭。但是方濟各會的會員確實是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引起廣大人民群衆踴躍地加入該會，從而引起了主教的不滿，罵他們是假先知、盜賊、危害世界的歹徒，企圖阻止他們到人口稠密的地區居住和在民間傳教。1384 年，當卡斯蒂利亞人撤離對里斯本的包圍時，如果閱讀一下一個方濟各會會員在里斯本講道的內容，你就會發現它們是多么的危險。他所維護的東西就是基督教最完美的東西：即慈悲，而慈悲就是不讓他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接着他舉出一系列突出的例子，説明在里斯本遭到圍困的艱難日子裏富人利用窮人的饑餓大搞投機倒把。人民一邊聽他講道，一邊“涕哭、抽泣、流泪、雙手伸向蒼天”。

在這種新的宗教思想進入葡萄牙的同時，也引進了一種新的建築格調：哥特形式。從 13 世紀到 15 世紀初，葡萄牙修建了幾十座哥特式修道院和教堂。這種新穎的建築形式很快就風靡全國，尤其是在平民佔優勢的南部地區；北部因爲地主統治的影響仍然很盛，所以哥特式建築只是在資産者集中的少數地區才有，如吉馬良斯、拉特什、巴塞盧斯、納亞納、康德鎮、波爾圖等。但是在南部地區，興建了聖塔倫和埃斯特雷莫兹的聖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埃爾瓦什的聖多明尼科什修道院、聖塔倫

和科英布拉的聖克拉拉修道院等一系列的哥特式藝術的建築。

與大量興建宗教性建築的同時，民用建築也大批涌現。我國中世紀的城堡幾乎都是這個時期建造的，高大的塔樓和堅固的圍牆代替了上個世紀修建的簡陋和不牢固的要塞。這是葡萄牙史上建築的鼎盛時期，大量建築物的出現，標誌着經濟的繁榮昌盛。在鄉鎮裏，手工藝匠人、建築工人、采石工人、砌石匠、鐵匠、上釉工人、木匠、雕刻匠、金銀首飾匠等的人數大量增加。這時的城堡增加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偏門：叛逆門。當然，這不只是在葡萄牙才有這種偏門。城堡的正門對着居民區，是鎮的大門。但是在城堡的後院還有一個門，直通田野，一旦大門走不出去時，就可走後門，這就是叛逆門。所謂叛逆指的就是人民起義，它使統治者時刻處於驚恐之中。在1383～1385年的革命期間，曾多次使用過叛逆門。

27　大學的起源

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擴大，掀起了一場文化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當然是教會，因爲教會的人比其他人更要求具備文學素養。這個教會不是卡斯蒂利亞的教會、英國的教會或者意大利的教會，而是天主教會，也就是世界性的教會，因而它應該講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這種語言在當時就是拉丁語。但是要講拉丁語，必須先學會拉丁語。只有大的修道院和主教教堂開辦學校。1072年，在一份有關布拉加主教教堂的文件裏第一次提到了葡萄牙的學生；1088年，在一份文件裏第一次提到一個名叫佩得羅·格拉馬提科的人，他是最早提到的一位教師。D·阿豐索·恩里格斯國王的一個朋友，叫若奥·彼古里亞爾，曾在

科英布拉教堂的學校裏執教，後來是科英布拉聖十字修道院（1131 年）的創建人之一。

開辦這些學校都是爲教會培育人才的，然而希望掌握知識的人不都是未來的神職人員，資產者的子女也想通過文化的提高來昇遷自己的地位。於是教育便開始越出修道院或者教堂的門坎。這樣，哪兒有高師，那兒就會聚大群的學生，他們自發形成的當然不是一所學校，而只是一個比較自由的教育中心。規模最大的是巴黎的教育中心。那兒有個天才的僧侶，叫阿伯拉爾多，他的聲望很高，吸引了整個歐洲的幾千名學生。但是這種自發辦學的潮流威脅到教會學説的統一。阿伯拉爾多惹了麻煩，他的思想受到指責，盡管學生們視他若聖人。教會給這場文化運動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要求執教的教師必須有許可證。

這些教會機構以外的學校是面向所有的人，不管是教徒還是俗人都可自由出入。爲了區別於專門爲教士舉辦的學校，人們把這類學校稱爲綜合的學校。後來，在綜合學校的基礎上誕生了大學。“大學”一詞來自拉丁語，它的含義是“綜合”和“全面”。教會對教會組織之外興起的這股尋求知識的潮流並未漠然視之，而是想方設法領導它，限制它。教會最早承認的大學之一是巴黎大學（1215 年）。托洛薩大學（1229 年）、博羅尼亞大學及西班牙的帕倫西亞大學（1214～1216 年）和薩拉曼卡大學（1230 年）都是最早建立的大學。

1288 年或者 1290 年成立的里斯本大學，是這場偉大的文化運動中的產物。1288 年或者是 1290 年年初，阿爾科巴薩修道院、科英布拉的聖十字修道院、里斯本的聖維森特修道院和吉馬良斯的聖瑪麗婭教堂等幾個有錢的教團的首腦，聯名上書教皇，請求教皇批准他們拿出一部分收入資助興建一所里斯本大

學。他們說建立一所大學有助於爲教會培養人材，同時，還可以避免因把人送往國外學習而負擔的龐大開支和所冒的危險。教皇同意他們的請求，於是在1290年，D・迪尼斯國王正式創辦了這所新的大學。

在葡萄牙,非宗教機構的學校要比其他國家晚開辦幾十年。這裏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科英布拉的聖十字修道院和阿爾科巴薩修道院當時起到了文化中心的作用。這兩個修道院與葡萄牙前幾任國王的關係十分密切，可能他們認爲這兩個修道院已經滿足了當時的文化需要。另外一個原因是，除了教會辦的學校外，猶太人的教堂也辦了一所學校。最初幾位國君的一些合作者，都曾在猶太人教堂辦的學校裏學習過。但是最普遍的說法是，早在里斯本大學建立之前已經有許許多多的學生前往國外學習去了。一份有說服力的材料就是還在12世紀，D・桑紹一世已經爲在國外學習的葡萄牙學生撥款四百個莫拉貝蒂諾，以支付他們的學費。

里斯本大學成立後，葡萄牙人仍然大批地到外國的大學上學。對這種仰慕外國學校的風氣，一些民歌作了辛辣的譏諷。

帕伊奧學習歸來，
一派夏爾特爾式打扮。
學習還不到一個月，
書的篇名都未讀完。
然而轉瞬之間，
成了烏格列什勛章的評審委員。

這首歌謠挖苦了那些一心一意想到國外學習或者鍍金的

人。這個帕伊奥從法國回來，服裝打扮全是法國的式樣，但是他去時愚昧，回來時同樣無知，因爲他在法國的時間不到一個月，連《邏輯學基礎》一書的篇章名都没有來得及看完。但是轉眼之間，弄到了一個待遇優厚的職務——聖地亞哥寶劍勛章（烏格列什勛章）的評審委員。

另外一首詩寫於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是譏諷一個名叫尼古拉醫生的。這個醫生返回葡萄牙時身上穿着法國蒙彼利埃式樣的服裝，帶了許多他甚至連一個字都不認識的書籍。當然對於前來問病求醫的人，他是無法治療的。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尼古拉指着這些厚厚的書籍，説它如何昂貴，這就足以使病人對他另眼看待了。

蒙彼利埃大學創辦於1289年，和里斯本大學同屬於一個時期。盡管如此，在葡萄牙仍然認爲到蒙彼利埃大學上學是件光宗耀祖的事。以後的事實也確實如此，所以里斯本大學建成後，葡萄牙的學生繼續到歐洲求學。

這種情況説明葡萄牙建國後的最初幾個世紀裏，高等教育的景況十分黯淡。有錢的人不在葡萄牙上學，没有錢的人根本不學習。至於著名教授、學術著作和受到讀者歡迎的書籍，一點都没有。高等教育僅僅局限於爲教會培養一些通曉拉丁文的教士，爲國家造就一些在國家機關内工作或者從事律師工作的文人。根據1380年的一份文件，D·費爾南多對教皇説，葡萄牙連所大學都没有，因而請求他准許建所大學。這種説法顯然不符合事實，但是它卻説明了D·迪尼斯國王撒下的種子没有在這所學府開出絢麗的花朵，以致世界上無人知道它的存在。

D·迪尼斯時期在科英布拉修建了一座大學樓宇。後來這座樓房迴廊的立柱用到了一個修道院裏，至今還可以看到這些

石柱。但是在里斯本，從未興建過大學的校舍，所以到今天還弄不清這第一所大學辦在何處。當時教師可能在學校上課，學生可能分散住在市民家裏。後來，由於市民不歡迎這些吵吵嚷嚷的青年人住在自己家裏，所以在 1308 年和 1354 年兩次迫使國王關閉里斯本大學，並將它遷往科英布拉。第一次的遷校命令甚至提到了學生和市民之間的衝突。湊巧，在發佈命令的前一年，一所新的雄偉壯麗的猶太人教堂在里斯本落成典禮。第二次遷校發生在里斯本的大資產階級的權力達到最高峰的時期。D・費爾南多上臺後，這所大學又從科英布拉遷回里斯本(1377 年)。遷回的理由頗爲有趣，國王說他準備在國外聘請著名的教師，但是這些教師除了里斯本，不肯到其他城市居住。

人們從來沒有研究過我國這所大學在中世紀的社會影響，但是有迹象表明，它的社會影響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許多鄉鎮曾舉行過反對 D・迪尼斯的起義，而起義的策劃者就是貝雅一個木匠的兒子、一個能言善辯的律師。從君主制的初期就有了律師，他們把自己的喉舌借給那些在法官面前不善於申訴理由的人，成爲代言人。但是後來在里斯本大學開設了法律課，不少以前的代言人變成了真正的律師，他們熟悉法律和訴訟的程序，因而就使得法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草率結案。後來，“鐵面無私”的 D・佩得羅認爲辯護是用“惡意的辯詞”拖延判決，宣佈廢除辯護制度。到了 1361 年，在議會上人民對國王這項禁令提出抗議，他們說刺激人們學習的理由是他們可以從中得到好處。禁止辯護勢必挫傷人們學習法律的積極性。這表明上大學是提高社會地位的渠道。貝雅該有許許多多個木匠的兒子，他們在里斯本的革命中幫助了阿維斯的統帥。這場革命中的一個主要知識份子，是個很有錢的人，畢業於博老尼亞

大學。在里斯本成立的第一屆政府委員會裏就有好多個法學家。1443年，D·佩得羅王子說，里斯本大學培養出了無數個文人，“他們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爲他（D·若奥一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且闡明了許多模糊不清的問題”。農民起義後，在統治埃武臘的人員當中有一名學士。D·佩得羅像一個開明人士，他認爲自由的敵人就是教育的敵人，他說“破壞公共事業的惡棍使有知之士感到憎恨。”因此，他頒佈了一道法律，決定在葡萄牙建立第二所大學。但是他未能如願，因爲他所說的那些破壞公共事業的惡棍，幾年後掌握了國家的政治命運。

28 14世紀末的危機：費爾南多時期

1367年，D·佩得羅逝世，新國王D·費爾南多開始執政（1367～1383年），並且制定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綫。

葡萄牙的歷史與卡斯蒂利亞的政治變幻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長期内戰之後，封建貴族的首領恩里格·德·特拉斯塔馬拉取得了勝利，他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卡斯蒂利亞國王“殘酷暴君”佩得羅，繼承王位。許多西班牙貴族在失敗後紛紛逃亡葡萄牙，他們說服了D·費爾南多去同恩里格·德·特拉斯塔馬拉爭奪卡斯蒂利亞的王位。D·費爾南多的父親、卡斯蒂利亞的桑紹四世的後代D·佩得羅國王也曾垂涎過這個王位。D·費爾南多是桑紹的正統玄孫，雖然卡斯蒂利亞國王也是桑紹的玄孫，但他是個私生子。

D·費爾南多在同卡斯蒂利亞進行第一次戰爭（1369～1370年）之前，事先同阿拉貢的國王和格拉納達的摩爾人國王訂立了條約。同後者的條約規定，允許北非的摩爾人來伊比利

亞半島。戰爭中還包括一支葡萄牙的艦隊（32 艘雙桅戰船和 30 艘三桅戰船）封鎖塞維利亞港，但是不管是海上還是陸地，葡萄牙國王都沒有取得勝利。雙方締結了和約，其中條文規定 D·費爾南多放棄當卡斯蒂利亞國王的慾望，同時簽訂了葡萄牙國王與卡斯蒂利亞國王女兒的婚約。

1372 年，D·費爾南多在英國的支持下再次向卡斯蒂利亞發動戰爭。英國愛德華三世的兒子蘭卡斯特列公爵娶了“殘酷暴君”佩得羅的私生女爲妻，由於這種原因，他也要求繼承卡斯蒂利亞的王位。這位公爵之所以提出這種要求，同英國對法國的戰爭（百年戰爭）有關；如果英格蘭人控制了卡斯蒂利亞，這對戰爭的勝敗將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D·費爾南多答應支持英國人的這種要求，並開始了戰爭的準備工作。但是卡斯蒂利亞國王搶先發動戰爭，入侵葡萄牙，軍隊一直挺進到里斯本，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

結果簽訂了和平條約，D·費爾南多又答應支持卡斯蒂利亞反對英國。

第三次戰爭（1381～1382 年）和第二次戰爭一樣，只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衝突的一個插曲。一支浩浩蕩蕩的英國大軍開到葡萄牙，但是葡萄牙人已經和卡斯蒂利亞人簽訂了和約。所有這些英國人最後乘坐卡斯蒂利亞國王的船隻返回祖國，以免遭到葡萄牙人民的砲擊。

令人奇怪的是在這三次戰爭中連一次戰役都未發生（只是在第二次戰爭中幾個貴族曾率領波爾圖和吉馬良斯兩個市鎮的民軍企圖阻擋卡斯蒂利亞的入侵，但是被擊敗）。戰爭是貴族的游戲，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但是現在戰爭的沉重負擔卻壓在資產者和人民頭上。資產者要負擔軍事費用，而人民則付出生命。

在 1371 年召開的里斯本議會上，和 1372 年召開的里斯本及波爾圖議會上，這兩個市鎮的人民代表（即城市大資産階級和農村中産階級的律師）强烈譴責 D·費爾南多國王的政策，並把 D·阿豐索四世和 D·費爾南多兩個朝代和兩種政策做了一番對比；他們認爲 D·阿豐索四世統治時期國內一派太平盛世，而 D·費爾南多則通過戰爭動員、借貸、税收、使貨幣貶值、使價格大大低於成本的政策（這種政策使生産者變得貧窮，而使消費者佔了便宜）、對貴族的照顧（這時貴族用上了他們從來未見過的金銀餐具）、王室的龐大開支和不立賬目等等手段，使貴族階級越來越富，使其他階級日益貧困。律師們還指責了貴族對資産者商業活動的侵犯，不少貴族成了商人，經營出口，他們訂購産品除了滿足於自己的消費外，還轉手倒買，牟取暴利。在議會上，律師列舉大量的事實，揭發王室官吏的貪污腐化、不秉公辦事、不遵守財産轉讓法和國王欺壓平民。

費爾南·羅佩斯説“國王和人民之間存在着一條很深的鴻溝”，造成這道鴻溝的原因就是上面列舉的事實。由於人民的不滿導致了 1383 年 D·費爾南多王朝的覆滅。

1372 年或者 1373 年，國王 D·費爾南多與萊奥諾爾·特來絲的婚姻問題引起的動亂，其原因也是由於人民對國王的不滿。

前面我們講過，1371 年 D·費爾南多和卡斯蒂利亞國王的一個女兒訂下了婚約，目的是爲了保證兩個王國之間未來的和平。但是這樁婚約並未付諸實施，因爲國王想同萊奥諾爾·特來絲·德·梅內塞斯結婚。她是一位頗有權勢的貴族的女兒，而且已經嫁給了貝拉的一個貴族。有關這場婚事的謠傳激起了民憤，里斯本市有四千名手工業匠人手持工具游行示威，向國王

表示他們不贊成國王同萊奧諾爾·特來絲結婚。D·費爾南多表面上答應了游行者的要求，暗地里卻逃出里斯本同這個貴族的女兒成了親。游行示威的組織者被處決。有關鎮壓這次游行示威的記載雖然不多，但是仍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游行的規模超出里斯本，在聖塔倫、萊里亞、蒙特摩爾奧維里奧、托馬爾、波爾特爾等地都舉行了示威。在這些地方，示威的發起者都受到了審判。費爾南·羅佩斯說，1383 年這場野蠻鎮壓的情景深刻地留在人民的記憶裏，里斯本的手工業匠人後來之所以仇恨這個攝政女王，與這次鎮壓關係極大。

葡萄牙的歷史學家同意費爾南·羅佩斯的看法，同時指出了 D·費爾南多統治時期一些好的方面，如發展經濟的措施，尤其是保護海上貿易運輸和塞斯馬里亞斯法。D·費爾南多時代充滿了政治、社會和國家管理的危機，但是唯獨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海上貿易的發展主要是歐洲的因素，其次才是國內的因素。里斯本市新城牆的建造（1373～1375 年），表明葡萄牙這個主要港口的迅速發展。倫巴第人、熱那亞人、米蘭人、卡塔盧尼亞人、比斯開人的船隻都到特茹河上裝貨。據費爾南·羅佩斯的記載，有時停泊在里斯本港口的貨船多達五百艘。這種繁忙的貿易帶來了大量的收益，富了“市民”，也富了國王。D·費爾南多對海上貿易采取了保護性的措施，如成立海運公司，國王成了主要的股東。這表明國王開始介入了從前只是私人從事的貿易活動，這是造成危機的另一個原因，也引起了人民的反對。頒佈塞斯馬里亞斯法（1375 年）的目的，是爲了恢復糧食作物的種植，原來這些作物大都被遺棄而種植其它有利可圖的作物。雖然這一目的未能達到，但是貴族地主和農場主撈到了不少好處，倒霉的是勞動人民，因爲他們只能按照規定的工

錢被强制勞動。這一切都是人民不滿的因素。不僅國王與人民之間存在怨恨，貴族和貧民之間也有摩擦。

國王的死（1383 年）使矛盾公開化了，引起了中世紀葡萄牙社會的最後一次大動蕩。

29 1383～1385 年的革命

與我國中世紀其他幾次政治危機不同，1383～1385 年的政治危機在我國現代的歷史學家中間引起了頗大的興趣。這是因爲 15 世紀上半葉一位天才的作家叙述過這場危機，他用清晰的筆法勾畫出了當時的社會面貌，並且寫得十分生動。如果没有這部書，或者這本書編寫得和當時的其他書籍一樣乏味，或者説這本書已經失傳，那麼我們今天對於 1383～1385 年這場革命的瞭解就不會多於對 1211～1214 年、1255～1257 年或 1320～1324 年發生的危機的瞭解。

歷史學家對 1383～1385 年革命的社會性質的看法不一致，但是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源出於費爾南・羅佩斯的著作，而費爾南・羅佩斯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也雜有自己的政治感情，因爲這本書是在另外一場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寫成的，費爾南・羅佩斯可能參加了這場革命。按照這位歷史學家的看法，革命是一種極其複雜的現象，充滿了各種力量、利益、思想的對立和深刻的階級對抗。

1383 年，D・費爾南多逝世，由數月前嫁給卡斯蒂利亞國王的公主 D・帕阿特里絲繼承王位。公主和國王的婚約規定，在 D・帕阿特里絲生下男孩未滿 14 歲之前，由王后萊奥諾爾・特來絲攝政。這個男孩只能繼承葡萄牙的王位，不能繼承卡斯蒂利

亞的王位，因爲卡斯蒂利亞的國王D·若奧一世同前妻已有兒子。

這種局面引起了不同反應：人民和一部分貴族不大歡迎D·帕阿特里絲當女王，認爲王位應由D·費爾南多的弟弟、D·佩得羅一世和因內司·德·卡斯特羅的兒子D·若奧王子繼承；許多城市，特别是里斯本的資產階級反對萊奧諾爾·特來絲攝政，因爲她的攝政意味着繼續執行D·費爾南多的政治方針。

在里斯本爆發了起義。大資產階級企圖把自己的施政方針强加給攝政的王后，建議她成立一個由“市民”，即資產者組成的御前會議。大資產階級還聯合了一部分貴族，決定殺害掌握大權的加利西亞冒險家安德伊洛伯爵。顯然他是大資產階級達到自己政治欲望的障礙。爲完成這項使命，他們挑選了阿維斯軍團統帥、D·佩得羅一世的私生子D·若奧出面。

起義的策劃者號召里斯本的人民支持這場宮廷政變，但是其後果卻是他們事先未曾想到的。里斯本人民起來後，既反對攝政王后也反對貴族，而且他們很快便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手工業匠人和“庶民”採取革命的手段，宣佈立阿維斯統帥爲攝政王。第二天準備在市政議廳開會，比較富裕和有聲望的資產者不想參加，但是手工業匠人强迫他們加入了人民事業的行列。費爾南·羅佩斯用形象的語言描繪了這件事：資產者猶豫不決，他們不願拿自己的家產去冒險。一個製桶工人，代表聚集在市政議廳週圍的群衆，警告資產階級說：他，一個製桶工人，一無所有，大不了就是掉腦殼；而有錢的人可要損失慘重，但是如果他們不加入人民的行列，不同意人民的決定，那麼，連自己的脖子都保不住。這幾句話說得鏗鏘有力。阿維斯的統帥成

立了一個由法學家和商人參加的御前會議。建立了 24 人委員會，它是一個由 12 個重要行業各派兩名代表組成的革命委員會(費爾南・羅佩斯没有説是由誰組成的)，設在市政廳，“凡是阿維斯統帥的規章制度和工作事項”一律要經這個組織的批准。這句話及以後的事件表明，看來里斯本的大權掌握在手工業匠人的手裏。

在葡萄牙的城市和鄉鎮裏，貴族和農場主把持着地方的政權，宣佈立D・帕阿特里絲爲女王，並擁護萊奥諾爾・特來絲攝政，盡管庶民百姓反對，但是他們没有力量來反對這些富豪。然而里斯本起義的消息卻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到處都發生了“貴族和平民間的衝突和分裂”。富豪譏諷貧民，駡他們是“里斯本彌賽亞臣民”；而平民則團結一致，鬥志昂揚，駡貴族是叛徒，是製造分裂的罪魁禍首，如果誰敢於反對他們，誰就要“立刻倒大霉”。

平民的起義在阿連特如地區具有特殊的性質。在埃武臘、貝雅、埃斯特雷莫兹和波爾塔萊格列，“平民們武器簡陋，而且也没有人率領，他們敞胸露懷”，蜂擁衝向貴族司令官們駐守的城堡，並且佔領了這些要塞。在埃武臘，農民佔領了這座城市，驅逐了阿維斯統帥的追隨者。1384 年的一份文件説，在埃武臘市有一個平民首領。

在阿連特如的起義期間，我們没有看到攻擊貴族的資料，這場起義的矛頭是指向地主和農場主的。他們構成了農村的中產階級，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他們和僱傭勞動者的矛盾日益嚴重。葡萄牙的人民起義和當時震撼西歐的其他國家的人民起義有許多相似之處，不同的地方是歐洲其他國家的農民起義都被地主勢力鎮壓下去了，而葡萄牙的獨立戰爭則取得了不同的結

局。

攝政王后萊奧諾爾・特來絲希望借助卡斯蒂利亞國王的力量來撲滅里斯本人民起義的烈火，因而請來了卡斯蒂利亞的軍隊。但是卡斯蒂利亞國王認爲攝政王后不得人心，是葡萄牙人民不接收D・帕阿特里絲繼承王位的主要障礙，因而逼她下臺，以便使卡斯蒂利亞的國王登上葡萄牙國王的寶座。1384年5月底，卡斯蒂利亞國王重兵包圍里斯本，但是一場可怕的瘟疫迫使國王在10月份返回卡斯蒂利亞重新招募兵員。在阿連特如地區，年輕的貴族努諾・阿爾瓦列斯・佩雷拉率領一幫農民擊敗了一支强悍的卡斯蒂利亞騎兵（阿托雷洛斯戰鬥）。這場勝利影響到整個戰爭的結局，它表明，依靠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打敗卡斯蒂利亞的入侵者的。阿托雷洛斯戰鬥後，本來在阿連特如人民中並不太受信任的努諾・阿爾瓦列斯一下子成了赫赫有名的英雄，他動員農民起義的力量，保衛了阿維斯統帥的事業。

卡斯蒂利亞人從里斯本撤退後，阿維斯統帥就立刻離開了這座城市。根據費爾南・羅佩斯的說法，過了四年之後他才回到里斯本。有許多隆重的事，如他同蘭卡斯特列公爵的女兒D・菲力帕的婚禮都未在首都舉行。這件事似乎說明，人民推選出的革命領袖可能並不喜歡里斯本，然而里斯本的政權繼續掌握在手工業匠人手裏。

1385年4月，科英布拉議會，在以法律學家若奧・達司・列格拉斯（阿爾瓦洛・巴伊斯前妻的兒子）爲首的各鄉鎮代表的壓力下，擁立阿維斯統帥爲國王，盡管到會的貴族表示反對，他們認爲王位應該屬於D・若奧王子。會上決定成立御前會議，由教會、貴族、文人和資產者各選派兩名代表組成。

在這期間，卡斯蒂利亞的國王再次率領重兵入侵葡萄牙，軍

隊中還有許多葡萄牙的貴族。1385 年 8 月 14 日，兩國軍隊在阿爾儒巴洛塔交鋒，當時擢昇爲大公的努諾・阿爾瓦列斯再次顯示了卓越的才能，他的指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葡萄牙的軍隊排成一個個小方陣，不但抗擊住了卡斯蒂利亞騎兵的衝擊，而且使其潰不成軍。這次勝利產生了深刻的政治後果。阿維斯統帥的王朝和葡萄牙的獨立已成爲不可逆轉的事實。雖然戰爭又持續了好幾年，但不過是邊境上一些小規模的衝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爾維德戰鬥，努諾・阿爾瓦列斯在麥里達地區取得勝利。1411 年雙方簽署了和約。

1385～1498 年

大西洋問題的解決

30 政治歷程

1. 從資產階級的勝利到國王的勝利

在同卡斯蒂利亞的戰爭中，世襲的大貴族階級站在卡斯蒂利亞一邊，但戰爭中卡斯蒂利亞失敗了，所以 1383～1385 年革命後，大貴族的勢力暫時受挫。D·費爾南多王朝裏伯爵的勢力，似乎被政權中佔優勢的有產者和法學家所代替；有產者熱衷於和平和擴大貿易的政策，而法學家則因爲受到羅馬法律專制主義思想的熏陶，主張加强國王的權威。

偉大作家費爾南·羅佩斯的著作至今仍是我們研究這個時代的主要依據。他留給我們的一篇有名的文章概括了這場革命所引起的社會變化：按照當時一些權威作者的看法，世界的歷

史分爲六大時期，第六個時期是最後一個時期。但是費爾南·羅佩斯認爲，葡萄牙的這場革命開創了“第七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興起了一個新的世界和一代新人。從前那些因爲身份低微而不足掛齒的人家的子女，今日由於他們的功勞和貢獻被封爲騎士，人們立刻按照新的家族和姓氏稱呼他們。另外一些人要求恢復早已遺忘了的貴族封號。因此，這個昔日的統帥、後來的國王就按照頭銜和官職，把這些人安排在顯赫的地位上，以致他們的後代也被稱爲‘閣下’，受到莫大的尊敬”。這段文字是從費爾南·羅佩斯的著作裏逐字抄錄下來的，它是統治階級人員大更換的證明，也有可能是這個偉大的作家對某些社會現象的譏諷。因爲在費爾南·羅佩斯撰著編年史一書的時代，擔任要職的幾乎都是内戰中敗北的大貴族的後代。事實的確如此，戰爭結束不久，阿維斯統帥全盤改變了他在革命時期所奉行的政治路綫。前面我們講過，他離開了里斯本，並且多年不回里斯本。我們也講過他恢復了他本人宣佈取消的貴族津貼金。盡管他在科英布拉的議會上許下諾言，不增加貴族在御前會議中的席位，但後來他們的席位還是大大增加了。“24 人委員會”這個組織被打入冷宫，大約過了 50 年，即到了下一個王朝，才又提到了這個機構，這還是爲了限制它參預市政，因爲在革命期間市政管理全屬手工業匠人領導。後來除里斯本以外，全國各地手工業匠人在市政廳裏的地位下降了，最後甚至禁止他們參加。革命期間取消了的農村强制勞動的措施，又重新頒佈執行，最初還不太嚴厲，後來愈演愈烈，與費爾南多王朝相差無幾。

這個王朝與其他王朝的不同之處，是强烈的集權主義思想。戰爭年代被迫實行的一些寬厚政策也被巧妙地加以修改。當時努諾·阿爾瓦列斯已成爲半壁山河的主人。和平之後，他想把

他得到的一部分土地交給在戰爭中曾經幫助過的人，使這些人成爲他的屬民。然而，國王不但不允許，反而是把饋贈給他的土地又收了回來。爾後，國王的一個私生子又與努諾・阿爾瓦列斯大公唯一的女兒成親。這樣，這位戰功昭著的英雄人物的龐大家產就落入王家手裏，這就是布拉甘薩家族的起源。當時，國王的權力不斷擴大，以致可以在全國强徵房地產交易稅，不管其社會地位如何，任何人不得例外。在他執政期間，接連召開議會，只是間隔的時間越來越長。在D・若奥一世逝世那個時期，國王的意志就是國家最大動力，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限制它。到了下個朝代初（D・杜阿爾特，1433～1437年），議會曾要求國王在未徵得議會同意之前不要發動戰爭，但是國王回答說，發動或者不發動戰爭完全是國王的事。

2. 休達與非洲政策

1415年，在同卡斯蒂利亞簽訂和約四年之後，葡萄牙國王率領着一支浩浩蕩蕩的遠征軍（19，000名陸軍、17，000名海軍和200艘戰船），佔領了北非的重要城市休達。這件事被認爲是葡萄牙海上擴張政策的正式起點。

佔領休達的計劃是財政總監若奥・阿豐索提出的。他掌握着國家的財政大權，並且和里斯本的大商鉅賈來往密切。國王非常贊賞這個計劃。佔領休達對商人和貴族都有好處，因爲它是陸地和海上的重要貿易中心，而且位於農業上非常富饒的地區和可以控制直布羅陀海峽的戰略要地。佔領這座城市不僅可以提高國王的威望，而且還可以作爲佔領其他地方的基地。再者，戰爭使許多貴族有事可幹，因爲他們的職業就是打仗。

但是這些期望並未實現。基督教徒佔領休達之後，這座城

市已經濟凋敝，由貿易中心變成了一座你爭我奪的城市，一切供應必須從葡萄牙通過海上運來。1425年，D·佩得羅寫道，休達成了"人力、武器和金錢的最好的消耗地"。他還說，在英國，人們普遍認爲繼續佔領這個城市是個錯誤。

盡管如此，葡萄牙人仍舊佔領着休達，因爲直到16世紀末，在非洲北部進行軍事擴張仍然是葡萄牙的非洲政策之一。

1437年，又進行過一次新的遠征，其目的在於佔領丹吉爾、阿爾吉拉和其他一些地區。但是這場戰爭一敗塗地。爲了返回祖國，葡萄牙人答應把休達還給摩爾人，國王D·杜阿爾特的弟弟D·費爾南多王子作爲實現這一諾言的人質留在當地。後來，就歸還休達一事召開了議會，但是議會不同意，王子一直囚禁到死也未釋放。

3. D·佩得羅攝政

1483年D·杜阿爾特逝世，王位的繼承人D·阿豐索五世只有6歲。D·杜阿爾特在遺囑裏指出，國王年幼期間由孀婦王后萊奧諾爾·德·阿拉貢攝政。與1383年的情況一樣，發生了意見分歧：貴族要求執行國王的遺囑，但里斯本的手工業匠人和庶民百姓反對，他們采取革命手段宣佈國王的弟弟D·佩得羅王子爲攝政王。王后企圖武力抗拒，但是得不到支持，只好離開國家出走。

D·佩得羅攝政時期(1441～1448年)的幾件大事是：攝政王對貴族做了大量的讓步，以便同他們取得和解；插手卡斯蒂利亞的政治事務；加强了大西洋上的航行，保護里斯本大學和編纂《阿豐索法典》，即把當時施行的法律進行了系統的彙編。

1448年，D·阿豐索五世登基，但是直到他的王朝結束，上

層貴族一直把持着國家的政權。攝政王及其黨羽受到迫害。1449年，D・佩得羅聚集了自己的人馬，領着一支小部隊開赴朝廷，似乎要對他遭到的指責進行辯解，但是國王阿豐索五世的軍隊出來截擊，在阿爾法洛貝拉展開戰鬥，結果王子及其隨從被擊斃。

在這場戰鬥中，D・佩得羅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十年前立他爲攝政王，並且拿起武器保衛過他的里斯本的手工業匠人，在1449年的戰鬥中似乎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國内其他地區對這場鬥爭也没有什麼反應。阿爾法洛貝拉戰鬥的性質與其説是内戰，不如説是場報復。上層貴族階級獲得了徹底的勝利。

4. D・阿豐索五世

15世紀後半葉直到D・阿豐索五世的王朝結束，這段時期的特點是，使國家的政策符合上層貴族階級的利益，如大量的饋贈、設立新的貴族頭銜，大量增添朝廷内的人員、由上層貴族擔任王室的官職、靠分發王室的收入來增加貴族的俸祿和福利、連綿不斷的戰爭，等等。

人們往往把執行這種政策的責任推給D・阿豐索五世。事實上，1449年，貴族是利用年輕的國王鎮壓以D・佩得羅王子爲代表的政治上的反對派，因爲當這位國王登基的時候，這些貴族已在其位。1383～1385年革命以後，國家進入恢復階段，貴族階級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時又奪得很大一部分權力。經濟的發展，加上中產階級中缺乏管理國家的人材，使得1383～1385年革命中表面上失敗的貴族階級趁15世紀上半葉國王奉行專制政策的時機，又撈到了很大的好處。

1458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戰爭冒險。1453年，土耳其人佔

領了君士坦丁堡，使整個歐洲大爲震驚。這個日期以後被定爲中世紀和現代的分界綫。土耳其人繼續向中歐侵略，1456年包圍了貝爾格萊德。教皇下令組織十字軍抗擊異教徒。歐洲對這一號召置之不理，唯有D·阿豐索五世熱烈擁護，並且立刻稟告教皇，說葡萄牙將派遣一萬二千名士兵參加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爲期一年，軍費自理。盡管這一決定遭到舉國上下一致反對，但D·阿豐索五世還是着手進行戰爭準備，購買武器和船隻，鑄造了其價值能在整個基督教世界流通的金幣。

但是這時候教皇與世長辭，土耳其人撤離了貝爾格萊德，十字軍的計劃也就此結束。這樣，購置的軍事物資就用來進攻北非，佔領了位於休達和丹吉爾之間的一個海濱小城阿爾卡塞賽克爾。接着，國王又親自統帥大軍，兩次進攻非洲。一次是1463～1464年，由於丹吉爾的城牆堅不可摧，戰爭宣告失敗：第二次是1471年，葡萄牙的軍隊佔領了阿爾吉拉和由於丢失了阿爾吉拉而被摩爾人主動放棄的丹吉爾。

非洲的戰爭和D·阿豐索五世對大貴族的寬宏大度使他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貴族中間贏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一部分卡斯蒂利亞的貴族請求葡萄牙國王干預卡斯蒂利亞的國內事務，接受卡斯蒂利亞的王位。

但是另外一派貴族認爲，恩里格四世的王位繼承人應當是他的妹妹伊莎貝爾。當時伊莎貝爾已經和阿拉貢的王位繼承人結婚，倘若她登上卡斯蒂利亞國王的寶座，就意味着這兩個王國的合併，這樣勢必打破伊比利亞半島各國間力量的平衡。

1475年，D·阿豐索五世入侵卡斯蒂利亞。開始的時候國內還有一部分大貴族支持他，但後來這種支持越來越減少。1476年，D·阿豐索五世在托洛城附近的一場戰鬥中受傷。葡萄牙的

歷史學家認爲這場戰鬥並不是決定性的，但是卡斯蒂利亞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則相反，他們認爲這場戰鬥的勝利是決定性的。事實上，托洛城之役意味着葡萄牙國王繼承卡斯蒂利亞王位野心的破滅。

5. 國王同富豪之間的鬥爭

D·若奧二世統治時期（1481～1495年），國內起了根本的政治變化。

D·若奧二世的敵人駡他是暴君，但朋友則稱他是十全十美的王子。雖然《親王》一書寫於幾年之後（1514年?），但是新國王的所作所爲與馬基雅維爾在這本書裏所闡述的政治理論有着密切的關係。可以肯定，D·若奧二世是麥迪西斯的同代人，是當時歐洲盛行的政治實用主義派的突出代表人物之一。

爲D·若奧二世立傳的作家很多，其中有個叫路易·德·皮納的寫道："作爲老爺們的老爺，他從來不想以奴隸的僕人的姿態出現。"這句話有意或無意地說明了D·若奧二世執行的政治路綫：嚴格地限制富豪的權力，但是在同富豪的鬥爭中也不想依靠貧民的力量。這種力量的運用在他那個時代已經過時。他認爲，他的政治權力就在於他的王室機構。在他登基後的第一批文件（1481年議會的決議，布拉甘薩公爵的判決書）裏，我們見到了"國王陛下"這種稱呼。新的稱呼反映了國王的新思想。這個既不允許他人瓜分、又不允許他人限制他權力的復興時期的親王，繼承了中世紀晚期騎士D·阿豐索五世的王位。

在他登上國王寶座的最初幾年之內，便消除了一切有礙他的行動的權力。由於大貴族反對國王的法官在國王饋贈給他們的土地上插足，D·若奧二世就首先從這兒開始壓制貴族的權

力。蒙特莫爾侯爵（布拉甘薩公爵的弟弟）給卡斯蒂利亞國王寫信，建議他的軍隊入侵葡萄牙和推翻D·若奧二世的統治，但是這封信被國王的密探截獲。結果葡萄牙貴族的魁首、幾乎佔有國家一半土地的大地主布拉甘薩公爵被認爲參預了這次陰謀，並在埃武臘廣場當衆審判，處以斬首。布拉甘薩家族從此家破人亡，龐大的家產劃歸王室所有。後來有人對這次審判提出了疑問，似乎被告的證人從D·若奧二世那裏領取了一筆數字相當可觀的報酬。第二年，有人揭發檢舉王后的弟弟維塞烏公爵別有陰謀，國王用刀將他殺死。這樣，許多上層貴族有的被處死，有的逃亡異鄉。在前朝起過重要政治作用的埃武臘主教，被毒死在牢獄裏。伊比利亞半島上最有錢的富翁猶太人伊扎克·阿布拉瓦内爾受到指控，說他資助了這場陰謀，被判處死刑，但是他設法逃到國外。擁有無限權力的D·若爾熱·達·科斯塔大主教也出走羅馬，再也没有返回葡萄牙。

通過這場血腥的清洗，D·若奧二世可以毫無阻攔地推行自己的政策，施展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政治遠見。他的政績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國家行政管理機構的改組、同歐洲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推行海外政策。D·若奧二世最早興建的工程之一，是米納城堡（1481年），它成了葡萄牙在非洲海岸進行貿易開發的基地。通過非洲南部到達印度洋的計劃也是這時詳細確定的。

但是D·若奧二世壓倒貴族的優勢，只限於他短暫的統治時期。1491年，將要繼承王位的親王D·阿豐索王子從馬上摔死了，國王的堂弟、貝雅公爵D·曼努埃爾（D·阿豐索五世的弟弟，D·費爾南多王子的兒子）被最先提出來作爲國王的繼承人。但是D·曼努埃爾是維塞烏公爵的弟弟，這個公爵因擔任過

貴族的首領，被D·若奧二世處死。因此，D·曼努埃爾的登基，意味着大貴族世家的權力將得到恢復。D·若奧二世極力反對D·曼努埃爾繼承王位，他前去羅馬斡旋，企圖立他的私生子D·若爾熱·德·蘭卡斯特列。但是國王的對手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擁有相當强大的力量，使他的計劃未能實現。1495年，D·若奧二世逝世，貝雅公爵D·曼努埃爾即位。1496年，布拉甘薩家族恢復，旅居國外的貴族紛紛返回葡萄牙。

但是不久以後，葡萄牙的船隊抵達印度，國王逐步積累了財力，完全改變了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

31 猶太人問題

1492年，一些天主教國家的國王頒佈法令，限定猶太人在四個月之內離開他們的國家（阿拉貢和卡斯蒂利亞），違抗命令者處以極刑。許多卡斯蒂利亞的猶太人紛紛投奔葡萄牙。D·若奧二世准許一些有錢的猶太人到葡萄牙居住，但是必須交納一筆鉅款。然而逃難者就像一支入侵的大軍，蜂擁進入葡萄牙，大約有10萬人左右。國王也允許他們在葡萄牙暫時停留，但是要按人頭交納稅金，八個月以後，必須各奔東西。那些分文拿不出的人後來淪爲奴隸。

大多數逃難的猶太人在葡萄牙住下不走了，葡萄牙本來就有許多猶太人，現在他們的隊伍更加龐大了。許多猶太人的兒童被强行從父母手裏奪走，送往聖多美島，後來活下來的人屈指可數。

1496年，D·曼努埃爾步天主教國家國王的後塵，下令驅逐猶太人，不管是葡萄牙原來的猶太人，還是從卡斯蒂利亞遷來

的猶太人。國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在同鄰國君主的女兒的談判中對方提出了這種要求。但是D·曼努埃爾的御前大臣似乎感到采取這樣的措施會給葡萄牙帶來鉅大的損失，例如猶太人出資生産的大量商品没有了、大批財富將隨着猶太人的出走而流往國外，以及數以千計的技藝高超的手工藝人將離開葡萄牙。最後，國王採取了表面上妥協的政策：猶太人可以居留不走，但是必須改變猶太人的身份。爲了達到這一目的，D·曼努埃爾下令强迫爲猶太人的子女行洗禮，拒絶給想要離開葡萄牙的猶太人提供海上的交通工具（這就等於禁止他們離開，因爲通過西班牙走是不可能的），並且保證今後二十年内不會再因爲宗教問題迫害猶太人。這種强行改變信仰是表面的，是爲了敷衍他在同天主教國家的國王簽定的協議中所承擔的義務。

猶太人居住區被取消，猶太人的教堂改成了天主教堂，猶太人正式變成了基督教徒。爲了區分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開始使用“新基督教徒”和“老基督教徒”的稱謂。

新基督教徒的問題拖延了很長的時間。因爲猶太人和基督教徒作爲兩個群體單獨生活了幾百年，現在要把他們合二爲一，進程當然是緩慢而艱難的。1506年，里斯本爆發了一場動亂，新基督教徒遭到殘酷的迫害，約兩千人喪夫了生命。盡管國王保證不再迫害，希伯來人仍然受到種種的歧視。從前，國内居民分爲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兩大民族時，猶太人還過了幾百年太平無事的安穩生活，而現在卻要維持一種虚假的團結。從1434年開始，猶太人遭到經常的和有計劃的迫害，從而導致産生了兩種互抱成見的和敵對的思想：老基督教徒認爲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們反對革新，對别人的錯誤吹毛求疵，他們固執而且保守；新基督教徒則掩飾自己，他們是彌賽亞教徒，他們受欺壓，内心

深處十分憤慨，與排斥他們的國家不一條心，而且心裏也不承認這個民族的家庭是他們的國家。這種民族意識的裂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32 海上擴張的"原因"問題

人們往往把1415年（佔領了休達）作爲葡萄牙海上擴張的開始。但是有理由說它開始得更早，只不過1415年以後海上活動在我國歷史上開始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從15到20世紀，葡萄牙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活動的規模是令人驚嘆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部集體的了不起的史詩。一部世界歷史，裏面如果不多次提到歐洲邊緣上這個貧窮國家中人口不多的民族在世界上的作爲，那麼，這部書是寫不出來的。一個人口如此稀少的民族怎麼能夠幹出這樣多的事呢？對任何事情我們民族歷來都有一種追根求源的精神，因而也就提出了葡萄牙擴張的"原因"的問題。這個問題後來在研究葡萄牙歷史的學者中間一直爭論不休。

對於上面提出的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解說，諸如國土的地理位置、人口的增長和國內資源不成比例、沿海人民的航海經驗、先進的航海科學、資産階級的發展和他們對小麥及黃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人民的階級意識（資産階級經商精神、貴族的騎士精神、人民的冒險精神、教士和國王的十字軍精神）、個人的作爲，特別是D・亨里格王子的個人作爲，等等。

這個問題有這樣多的解說，說明它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倘若用習慣的語言提出問題的話，它甚至是無法回答的，因爲這裏所說的原因和擴張都是頭腦裏的抽象概念，很難

與具體的具有共性的歷史現實相符合。至於說到原因，凡是我們所說的事件發生之前所發生的事，只要我們高興，都可以說是它的原因。這樣，一些簡單的、不爲注意的條件便和社會經濟狀況、集體意識、個人動機混淆在一起了。

擴張的概念包括了不同時代和出於不同的動機所發生的事件：迷航船隻的艱苦歷程旅行、地理考察、戰爭、海盜的掠奪、購買土特產、傳教活動、繼外交途徑之後的國家干涉等。這一切將發生在不同特點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特點的地理區域。15 世紀，擴張活動局限在大西洋，16 世紀，擴張活動發展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17 和 18 世紀，擴張活動的重點移到了巴西，19 和 20 世紀，則開始向非洲擴張。每一步都是前一步的繼續。佔領休達同其他島嶼的發現是有關係的；在阿爾古因小規模商業獲得的利潤的鼓舞下，才在米納修建了牢固的基地，從米納出發又繼續沿着非洲海岸開發，結果發現了通往印度的航道。當亞洲的利潤開始減少的時候，對巴西的殖民化開始了；在巴西獨立之後，又開始了對非洲的殖民化。這些階段互相聯係，不能脫節，如果不提到前一階段，後一階段就無法理解。總之，這一切都是擴張的形式。企圖尋找出擴張的唯一的固定不變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因，那只是經院式的幻想。

葡萄牙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獨立政治生活之後，形成了一個單一民族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局勢緊張，經濟入不敷出。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才開始了向外擴張運動，其目的是擴大必需資源，使這個國家擁有充足的經濟，這是社會安寧的條件。1336 年之前，爲佔領新的領土，國家首次組織遠征加那利亞群島就是證明。當時的社會背景與 15 世紀擴張時的社會狀況大體近似：貨幣經濟打亂了農村社會、失業、薪俸上漲、從事海上貿

易的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擴張運動是由於國內找不到有理想報酬的就業機會而引起的一場向國外遷移的運動，1348 年的黑死病曾經使擴張運動一度中斷。1451 年的一份文件曾涉及此事：阿維羅鎮靠漁民的勞動爲生，但是彷彿他們靠捕魚得到的收入不多，即“漁民靠自己的職業掙不來錢”。所以漁民不再捕魚，當了海員。國王禁止他們放棄原來的職業，然而海上的營生是避免陷入貧困的出路。這些阿維羅鎮人是些什麼樣的海員呢?據 16 世紀的資料記載，他們是販運葡萄酒、鹽、橄欖油到外國港口的貨船的船員，因爲他們當過漁民，所以既善於造船，又因爲追逐鯨魚曾經到過深海。1340 年，國王批准里斯本的一名商人在米紐河入海口到瓜迪亞納河入海口這一段内捕撈鯨魚，每年租金爲五千英鎊。這樣高的租金，説明了當時捕鯨的重要性。

13 世紀開始，歐洲的經濟迅速發展，許多地區人口增加，建立了專門的商品生產。隨着貿易的發展，對黄金、食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增加。許多商人開始涉足遙遠的地區，從那裏帶回來歐洲罕見稀有的物品，高價出售。有關這些長途跋涉和描寫這些財富的文學著作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馬可·波羅寫的，這本書叙述了威尼斯商人到達中國内地旅途經歷。葡萄牙人的海上發現作爲歐洲歷史的插曲，只不過是中世紀最後幾百年歐洲貿易擴張的一部分，起因是相同的。

15 世紀初，國内條件爲擴張創造了大好時機，雖然葡萄牙社會充滿着矛盾，但是擴張符合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對於人民來説，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形式，對他們來説擴張和移民意義相同：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擺脱壓迫制度。這種壓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總想逃脱這種壓迫，尋找新的土地，12 世紀發生的向南部遷移就是國内的第一次擴張。對於教士和貴族來

說，擴張意味着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是爲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的宗主國裏是越來越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說，擴張意味着生意前景興隆，意味着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對於國王來說，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辟新的財源，特别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只有這些經營農業的農場主無利可圖，對他們來說，國內勞動力外流意味着勞動力價格的上漲。

因此，擴張是解決國家集體生活的主要矛盾的一種辦法。中世紀，國王和教會之間的矛盾、貴族和人民之間的矛盾、富豪和貧民之間的矛盾，都產生於同一個原因：財富增加緩慢和需求增加過快，兩者之間比例失調，和一些人生產的太少及另外一些人消費得太多，兩者之間不成比例。隨着新的領土的發現，葡萄牙開始消費葡萄牙領土之外生產的資料，或者說消費通過這些生產資料得到的財富。這就是爲什麼大規模的航海事業開始之後國内戰爭時期便告結束。從那時候開始，擴張成了一項全國的大事，每個人都想從擴張中得到好處。這也是爲什麼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政策對葡萄牙生活的各個方面能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以及爲什麼在一個各項工程計劃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烟雲過眼、持續時間不超過一代人的國家中，唯獨擴張成了一種持久的活動，並通過歷史條件所許可的各種形式，列入國家計劃達五百年之久。

33 島　　嶼

葡萄牙人佔領大西洋中的島嶼的最早記載，是關於D·阿豐索四世時期對加那利群島的遠征。

歐洲人對加那利群島、馬德拉群島，也許還有亞速爾群島所知無幾。在“正式發現”的日期之前這些島嶼已經標記在地圖上了；對於前兩個群島，這種說法毫無疑問，但是對於亞速爾群島，卻似乎有點勉强。這些島嶼離陸地遥遠，而且不在航道上；航行到這些島上去不但危險，而且得不償失。在歐洲並不乏待墾的土地和待移民的地區。當時，只有加那利群島上有居民，這一點對他們還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歐洲離開奴隸是無法生存的，但抓獲奴隸已日趨困難。因此，14世紀上半葉就加那利群島的所有權問題發生了一場衝突：D·阿豐索四世的船隊到了那裏，我們强調說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到過那兒；但是卡斯蒂利亞人認爲，這些群島歸他們所有。一百年以後，這個問題又再次爆發：D·若奥一世的船隊到了那裏，可是卡斯蒂利亞的船隊也同時到達。問題提交教皇裁决，爭論拖了許多年。1436年，教皇認爲葡萄牙不應享有加那利群島的所有權。但是爭論一直持續到1478年。這時，當時還是王子的D·若奥二世利用這個問題作爲談判的條件：通過阿爾卡索瓦斯和約（它結束了D·阿豐索五世繼承卡斯蒂利亞王位的要求），葡萄牙放棄對加那利群島的一切權力要求，卡斯蒂利亞則不再對加那利群島以南將來可能發現的新的陸地提出要求。

卡斯蒂利亞人也企圖搶先佔領馬德拉群島。1417年，他們到了聖港。葡萄牙人早就知道聖港的存在，他們在1419年登上

了聖港，1420年登上了馬德拉群島。幾年之後，便開始往這些島嶼上移民，有一百人率先在此安家落户。他們立即開墾荒地，搭起了小窩棚。這些小的草屋很快變成了村鎮：豐沙爾和馬什科兩鎮於1451年領取了地方行政法證書。移民們在過去荆棘叢生的土地上，種植了小麥、甘蔗和葡萄。1455年，他們開始向葡萄牙和北非的幾個城堡出口產品。直到15世紀末，島上的發展速度十分驚人。在1481年召開的議會上有人提出，去年一年有20艘外國的三桅帆船滿載着食糖離開馬德拉群島，因此要求國王採取措施，嚴禁外國人大批進入馬德拉群島。到1500年，島上的居民約有兩萬。

至於亞速爾群島，與其説是發現不如説是佔領更爲確切。1427年，似乎是國王的領航員狄奧戈·德·席爾維斯第一次抵達該島。不久以後便開始移民。1439年，D·恩里格王子下令把羊群送到這兒放牧。葡萄牙移民在聖瑪麗婭和聖米格爾兩個島嶼上建築了第一批房舍。到15世紀末，小麥的產量已相當可觀，並且大量向葡萄牙輸出。

34 非洲海岸的開發

可能是在佔領休達不久以後，就開始了對非洲海岸的開發。有資料説1416年D·恩里格王子下令組織過一次探索性的航行，但是揭開逐步發現非洲海岸序幕的是1434年吉爾·亞内斯完成的環繞博嘉杜爾角的航行，這是第一次航海的偉大創舉。最後一個階段是1487年巴托洛麥烏·狄亞斯環繞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的航行。非洲西海岸的探索花費了53年的時間。

歷史學家對於這些遠航的目的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歷史

學家認爲，這些遠航追求的目的只有一個：尋找一條通過非洲南部到達印度洋的海路。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爲這項計劃是後來才提出的，即在D·若奧二世提倡發現政策的時候才提出的。迄今爲止，我們所看到的資料和瞭解的事實，似乎都確認了第二種看法。

第一階段（因爲是恩里格王子領導的，所以又稱恩里格階段），葡萄牙的船隊發現了直到塞拉利昂的所有的非洲海岸，長度達4000公里左右。船隊的規模很小，王子或者國王只派一兩艘船，兩艘船以上的次數不多，有時D·恩里格王子或者國王也允許私人派船探索。這些小型的船隊從阿爾加維或者特茹河出發去發現非洲海岸，也就是去搜集那些陌生地域的資料。船隊要把這些新發現的地區的地理概況和資源情況一一記錄下來。據說在非洲的某些地區盛產黃金，船隊也曾作過尋找。從1441年開始，黑奴成了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進行倒賣的主要財富。葡萄牙人遠涉重洋還有一個偉大的目標，就是尋找普列斯特斯·若奧王國，或者埃塞俄比亞。D·恩里格王子竭力想發現一條通向這個王國的航道，以便同它結成聯盟共同對付基督教的敵人。

D·恩里格於1460年逝世。毫無疑問，他死後葡萄牙發現新領土的浪潮開始降落。1469年，里斯本有個富商，費爾南·戈麥斯，向國王要求同幾內亞進行獨家貿易的權利，爲期五年；當時的幾內亞指的是博嘉杜爾以南的非洲地區，不包括幾年前剛剛修建的阿爾古因城堡，因爲它是同里奧德奧羅河地區進行貿易的中轉站。佛得角群島對面的海岸也不包括在內，這個貿易區留給該島的居民去經營。因此，費爾南·戈麥斯要求的貿易區只是從佛得角以南到塞拉利昂長約800公里的地帶。費爾南·戈麥斯每年付給國王20萬雷伊斯的租金，這說明這兒的貿

易額不高，因爲六年之後，阿爾科巴薩修道院院長以每年15萬雷伊斯的價錢把自己的職位賣給了阿爾佩得里尼亞的大主教。這件事轟動一時，因爲這個數目同修道院院長的實際收入相比，少得可憐。但是費爾南・戈麥斯除了交納租金之外，還承擔了一項義務：每年發現100里格的海岸（1里格相當於5572米）。

到1474年爲止，這個商人一直肩負着開發非洲海岸的任務，這一事實說明他們的開發是以貿易爲目的的。費爾南・戈麥斯出錢僱傭的航海人員的確發現了赤道以南的幾內亞灣的海岸。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島、安諾本島和斐南多波島的發現也是這批航海家的功勞。租賃契約期滿後，商人費爾南・戈麥斯被晉封爲貴族，其貴族標誌是，一塊盾牌上面刻着黑人的頭像，黑人的耳朵、鼻子和脖頸上都繫着金環。這枚貴族標誌的意思很清楚：他爲國王弄到了黑人和黃金。後來，費爾南・戈麥斯被任命爲御前大臣。

1474年，王位的繼承人、未來的D・若奥二世開始親自領導航海事業。這時的目的十分明確：繞過非洲抵達印度。與此同時，還開展了强有力和巧妙的外交活動。阿爾卡索瓦斯條約本來是爲了解決其他問題簽訂的（D・阿豐索五世繼承卡斯蒂利亞王位的要求），但是裏面有一項條款結束了西班牙船隊在非洲海域同我們的競爭。該條款規定，待發現世界以加那利群島的平行綫爲界綫分成南北兩個部分，北部由西班牙去發現，南部由葡萄牙開發。

1482～1483年，這位綽號爲“十全十美”的親王組織一次重要的遠航，這就是狄奧戈・高率領的遠航，目的可能是尋找一條通向印度洋的航道。航海家狄奧戈・高這次發現的海岸綫確實比先前任何一次航行中發現的海岸綫都長，到達了安哥拉

的南部，在這裏他們看到海岸改變方向，向東延伸。根據古希臘人編寫的地理書，一些地圖也確實把非洲的最南端大致定在這個緯度。航海家狄奧戈·高帶着這樣的大好消息返回葡萄牙，國王對此表示相信，稱贊狄奧戈·高是人民的英雄，封他爲貴族，並授予他一枚盾牌標誌，上面有兩個柱標立在岩石岬中。第二年，葡萄牙大使在羅馬教廷發表演説，宣佈葡萄牙國王的船隊已經抵達阿拉伯海灣的大門口；阿拉伯海灣當時指的就是印度洋。與此同時，國王授命航海家狄奧戈·高繼續完成他的偉大使命。所以在他回到里斯本才過了幾個月，便又開始了第二次遠航。船隊到達上次到達的地方後，又向南航行了大約 1300 公里，仍舊没有找到通往印度洋的航道（1486 年）。次年，又派遣了一支船隊。由巴托洛麥烏·狄亞斯率領。1488 年初，一陣颶風把船隊捲海岸。這支船隊遠離陸地，向南行駛。幾天之後，才又見到了大陸。毫無疑問，非洲海岸從這兒起向東延伸，這正是夢寐以求的通向印度洋的航道。

35 托爾德西拉斯條約

在狄奧戈·高尋找通向印度洋的航道的同時，長期旅居葡萄牙的熱那亞領航員克里斯多萬·哥倫布向 D·若奧二世建議向西航行，以實現到達印度的理想。這個計劃是根據當時的天文學家認爲地球是圓形的理論提出的。從理論上講，不管往西還是往東，都可以到達印度，問題是哪條路比較近。根據佛羅倫薩的著名地理學家托斯卡内里的計算，哥倫布認爲從西去的路程較短，到亞洲邊境的距離只有 180°（實際上是 290°），每度大約相當於 84 公里（實際上相當於 111 公里）。D·若奧二世根

據他掌握的資料，使他不願意接受哥倫布的計劃：很有可能國王這時候已經知道 1483 年狄奧戈·高的發現是毫無意義的。

因此，航海家哥倫布便前去爲西班牙國王效勞。經過幾年的努力，西班牙國王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他於 1492 年 8 月起航。離開加那利群島一個月之後，便看見了陸地。根據哥倫布的計算，這些陸地應該是中國海的一些大島嶼，而事實上是安的列斯群島。返航途中，哥倫布路過里斯本，並把這一驚人的發現告訴了 D·若奧二世，同時埋怨"國王對他敷衍，對他不信任，不給他授權，關於這次發現，他第一次是向國王提出的要求。"

葡萄牙的國王對哥倫布説，他所發現的這片土地，根據阿爾卡索瓦斯條約對世界的劃分，應歸葡萄牙的國王所有。國王甚至要派船隊佔領安的列斯群島；但是，後來還是同西班牙的國王進行了談判，以便和平解決。

談判的結果，簽署了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取代了以前的劃分。條約規定，從佛得角群島以西 370 里格處劃一條豎綫，把世界分爲兩個半球。西半球新發現的土地歸西班牙所有，東半球新發現的土地歸葡萄牙所有。

根據哥倫布的估計，整個印度洋和令人垂涎的香料産地都坐落在西班牙的半球内，但據葡萄牙天文學家的推算，他們的半球從安的列斯群島開始，到印度海域爲止，印度完全處在葡萄牙的擴張地區之内。

36 瓦斯科·達·伽馬的航行

葡萄牙人在東方海域上航行的專利權力得到保障後，D·

若奧二世立即下令準備組建去印度的船隊。這次遠航他沒有使用從前使用的那些帆船，而是專門製造了適合去印度洋的小型三桅帆船，這些船的噸位大，能裝載更多的物品。

正在籌備期間，D·若奧二世逝世。他的繼承人D·曼努埃爾把航行計劃提交議會討論，大多數人不贊成這次遠航。但是國王D·曼努埃爾堅持執行這一計劃，並挑選瓦斯科·達·伽馬作爲船隊隊長。伽馬的父親是王室的官員，擔任過D·阿豐索五世王室的財政監察和錫尼希要塞的司令官。因此，瓦斯科·達·伽馬屬小官僚貴族階級。挑選一名貴族來率領遠航船隊，這還是頭一次。

1497年7月8日，船隊離開了特茹河。船上的航海日誌一直保留到今天，這份資料使我們知道了當時的航綫：當他們到達佛得角的南部後，轉舵向西行駛，直到巴西海岸附近。從這兒，他們又利用風向，穿過大西洋向好望角駛去。1498年5月20日，船隊到達印度的大商埠加爾各答。瓦科斯·達·伽馬帶着簽訂貿易和友好條約的指示去見該地區的首領薩莫林。但是會談進行得十分艱難。阿拉伯人早就壟斷了印度洋上的貿易，他們從中作梗，使我們同印度結盟的計劃破產。1498年8月29日，船隊開始返航回歸祖國，路上耽誤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丟失了一艘船隻，將近半數的船員承受不住旅途的艱辛而喪失了生命。幸存下來的人於1499年夏抵達特茹河。隆重的歡迎儀式表明這次遠航的意義已立即被公認：國王向各著名的城鎮發出諭旨，下令各地舉行聖像游行和慶祝活動。

37 經濟與社會

大約在 1440 年，費爾南·羅佩斯在談到里斯本 14 世紀的繁榮情景時指出，在里斯本河口經常有四五百艘貨船停泊在那裏，阿爾馬達的船隻因爲找不到泊位不得不駛向桑多斯港，里斯本的街道上到處都是外國人的商店，有熱那亞人的、皮亞琴察人的、倫巴第人的、卡塔盧尼亞人的、馬伊奧爾加人的、米蘭人的、科西嘉人的以及比斯開人的等等，而且一個國家還不是只有一家商店，而是有許多家；但是這種商業繁榮的局面已成爲過去，“戰爭爆發了，出現了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世界，災難接連不斷，許多人都爲他們的不幸遭遇而流淚。”

歷史學家費爾南·羅佩斯把國家衰落歸咎於 D·費爾南多同卡斯蒂利亞的戰爭；但其原因並非都是政治上的錯誤，還有其他的原因，例如由於信用價值的提高但没有相應增加現金而引起的貨幣迅猛貶值、百年戰爭造成的北歐經濟蕭條、農村危機造成的國内生産的混亂、擁有雄厚資本和得到國際商業網支持的意大利商人和其他國家商人的競爭、民族意識的發展，在經濟方面則把國外的資本活動變成了開發殖民地。

D·費爾南多對卡斯蒂利亞發動的戰爭，特别是葡萄牙艦隊被擊潰，以及後來的獨立戰爭，加速了由於外部因素引起的經濟衰落。關於貨幣貶值的幅度，費爾南·羅佩斯説：“以前用 1173 個多烏拉買到的東西，現在不值一個多烏拉了。”

上個時期支撑國家經濟的兩根支柱，即進口依賴的國外市場和出口依賴的國内條件，都在危機中傾倒了。貨幣經濟對農村的壓力引起的社會變化也反映在經濟衰落上。

1394 年召開的議會上，地主們的怨言說明了當時正在發生的變化："先生，你們國內的農場主由於僱不到勞工正在遭受嚴重的損失，並且已瀕臨喪失其大部份財產的邊緣，因爲勞工們索要的和拿走高價的工錢，已經使我們無利可圖。先生，更令人氣憤的是，任何一家有錢的人都僱不到手工藝匠人，因爲他們都願意同與他們身份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例如同馱夫或者其他身份低微的人在一起，他們坐在一起大吃大喝。這些人竟敢說他們願意同誰生活就同誰生活，他們不但這樣說了，而且也這樣做了！"

幾年前，就是這些願意爲誰幹活就爲誰幹活的人把阿維斯統帥推上了國王的寶座。要回到以前的局面是不可能了。面對我們剛剛聽到的怨言，國王決定恢復農場主即地主規定工錢的制度。但是從以後幾十年的事實來看，一切照舊，工錢沒有降低，人民不安心在農村，農業生產繼續下降。在這期間，從法國、英國和卡斯蒂利亞進口的小麥增加了。根據費爾南・羅佩斯的說法，15 世紀葡萄酒和橄欖油的出口量要遠遠少於 14 世紀的出口量。

這就是海上擴張之前葡萄牙的經濟狀況。在經濟領域內國家也將採取政治領域內的集權作法。國家將控制整個局面，進行海上擴張和貿易。第一個行動就是 1415 年佔領休達。這種佔領除了其他的誘惑力之外，還因爲這個城市地處盛產糧食地區的要衝。

從此以後，國家成了最大的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大多數是國家公務人員。商業具備了新的特性，小商人已無法插手，因爲當時經商要求具備糧倉、兵工廠和軍隊；只有國家才能拿出財力和享有經商的特權。從前，小商小販趕着小毛驢走鄉串

村，一升一斗地收購葡萄酒和橄欖油，然後賣給里斯本經營出口貿易的有錢的資產階級。現在，這種生意改由國王的官吏和管家、各個島嶼的受贈者和要塞的司令官經營了。要塞變成了儲存非洲貨物的貨棧。除非經國王批准，否則商人是不許參加競爭的。

經濟上的集權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城市資產階級迅速没落；當他們看到海外開發帶回的大批財富時，也產生過躍躍欲試的念頭，然而在看到對猶太人的迫害之後，他們又心灰意冷了，因爲當時多數富翁都是猶太人，而宗教裁判所往往把擁有大量動產的人稱爲猶太人。貴族恢復了自己的經濟力量，隨之也恢復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再也用不着被商人的競爭搞得焦頭爛額，眼巴巴地看着商人把農業勞動的剩余價值裝入自己的錢櫃或供他們奢侈揮霍了。在新的經濟中，貴族們成了首富，他們經常出入王宮，從國王那兒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俸祿、地租、官職和合夥經營海外貿易這種發財的便利條件。15 世紀，修建了第一批貴族家族的豪華宮殿，如吉馬良斯宮、阿爾維多宮、永遠新娘宮、魚水宮等等。製作紋章這種時髦裝飾品也是這個時候從外國傳入葡萄牙并流行起來的。1498 年，也就是從海上到達印度的那一年，廢除了貴族的津貼金，因爲這種制度已經陳腐，而且貴族也不需要這筆錢來維持生活。

國家的經濟活動集中在沿海一帶，同時國家工作的重點也放在經濟和海外的軍事政策上。葡萄牙成了一個眼望大海、背靠國内民族的國家。從君主制開始一直不斷發展的國內殖民活動，從 15 世紀開始停止。農村只是城市的腹地，農村生活進入了嚴重的停滯狀態；直到 19 世紀末，還保留着許多中世紀的生存方式。

38 葡萄牙15世紀的文藝復興

15世紀中葉葡萄牙文化生活的傑出見證就是費爾南·羅佩斯撰寫的編年史、《忠誠的御前顧問》、曼努埃爾建築格調的誕生和葡萄牙畫派的起源（這個畫派最初的作品及最完整的作品都陳列在“綠色之窗”博物館裏）。這些藝術品千差萬別，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構思複雜，形式獨特。這些是葡萄牙的表現手法，而不是外國流派的葡萄牙化。因此根據這些表現手法，可以説是葡萄牙15世紀的文藝復興。

15世紀編寫的書籍不多，無疑要少於16世紀，但是就流傳到今天的數量來看，兩個世紀是不分彼此。15世紀末在葡萄牙建立了第一批印刷廠，1489年在沙韋斯印出了第一本葡萄牙文書。從此以後，每本書開始有數百份複印本，絶版的可能性減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即便一本書印數達幾百册，有不少書籍今天只剩下唯一的一册，甚至連一册都找不到的情況也不少。使用印刷術之前，書籍只有靠手抄，份數當然有限，只有那些願意要這本書的人才肯花力氣抄寫，因此不少書籍就永遠消失了。

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費爾南·羅佩斯的著作佔有突出的地位。最初，他擔任過王宮的官員和立契官，後來被任命爲編年史官。他編寫了一部歷史，内容包括從葡萄牙開國起一直到他生活的朝代；但是這部著作的一部分手稿遺失了，另一部分則被他的編年史繼承人按照新的政策和新文學風格作了修改。今天我們看到的《D·佩得羅編年史》、《D·費爾南多編年史》和《D·若奥一世編年史》的第一、二部分，是没有遭到篡改和歪曲的三部書，人們毫不懷疑這些作品出自費爾

南·羅佩斯的手筆。這些作品足已使費爾南·羅佩斯躋身於中世紀末的文學鉅擘之列。就對歷史進程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論，没有任何一位歐洲的編年史學家可與之相提併論。費爾南·羅佩斯的所有作品中都滲透着一種思想：歷史不是一個親王、一個社會集團或者一個階級的縱橫恣肆，它是各種矛盾的力量和利益之間緊張的和持久的衝突。從表現形式的觀點來看，他的文風代表了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的最高峰。他本人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説，在他的作品裏看不到華麗的辭藻，而只是一目瞭然的真理。費爾南·羅佩斯自學成才，他的同代人稱贊他是通俗知識的學者。通俗即人民大衆，通俗的知識，也就是人民大衆的知識，這是與學院式的知識相對立的。費爾南·羅佩斯是這種文化的最後代表之一，因爲在他的時代，一種新的、脱離庶民百姓的、模倣古典作家的拉丁化文風正在興起。這種新的文化在16世紀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所以費爾南·羅佩斯所代表的這種歷史觀已後繼無人。戈麥斯·亞内斯·德·祖拉拉和路易·德·皮納都是大名鼎鼎的文豪，他們接替了編年史官的職務，但是他們的歷史觀與費爾南·羅佩斯則大相徑庭，他們主張寫達官貴人，而不是人民大衆。

另外一位别具風格的作家是D·杜阿爾特國王。他受過很高的文學教育，從事過拉丁文的翻譯。他的主要作品《忠誠的御前顧問》似乎與其所受的文學教育關係不大。這本書是他在不同時期寫的雜文的彙編，其中有些主題是剖析感情和靈魂的。和費爾南·羅佩斯一樣，D·杜阿爾特的心理活動是複雜和矛盾的，因此，切忌片面加以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葡萄牙D·杜阿爾特的著作既不同於在他之前的書籍，又不同於在他之後的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忠誠的御前顧問》是唯一的

一部内省的著作。下一個時代的人文主義使文學作品失去了個性，使它成了外部表象的記錄，而不關心主觀世界的描寫。

D·杜阿爾特委托費爾南·羅佩斯編寫過許多部編年史，也是D·杜阿爾特下令在巴塔利亞修道院修建了一座宏偉的萬神廟，今天我們稱它爲未完成的教堂。這項工程進行了許多年，1528年因王室財政拮据，被迫停頓。這座建築歷時90年，從不同的水準上反映了各個時期的建築風格的迅速變化。面對D·杜阿爾特的半圓形廣場的高大門樓，無疑是國王生前，即1438年之前設計和動工的。這就是曼努埃爾藝術的誕生。

“曼努埃爾藝術”是個新詞，産生於上個世紀，與第一代浪漫主義同時出現。在此之前，有人認爲藝術是從中世紀的哥特藝術直接過渡到16世紀的古典復興。但是毫無疑問，在這兩個時期之間存在着某些東西，它們既不屬於前一個時期，也不能列入後一個時期，例如一些具有突出價值的紀念性建築：熱羅尼莫斯修道院、未完成的教堂、托馬爾聖殿騎士教堂後加之中殿、貝倫塔、戈列哥主教堂、卡爾達斯達賴尼亞的波布洛教堂。除此之外，還有全國各地的數十座小型門樓和别致的窗户。它既不屬哥特式，也非古典式，而是按照另外一種格調興造的。從D·杜阿爾特到D·曼努埃爾，這種式樣流行了將近一個世紀。這一藝術取名曼努埃爾完全是這位國王的運氣，因爲他只不過是繼續了這種藝術，更何况他的王朝開始時這種藝術已處於末期，雖然這種藝術後來又持續了數十年。

與費爾南·羅佩斯的編年史和D·杜阿爾特的雜文一樣，曼努埃爾的建築藝術是非常複雜的，是由許多成份組成的，是與衆不同的。這個時期在藝術上可能是唯一的、完全是葡萄牙式的階段；所有的外國建築藝術都根據當地的風格和需要作了

改造，因而很少看到外國的影響。這就是大西洋時期的藝術或者海上擴張初期的藝術。在這個時期的第一批建築物上有摩洛哥的影響，這是石匠師傅去北非爲葡萄牙佔領的城市修築堡壘時帶回來的。裝飾的題材完全是航海的用品，纜繩、繩結、浮標、珊瑚代替了哥特式的裝飾。這些石匠師傅最大膽的創舉可能要數托馬爾中殿的浮雕了，他們刻出了刮風的情景，幾根帆繩，把鼓滿風的船帆緊緊勒住。

15 世紀葡萄牙繪畫藝術的傑作，也許是蓋世之作，是陳列在“綠色之窗”博物館裏那套神秘的組畫。今天它只有六大幅，據說從前畫幅甚多。它的作者、創作的年代和主題，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與這個時期其他的代表作一樣，這套畫也是別具風格、獨具匠心的。當時，歐洲繪畫藝術的兩大中心是佛朗德勒和意大利，但是這套組畫既不屬於佛朗德勒畫派，也不屬於意大利畫派。它的主題是悼念。有人認爲這是悼念 D・費爾南多王子的，另一些人則認爲是悼念聖・維森特的，還有人認爲是悼念 D・扎伊邁紅衣大主教的。但是在是誰在進行悼念的問題上，大家意見是一致的，是全民族，其中有親王、修道院院長、騎士、教士、有產者、官吏、漁夫和平民。在 15 世紀還沒有見到過如此全面、完善和代表多元階級的作品。與費爾南・羅佩斯編著的編年史和曼努埃爾格調的建築一樣，這套組畫寓意複雜，充滿着贊頌的思想感情。倘若費爾南・羅佩斯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畫家，他爲葡萄牙所作的畫像也會與這幅作品一模一樣。

1498～1580年

對東方的壟斷

39　帝國和曼努埃爾的鼎盛時期

國王D·曼努埃爾決定下令舉國隆重慶祝瓦斯科·達·伽馬的凱旋歸來是非常英明的。這一航行確實揭開了葡萄牙歷史的新篇章。

從1500年起，每年春季都有許多艦隻載着士兵和大炮從特茹河出航，歸來時裝載着各種各樣的香料。從前出海航行時艦隊只不過有數十名海員，現在則達到2000，甚至3000名海員。艦隊隊長不再是過去在海上漂泊的老水手，而是一些爭名奪利的大貴族。

D·若奧二世想在友好互利的基礎上同當地掌權者訂立和平貿易條約，但事實很快證明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由佩得羅

·阿爾瓦列斯·卡布拉爾率領進行的第二次遠航，開始時與印度尚且是以外交禮儀相待，但後來對加爾各答進行了砲擊。他們到達印度洋時，已經有主顧在那裏進行貿易：摩爾人的商人雖然數量不多，但遍佈印度各地，且同印度的許多王親建立了牢固的聯係。所以就發生了衝突：摩爾人千方百計阻撓葡萄牙人在那裏做生意，而葡萄牙人則到處追擊和搗毁摩爾人的船隻。此外，派駐印度的那些貴族一向崇尚武力，也是釀成這類武裝衝突的因素之一。這些貴族們認爲搞垮敵人得靠戰爭，而決非靠談判。

葡萄牙人艦隊的優勢和使用大炮的高超本領以及某些軍事將領的作戰能力使葡萄牙贏得了勝利。我國當時在印度活動的傑出人物是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1508 到 1515 年間，他曾任印度總督。是他率兵攻佔了波斯灣的戰略要地霍爾木茲和中國海的門户馬六甲。

這樣就使葡萄牙國王攫取了一大片新土地。伊比利亞半島上這個小國葡萄牙成了歐洲的航海和貿易大國之一。從而使 D·曼努埃爾下令在葡萄牙和阿爾加維國王的頭銜上添上新的封號："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航海家和貿易開創者"。

當時（1505 年）里斯本的阿爾卡索瓦斯王宮已被廢棄，這座宮殿原是中世紀的一座城堡式建築。取代它的是特茹河畔的一座新式宮殿，其庭臺皆取文藝復興時代的式樣，站在這裏的庭臺上可以遠眺特茹河的景色。這塊興建葡萄牙新王宮的地方，從前是米納公司的倉庫，是存放由幾內亞海岸收購來的棉花、多香果和象牙的地方。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稱這座王宮爲米納公司宮。這是一種習慣叫法，現在人們則把這種貨棧

叫印度公司。從這家公司裏散發出的肉桂和胡椒的香味整個王宮都能聞到。就這樣里斯本，甚至整個葡萄牙也就成了萬里飄香的國度。1535 年左右，沙・德・米蘭達曾經寫道：

我更擔心里斯本，
在肉桂的飄香中
使我國變得荒凉、乏人。

王宮的變遷反映出其他一系列的變化。D・若奧二世的小朝廷益發擴大，靠吃國家薪俸的官爵成倍增加。貴族的人數及其揮霍消耗在大幅度地上昇，但這種上昇並不危及到國王的權力，因爲這些貴族是些宮廷的貴族，他們有官職，并依附於國王。隨着軍事技術的發展，私人已經沒有力量發動戰爭，軍事實力在於國王的軍火庫。從前的“武夫”希望成爲“軍官”：由他們指揮戰爭，國王給他們薪俸。即便上等貴族，倘若驕横無羈，也會受到制裁。1512 年，布拉甘薩公爵因懷疑其妻子行爲不規而將她殺死。爲此有人對他進行起訴。公爵花了大量的銀錢才得以脱身。1513 年遠征阿扎莫爾的費用大部分是由這位公爵支付的。

當時的作家對宮廷無限制地膨脹，對領取國王的薪俸人員無止境地增加感到震驚。劇作家吉爾・維森特説，甚至一首著名的諷刺詩《騾子》中一個馱夫的騾子也都列入了領取國王俸禄的花名册。宮廷的擴大是炫耀國王尊嚴不斷抬高的一種表現，也是集權和國家公務大量增加的結果。D・曼努埃爾、D・若奧二世和 D・塞巴斯蒂昂統治時期，爲切實管理國家的各項事務，如財政、司法、軍隊、中央和地方的管理，頒佈了無數的法律

條例。在法律、武器和思想等方面，現代國家取代了中世紀國家。

一部分新法收編進《曼努埃爾法典》中。這部法典是有關國家權利及個人權利的根本大法。後來公佈的《菲利浦法典》(1603年）對它作了些小的改動和補充。

法制改革的後果之一，是取消了各個市鎮地方行政法中規定的老租佃權。16世紀，各種法律都限制了這種租佃權，即便是同地方的權利相抵觸時，這些法律也必須遵守。在1481年的議會上，D·若奧二世宣佈了地方行政法的改革。但是在1497年才開始改革，每個市鎮都把自己舊的地方行政法，交給法律委員會進行審查和修改。新的地方行政法已不再是地方自治的證書，而是國王的徵稅條例。這項改革於1522年宣告結束。

40 葡萄牙人在亞洲

對於16世紀的葡萄牙人來說，“印度”一詞不僅指印度斯坦半島，而且指整個東方世界，從好望角直到日本，以及太平洋中的各個群島。從15世紀到17世紀中葉，他們在印度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建立了葡萄牙人中心。其中少數人是爲國王效忠，在作爲東方貿易基地的商行、城鎮或者要塞裏工作，而多數人則是自謀營生，自食其力。但是這種個人自發進行的擴張，在整個葡萄牙的擴張事業中，其意義并不亞於官方的擴張活動。

葡萄牙在東方進行殖民活動的大本營是果阿。這座城市是1510年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攻佔的，直到1961年，還一直掌握在葡萄牙手裏。爲了改變整個亞洲的信仰，果阿也是廣泛傳播天主教教義運動的策源地。在這座印度城市裏，葡萄牙

人修建了一幢幢文藝復興時期式樣的大樓，使其成了一座歐化城市，直到今天還屹立着許多令人贊嘆的遺迹。還在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時代就開始提倡葡萄牙男子和果阿婦女通婚，以實現種族融合。通婚的結果，造就了一批具有獨特性格的人，他們講葡萄牙語，但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則有的信奉天主教，有的信奉印度教。派往印度的總督通常允許那裏的土人繼續信仰當地的宗教，這樣做對葡萄牙人在印度繼續待下去有好處。

教會，尤其是耶穌會，把果阿當作東方基督教界的總部，葡萄牙的作家非常喜歡把果阿比作羅馬。這當中有誇張的成份，不過在亞洲宣講福音的活動中，果阿確實起了卓越的作用。在果阿興辦了許多有相當規模的中等學校和高等學府，吸引了東方各地的男女青年。1584 年舉行開學典禮時，一份講演稿必須翻譯成 16 種語言才能使出席大會的學生都能聽懂。毫無疑問，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外，在這些學校執教的神父來自四面八方。有一位意大利籍的耶穌會會員離開果阿後從事翻譯工作，把歐幾里德的幾何譯成了漢語；一位德國籍的耶穌會會員後來成爲中國皇帝的科學顧問，他的工作之一，是爲中國皇帝改革了中國的曆法，使其盡量與西方的曆法一致。

爲了利用宗教勢力征服亞洲，果阿派出的大批傳教士都作出了鉅大努力，甚至在當時人迹罕至的西藏地區都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但是整個來説，使亞洲基督教化的奢望破滅了。初期，傳教活動搞得轟轟烈烈，尤其在下層人民中間，大衆紛紛改變信仰，歸順天主教。其原因是傳教士告訴他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又譴責了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受欺凌的老百姓把加入基督教看成是求得解放的好機會。然而也正因爲這一點，上層

階級則從不去聽這些傳教士的說教，而且視這種活動爲破壞社會安寧的因素。另一方面，亞洲各地伊斯蘭教盛行，從而使基督教面臨着十分强大的對手。再者，基督教是外國傳來的，有許多方面與當地人格格不入。這一切就使得傳教士所宣講的教義未能廣泛傳播，也没有徹底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和日本，當局對基督教徒進行過血腥的鎮壓，死亡數千人，天主教活動只能在零星偏僻的村莊裏進行，這種狀况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傳教計劃的失敗並不能貶低傳教活動在文化上的重要意義。這些傳教士學會了當地的語言，傳播了葡萄牙語，傳播了許多西方的技術，譬如印刷術。傳教士之所以採用印刷術，是爲了大量印刷教義問答讀本。傳教士通常都是些博學廣聞的有識之士，善於講道理，以理服人，不像士兵那樣以力服人。這些傳教士對東方的文化頗感興趣，不少人著書立說，介紹這些遙遠的國度的地理概况和民情民俗。他們的著作在歐洲激起了强烈反響，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葡萄牙的傳教士才瞭解了亞洲，才對亞洲的地域及其燦爛的文化有了新的瞭解。

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歷史清楚表明當時這種殖民活動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兩種計劃同時進行。15世紀時，中國在歐洲人眼裏還幾乎是神話般的地方，貿易往來要通過遙遠漫長的陸路——絲綢之路進行。這條路穿過整個中亞，到達黑海的東部港口，或者直達君士坦丁堡，那裏有通往威尼斯的海路。葡萄牙國王計劃開辟一條海上航道代替絲綢之路，把中國的商品直接運往里斯本。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就是這個計劃的組成部分。1509年，國王派遣了一個貴族親赴馬六甲，試圖與之談判在該城建立貿易機構的問題，因爲馬六甲當時是同中國港口進行貿

易的中轉站。國王的指示十分奇怪，說明他對中國一無所知；但是16世紀初，整個歐洲都非常想瞭解中國。國王的旨意是：

> 要問明中國人，他們來自何方，旅途有多遠，到馬六甲需多久，或可問明他們隔多久到那裏經商一次，都有何種商品，每年來船的數目，船的樣式，下年來船樣式是否改變，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設有商行或公司。中國商人是否有錢，其性格剛柔如何，有否武器或者大砲，服裝款式，個頭高矮凡此等等。

貴族狄奧戈·羅佩斯·德·塞克伊拉，最後並未完成其使命。馬六甲國王對葡萄牙人的來訪不感興趣。1511年，葡萄牙人攻佔這座城市後，才開始在這裏紮下了根。從那以後，該城即成爲葡萄牙在遠東進行擴張的總部，但隸屬於果阿政府。葡萄牙人在那裏拆除了當地國王的陵墓和各種宗教建築，用拆除的石料築成了一座西方式城堡。兩年之後，這里形成了一個葡萄牙人居民區，建有兩所醫院，五座教堂。然而此地氣候條件歐洲人不能適應，所以死亡率很高，葡萄牙人居民區通常只能維持一代，連第二代都無法保持。

在佔領馬六甲的同時，里斯本仍在繼續考慮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國王委派了一名藥劑師前往中國去說服中國皇帝，說明建立這種關係的好處。這個人就是托麥·皮列士。他是個"東方通"，在接受這項使命之前，曾寫過《東方概況》一書，介紹了馬來西亞、爪哇、蘇門答臘和其他太平洋地區的情況。書中羅列的資料是托麥·皮列士在馬六甲採擷的，他後來又回到馬六甲，並從那裏起程前往中國。爲求得拜見中國皇帝的機會，

托麥·皮列士在中國整整待了三年，最後終於如願以償。但是中國當時極端排外，禁止同外國人往來；外國人在中國遭到迫害，許多人被處以死刑。這位使者及其同伴曾被囚禁多年，最后托麥·皮列士才得生還。

官方無力排除的障礙卻被一些善於自己開路的冒險家克服了。多數探險家迄今已沒有留下姓名，因爲他們的活動不但中國人不知，而且葡萄牙人也無從知悉。若爾熱·阿爾瓦列斯就是自發地譜寫這部史詩的典型人物之一。1513 年，他搞到一艘中國式帆船，開始了中國與馬六甲之間的貿易往來。在中國廣東的一片孤寂的海灘上，若爾熱·阿爾瓦列斯搭起一座草棚，供前往黃海去的葡萄牙商人落脚。後來，他竪起了一根石柱，在上面刻上了五個盾，以示那個地區屬葡萄牙國王所有，並做出種種姿態似乎確有其事。他的冒險就此出名，因爲 1532 年聖·弗朗西斯科·沙維埃爾路過這裏時生了重病，若爾熱·阿爾瓦列斯把他背入這間窩棚，這位傳教士就是在這兒與世長辭的。有一次若爾熱·阿爾瓦列斯出海經商遭到德那地船隻的襲擊，受了重傷，他請求他的同伴把他運到他認爲是葡萄牙領土的地方，並埋葬在他多年前竪起的那根石柱旁。

還有一些冒險家也像若爾熱·阿爾瓦列斯一樣，不顧中國皇帝的禁令，通過馬六甲建立了中國同印度的貿易往來，並通過其他途徑溝通了中國同日本的貿易。中國人自己也終於體驗到這種貿易的好處，但是認爲必須遵守老的幾乎是神聖的法令。直到 1557 年，廣州總督才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既能通商又不違禁的辦法：即把一個與中國大陸相連的小島讓給葡萄牙人並在小島連接大陸的地峽上築了一道牆，以示中國到此結束。這個小島就是澳門半島。小島既然不屬於中國就可以不受皇帝禁令的

限制，就可允許它自由貿易。

這個小漁村很快就發展成一座繁華的商埠，1675 年以前，澳門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物資的唯一集散地。從 1675 年到鴉片戰爭（1839～1844 年），澳門成爲國際性城市，向世界各國的船隻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對歐洲貿易的基地。盡管澳門隸屬果阿，但是市政是由商人管理的。他們建立的政府機關——市政參議院到今天還在行使權力。1586 年，葡萄牙國王爲澳門起了一個名字即中國的聖名港，想用這個名字來體現商人活動和傳教士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們指望讓上帝的名字從這裏進入中國，同時，使中國的商品從這裏出口運到歐洲高價銷售。

大約將近一個世紀（直到出現荷蘭的競爭爲止），中國同日本的貿易往來還操縱在葡萄牙人手裏。葡萄牙的影響如此强烈，以致日本的歷史學家把 1540～1630 年這段時期稱爲基督世紀。那裏的主要國際貿易中心是長崎，它是葡萄牙冒險家們在海濱的小丘上建立起來的一座商業城市，使人能夠聯想起葡萄牙的海港。然而這所城市後來出了名並不是因爲它興建的方式，而是因爲它成了第一顆原子彈的轟炸目標。由於中國皇帝的禁令，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一直是個空白，但是葡萄牙人填補了這一空白。在今天的日本語詞彙里還保留着許多來自葡萄牙語的詞彙，也許這就是葡萄牙與日本這兩個相距遙遠的民族之間的接觸所留下的唯一痕迹。

41 巴西的發現和殖民化

1500 年 3 月 8 日，一支由 13 艘船隻組成的船隊載着 1200 名水手從特茹河起航。領隊是貴族佩得羅・阿爾瓦列斯・卡布

拉爾，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印度。從船隻和士兵的數量來看，這是第一支貿易性的大船隊，不僅能夠把印度的大批商品運回里斯本，而且必要時還能進行戰鬥。

船隊基本上是沿着瓦斯科·達·伽馬開辟的航道前進的，抵達佛得角後，船隊轉舵向西航行，以便利用風向穿過南大西洋和繞過好望角。4月22日，他們看到了一片陸地："一座高大圓渾的山丘"。我們葡萄牙人給它取名叫復活山，因爲是在復活節期間發現了它。兩天以後，船隊航行到了一個避風港：塞古羅港（安全港的意思——譯者）。葡萄牙人在此停留了一個星期，他們對該地進行了考察，並與當地人民進行了初次接觸。跟船隊航行的書記員把這一星期内的所聞所見一一記錄在案，成了《著名的彼洛·瓦斯·德·卡米尼亞的書信》。它是葡萄牙游記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人們至今對這次發現的性質依然爭論不休，這次發現到底是偶然性的還是有意進行的？是卡布拉爾的船隊有目的地到達了巴西海岸完成了自己的"正式"發現呢（因爲在此之前是否有這塊地方還是個謎），還是由於風大把船隊吹到了那裏，或者航海家們的差錯造成的偏離航道使船隊偶然到了那個地方？

證明這一發現是有計劃進行的重要論據之一，就是葡萄牙的代表在托爾德西拉斯曾經極力主張把子午綫劃在佛得角以東的370里格（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兩本敕書都劃在100里格）的地方。把分界綫向西挪動的結果，就把巴西劃到了葡萄牙的版土内，我國的這一要求表明我們當時可能已經知道在那個經度上有大陸存在。的確是大西洋的海風把我們的船隊送到了巴西海岸，很可能在1500年發現巴西之前的航海中，已經知道了它的存在，只是爲了避免同西班牙的摩擦没有公諸於世而已。

許多年來，這塊新發現的土地上的主要資源是巴西木。這種樹樹心殷紅，能作染料，而且木質堅硬，可製造家具和船隻。發現者給這塊土地取名叫維拉克盧兹，但是這個名字很快就被當地的主要産品的名字所取代。

1501 年，曾經組成了一支船隊考察巴西海岸，航程 3600 公里。1502 年，巴西木的貿易委托給一名叫費爾南・德・羅洛尼亞的新基督教徒進行，他必須每年派遣一支由六艘船隻組成的船隊考察 1300 里格的海岸綫，並在適當的地區設立商行。葡萄牙人的第一批據點就是此時開始在巴西沿海建立起來的。

從迄今尚存的一張 1511 年一艘貨船所載貨物的清單中，可以看出當時經濟活動的概況。船上裝有 5000 根巴西木、幾名奴隸以及許多猴子和鸚鵡。葡萄牙人還截獲過一艘從巴西開出的法國船，上面除了巴西的圓木、猴子和鸚鵡外，還裝有 3000 張豹子皮和 300 肯塔爾（一個肯塔爾相當於 60 公斤——譯者）的棉花。

巴西發現之後不久，法國的一些冒險家式的商人也到了巴西。他們大力採伐巴西木，同時也想佔有這塊土地。里斯本派遣了一些小股部隊去保衛巴西海岸。但是許多年中，巴西的主要作用僅僅是里斯本派往印度的軍隊的停靠站。

1530 年，馬爾丁・阿豐索・德・索烏扎率領船隊到達巴西後，才有了正式的，有系統的開拓這塊殖民地的設想。就在這一年，建立了聖維森特市，在那裏的沼澤地上種植了第一批甘蔗，安裝了第一臺軋糖機。當時該地區已有葡萄牙人居住，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若奧・拉馬里奥；在他的倡議下，葡萄牙人在距離海岸大約幾里格的腹地建立了一個村莊。這個村子叫皮拉蒂寧卡，後來發展成爲今天的聖保羅市。

1534年,D·若奧三世把整個巴西劃分成許多塊世襲封地,賜給一些小貴族。受賜者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來推動移民和開墾荒地。某些封地,特別是南部的聖維森特和北部的伯南布哥很快就繁榮了起來。但是一般來說,由於這些封地的受賜者缺乏雄厚的經濟實力,或者是由於當地人民的强烈反對,墾殖土地遇到了很多困難。盡管如此,到1548年時在巴西沿海已經建立了16個葡萄牙人定居的村鎮。居民們大都靠經營同葡萄牙本國的貿易爲生,除木材外,他們運往葡萄牙的產品還有糖、棉花和烟葉。

隨着巴西的經濟地位不斷上昇,1548年成立了總督府體制,第一任總督是托麥·德·索烏扎。他率領着近1000名移民和第一批耶穌教牧師前往巴西赴任。在這批牧師中有個叫曼努埃爾·達·諾布列卡的人,他的傳教活動在當地人民中影響頗深。爲了同當地人民接觸,他在皮拉蒂寧卡村建立了聖保羅經院。聖保羅市的名字就是從這兒來的。然而,托麥·索烏扎卻把總督府設在北部的聖薩爾瓦多,這座城市便很快發展了起來。

巴西在葡萄牙人的統治下進入了迅速發展的時期。許多猶太人在葡萄牙受到迫害,紛紛逃到巴西定居。這種遷移往往是有去無返的,大多數葡萄牙移民都是不帶家屬孑然一身到那裏去的,然後在那裏與當地女子結婚,從而形成了一個混血的種族馬麥盧科斯族。這個種族的人對傳播葡萄牙的影響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583年,在巴西定居的白種人達2.5萬人。巴西的氣候濕熱,適宜於甘蔗的生長。第一臺軋糖機安裝100年後,每年的糖產量達200萬阿羅巴(1阿羅巴相當於15公斤——譯者)。糖廠老闆同幾内亞海岸建立了直接聯係,他們從那兒又購買了大批黑奴去巴西種植甘蔗或從事軋糖業。

1584年，耶穌會神父費爾南·卡爾丁訪問了巴西的耶穌會組織，並對伯南布哥的社會狀況作了如下的描繪：

> 這兒人們富有，許多人有四萬、五萬或者八萬個克魯扎多（葡萄牙古幣名——譯者）〔當時，在葡萄牙一個有錢人家的傭人除了衣服外每年才掙四個克魯扎多〕。少數人負債累累，因爲從幾内亞販來的奴隸大批死亡而虧了本，或是因爲給奴隸看病開支太大或開支過多。婦女和兒童穿着各色各樣的絲絨、大馬士革的錦緞和絲綢。一些闊太太們神態傲慢，趾高氣揚，既不太信奉上帝，不做彌撒，也不聽佈道，不做懺悔。一些先生們愛講排場，擺闊氣，不惜花二百到三百個克魯扎多買一匹西班牙小馬。這種馬的價格極高，而有的人竟然一次就買三、四匹。每當有錢人家的姑娘嫁給一個維亞納人〔從維亞納來的人，也就是在那個港口登岸的民約人〕，當地的要人、親朋好友，有的身着大馬士革錦緞，有的身穿大紅大綠的絲絨，有的穿戴綾羅綢緞，甚至連開道的下人的衣服和馬鞍的襯墊都是綢緞做的。那天，要舉行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如鬥牛、擲棍、滚鐵環、參觀經院，總之，在嫁娶這樣的日子裏，人們可以大飽眼福。這兒總共有十個到十二個糖廠老闆，他們輪流設宴，每天聚集在一起大吃大喝，揮霍錢財。每年光喝葡萄牙酒的酒錢就達五萬個克魯扎多，有幾年竟高達八萬。總之，伯南布哥遠遠比里斯本闊氣。維亞納人成了伯南布哥的太上皇，有人嘀咕說：“難道這兒是維亞納！”

與印度洋貿易日趨衰落的同時，巴西在不聲不響地發展。與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情況相反，他們在巴西看不見任何原來已經有組織的經濟，即便利用已經存在的資源，也得自己建立某種形式的組織。爲了出口巴西木，得成立最原始的企業（從內地採伐、運往海岸、在那裏存放、看護以防海盜搶劫、然後裝上從葡萄牙來的船隻）。特別應當指出的是製糖業，它使一個葡萄牙移民既成了企業家又成了生產者。糖廠不僅是家庭、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中心，而且還把葡萄牙移民永遠繫在了這塊土地上，使他們把這塊土地看成是他們的第二個祖國。這種現象在東方從未發生過，葡萄牙人去東方時想的是發筆橫財早點回來。由於葡萄牙人把巴西看成是他們的第二祖國，所以人數很少的葡萄牙種族才能給當地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影響：巴西人瞧着葡萄牙人爲他們做出的榜樣，走出了森林，進入了文明時期。

42 困　　難

曼努埃爾國王的揮霍無度很快超出了葡萄牙所得收入的負荷。16世紀就已使用了"印度的烟幕"一詞來表示以對東方壟斷爲基礎所形成的繁榮的虛幻程度。讀一讀若奧·德·巴洛斯的《亞洲的歲月》和伽斯帕爾·科雷拉的《印度神話》，是瞭解我們在東方的統治和我們所付出的鉅大戰爭代價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我們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如圍攻第烏的勝利；另一方面則是葡萄牙駐軍遭到殺害、商行被焚燒、艦船被擊沉。這類鬥爭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進行着，開始時的勝利往往意味着曠日持久的戰爭，而對付持久的戰爭，葡萄牙的兵力則數量總顯得不足。一百多年來，陸上、海上、非洲和東方，戰事連綿不斷，然而戰爭的費用都得從里斯本支付。

1515年，還在D·曼努埃爾執政期間就發生了第一次危機。佔領阿扎莫爾後，國王曼努埃爾想在摩洛哥海岸擴大葡萄牙基地，當時可能是爲佔領菲斯王國作準備。菲斯王國佔有一片農業上非常富饒的土地，對我們在北非的存在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1515年，一支艦隊載着大批人馬從特茹河出發，他們的任務是在馬穆拉和阿納菲（靠近現在的卡薩布蘭卡）建造兩座城堡。但是我們遭到摩爾人的襲擊，損失慘重：四千名士兵喪生，一百艘船隻被擊毁，大砲全部被迫丢棄，運去墾殖土地的葡萄牙人被俘，或被作爲奴隸賣掉。没有比這次代價更高的遠征了。國王曼努埃爾立刻準備報復，宣佈要再次遠征討伐，並任命了新的船長。但是兵員費用、武器開支及建造艦艇的錢都未能湊齊。吉爾·維森特曾以此爲主題寫了《戰爭的召喚》一劇在王宫演出，劇中國王强烈呼吁平民百姓在他處境困難時伸手幫他一把，拿出首飾、珠寶、教堂的聖餐杯和十字架來資助非洲的戰爭。但是人們對這種號召置之不理，遠征隊未能出發，馬穆拉的慘敗意味着葡萄牙人一百年前在北非佔領休達開始的第一階段擴張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在以後的年代裏，葡萄牙的困難日趨增多，摩爾人對葡萄牙要塞的壓力越來越大。無論守衛要塞的葡萄牙士兵多麼勇猛頑强，也頂不住摩爾人的大砲的轟擊。1541年，我們最南端的陣地古埃角的聖克魯斯（現在的阿加迪爾地區）失守，幸存的守兵屈指可數，全鎮的居民慘遭屠殺。摩爾人把這場戰績看成是"同葡萄牙人作戰以來取得的最輝煌的勝利"，而大肆渲染。從此以後，葡萄牙在非洲的帝國即開始崩潰，盡管它從未真正形成過。第二年，國王下令撤離薩菲姆。該地曾是侵略摩洛哥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是主教府所在地。1549年，我們離開了阿

爾吉拉；1550 年，我們又撤出了阿爾卡塞爾塞克爾。

我們放棄這些地方是因爲我們感到有必要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到東方。我們在東方的勢力範圍仍在不斷擴大。以馬六甲爲起點對中國港口進行經濟開發；1557 年，中國承認了我們對澳門的和平佔領，直到 17 世紀末，它是中國同印度洋各國市場進行貿易的中轉站，也是葡萄牙人去日本諸島的起點。

43 D・塞巴斯蒂昂時期 阿爾卡塞爾吉比克

從 D・曼努埃爾王朝末期起直到 1580 年喪失獨立，葡萄牙的經濟困難日趨嚴重。

1557 年，D・若奧三世逝世，王位讓給了他的孫子 D・塞巴斯蒂昂。因爲他當時才三歲，所以由卡洛斯皇帝五世的妹妹、孀婦王后卡塔琳娜・德・奧斯特麗婭攝政。這個問題提交議會討論時，民衆代表表示反對，因爲王后是卡斯蒂利亞人。1562 年，D・卡塔琳娜放棄攝政，由 D・若奧三世唯一活着的弟弟 D・恩里格王子大主教接替。在爲商議這個問題召開的議會上，議員們都充滿傷感地談論國家當時的形勢，攝政王后在演説時説：維持對印度的統治看來只有靠出現聖迹才有可能。而當時爲了教育年輕的國王 D・塞巴斯蒂昂，人文學家狄奧戈・德・特伊維用拉丁文寫了一首詩。詩中説，自從發現了“東方粗製的珠寶和新的世界”，自從“靠犧牲衆多的生命換來少量好處的方式”，把肉桂和胡椒運回葡萄牙以後，葡萄牙就變成了一個鬱鬱寡歡的國家。很多年前，薩・德・米蘭達就曾指出，印度和香料貿易將是葡萄牙走向衰落的一個因素。

指責對東方的經濟擴張在人文主義者中間是普遍現象，這些批評含有許多正確的部分。

16世紀頭25年内，大批香料涌入我國，而且利潤豐厚，這對葡萄牙傳統的一向平穩的生活是一個突然的衝擊。不過人們從農村涌向首都，不願從事生産，而追求享樂和寄生的生活，這種傾向早在發現時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D・佩得羅王子在著名的布魯爾書信中就已談到過這種現象，並提出了制止這種現象的解決辦法。鑒於國家匱乏，能夠供養的僕役有限，農民流入城市的趨勢已被控制。香料貿易的頭幾年，的確曾有過一時繁榮，不少人暫時發迹。這種短暫的變化卻帶來了永久性的後果，里斯本王室講排場擺闊氣，宮廷人員大量增加。貴族們開始靠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來表示其享有的社會地位。大貴族千方百計來維持自己的小宮廷，結果弄得入不敷出。爲了制止這種風氣，曾頒佈了許多法令，禁止衣着和生活過分奢侈，限制使用貴重布匹、首飾、黄金和白銀飾物的用量，以及傭人的數目。

但是在國家消費上昇的同時，其收入卻在下降。無論是絶對數量（16世紀在東方購買和運往里斯本的貨物的數量逐漸降低）還是相對數量都在減少：轉賣的利潤越來越小，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因爲這一時期的進口額增加了。收入減少的原因很多，雖然直到16世紀末經由好望角通向東方的航道一直壟斷在葡萄牙人手中，但是經過小亞細亞把東方的貨物運到地中海的那條古道卻又重新活躍起來。就這方面而論，運輸費在逐年上昇，海上沉船的百分比一年比一年增大，民用和軍事開支不斷增加。16世紀期間，船的噸位飛快增長，與此同時船隊的費用也在上昇。海盜和匪徒在大西洋上活動猖獗，運載香料的貨船

從亞速爾群島到里斯本這段路程需要有艦船護航。在印度，總督府的機構日益臃腫，許多職務情同虛設，只是領取薪俸而已。最初的幾次航行，在到印度時，葡萄牙的大砲使印度人膽顫心驚，但是過了幾年以後，印度人的大砲卻使葡萄牙人望而生畏。葡萄牙人從坎貝君王手裏繳獲過一門大砲，長六米，重二十噸。這就是有名的"第烏大砲"。葡萄牙的士兵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沉重的大砲，所以把它作爲戰利品運到了里斯本。葡萄牙的艦船控制了海洋，但是維持陸地上的要塞卻日益困難；一方面葡萄牙經常以少勝多取得驚天動地的戰績，但是另一方面，葡萄牙的駐守部隊則不斷遭到殺害，貨棧商行被搗毀。

"印度的烟幕"已經開始飄散。許多人認爲依靠武力在一個遙遠的地域（航程六個月）進行經濟開拓花費的力量太大，局面難以持久。1570 年，國家放棄了對東方貿易的壟斷，開始將那裏的生意出租給一些商人，這樣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家收入微薄，每年拿不出足夠款項組織艦隊。

狄奧戈・多・科烏多（戰士作家，卡蒙斯的同時代人）主張從安哥拉的海岸到莫桑比克的海岸建立一個包括整個南部非洲在內的帝國，代替東方的帝國。那裏有莫諾莫塔帕的富饒的礦産地區（現在的羅德西亞）。這種意見並非無人支持的；有人甚至提出了佔領中國的計劃；但是最容易實現和最受支持還是佔領北部非洲的計劃。這就是卡蒙斯在著名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裏稱之爲的"大門口的帝國"，或"城池一千、土地無限"的帝國。這種想法在政治上容易被人接受。在 1562 年召開的議會上，各市鎮的人民代表表示贊成保持非洲的要塞，建議增加軍事費用，要求教會和貴族承擔一部分軍事開支，甚至説興建科英布拉大學"危害"王國，誰願意學習就請上薩拉曼卡

或到巴黎去，要求把這筆辦學校的錢用於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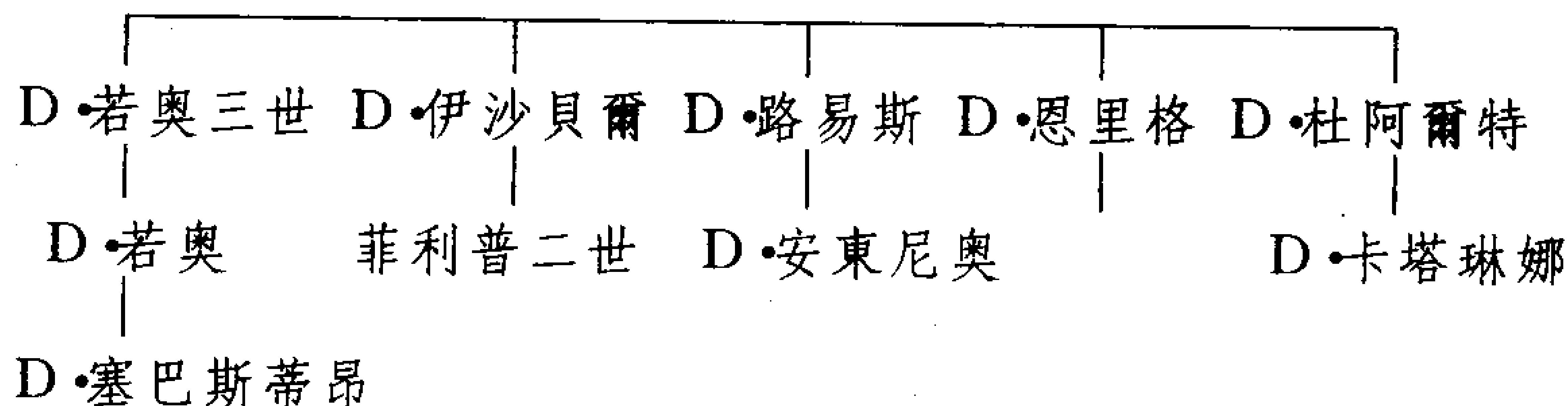
1658年，D·塞巴斯蒂昂十四歲，開始執政。他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如何統治，也就是說他從小被灌輸的思想就是軍事上的英雄主義和國王神聖。葡萄牙是受到威脅的基督教的救星，他本人就是拯救基督教的工具，這種自信心很早就在D·塞巴斯蒂昂身上紮下了根。隨着年齡增長，這種思想日益膨脹。在他執政的十年當中，他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對付異教徒。1572年，D·塞巴斯蒂昂就組織討伐不同信仰者，但是計劃没有能夠付諸實施，因爲集中在特茹河上的船隻被一場風暴毁於一旦。兩年之後，D·塞巴斯蒂昂偷偷地乘船到達北非，準備對摩爾人發動戰爭。他臨走時留下旨意，要求全國人民拿起武器等待他的召喚。

1576年，一個摩爾人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奪取了摩洛哥的王位，葡萄牙人以此爲藉口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討伐戰爭。照D·塞巴斯蒂昂的說法，土耳其支持摩爾人奪取摩洛哥的王位意味着土耳其的國王想霸佔整個北非，這對伊比利亞半島和基督教的歐洲是件生死攸關的大事。

1578年，D·塞巴斯蒂昂24歲，統率着他招募來的全部人馬，約17萬人，其中包括5000名外國僱傭軍，前往非洲戰場。他拒不聽從在非洲戰爭中有豐富經驗的軍官的勸阻，離開海岸，前去迎戰摩洛哥國王的軍隊，兩軍在阿爾卡塞爾吉比克附近遭遇。我軍損失慘重，一半人喪生，一半人被俘，國王本人也一命嗚呼。

44　1578～1580 年的危機

D・塞巴斯蒂昂死後沒有留下後代。他也沒有兄弟。繼承王位的問題可以從下面的圖中表示出來。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些人也在覬覦王位，但是親屬關係上更遠一層。

1578 年，D・曼努埃爾的兒子當中活着的只有 D・恩里格王子。他是大主教，也擔任過多年宗教法庭裁判長的職務。於是 D・恩里格王子就繼承了王位。

他當時已 64 歲高齡，身體多病，不可能再有子女。一旦他逝世，葡萄牙的王位勢必由 D・曼努埃爾的孫子繼承。屬於孫子輩的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克拉托修道院院長 D・安東尼奧(D・路易斯王子和一個新基督教女教徒的私生子)，和布拉甘薩女公爵 D・卡塔琳娜。

問題的實質是維護葡萄牙的獨立還是進行伊比利亞半島的聯合。如果選擇 D・安東尼奧和 D・卡塔琳娜，這就意味着國家的獨立；如果選擇菲利普，則意味着王位的聯合。

當時的一份文件說，“貴族中的頭面人物和社會上的要人”都傾向於選擇卡斯蒂利亞的國王。在國家處於一片蕭條衰敗的時期，對於那些擁有一些財產而又害怕喪失的人來說，同卡斯蒂利亞的聯合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對於貴族（由於支付在阿爾卡塞爾吉比克戰爭中被俘人員的贖金，他們的經濟地位大大惡化了）來說，選擇卡斯蒂利亞的國王意味可能“維持他們的現狀”，即可以保持他們的職務、財產和在宮廷內的官銜，因爲菲利普二世是有權勢的大富豪。對於大資產階級來說，同卡斯蒂利亞的聯合意味着葡萄牙同卡斯蒂利亞陸地邊界的開放，以及葡萄牙同東方和巴西的貿易將得到當時歐洲最强大的西班牙艦隊的保護，所以這種聯合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好處。有人還盼望着同卡斯蒂利亞聯合能夠允許我國的商人到中美洲盛產白銀的地區去，那裏是正處在生産發展的鼎盛時期的西班牙佔領區。對於這兩個階級——貴族階級和大資産階級來說，一個强有力的國王的統治，能夠避免人民起義的威脅。人民的起義時刻都有爆發的危險，而這種起義一旦爆發，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特權階級。

只有人民——手工匠人、漁民和城市的平民公開主張維護獨立。《實踐的戰士》一書裏有一段雙人對話。其中一個人說，强烈反對西班牙的思想情緒是由於“我們和卡斯蒂利亞人之間過去不斷發生的爭端造成的”。但是另一個人回答說，“這種敵對情緒只存在於下層人民身上，貴族們想的是另一回事。有誰能比西班牙人更完美？有誰能比西班牙人更文雅？有誰能比西班牙人更通達？有誰能比西班牙人更風度翩翩？先生，有誰能像他們，要什麼就有什麼?!”但是人民的情緒使上層人物惶恐不安，因爲 1383 年危機就是由於人民的不滿引起的。現在，爲

了避免在王位繼承問題上爆發一場人民運動，上層神職人員、貴族、法官和大商賈都聯合起來了。

爲了通過法律途徑和平解決王位的繼承問題，避免訴諸武力，紅衣主教兼國王費盡了心機，他强逼一些爭奪王位的人宣誓服從他將來選擇的解決辦法，邀請爭奪王位的人派遣代表來維護他們的權力。但是菲利普二世認爲他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因而拒絶宣誓。1579 年，議會開會，決定教會、貴族和平民各選出十名“代言人”，這些代表應當有能力闡明王位究竟應該屬於誰。平民不接受這種比例，他們選派了四十名代表，以便佔據多數。但是這只不過是避免國内爆發危機的一種法律形式，因爲關於王位的繼承問題，紅衣主教和西班牙國王之間的秘密談判已經在進行。

議會開會期間，D・恩里格謝世，他的遺囑隻字未提王位的繼承問題。政權委托給五位總督代管，在王位繼承權未確定之前，由他們行使最高權力。

在兩名葡萄牙候選人當中，布拉甘薩女公爵没有擁護者，因爲貴族希望菲利普繼承王位，平民對於這位女公爵繼承王位也無好感，因爲她的執政也就是貴族的執政。這樣，D・安東尼奥便受到了平民擁戴。但是在那些竭力想避免内亂者的心目中，這種擁戴卻使他成了一個十分危險、受到懷疑的人物。紅衣主教國王想方設法迫害他，甚至宣佈了一份判決書，剝奪他的葡萄牙國藉，並且以“爲了我的王國和臣民的幸福安寧”爲理由，把他驅逐出國。

在這期間，菲利普二世屯集重兵於葡萄牙的邊境，但是卻按兵不動，避免入侵，因爲他也擔心遭到人民的反對。紅衣主教兼國王死後，D・安東尼奥便想回到里斯本，但是人民律師勸

他先到聖塔倫。數月之後（1580 年 6 月 12 日），發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使 D·安東尼奧提前回到了里斯本。有一天，D·安東尼奧參加一項宗教活動，瓜爾達的主教提到了他，稱他是王國的保衛者。這句話激起了掌聲和喝彩。有一個人把手帕繫到劍尖上，高呼："王旗！王旗！擁護 D·安東尼奧爲葡萄牙的國王！"人民熱烈擁護 D·安東尼奧爲國王。幾天以後，這個克拉托修道院院長進入里斯本，許多貴族紛紛逃跑，但是人民舉行集會歡迎他。當時五個執政的總督正在錫圖巴爾，他們認爲這場早已預料的可怕的革命終於開始了，於是星夜乘船逃奔艾亞蒙特。他們在西班牙軍隊的保護下，來到了卡斯特羅馬林，在這裏簽署了宣佈菲利普二世爲葡萄牙的合法國王的文件，宣稱克拉托的修道院院長及其追隨者爲叛徒。

這時西班牙軍隊越過國境，而且未曾遇到任何抵抗。D·安東尼奧企圖集結兵力，但是困難重重。許多城鎮雖然承認他爲國王，但是所謂承認不過是表示支持而已。最後，D·安東尼奧只好以解放奴隸爲交換條件把大批奴隸編入軍隊并動員監牢裏的囚犯出來爲他打仗。8 月 25 日，D·安東尼奧的軍隊企圖阻止西班牙侵略軍進入里斯本城；但是在阿爾坎塔拉河附近遭到慘敗；後來他又想在北部地區組織力量抗擊西班牙入侵者，但到了 1581 年初，他不得不離開葡萄牙去尋求西班牙政治上的傳統敵人——法國和英國的支持了。

許多歷史學家把 1383～1385 年的危機和 1578～1580 年的危機做了對比。兩次危機的背景是不同的。阿維斯統帥當時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爲長期的國內戰爭削弱了卡斯蒂利亞的國力，克拉托修道院院長之所以失敗，是因爲西班牙已經統一，而且正處在經濟上的昌盛階段。在這兩個時期，大貴族都想選擇

外國人繼承葡萄牙的王位，而手工工人和平民則選擇葡萄牙人繼承王位，但是這個共同點純粹是形式上的，因爲這兩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兩個世紀之中發生的政治變化是，大貴族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大，而阿維斯統帥賴以取勝的手工工匠階層卻分化瓦解了。所以這兩個時期的關係是既非相同又非完全不同，而且對前一個時期的回憶又會聯想到第二個時期。人們經常回憶並提及 1383～1385 年間發生的許多事情。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回憶這場革命時，曾預言它將來一定會重演。但是能夠阻止這類革命發生的勢力遠遠超過了促使這種革命爆發並從中得到好處的勢力。

45 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的思潮

D·塞巴斯蒂昂死後，迷信活動風靡全國，現代著作家們稱這種動向爲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的思潮。

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的思潮可以追溯到 D·塞巴斯蒂昂死前，甚至誕生之前。

1530 年，國王 D·若奧三世的最小弟弟 D·費爾南多王子結婚，國王把特蘭科索鎮賜封給他。但是農場主和手工工匠人反對，不同意王子佔有此鎮。這種隸屬關係並非無關緊要，因爲國王的官吏在稅收方面比較寬宏大量，而王子是個靠地租收入爲生的大領主，因而在稅收方面則非常嚴格，有時甚至苛刻。這種反叛的局面持續了好幾年，國王同這個鎮的居民代表進行了談判，並堅信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局面會自然得到解決。果不出國王所料，1534 年 D·費爾南多王子去世，特蘭科索鎮又回到了國王之手。

在特蘭科索鎮人民反對D·費爾南多王子佔有該鎮的歲月裏，鎮上居住着一個叫貢薩洛·亞內斯·班達拉的鞋匠。他寫了許多著名的短詩。一個宗教性的戲劇裏說他“適合牧羊”。的確，貢薩洛·亞內斯·班達拉是個老粗，但是他潛心攻讀葡萄牙文版的《聖經》，看不懂的段落還請求新基督教徒爲他講解，因而和他們接觸頻繁。他把零七八碎背誦下來的《聖經》、傳統的民間詩、西班牙的神話（他引用的《隱匿者》是一篇關於1520～1522年西班牙人民暴動的傳說）、流傳在民間的預言、阿爾杜爾時期的神話和社會上對達官貴人腐化和肆虐的指責拼湊在一起，寫成了一種預言性的田園詩，反對國王D·若奧三世把特蘭科索鎮賜給其弟D·費爾南多。

但是這個鞋匠是個蹩腳的作家。他使用的詞句聽起來彷彿悅耳中聽，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些詞的確切意思，他把道聽途說的句子，詞藻和比喻堆砌成五音或八音節的詩，但是卻解釋不出它的意思。結果他的小詩可以任人理解，隨便解釋。貢薩洛的詩有許多手抄本在民間流傳，當宗教裁判所開始迫害新基督教徒的時候，這些教徒們認爲在他的詩篇裏讀到了救世主彌賽亞到來的知音。事實上，這些詩是給D·若奧三世的呼吁書，要求他不要用特蘭科索鎮來滿足D·費爾南多王子的慾望。這時宗教裁判所參與此事，把鞋匠當作猶太教的嫌疑分子逮捕。但是他根本不知道猶太人會把他寫的短詩同救世主彌賽亞連在一起。最後，宗教裁判所只好將他釋放，但是宣判他以後不得再寫詩和閱讀世俗讀物。

宗教裁判法官認爲他們的一張判決書就可了結此案，殊不知此案才剛剛開始。

D·塞巴斯蒂昂死得莫名其妙，這件事又很快使鞋匠的詩

篇具有了新的意義。國王是在戰鬥中死亡的，但是沒有人說過曾經親眼目睹他喪命，盡管有許多人見過他的屍體（按照騎士的倫理觀，凡承認看見國王遇難，而又沒有替他去死的人是非常可恥的。這實際上已揭開了沒有人說看見國王死之謎。當時的一份資料，即《貝拉本堂神父的信》，對國王之死做了另外一種解釋：國王的死從未說清楚的原因，是爲了抑制人民的憤怒，使他們想到他還有回來的可能。）在人民中間流傳着一種說法：國王已經從敵人手中逃脫，正在回國途中。據記載，有不少冒險家利用人民盼望國王回來的心理，冒充國王。阿爾科巴薩一個燒陶工人的兒子就是因爲冒充國王而被捕入獄並判處苦役的；亞速爾群島人馬特烏斯·阿爾瓦列斯冒充國王，在埃里塞伊拉和托雷斯維德拉斯兩個地區煽動大批農民起義，結果在里斯本被處以絞刑；爲了掀起一場反對菲利普二世的起義，一個修道士想利用D·塞巴斯蒂昂，爲此他策劃了一場陰謀，在這個陰謀當中馬德里卡爾糕點鋪的老闆扮演了國王的角色。最後一個是意大利冒險家馬可·圖里奧，他甚至說服了一些流亡在國外的葡萄牙貴族參與他的冒險活動，但是最後也被送上了斷頭臺。

從這時起，人們就以另外一種眼光來閱讀鞋匠貢薩洛的預言詩：宣佈要回來的救世主是D·塞巴斯蒂昂。短詩的讀者不僅僅是新基督教徒，一些懷念塞巴斯蒂昂的貴族也津津有味的吟誦鞋匠的詩作。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版本，在編寫方面都賦有新意，以致於1640年的復國都彷彿證實了短詩的預言。鞋匠被視爲民族的預言家，被當成聖人供奉，里斯本的大主教下令把鞋匠的塑像放到全城的祭壇上。D·若奧四世不得不答應說，只要D·塞巴斯蒂昂回來，他立刻把王位交給他。

從這時候起，作爲一種葡萄牙化的猶太教彌賽亞學說，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期。它引導人們相信在國家處於水深火熱的時刻，會有人來拯救他們的，不管他是誰或來自何方。18世紀中葉，亞力山大·德·古斯芒發現了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和彌賽亞學說之間的這種一致性，把葡萄牙人分成了兩大派別：還在盼望彌賽亞(猶太人)的葡萄牙人和繼續盼望D·塞巴斯蒂昂回國的葡萄牙人。有關D·塞巴斯蒂昂的傳說不僅廣爲流傳，而且成了一些荒謬説法的依據，對人們的思想産生過很大影響。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安東尼奥·維埃拉神父。他在鞋匠的短詩裏找到了一種論據，設計了一個大同帝國。在這個宏偉的計劃藍圖裏，他設想把猶太人和基督教徒同時會聚在一所滌除了從前罪過的新的教堂裏；帝國的皇帝就是D·若奥四世，因爲這樣就應了鞋匠的短詩的預言。但是這個預見還没有實現，D·若奥四世就與世長辭了。然而安東尼奥·維埃拉的信念如此執著，甚至從D·若奥四世的死得出結論，D·若奥四世一定會起死回生實現他的預言。盡管宗教裁判所由於種種原因對他百般迫害，這個偉大的傳教士至死不改變自己的信念。

19世紀，由於法國的入侵，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的思潮愈加盛行。1810年，若澤·安東尼奥·達斯·内維斯寫道：“里斯本人多半成了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者。在我編寫這本書的時候，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者還勁頭十足，没有絲毫減退。我認識一個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者，在他家裏，他拿出顯微鏡，讓我看了他繪製在一組貝殼上的畫，全是近來歐洲發生的重大事件。不久前，他們這些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的

人們從阿爾加維得到可靠消息說，那兒隱約看見了一個小島，一支艦隊和一個佈置得十分隆重的碼頭。這支艦隊無疑是護送國王D·塞巴斯蒂昂回國的，這個碼頭肯定是國王登岸的碼頭。在里斯本的聖保羅右街，有人在"貨幣大院"的門口出售這個小島的平面圖。平面圖上繪有島上鬱鬱葱葱的樹林、海濱、王宮、守衛王宮的獅子以及國王穿着朝服在這些獅林間漫步的情景，這些貝殼上還畫有兩個教士看見國王，並同國王談話以及回到大陸後在羅馬宣誓的場面。D·塞巴斯蒂昂一定會離開這個小島，統率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親自迎戰拿破侖，拿破侖必定要在埃武臘附近的塞爾托里奧戰場上死於D·塞巴斯蒂昂之手，從而建立起保卡洛在《盧濟塔尼亞君主制摘要》一書裏所預言的第五帝國。也有人認爲D·塞巴斯蒂昂這位救世者已經回到了國内，而且就隱藏在特茹河上的一艘俄國軍艦上。各處瞭望臺上都擠滿了人群，等待着國王登岸時刻的到來。茹諾爲此大發雷霆，下令驅散人群，說他們等待的不是D·塞巴斯蒂昂，而是英國人。

葡萄牙移民把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帶到了巴西，當地的奴隸和西北部地區的人民很快地接受了這種思潮。由於鎮壓巴西東北部地區的人民運動而激發的"卡奴多人戰爭"(1897年)就是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的最後一幕悲劇。勇士安東尼奧·貢塞列伊洛曾四處遊說，宣稱到19世紀末，D·塞巴斯蒂昂將返回祖國，並把公正理智帶給啼饑號寒的勞苦大衆，因而掀起了一場人民運動。爲了平息這場運動，官方多次派兵鎮壓，數千名腹地的人民慘遭殺戮。

後來，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變成了詩歌中的成分，變成了詩人們爲他們的詩歌增添色彩的調料。詩人費爾南多·

佩索阿和阿里亞諾·蘇阿松納的著作裏都浸透着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思潮，不同點僅在於前者是高雅的，後者是粗獷的。但是作爲一種本能和常態，盼望塞巴斯蒂昂回國主義的思想意識持續的時間比文學創作還要長。"國王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清晨會回來的"，這句話成了今天人們的口頭語。在說這句話時，沒有人是一本正經的。這句話多次用來表達一種無法明狀的思想狀態；相信自己由衷盼望的事情必定會發生，但同時希望它的發生不要我們花費力量，而且又不牽涉到我們的責任。

46 文化：擴張、歐洲化、社會精神的形成與宗教裁判所

1. 文化的擴張

16世紀文化活動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個時期西歐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經歷的主要階段有四個：擴張、歐洲化、社會精神的形成和宗教裁判所的活動。

在整個16世紀，葡萄牙在世界上大肆擴張。15世紀末，葡萄牙船隻抵達的最遙遠的港口是加爾各答；到了16世紀中葉，加爾各答已處在葡萄牙的世界中心。葡萄牙的航海家、傳教士和商人遠至中國和日本，民間的冒險家遍佈太平洋地區各國的王廷；也有跋山涉水前往西藏和安底斯山的。與此同時，15世紀興起的文學藝術運動在16世紀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這個時期作家的數量之大，文學創作之多是我國歷史上盛況空前的。偉大的作家層出不窮，其中有：吉爾·維森特、貝爾納丁·里貝

洛、薩·德·米蘭達、安東尼奧·費列拉、狄奧戈·貝爾納德斯、卡蒙斯、阿戈斯蒂紐·達·庫盧斯修士、托麥·德·耶祖斯修士、費爾南·曼德斯·平托、達米奧·德·戈伊斯、卡斯塔聶達、若奧·德·巴洛斯、伽斯帕爾·科雷拉、狄奧戈·多·科烏多、費爾南·德·奧里維拉、熱羅尼莫·奧佐里奧、若爾熱·費列拉·德·瓦斯貢塞洛斯、杜阿爾特·帕舍科·佩雷拉、佩得羅·努內斯、加西亞·德·奧爾塔。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文學運動中涌現出了幾百名作家，出版了1200多部書籍，這兒列舉的作家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 歐洲楷模

但是這場文學運動的特徵不同於15世紀中葉的文藝復興運動。15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是用快帆船進行發現的時代，而16世紀的文學運動是用三桅帆船運載胡椒的時代。15世紀，在大西洋各島嶼和幾內亞貿易中運回的貨物主要是供應葡萄牙國內市場的需要，偶爾進行的一點國際貿易並没有引起葡萄牙國內經濟狀况的明顯變化。這個時期典型的英雄人物是D·恩里格王子。他在闡述一項軍事計劃的經濟部分時，僅僅説了一句話："基督，我的主，危險和艱難的事業已成過去，我該從哪裏開始呢?"然而到了16世紀，問題恰恰就是該從何處入手，到哪裏去尋找財富。新的英雄就是阿豐索·德·阿布爾克爾克。他善於思索，想出了一套市場戰略，使戰爭爲商業服務，葡萄牙的作用就像提供産品的亞洲世界和消費産品的歐洲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橋梁。當葡萄牙軍官砲擊東方城池的時候，葡萄牙國王的總管正在同西方城市的銀行家坐在一起，向他們索取這些砲擊可能創造出的財富。

葡萄牙與其他國家建立經濟聯係的同時，也與之建立了文化聯係。文化聯係的傑出代表是達米奥・德・戈伊斯。他本是弗朗德勒商行的司庫，爲了洽談金融業務，走遍了北歐各地。在商談業務之余，他曾同麥蘭科頓、路德、伊拉斯謨進行過交談，甚至還請頓列爾給他畫過一張像。另一個代表人物是若奥・巴洛斯。他一方面領導着印度公司這樣一個當時主宰葡萄牙對外貿易的機構，另一方面，又編寫了16世紀的文學鉅著——《亞洲的歲月》。由於葡萄牙和歐洲的交往範圍不斷擴大，也就産生了葡萄牙的文化源於國外的看法。有人認爲，與錢財及所有的工業品一樣，文化也一定可以從國外進口。進口的渠道很多，如派遣葡萄牙的學生到國外的文化中心去學習，由葡萄牙國王選派留學生到國外著名的大學深造，或者聘請外國學者到國内大學任教或給親王授課等。

國外盛行的文學潮流使葡萄牙青年人望眼慾穿。他們贊嘆那些新穎的文體。事實上這種新穎的文體不過是對被人們遺忘了數百年之久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偉大作家維吉爾、賀拉斯、特奥格里多、平達、卡圖洛和阿那克里翁文風的翻版而已。現在人們仰慕的已經不是純正民間風味的五音節或七音節詩、通俗易懂的打油詩和簡單明瞭的諷喻詩。人們把這些詩統統叫做“陳腐的老套”。現在流行的詩不僅有了新的韵脚，而且有了新的格調，如十四行詩、田園詩、挽歌、頌歌、書信體詩和賀婚詩。最初，也有人不喜歡這些新詩體，甚至對它冷嘲熱諷。吉爾・維森特曾經譏諷過彼特拉爾卡的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詩：

我哭泣時

却又放聲大笑

我身燃烈火
却又冷得哆嗦……

但是 30 年之後，卡蒙斯對這首詩卻倍加贊揚，並加以發揮：

“愛情是一團無焰的烈火
是一種無窮無盡的歡樂……”

3. 拉丁語文化

1536 年，在上演了吉爾·維森特最後一部劇作的同時，葡萄牙出版了第一部翻譯的劇作，阿嘎麥農的《復仇記》。它是根據艾烏里拍德斯的譯文譯成葡萄牙文的。10 年之後，國王下令在里斯本大學成立話劇團，但這個劇團已經無法越出校門走向社會去演出，因爲演出使用的是拉丁語，還引用了劇作家德倫西和布拉烏多的大段對白。

對於用拉丁文寫作的作者的文風、對拉丁語的崇拜，以及使表現形式和思想内容拉丁化的主張統稱爲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在意大利曾非常盛行，後來雖然傳到了葡萄牙，但並没有形成一場大規模的運動。葡萄牙也涌現出了幾個純粹的人文學者，如安德列·德·列森德、阿伊列斯·巴爾博扎、狹奥戈·德·特維。但是他們的著作流傳不廣，這一點從他們的著作印刷的數量即可得到證實。同其他國家相比，葡萄牙出版的有關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書籍也微乎其微。統治文化的是葡萄牙化的和用葡萄牙文表達的人文主義。這種影響如此强烈，甚至人們崇敬的葡萄牙語本身也起了變化。在普通人的耳邊，卡蒙斯的葡萄牙語彷彿像外國語一樣在鳴響。費爾南·羅佩斯使用的詞彙和

卡蒙斯使用的詞彙完全不同，幾乎可以說卡蒙斯在拉丁語的基礎上對葡萄牙語進行了革新。不僅詞彙不同，而且句法和句子的語調也都煥然一新。顯然這種變化只局限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因爲從學習第一個字母起他們接觸的就是拉丁文。人文學大師格列那爾多被聘請來給國王的兒子授課，他認爲不用先學葡萄牙語就可以直接教兒童念拉丁文，並且在埃武臘作過這類試驗。人民不懂拉丁文，繼續像先前那樣講葡萄牙語。這樣就產生了同時使用兩種語言的局面，它不僅反映而且加劇了兩個社會階層的分化：有文化和學識淵博的葡萄牙人階層和其餘的葡萄牙人民大衆階層。

有文化素養的葡萄牙人意識到了這種分化，但是他們以此爲榮。人文學者思想意識的構成部分之一，就是鄙視下層人民。他們在繼續使用傳統的鄉土語言來表達文化的人的面前有一種優越感。從這個時候起，文化就起着導致社會階級分化的作用。這種文化是一種以拉丁語爲基礎的文化，要想掌握它就必須長期學習。然而當時的學校趕不上這種變化，唯一的重要改進，就是從16世紀開始開辦了許多耶穌會的學校。這些學校的確壟斷了大學預科的教育。這樣，受教育的階層就和人民日益疏遠，文化成了社會上層人士享有的特權。

4. 宗教裁判所

當葡萄牙跨進歐洲文化界時，歐洲在思想上分成了兩大敵對的營壘：一個是保守、信奉天主教和對教皇唯命是聽的歐洲，另一個是改良的、反對羅馬的和持有不同政見的以手工業界爲代表的歐洲。

這種劇烈矛盾的根源在於社會和經濟狀況的不同，然而其

表現卻是在文化領域內。最初的一次爭端是羅伊希林事件，爭論的焦點是究竟應該把猶太人的書籍全部燒毀呢（因爲它違背天主教的教義）還是應該保留（因爲它對文化有益）。因爲正是通過這些書籍、傳單、甚至歌曲，宗教思想解放的論點才在大學、城鎮、工業中心和最貧困的教士階層中得到了傳播。那些不得溫飽的"短工"和手工業學徒們非常容易接受這些觀點，他們認爲這是翻身解放的出路。路德在德國傳教佈道；從而在兩個歐洲之間掀起了一場公開的論戰。

從地理位置、社會階級、經濟狀況和政治條件來看（D·若奧三世是卡洛斯五世的內弟，而卡洛斯五世又是忠於羅馬的那個歐洲的鉅大政治支柱），葡萄牙在這場衝突中站在西部營壘反對信奉耶穌教的營壘。1534 年，在葡萄牙與法國同時開始了一場鎮壓運動。其實在我國幾乎完全没有理由進行鎮壓，因爲路德異教的影響微乎其微。只有個別對新鮮事物感興趣的教士在思想上受到了一點影響，或者通過一些禁止閱讀的書籍瞭解了一些異教的思想，但路德的異教從未構成對天主教的威脅。因此，在葡萄牙反對宗教改良的鎮壓運動其對象不應是路德異教，而應當是猶太教。

這個問題很現實。許多猶太人被强迫改變信仰，雖然表面上他們也參加基督教的宗教活動，但他們心理上仍舊信奉猶太教。倘若有人改變信仰後照舊參加猶太教的活動，就要按叛教罪論處，或者處以死刑，或者没收其財産。因爲許多猶太人擁有萬貫家産，所以在國家經濟嚴重困難的時期没收叛教者的財産這種措施就十分重要。對秘密信仰猶太教者的鎮壓當時竟成了國家一宗應急收入的措施。

1531 年，D·若奧三世請求教皇批准在葡萄牙成立宗教裁

判所。新基督教徒動員了他們的一切經濟力量進行反對，他們說成立這個機構的目的在於敲詐他們的錢財。關於這場外交鬥爭的史料很多，只要讀一下，你就不得不承認猶太人確實言之有理：没收財産是它的主要目的。

盡管從 1534 年葡萄牙就有了宗教裁判法官，而且在這一年對吉爾·維森特進行了起訴，但是直到 1536 年教皇才下達了成立宗教裁判所的敕書。1541 年第一次實行火刑。從這一年開始到 1684 年，在這 143 年中間，共對 1379 人施以火刑。以後使用火刑的次數雖然有所減少，但這種刑罰一直持續到彭巴爾侯爵時期。大多數被處火刑者，是被人告發的所謂猶太教信徒，但是其中有些人則是因爲從事巫術活動或者幹了傷風敗俗的事。

宗教裁判所採用的刑罰很多，其中火刑影響最大，至今提起它還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有些作法，如揭發檢舉和書籍檢查，雖然不太引人注目，其後果也相當嚴重。

揭發他人違背教義罪是每個基督教徒應盡的義務。在宗教活動十分盛行的時期，則更是如此，宗教義務高於一切。在思想意識上，基督教徒認爲他們必須揭發一切信奉猶太教的人或者不尊重基督教的任何舉止。有的揭發純屬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因爲没有風，船長一時着急，出言傷了某個聖人。也有的檢舉是出於惡意，如嫉妒、報復、吃醋等。但是多數的揭發是出於對上帝的虔誠，並不是可惡的卑劣行徑，而是所謂虔誠的品德。葡萄牙是個基督教國家，所以在這兩個世紀中全國都成了警察。這是我國歷史上警察活動時間最長、活動規模最廣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内，每個人既負有檢舉揭發他人的義務，同時也處在被人揭發的恐怖之中。這就是爲什麼當時案件堆積如山，雖然大量丢失，今天仍保存有兩萬餘件。

當時的書籍檢查包括下列三個方面：

1. 禁止收藏和閱讀的禁書目錄上的書籍，或者宗教裁判所認爲是異端邪説的書籍；凡有這類書籍者，必須將其交出；凡是發現這類書籍者，必須將其上交。焚燒書籍是隆重的火刑儀式的組成部分。

2. 檢查圖書貿易和從外國進口到我國的圖書；書店經常受到檢查，所有的船隻在入境時也都得受檢查。

3. 國内的文學創作都要預先送交宗教裁判所審查。審查批准後方可印刷。檢查官有權修改内容、删去或者改動他認爲不適當的段落。《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第二版就删去了大量的篇幅。

宗教裁判所的規定在葡萄牙得到了一絲不苟的貫徹執行。在我國，一切公共機構組織鬆散，辦事效率低下，唯獨宗教裁判所是個驚人的例外。在 16 世紀的一段時間内和整個 17 世紀，宗教裁判所操縱着葡萄牙的文化活動，使之没有捲入歐洲的思想運動。而這場運動發展迅猛，且具有革新的性質。隨着人文主義時期外國文化廣泛和公開的輸入，盡管宗教裁判所對它嚴加封鎖，也採取了防範措施，一些危險的思想和書籍還是進入了葡萄牙，作家們心中有數，他們清楚在他們和印刷機之間立着宗教裁判所，他們的第一個讀者就是檢查官。風險不值得冒。但事實上冒風險的作家也爲數不多。這樣，文學創作就避開了一切可能惹起麻煩的素材，文化也就變成了空洞無物華麗詞藻的堆砌。文風反映了這種變化，它演變成一種巧妙的花邊文學，思想隱藏在模棱兩可之中，隨時留有辯解的餘地。但是後來的主題主要是些不冒風險的主題，如天使、聖徒傳、訓導和祝賀等等。

這種長期嚴酷的鎮壓運動對葡萄牙人的氣質和國家的發展有哪些影響呢？19世紀的思想家把這種壓制看成是葡萄牙全面走向没落的根源。在一次關於伊比利亞半島人民衰落的原因的著名的報告會上，安德羅·德·肯塔爾曾用"民族的墳墓"一詞來形容這種鎮壓。這種説法未免過於簡單。一百年之前，彭巴爾所説的國家的墳墓是指耶穌會成員的所作所爲，因爲他們是反對這個宗教裁判所帝國的唯一力量。事實上，宗教裁判所是國家衰敗的表現，它繼承了以前各個王朝執行的不允許異教存在的路綫，例如，D·曼努埃爾統治時期的反對猶太人的政策。宗教裁判所的活動之所以没有激起國内的强烈反抗，這是因爲葡萄牙國内没有一個經濟和思想上獨立的中産階級，這種情况也是在宗教裁判所成立之前就已存在的。因此，不能把宗教裁判所視爲國家危機的起源，然而正是這個機構使不能容忍異教的思想合法化和公開化了，這是葡萄牙人氣質上不好的一面。宗教裁判所組織告密活動和摧殘民族文化的活動，並且爲這些活動提供了精神基礎。正是由於宗教裁判所的關係，這種告發異教活動和進行文化滅絶的思想情緒，就像一團尚未完全熄滅的火，只要遇到一點風向變化，就會立即死灰復燃，引起檢舉揭發、思想譴責和判處火刑的烈火。

47　譜寫史詩的雄心及其變化

航海活動的發現使葡萄牙這樣一個小國變成了世界性的國家，因爲葡萄牙人的活動開始以整個世界爲舞臺："地球上到處都有他們的聲音，甚至天涯海角也能聽到他們的語言。"（達米奥·德·戈伊斯）這種變化在思想和美學方面也得到了反映。一

些文人對國家的看法起了根本的變化。15世紀中葉，費爾南·羅佩斯筆下的葡萄牙不過是一小片貧瘠的土地上居住着的一群堅强的人。爲了不致陷入富强鄰國的統治，他們時刻都在進行着頑强的鬥爭。但是一百年後，國家完全變了樣："從直布羅陀到中國"，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由於我們的努力，人人都通曉了基督的法律"（戈伊斯）。卡蒙斯用最雄辯的語言把這種譜寫史詩的雄心公諸於世，但是從歷史的年代來看，他遠非始祖。因爲祖拉拉的著作中早已充滿了譜寫史詩的思想；當D·曼努埃爾把渾天儀定爲國徽時，他就非常强調地指出，葡萄牙這個君主國家很可能具有全球的性質。

卡蒙斯在印度度過了許多個春秋之後，於1572年在里斯本發表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從形式來看，它是一部古典格式的史詩，因而是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模做。這個時期在歐洲還出版了其他許多部史詩，但是這部葡萄牙史詩與衆不同。它有一個驚人的獨創，素材不是古代的東西，而是葡萄牙自身的歷史。書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主觀想象的，也不是希臘和羅馬的，而是真實的人，是些葡萄牙人。詩裏歌頌的不是古羅馬的凱撒皇帝，而是阿豐索·恩里格斯，稱贊的不是特洛伊王公艾奈亞斯，而是瓦斯科·達·伽馬。的確，葡萄牙的英雄出類拔萃，同他們相比，亞力山大和特拉亞諾也黯然失色。因此，"繆斯女神請不要老調重彈，因爲更加偉大的樂篇已經出現。"這個更加偉大的樂篇就是指葡萄牙。聆聽了卡蒙斯的史詩後，葡萄牙國王需要做出這樣的選擇：最美好的究竟是作這個世界的國王還是作這些人民的國王。這種誇張的含義自始至終浸透於《盧濟塔尼亞之歌》的字裏行間。

《盧濟塔尼亞之歌》的出版，立即獲得了鉅大的成功；有

文學造詣的葡萄牙人通過這部詩作能瞭解到葡萄牙的基本特徵。它對葡萄牙刻畫得如此深刻和迷人，這是其他任何著作都無法比擬的。然而對葡萄牙持贊頌態度的不只是卡蒙斯。除了少數幾位不屬於古典派的文化人物，如《遊記》的作者費爾南·曼德斯·平托和《印度的神話》的作者伽斯帕爾·科雷亞之外，其他所有歷史學家唱的也都是史詩的調子。不僅歷史學家如此，這種思想也激勵着科學家，如加西亞·德·奧爾塔，他贊嘆說從葡萄牙人那兒一天學到的知識比從羅馬人那兒一百年學到的東西還要多；語法學家介紹說葡萄牙語是一種具有全球性用途的新拉丁語，它是統一宗教世界的工具。費爾南·德·奧里維拉寫道："我們最好去教育幾內亞而不必接受羅馬的教育"。葡萄牙人遍及世界各地，"他們到處搖旗吶喊，攻城略地，征服了許多連常勝將軍亞力山大和著名的大力士赫爾克里斯都無力到達的國度。葡萄牙人發現了新的星座，在從來沒有人到過的海域和陌生的氣候環境中航行，發現了以前地理學家從未揭示過的奧秘。在今天已被發現的土地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貢獻能與葡萄牙人比肩"（阿馬多爾·阿拉伊斯）。

這種譜寫史詩的意識是我國修辭學的最持久的成分之一。雖然産生這種意識的原因已成爲過去，但是這種精神狀態卻依然存在。到了17世紀，卡蒙斯死後，這種史詩已變得誇誇其談、空洞無物。在17世紀，曾有無數的外國游客來我國旅行，我們從他們那裏發現了一種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對葡萄牙人仍然自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勇敢和最光榮的人感到震驚。葡萄牙人的這種自信心貫穿在菲利普統治時期的許多具有反抗精神的文學作品中。在1631年出版的一本書裏，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推理：西班牙人戰勝了其他民族。然而，歷史證明我們戰勝

了西班牙人。因此，我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就在這個時期，羅佩·德·維加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精彩的漫畫：

我是最偉大的人，
把世界踩在脚下！
我財大氣粗，
擁有無限的權勢；
我是權杖、王冠和王位，
能使大地和海洋顫抖！
我的威名遠揚，
家喻户曉，
歸根結底，
我就是葡萄牙，
我比整個世界都大！

但是由於一系列事實的壓力，譜寫史詩的思想開始崩裂。雖然表面上仍舊保持這種思想狀態，但是不信任和懷疑的冷風已經刮起。在無名氏的著作《剽竊的藝術》(寫於 1648 年之後，但在 1656 年之前）裏，作者想象了一個國務會議。會上討論的焦點是海外問題。有一個國務委員非常現實，提議放棄幾個海外省，因爲葡萄牙已經無力支撑這種局面。但是會議主席打斷他的發言，質問這個國務委員是不是喝醉了，並且提醒他當心，青年人一旦知道他要“把我們祖先用鮮血贏得的東西送還給敵人”是會向他投擲石塊的。最後主席下令把這位委員投入了里摩埃伊洛的大牢。

由於模倣國外派的抨擊，譜寫史詩的思想終於土崩瓦解了。

葡萄牙的落後、貧困、愚昧如此嚴重，以致我們再無力在世界上獨佔鰲頭。D·路易斯·達·庫尼亞認爲葡萄牙已經不再是一個從阿爾加維直到日本的帝國，而只是一片亂石山丘，在山丘盡頭的平原上生活着的人民與災難深重的巴西印第安人相差無幾。模倣外國派批評的語調雖然有些令人傷感，但是從這些批評當中應該悟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重建國家。至於振興國家的方法，重商主義者主張通過勞動，開明教派主張通過文化。16世紀的譜寫史詩的意識蛻變成17世紀的誇誇其談；而18世紀的這種批評精神又演變成頹廢主義。這種頹廢主義又從埃爾庫蘭諾傳到70年代派，并且很快侵蝕到下一代的虛無主義的失敗主義中："……一代落後、懷疑、不相信自己和不信任國家的青年，他們無視國家的傳統，冷嘲熱諷國家的制度，抱怨國家缺這少那，但是他們並不努力爲國家創造任何財富。這一代青年憎恨生育自己的土地、使用的語言和所受的教育。他們像卧在窩内的貓頭鷹，整天板着面孔，滿臉愠色。的確，這代青年把祖國和祖國的氣概拋到了九霄雲外，他們好像是裝在大木箱裏由勒阿弗爾的郵船從法國進口到葡萄牙的。"（埃薩：《當代評論》）

這是一種文學的宿命論，是資産階級的自我封閉，他們認爲思想的來源就是思想而不是現實。在自由主義時期，葡萄牙帝國得到了重生，資産階級的國家進步了，資産階級對這種進步感到驕傲。所以當安東尼奧·諾布列哀嘆："唉，我的朋友，生在葡萄牙是多麼不幸！"時，譜寫史詩的呼聲又重新響徹大地。擁護共和政體的人們高呼：

祖國呀，

在朦朧的記憶裏，
回蕩着你傑出先輩的聲音，
定會把你引向勝利。

隨着制度的改變，曼努埃爾時期的渾天儀標誌被定爲國徽。20世紀葡萄牙的文學鉅匠費爾南多·佩索阿沉湎往事，他的著作重新表現了譜寫史詩的意識："讓我們再次遠征，但願海洋及其他一切都屬於我們。"

48 香料貿易的盈虧

"香料"一詞來自拉丁語，是醫生用來表示"物質"的。後來，這個詞有了新的含義，用它來表示價格極其昂貴、經常用來作藥材和化妝品的物質。當時最重要的香料是胡椒，因爲它是稀有的東西。和今天一樣，人們用它作佐料，不同的是在那時離開它無法生活。夏初，農村裏缺乏飼料，必須宰殺掉大批的牛羊，肉必須用鹽腌製、用烟烤或靠太陽曬乾後才能保存。儲藏魚也得用這套辦法。這些簡單的加工方法之所以能夠保持肉食不壞，是因爲采用了胡椒防腐的緣故。從這裏可以看出胡椒的重要性和它在中世紀貿易中的作用。加工肉類用的香料還有很多，如肉豆蔻、肉桂、石竹花、生薑等。日常生活和工業中還使用其他一些香料，如松脂，阿拉伯膠、火漆等。藍靛、巴西木、鬱金草是印染工人配製染料的重要成份。芳香撲鼻的香料也用來配製化妝品。以阿拉伯人處方爲基礎的醫學大量採用東方的藥草和藥料，如檀香、蘆薈、鴉片、樟腦等都是醫生處方裏常見的藥材。在16世紀的科學文獻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是葡萄牙醫生加西亞・德・奧爾塔在印度編寫的《印度的藥用植物、藥材及醫學講座》。

隨着歐洲各大都市居民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料消費的數量日益上昇。由於產香料的國家相距遙遠，因而香料變得十分昂貴。威尼斯和熱那亞靠經營香料貿易發了橫財，東方的香料通過波斯灣和紅海這條千年航道運到意大利，然後再分散到歐洲各地。

葡萄牙的計劃也是用船把香料從印度直接運到里斯本，避免來往於印度和意大利之間靠販運爲生的中間商人的盤剝，使這些香料以最低廉的價格投放歐洲市場。在歐洲，香料的價格十分昂貴，和在印度的價格相差極其懸殊。瓦斯科・達・伽馬第一次率領船隊到達印度，返航時帶回了少量的香料，其價值是船隊費用的 60 倍。

自然，在印度必須花錢買香料，不掏錢是不能把香料裝上船的。在印度這片廣闊的土地上葡萄牙没有建立起政治上的統治，雖然我們佔有那裏的出產。葡萄牙有的只是幾個陸軍和海軍基地以及一個重要的行政管理基地——果阿，但是印度國土上遍布着無數大小州郡。葡萄牙曾努力使這些州郡成爲葡萄牙的盟友（幾乎所有的州郡都願意繼續通過阿拉伯商人進行出口），葡萄牙自己在那裏打了許多場戰爭，也幫助他們打贏了許多仗，但是這些戰爭的目的不是爲了從政治上控制他們，而是爲了通商，爲了貿易控制，爲了使他們的香料只賣給葡萄牙，而不賣給阿拉伯人。

購買香料的付款方式，大部分是現金交易，但是也有以物易物。歐洲雖然不產香料，但卻有大量的其他出產。如銅、鉛、水銀和布匹。這些東西在印度是稀罕貴重之物。當時的一張運

貨單上填寫的布匹有：熱那亞的平絨、佛羅倫薩的緋布、倫敦的棉布，以及荷蘭的亞麻布。

因爲葡萄牙國内不生産這些布匹，所以通常都得在外國購買。買時先賒欠，等到葡萄牙的船隊運回香料時再付款。爲此，葡萄牙在安特衛普開設了一個商行，也就是一個負責購買布匹和處理葡萄牙同整個北歐貿易關係的貿易機構。當時貸款的利息比今天要高得多，因爲錢的數量少，而且風險大。借出的錢四年内就增加一倍，也就是説年利率爲 25%。短期内一般是償還不了貸款的，所以債務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 1524 年，即第一次航行的 25 年之後，已經欠下 300 萬克魯扎多，這個數字略小於三年間販運貨物的價值。

每年復活節期間，船隊離開特茹河起程，抵達印度後，卸下途經弗朗德勒時裝載的貨物，然後裝上葡萄牙商行事先買好的香料。裝船的胡椒平均價格爲每 1 金塔爾（約合 51 公斤）約 3 個克魯扎多。加上旅途的開銷、在印度和在里斯本貯存的管理費、海上運輸費以及貨物在船上的損耗，估計運到特茹河後每 1 金塔爾價值 17 個克魯扎多。然後，以每 1 金塔爾 33 個克魯扎多的價格由印度公司批發出售。爲了滿足海上運輸的需要，每次必須大宗進口，平均每年約進口 4 萬金塔爾，即 200 萬公斤。盡管如此，經營的赤字仍然逐年增加。

在安特衛普購買的貨物價格大幅度上漲，而進口的數量也同時增加。同印度的貿易使許多人發了財，因此香料的消費量不斷上昇。爲了滿足消費的需要，什麼東西都得進口。有資料記載説，不僅進口那些需要運到印度去换胡椒的貨物，而且還得進口許多留在里斯本使用的物品。如武器、服裝、家具、紙張、藝術品、地毯、糧食、馬匹、車輛、船隻及造船的器材、木

材、貼面石、書籍、裘皮、香水及其他由於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需要進口的各種物品。甚至有的資料說鷄蛋也要從外國進口。在1526年上演的一部諷刺劇裏，吉爾·維森特譏諷當時的時局，說生肉從大不列顛進口，白菜從比斯開進口。在壟斷東方貿易的一百年間，葡萄牙没有進口任何新的工業產品，即便是進口了東方的藥材，它也没有引起貿易活動的變化，進口的貨物與前個時代没有多大差別。16世紀結束時，葡萄牙的工業生產與13世紀相差無幾，仍然是鐵匠鋪、瓦窰、土布紡織、製鞋、做馬具、紡蔴、造船等。這些生產還只是農村生活和城鎮生活的補充，城市人民需要消費的其他許多東西，還得依賴進口。

由於大量的香料充斥歐洲市場，其價格逐漸開始下跌，開頭幾年内，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因此受到嚴重損失，但是後來他們又重整旗鼓。歐洲開始在意大利的胡椒和里斯本的胡椒之間進行選擇，於是一場商業戰爭開始了。爲了推銷自己的香料，意大利人說他們的貨比葡萄牙的好，因爲在海上的長途運輸過程中我們的胡椒變質了。爲此，達米奥·德·戈伊斯寫了一本小册子，駁斥一個熱那亞人在莫斯科王宫對我國的攻擊。盡管他的回擊言詞有力，但是由於包裝不好，胡椒在船艙裏霉爛的事情的確是存在的。

由於古老的陸路重新啓用，葡萄牙的困難更加嚴重了，收入已經開始不能彌補支出，國王不得不借内債以減小赤字。爲此，發放了國庫債券，1528年規定的息利爲6.25%。就用這筆錢來支付年利率爲25%的外債利息。到16世紀中葉，内債比外債多了四倍。盡管如此，内債的利息只有10萬克魯扎多，而我們所欠外債利息達40萬克魯扎多。國内的全部積蓄通過這樣的渠道流到了國外，東方貿易反而使國家變得日益貧困。

除了經濟上的損失外，還有人的損失。

購買胡椒不僅要付出黄金，而且還要作出人的犧牲。三桅帆船從特茹河起錨時，船上的裝載主要是人，但帆船離開印度返航時，船上裝的則主要是香料。不少人在旅途中死去，也有人留在東方不再返回葡萄牙。裝運香料的蔴袋代替了人的重量，填補了他們佔有的地盤。海上航行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狄奥戈·多·科烏多説過，有4000人同他一道登上了開往印度的航船，而下船時幸存者不過2000人。16世紀一個叫皮拉爾德·德·拉瓦爾的法國人説，從特茹河起程時船上有1000～1200人，活着到達果阿的只有200人。除了路上的死亡外，在印度停留期間還有不少人死掉，因爲印度的氣候惡劣，葡萄牙人難以適應。回程雖然時間不長，疾病發生也不多，但是因爲必須在多風暴的季節渡過印度洋，所以帆船經常遇難，也造成了不少的死亡。

49　擴張的社會影響

吉爾·維森特對擴張所造成的社會後果闡述得如此精辟透徹，没有任何一個作家可以與之倫比。這種説法之所以在今天還會引起一些人的驚訝，是因爲原來我們只知道吉爾·維森特是位詼諧 的喜劇家，從未把他看成是大無畏的社會思想家。他在《騙術之林》一書的序言（此文不知何故未曾引起人們的重視）裏，爲我們留下了一幅自畫像。這不是一幅嘻嘻哈哈的喜劇家的自畫像，而是一幅其思想受到同代人的迫害、言論遭到無知的同代人鄙棄的一個哲學家的自畫像。

1533年，吉爾·維森特的劇本《受害者的朝聖》在埃武臘

上演。劇本所指是一群對自己生活的時代不滿的人舉行的一次游行。劇本分析了自發現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35年來引起葡萄牙社會動蕩不安的矛盾和衝突。直到今天爲止，這部劇作仍然是一部對16世紀中葉葡萄牙社會剖析最深刻的文獻。

遊行從弗列伊·帕蘇面前通過，是他主持這次遊行的。他是弗列伊（修士的諧音——譯者），因爲他屬於教堂，他是帕蘇（王宮的諧音——譯者），因爲他屬於政府，兩種身份混於一體："王宮成了變形的修道院，結果什麼也不是。"由於大貴族深居簡出，不再揮動干戈，興兵打仗，這個階級便自行消失了，而教會的政治影響則日益强大，宗教的權力和政府的權力融爲一體。在這個劇本上演的前幾個月，D·若奧三世成立了信念和教會聯席會議，"有關國王信念"這樣的大事，也就是有關國家管理的棘手問題，都由聯席會議來決定。聯席會議的領導權掌握在高級教士手裏。

劇中人物一對一對地出場，每一對象徵一個社會階級。第一對出場的是農村無産階級：一個農民和他的兒子。他們的形象凄苦，不像19世紀的農民那樣笑容滿面。農民没有取名"小老百姓"，而取名"死去的若奥"。兒子名叫塞巴斯蒂昂，是位先烈的名字。吉爾·維森特把死的概念同農民的生存聯係在一起："手扶犁耙幹活的人像死人似地生活"；"我們的生命是他人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卻死亡了"；"倘若誕生只是一刹那的事，那麼爲什麼我的死亡卻是如此地持久漫長？"農村的無産階級是個在死亡綫上掙紮的社會階級。1521年，一場可怕的饑餓席捲了葡萄牙。農村土地荒蕪，農民們離鄉背井逃往里斯本，結果許多人餓死在途中。在中世紀，肉類是葡萄牙人的主要食品，但這時成了罕見稀有之物。1580年，有兩個在葡萄牙旅游的外國

人對葡萄牙人食品的匱乏感到震驚，因爲人民只能吃到咸沙丁魚和黑面包，海外的財富到不了農村，然而海外貿易造成的惡果卻得由農村承受。不管是教會的地主還是貴族地主都對農民施加壓力，要求從土地上拿到更多的收益。然而由於缺乏肥料和勞動力的外流，土地的産量一天比一天減少。勞動力外流的因素有兩個方面：勞動者不甘心忍受貧困，仰慕城市裏的財富。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已不可能，因爲像耕田這一類的活計可以由黑奴承擔了。1541年，達米奧·德·戈伊斯作了統計，每年大約有一萬到一萬二千個非洲奴隸進入葡萄牙。正是由於黑奴的擁入，才使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死去的若奧”在舞臺上訴説：“除非倒下，我不能停止幹活！”“我窮得像條狗！”他只有一個希望了：但願兒子能生活得好一點，因此他想把他送進教堂。這並不説明他篤信宗教，而是在教會，兒子可生活得舒適一些，可是連這個目的也未達到，因爲弗列伊·帕蘇對這個小夥子進行了一番考試，不允許他通過。

這個農民抱的希冀是當時時代的特徵。入教是擺脱或者避免貧困的道路之一。農民的子女、貴族的除了長子以外的子女，或者因爲備不起嫁妝而無法結婚的女兒，都紛紛投奔教會。人民總結出了一條經驗：“誰想發迹，誰就得信教，進宮或遷居。”因此，入教是三條生路之一。選擇的餘地只有入教、服侍王室或者與王室沾親帶故的貴族，或者飄洋過海。這種現象使16世紀期間教徒的人數急劇增加，教堂林立，修道院由200個增加到400個。教會並没有分得海外發現帶來的財富，它還是主要依靠土地的收入維持生活。教會不直接經營土地，但是收取土地收獲的十分之一（此項規定立於13世紀，當時規定‘奉獻上帝十分之一’是教會用來彌補生活費用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的一種形式）同時接受小土地租賃者和長期租賃土地者的地租，他們是農村中的中產階級。

劇中，自耕農阿帕里西阿奈斯同其女兒一同上場，他們披露了農村中產階級的破產："但是我夾在中間，生活更加困難。"他之所以夾在中間，是因爲葡萄牙的農村社會分爲三個階層：地主、自耕農和僱農。地主在收取地租方面表現得越來越苛刻，僱農紛紛離開農村，所以自耕農越來越窮。阿帕里西阿奈斯訴苦說，他從修道院租種了兩塊土地。一場風暴毀壞了莊稼，他登門懇求修士允許他緩交地租，但是遭到拒絕。修士强迫他無論如何也得按期交租。結果拿了他的家產作抵押，甚至連條牀單都不肯放過。自耕農阿帕里西阿奈斯懷念昔日不知疲倦地勞動，對自己的耕牛唱歌的歡快情景。對於唱歌現在是索然無味了，因爲生活窘困，而"貧窮和歡樂是不能睡在一張牀上的"。

農村中產階級破產的直接原因，是國內的生活條件有了新的變化，並非完全是由於地主收租的苛刻和勞動力的外流造成的。大的農場和小塊的夫妻田逐漸從自耕農手裏轉到了從印度回來的貴族、官吏和冒險家的手裏，因爲這些人把土地看成是唯一的投資場所。葡萄牙人認爲土地是萬無一失的財產，最安全可靠。一個貴族在自己寫的一首短詩裏說："人們這麼說，我也這麼想，土地是安全的投資場。"他認爲經營畜牧業是危險的，這種思想進而擴大到各種各樣的要冒風險的事業上來。1608年有篇文章說，在國家處於危機的時刻，一棵橄欖樹和一寸土地都是最後的藏身之地。"一幫人統治着這個王國，人們得不到安寧，我預言，國家將面臨一場鉅大的劫難，到時候，誰能抱住一株橄欖樹誰就是幸運者！"

但是這些貴族、官吏和冒險家從印度回來買下這些土地的

時候，這棵橄欖樹就長在那裏了，而面包、葡萄酒和橄欖油卻并不因爲物主的變更，或者從前由平民自耕農經營而現在由從事肉桂或胡椒貿易發了財的地主經營就有所增加。這些從城市來的地主打算以後依靠田產生活。這樣，掌握在中產階級手中的土地數量就逐漸減少。新的地主是些“老爺”，但是其中許多人並非世襲，而是要求别人稱他“老爺”，或者擺出一副老爺的架勢。古老的葡萄牙農村社會是以官職爲基礎劃分等級的，現在這個基礎被表面排場和稱呼取代了。一方面是老爺和太太，另一方面是農夫和農婦。所謂農夫指的是農業勞動者，“太太”是農村婦女爲之奮鬥的目標。但是手拿鋤頭的農婦是無法逾越這個社會界綫的。只有在城市裏才能拿到這種通行證。自耕農阿帕里西阿奈斯對此一清二楚。與農民希望自己成爲教士一樣，他盼望自己的女兒有朝一日作個貴夫人：

你來自洛烏扎山下，
姑娘你遐邇聞名。
我帶你來就是要你成爲貴婦，
希望你成爲宫廷的侍從。

爲此，阿帕里西阿奈斯給女兒買了從熱那亞進口的香水，並且讓她跟弗列伊·帕蘇學習墮落的門道，女兒很快就學會了這一套。16 世紀，許多婦女都是通過這樣的途徑當上了“貴婦人”，在里斯本經營皮肉生涯。卡蒙斯稱她們是租賃的貴婦。

城市中產階級的破產，劇本中是通過兩個特徵截然相反的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來表現的。今天這兩個社會集團仍然混在一起，統稱中產階級。然而其中一個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因爲

它以勞動爲基礎，社會地位也符合其經濟地位，另一個是假的，是寄生的中產階級，它的基礎是講究排場，是依靠生產者階級的勞動而生存的。吉爾·維森特把這兩個群體分開，闡述了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他的一大發現。

在里斯本，有兩個靠賣蔬菜謀生的女菜販，身邊只有一個待出嫁的侄女。她們爲了侄女嫁妝積攢了一千雷伊斯，因此也算得上是殷實人家了。有了這些錢，侄女盼望通過婚姻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當時各個階級都想沿着金字塔一層一層地向上攀登是時代的特點之一。有一天，一個小夥子登門求親。他自我介紹說在王宮做事，並且出示了他的養子身份和享有附加繼承權的證書，這是可以優先被任命和提拔的證據。面對這些重要的證件，加上小夥子的文雅和堂堂的儀表，兩人立即結爲夫妻。事後發現這些證件全是僞造的。小夥子是個無家可歸、一心想靠妻子的金錢過活的流浪漢。這個青年就屬於假的中產階級。他們像蘑菇一樣，依靠真正的中產階級生活，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懶惰、吝嗇、職業上見異思遷、搖尾乞憐於富豪、卑躬屈膝於權貴。數千名青年從全國各地涌入首都，有的演唱民間小調，有的彈奏吉它，有的裝扮成武士的侍從，在沒有被饑餓奪去生命之前，他們總是想找到一個僱傭他們勞動的主人，或者能夠養活他們的闊太太。諷刺這類貴族的倣效者的詩篇很多，但是沒有一篇提到了勞動。一個從布拉邦特來的教士這時正在埃武臘，因爲在布拉邦特，人們把勞動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對在葡萄牙的所見所聞感到驚訝。這個教士寫道："這些人寧肯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也不願意學點技術"。但是這種現象與發現時期帶來的財富也有關係。轉眼之間國家富裕起來，國家的官吏大量增加，宮廷的人員由D·若奥二世時期的二百人

增加到D·曼努埃爾時代的四千人。在高官名爵家裏,僕從增加的幅度也大致如此。誰有本事,誰無顧忌,誰有後臺,誰就不必幹活,因而誰幹活就意味着誰没有本事,没有辦法。幹苦力活是黑人或者摩爾人的事。“幹活對黑人很好”,“誰没有靠山就得像 摩爾人那樣賣命”,這些詞句就是這一時期進入葡萄牙語中去的。

新的國家機構是産生這種寄生思想的根源。吉爾·維森特精辟地指出了這種情况。劇 中有一幕實在扣人心弦:出席觀看演出的王室的所有高級官吏都被懷疑犯有僞造貨幣罪,後來,終於真相大白,原來僞造貨幣的正是弗列伊·帕蘇本人。爲這種好逸惡勞的、依賴他人勞動而生活的階級提供土壤的,也正是這種腐敗的制度。

吉爾·維森特對社會的剖析還有其他許多方面,如貴族階級雖有萬貫家産,但庸庸碌碌,對社會没有多少貢獻,每天只會吟風弄月和向朝廷施加壓力,以期增加本來已經相當可觀的收入;教會則覬覦馬德拉和亞速爾群島的新主教轄區;修女們面對這個人人埋怨自己命運的混亂時代嘆息不已。除了一些細節之外,必須抓住總的思想,因爲這種思想反映了擴張在經濟方面造成的社會後果:窮國中的富國,富國來自國外的財富壓斷了國内勞動者的脊梁骨,促使了一個不從事任何勞動的虚假的中産階級的生長。這個階級像脊背上的大贅瘤,靠吸取國家機體上其他部分的養料越長越大。同時,又把重量壓在唯一的生産者階級農民身上。使其日益貧困。

吉爾·維森特的生活經歷就是他所描寫的這種變化過程的最好例證。他原來是個平民百姓,以手工匠人爲職業。後來被王宫的營生所吸引,16 世紀初開始爲孀婦王后做金銀首飾。王

宮擴大，整日沉浸在歌聲舞會之中。爲了尋歡作樂又想觀賞劇目。於是這個手工匠人撂下手裏的工具，成了官員。他領取薪俸編寫"國王的劇目"，成了一名靠領取俸祿生活的文化人。從這時候起，他的生活反映了另外一種變化：文化的變化。他應用的語言通俗易懂、不落俗套、妙趣橫生。吉爾・維森特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毫無顧忌。在D・曼努埃爾統治時期，國王和整個王室都愛看他編的劇，并且發出滿意的笑聲。但是到了下一朝代，就有人開始不滿意他編的劇了。面對着舞臺上的放肆，神學家們緊鎖眉頭。於是國王若奧三世請求羅馬在葡萄牙建立宗教裁判所，理由之一就是路德的異端邪說已經波及到了葡萄牙。就在這一年，葡萄牙駐羅馬大使當着教皇特使的面，吩咐在安特衛普上演吉爾・維森特編寫的最爲大膽放肆的一部劇作，主題是關於赦免罪過中的交易的醜聞。在場的羅馬神學家大發雷霆，並且告到教皇那兒，他們告贏了。吉爾・維森特遭到審訊，被判刑兩年，1536年才又回到王宮。一個没有言論自由的思想家的自畫像就是他在最後一場演出中給我們留下的財富。宗教裁判所從1536年開始在葡萄牙行使權力，從此人們也就不再提起吉爾・維森特了。

1580～1668年

菲利普統治及光復運動

50　菲利普綱領

取得軍事勝利之後，菲利普二世來到葡萄牙，並於1581年4月在托馬爾召開的議會上被擁立爲葡萄牙國王。在這次會議上，新國王確立了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一綱領基本上是根據他同葡萄牙大主教（兼）國王的密談中所做的承諾而制定的）。國王在葡萄牙應該遵守這個綱領。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下列幾項：

1. 國王應尊重葡萄牙君主制的自由、特權及傳統的風俗習慣，不得改變；

2. 議會制定有關葡萄牙事務的法律時必須在葡萄牙召開會議，葡萄牙的現行法律繼續有效。所有涉及葡萄牙行政及財

政問題的決定亦應在葡萄牙作出；

3. 葡萄牙副國王或總督之職務應委派葡萄牙人或王室成員擔任；

4. 宮廷、行政、司法、財政及軍隊應因循舊的編制，所有這些機構中的職務均應由葡萄牙人擔任，同時，葡萄牙的主教以及教會中的其它職務亦應從葡萄牙人中挑選；

5. 葡萄牙人可以受命在西班牙擔任公職；

6. 在印度和幾內亞的貿易只能由葡萄牙人進行。西、葡二國邊境上各種賦稅應予取消，妨礙兩國商品流通的種種限制應予排除。為保護來自印度的船隊免遭海盜襲擊，菲利普二世所轄其它國家的海軍在必要時應提供援助；

7. 葡萄牙的城市和村鎮官員之任命、現有封號及王室權利之分配，只能給予葡萄牙人。如有空缺，國王應保證不將這些市鎮收歸王室財產，而交給新受封的葡萄牙人；

8. 貴族凡年滿 12 歲者即可享有補貼金，即由國家支付俸祿。每年新發放的補貼名額為二百名。王后的侍從只能從葡萄牙的貴族仕女中挑選；

9. 當國王不在葡萄牙居住時，應成立一個由葡萄牙人組成的專門機構跟隨國王，國王通過該機構處理有關葡萄牙事務；

10. 官方行文中使用的語言仍為葡萄牙文，貨幣仍保持葡萄牙圖案。

總之，葡萄牙新的政治綱領旨在解決兩個根本問題：一是滿足上層階級的要求，保護他們在這場改朝換代的嚴重危機中不受損害；二是保證葡萄牙行政自治，使君權的統一同國家政務分開管理，不致抵觸。

在菲利普二世（按葡萄牙的國王順序應為菲利普一世）統

治的整個時期，這些規定都受到尊重。貴族、教士、船商及有產者没有理由爲他們向異國效勞而感到懊悔。反西班牙的情緒只停留在知識界一些文人的筆端，而在人民的心底裏這種情緒只是化爲對過去的默默的懷念。1589 年，當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在英國的重兵支持下返回葡萄牙時並未贏得葡萄牙人民的任何響應。他帶來的外國軍隊在皮尼希島登陸並一直挺進到里斯本近郊，但里斯本全城嚴陣以待，英軍無力對該城進行長期圍困，只好撤回。“皮尼希之友”這句口頭禪是這次不光彩的復辟企圖在我國語言上留下的痕迹。

51 無敵艦隊

將葡萄牙及其領地併入菲利普二世的版圖，標誌着 16 世紀西班牙海上勢力達到了高峰。用當時一位修辭學家的話來説，就是：海洋是西班牙國王草履上的綠寶石，太陽是他皇冠上的一塊黄玉。但是他這種霸佔海洋的行徑遇到了障礙，這就是實力不斷增長的英國海軍。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船隊不斷遭到英國海盜的襲擊，其中德雷克（弗朗西斯科・德雷克，英國海軍上將——譯者）的戰績尤爲顯著。1580 年，德雷克環繞地球一週返回英國，帶回了大批珍寶。英國女王伊莎貝爾一方面接受了西班牙憤怒的抗議，同時也接受了德雷克從掠奪來的財寶中奉獻給她的那一部分。因爲在英國雖然人們稱海盜爲商業冒險家，但他們所進行的戰爭卻得到英國王室的支持。

宗教問題加劇了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對立。菲利普是天主教事業的政治首領。他支持在英國旨在扶持瑪利亞・斯圖亞特復辟的陰謀，但英國的伊莎貝爾卻全力支持基督教和西班牙的

敵人。

處決瑪利亞・斯圖亞特是導致兩國公開交戰的直接原因。菲利普二世決定征服英國，並爲此裝備了一支龐大的海軍。這支遠征艦隊的船隻就集中在特茹河口，其中包括 31 艘葡萄牙的高幫船隻。這次遠征以這支無敵艦隊在芒什海峽幾乎全軍覆没而告結束。出征時的 200 艘艦船只有 53 艘得以返航。這是西班牙聯邦給我們帶來的第一次災難，在葡萄牙引起了鉅大的反響。

52 穩定與解體

菲利普統治分爲兩個時期：1580 年至 1620 年，1620 年至王朝光復。

第一個時期的特點是政治上安定（決策中心設在國外對此起了極大的作用）；改組了管理機構和改善了經濟狀況。經濟狀況的好轉對於貴族和商人極爲有利。過去王室的費用、公主婚嫁時的饋贈，以及各種特别費用，是造成收支嚴重不平衡的直接原因。現在，這些開支大大減少。馬德里多次負擔了軍費開支，特别是在東方貿易中海軍護航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新建或重新修建了一批重要教堂，其中包括：里斯本的聖羅克和聖維森特教堂；科英布拉的塞偌瓦教堂、主教宮、聖本托教堂和聖佛朗西斯科教堂，以及波爾圖的皮拉爾山修道院等等。

然而，平民階級的處境卻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農村的情況更爲嚴重。從 17 世紀初開始，許多貴族相繼到農村定居，他們在那裏修建或改建了他們的别墅，這就是所謂的“鄉村宮廷”的時代。這一變化使農村的土地主的收入猛增，但是農民卻越來越艱難了。美洲玉米的引進，爲靠鋤頭開墾小片土地的

耕種者提供了方便，使貧窮的農民有了生計。但是在這個世紀中，人口外流的情況相當嚴重，尤其是向巴西和西班牙移民。

這種經濟上的相對繁榮的局面到了菲利普三世時便停滯了。西班牙的經濟形勢開始惡化，美洲銀礦已經枯竭，長期的戰爭耗費了國家的全部財力。1605 年，驅逐“摩爾人”(征服格拉納達王國後，留在西班牙的摩爾人的後裔）之舉使西班牙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手工藝匠人和小農業主。菲利普四世上臺時，西班牙已危機四起。這種形勢也波及到葡萄牙。這時，英、法加强了對葡萄牙海外領地的進攻，波斯人在英國的支持下，於 1623 年佔領了霍爾木兹海峽。同年，荷蘭人佔領了巴依亞的聖薩爾瓦多——當時是巴西的首府，兩年之後才被葡、西海軍聯隊驅逐。1630 年，荷蘭人又佔領了巴西人口最多、經濟最爲富饒的地區之一——伯南布哥。西班牙的海上運輸也愈來愈困難，從 1623 年到 1638 年有近 500 艘船隻在駛向葡萄牙港口的途中遭到襲擊或受到威脅，商人和船主感到王室聯合體制對他們來説已無利可圖了。

西班牙政府開始加重税收。政府提出要葡萄牙分擔救援巴依亞的艦隊費用的要求遭到反對。在葡萄牙貴族俸祿的問題上，1631 年馬德里政府提出應從葡萄牙的税收中支付。這項提議激起了里斯本市政廳的反對，里斯本拒絶承擔這些開支，並建議增加房地産轉讓税，由全國分攤這筆開支。

但是人民對這些新的增加税收的措施做出了强烈反應。1629 年，波爾圖發生了民衆騷亂事件，起因是謠傳將對兒蔴紡織業徵税。幾年後，又因爲向里斯本漁民强行徵收新的苛捐雜税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抗。

53 1637年起義

最爲嚴重的一次群衆騷亂發生在1637年。騷動是從埃武臘開始的，起因是因爲要增加新的房地產轉讓稅來支付貴族的俸祿以及拖欠的津貼。增加房地產轉讓稅的做法並不是西班牙政府的指令，而是里斯本市政廳提出的建議。一名王室法官來到埃武臘想使該市人民代表支持此項建議，但該市的人民法官堅決反對，以致這位政府的法官揚言要派人砍掉他的腦袋。當雙方還在爭論的時候，群衆早已聚集在一起。人民法官從窗口呼救，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群衆起義迅速遍及全城。政府法官下榻的宮殿遭到襲擊和洗劫。數年之後，D·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麥洛這樣描述道："所有王室的稅收登記帳册都被付之一炬，用以徵收肉類新稅使用的磅秤也被砸毁。群衆衝進監獄，釋放了在押犯人，以便得到他們的支持；他們還搶劫了檔案室，銷毁了文件和司法檔案。"該作者記述了當時的詳細情節。他寫道：這次起義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反對加重稅賦，而是把矛頭指向貴族階級。王公貴族擔心事態進一步發展，於是在聖安唐教堂聚會商議並表示願意出面調解。但是，起義者拒絶貴族干預此事，他們認爲："埃武臘的權貴們之所以對自己祖國的人民慘遭屠殺而無動於衷，那是因爲他們已不再是人民的一部分。"並表示對貴族不信任，調停只不過是貴族爲國王效勞的一種手段，目的是要把人民交給劊子手。

這場動亂從埃武臘開始一直蔓延到整個阿連特如和阿爾加維地區，幾乎發展成爲全國規模的起義，因爲起義已波及到錫圖巴爾、聖塔倫、阿布蘭特斯、波爾圖、維亞納杜卜斯特盧。就

連里斯本也是一片驚慌，擔心隨時都可能發生一場民衆暴動。大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沒有從首都派出軍隊到各地去恢復秩序。在維索沙鎮，布拉甘薩公爵的宮殿遭到了石塊的襲擊。1640年，曾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起義鼓動者是一些手工藝匠人和技工"。文章又說："一些歷史學家稱這場來勢兇猛的人民運動是猛獸。"也許正是這樣的評論使得一些貴族不敢加入這場人民運動。這場運動由於缺乏組織領導，數月後便自行消亡了。

對於1637年的起義曾經有過許多傳說，其中關於曼努埃里諾的那一段情節最爲著名。這件事在1637年時就是個謎，至今仍無從考證。當時，一個在里斯本王室擔任警察職務的西班牙人在起義開始後不久，向馬德里報告了起義的消息："在埃武臘城，一群年輕人燒毀了政府法官和書記官的住宅，搶走了他們的文件。在波爾圖、錫圖巴爾和埃斯特雷木兹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維索沙鎮，布拉甘薩公爵遭到石塊的襲擊，被封鎖在家裏。這些青年人中爲首的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似乎誰也不認識他。他衣着破舊，身上只有件斗篷和一條灰顏色的披肩，臉上從未流露過笑容。人們都用'曼努埃里諾'這個名字稱呼他。作爲起義首領，他到處露面。他在埃武臘的絞刑柱上張貼了一篇檄文，現逐字抄錄，隨信寄上。在發此信時曼努埃里諾正在奧利文薩。雖然沒有人認識他，但是他卻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有年輕人跟隨在他身邊，當然不只是年輕人。政府法官的官邸裏裏外外都堆滿了乾柴，準備放火。後來有人把一尊聖像搬到大街上，曼努埃里諾也在聖像旁邊，這樣這場大火才得以避免，沒有放火燒毀政府法官的官邸，而且給了他時間使他逃往聖佛朗西斯科。"

貼在絞刑柱上的那篇檄文，即信中所附的那篇文章是這次

起義的宣言書。它的文字極爲考究，說明是教會的人所寫，很可能出自耶穌教士之手。

據說，當里舍利厄大主教得知起義的消息後，曾向葡萄牙派出密使，並答應給予陸軍和海軍的支援。同這些密使聯係的是一名法學家和一名上尉。後者似乎是頗受里斯本市政廳信任的人物。證據雖不充分，但迹象表明當時的資産階級同人民運動還是有聯係的。

當起義的火焰熄滅之後，兩支西班牙部隊開進了阿連特如和阿爾加維地區，起義首領被處以絞刑。

54 光復運動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政治態度也有所改變。它爲了謀求整個半島政治上的統一，決定結束葡萄牙當時的半獨立狀態。於是許多西班牙貴族被派往葡萄牙擔任官職。在葡萄牙内地，西班牙招兵買馬爲繼續維持西班牙在歐洲進行的戰爭充當炮灰。

卡塔盧尼亞起義時的形勢和這次騷亂頗爲相似。1640 年 6 月，一群收割稻穀的農民按照傳統習慣在基督聖體節那一天涌向巴塞羅那。他們在那裏舉行了暴動，燒毀了檔案館，殺死了西班牙人縣長。整個縣都參加了起義，並請求法國給予軍事支援。法國國王路易十三於 1641 年宣佈爲巴塞羅那伯爵。

馬德里政府決定鎮壓這次起義，於是下令動員葡萄牙的貴族跟隨國王進行卡塔盧尼亞戰爭。這項命令成了葡萄牙革命的直接原因。少數貴族和文人開始策劃推翻西班牙統治，其中最爲活躍的是若奥・平托・利貝洛。他出身資産階級，當過一個省的法官，由於主張維護貴族的利益而深受青睞（1632 年他曾

發表過一篇文章，從法律角度闡述不應該動員葡萄牙貴族去參加西班牙的戰爭)。他同里斯本商界以及布拉甘薩公爵過往甚密(他後來辭去了法官職務而充當公爵在里斯本的事務代理人)。這次謀劃没有吸收人民群衆的代表參加，就連1637～1638年的起義領導人也未被通知參加。因而，在這次起義中没有人知道里舍利厄大主教的密使在1638年曾經答應給予的支持。1640年起義的政治領導人，就像1580年暴動的領導人一樣，對於發動一場人民起義顧慮重重。

起義策劃者主張恢復葡萄牙王位世襲的合法順序。他們認爲，1580年菲利普二世上臺是被扶持上去的。因爲，按照法律王位應該屬於布拉甘薩女公爵D·卡塔琳娜，這才是位歸其主。D·卡塔琳娜的繼承人是她的孫子布拉甘薩公爵——D·若奥。公爵住在維索沙鎮，表面上他遠離里斯本的政治生活，但他被認爲是可以信賴的人。革命爆發前夕，他曾任全國軍事總督。他曾被邀請來領導這次革命，但是他猶豫不決。策劃者讓他選擇，要麼維持以他爲首的君主制度，要麼成立貴族共和國。最後他終於讓步了。

起義採取了向王室發動突然襲擊的方式。

1640年12月1日，有40位王公貴族突然衝進王宫，控制了宫廷衛隊，搜捕國務大臣米格爾·德·瓦斯貢賽羅斯，並按照預定計劃將其處死。之後又迫使副女王——西班牙國王的表妹芒圖婭女公爵命令聖喬治城堡和特茹河要塞的西班牙駐軍繳械投降，不得抵抗。直到事變結束之後，才號召人民群衆予以響應。“上午10點，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大群婦女沿街叫賣鮮魚、水果以及其它東西。廣場上和河兩岸賣面包和擺攤的婦女是那樣的平静和若無其事，似乎買賣對他們無關緊要

……"，一位參加過襲擊王宮的人這樣回憶說。整個國家在聽到革命的消息之後立刻加入了革命的洪流。薩拉曼卡大學的幾百名葡萄牙學生返回葡萄牙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是在馬德里王室任職的葡萄牙貴族幾乎全部都在爲菲利普四世效力。

革命成功 15 天後，D·若奧四世被推舉爲國王。加冕典禮仍然謹慎地按照傳統的儀式進行，沒有任何改變。爾後國王忽忙重申，一切法律仍然有效，全體菲利普時期的行政官吏原職不動。一位上了年紀的有經驗的先朝遺老弗朗西斯科·盧塞納被委任爲國務大臣，此人過去也曾擔任過頗受信任的職務。光復運動結束不過幾個月，一場廣泛的貴族叛亂陰謀又開始策劃進行。維拉列亞爾侯爵、卡米尼亞公爵、阿馬馬爾伯爵、布拉加主教、里斯本宗教裁判所總裁判長以及里斯本的一些殷商富户都同這次陰謀有牽連。後來事情敗露，陰謀策劃者除神職人員外均被處決。嚴厲的鎮壓是由國務大臣主持的，但没過多久他就爲此付出了生命。他被指控爲背叛。盡管公衆輿論普遍認爲他是無辜的，但國王卻没有力量拯救他。貴族還散佈說，砍他腦袋的那把大刀正是他用來殺害貴族的那一把。

國王登基不久，即按照傳統的形式召開了議會。議會決定採取措施以對付普遍認爲是不可避免的戰爭，通過了一筆鉅額撥款，即徵收相當於個人財產 10%的稅賦作爲軍費開支，總計約 180 萬克魯扎多。第二年這筆稅額又增加到 240 萬。這種稅收遠遠超過了菲利普時期的任何稅賦，但是卻没有引起任何抗議。

55 光復戰爭

當時已處於30年戰爭的最後階段。法國和西班牙在戰場上爭奪歐洲霸權。兩國的戰爭從1635年開始，在歐洲的幾個地區同時進行（比利牛斯邊境地區；弗朗科貢達多地區；低地國家；阿爾薩斯地區；德國和意大利），直到1659年簽訂比利牛斯條約，戰爭結束，法國大獲全勝。

由此可見，在D·若奥四世執政時期並未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許多年内，戰爭只局限在邊界地區，雙方各有勝負，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使葡萄牙得以利用這一時期組織防衛力量，鞏固要塞，補充軍官、武器和馬匹。

戰爭中民衆表現了無限的愛國熱忱。下面的消息當時並非來自葡萄牙方面，而是來自西班牙的軍方報告。1641年，敵軍越過了山後地區邊界綫，向維尼亞依斯鎮的莫依曼塔村發起進攻。經過激烈地抵抗之後，有70名居民躲進教堂，並以教堂爲工事繼續戰鬥，后來終告失敗并被砍頭。報告寫道："這些叛逆者是如此頑固，除一名老年婦女之外，没有一個人要求憐憫或者呼喊D·菲利普國王萬歲。"翌年，西班牙軍隊進入埃爾瓦什附近的聖盧西亞要塞。指揮這次戰鬥的軍官寫道："葡萄牙士兵力量虚弱，也不機警，但反抗精神十分頑强，没有任何一個人同意呼喊'D·菲利普國王萬歲'的口號，因此所有的人都被處死"。報告最後説："他們是葡萄牙人，個個都是這樣，只有忠實的貴族除外。"

但是究竟"忠實的貴族"幹了些什麼，當時的另一則消息來源説："他們耍兩面派。他們一方面應付D·若奥國王，同時

也做出某種姿態，以期得到D·菲利普國王的諒解。他們脚踏兩隻船，左右逢源。”有些人則被人僱傭來破壞這場戰爭，“就是說，通過他們使船隻誤點，船工逃亡，使船隊或艦隊受挫，使資金消耗，他們不僅不秣馬厲兵，還苛扣軍餉，不給糧草，使士兵在緊要關頭不能投入戰鬥，不加固城防。”(《抽薪術》XLVI章)。

比利牛斯條約對我們來說是戰爭最危險的時刻。在這個條約中法國對西班牙做的小小讓步之一，就是停止對我國——當時一直是法國的盟國的支持。因此，擺脱了歐洲戰爭的西班牙軍隊這時就有可能回師進軍葡萄牙。正是在這個時候（1660年）施霜貝格公爵根據協定率領600名訓練有素的官兵來到我國，開展了一項旨在使我國軍事技術現代化的重要行動。1662年，根據一項在英國簽署的協定，我們接受了幾千名英國官兵和幾艘艦船的援助。上述因素以及當時主持葡萄牙政務的D·阿豐索六世的親信卡斯特羅·麥略爾公爵極爲强烈的主戰行動，才使我國能夠粉碎西班牙軍隊的大舉進攻。1663年，西班牙軍隊佔領了埃武臘並向里斯本挺進，但是在阿梅西亞爾戰役中被打得潰不成軍。1665年，另一支更爲龐大的西班牙軍隊在克拉羅斯山的戰鬥中被殲。這次戰役對戰爭的進展有着決定性的影響。這是西班牙企圖重新征服葡萄牙的最后後一次軍事嘗試。

此時在西班牙，菲利普四世駕崩，國家經濟形勢一蹶不振，政治形勢十分危急;法國和德國皇帝都在策劃接替西班牙王位。在葡萄牙，渴望和平的情緒極爲强烈。戰爭已經耗費了國家的全部財産，經濟形勢自光復以來不斷惡化。内部意見分歧，平民階層對貴族缺乏信任；當西班牙人佔領埃武臘時，里斯本曾

經發生過平民反對貴族的騷動。卡斯特羅·麥略爾利用民間的不滿情緒大撈好處。但是人民已厭倦戰爭，願意支持任何能導致和平的政治改革。

56 1667年政變與和平

在戰爭結束前夕，由於廢除國王的問題而導致國內政局再次動蕩。

當國王D·若奧四世在1656年去世時，王位繼承人（D·阿豐索六世）只有13歲。因此根據傳統法律還差一歲不到單獨行使權力的年齡。於是，國王遺孀D·路易莎·德·古斯芒王后參與攝政。但是新國王是個殘疾人，幼年時由於患病留下了後遺症，行走困難。反對派不斷散佈說，國王除了殘疾外還頭腦遲鈍，但是國王的追隨者認爲這種指責純粹是反對派的政治伎倆。實際上攝政者掌權達六年之久，比規定時間超出了五年。

1662年，攝政者把一個年輕的貴族提拔到國王身邊，這就是卡斯特羅·麥略爾公爵。公爵決意控制政府，因此，他唆使國王結束攝政狀態，自理朝政。絶大多數貴族支持這場運動，這實際上是一次宮廷政變。卡斯特羅·麥略爾開始以宮廷大臣的身份參與朝政。然而這個宮廷職務從塞巴斯蒂昂時代起就不存在了。

當時正處在獨立戰爭最危險最關鍵的時期。在指揮戰爭方面公爵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在他執政時期葡萄牙軍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西班牙由於歐洲戰場的失敗而精疲力盡，即便是對付像葡萄牙這樣軟弱的敵手也已經感到無力發動進攻。卡斯特羅·麥略爾意識到這是他在和平的問題上施展努力可以撈到

極大的好處的時機。於是在進行軍事準備的同時也展開了外交活動。爲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他想讓國王同一位法國公主攀親。經過艱苦的談判，路易十四終於同意把他的親戚內穆爾公爵的女兒瑪莉婭·弗朗西斯卡·伊莎貝爾·德·薩寶婭嫁給新國王。阿豐索六世於1666年結婚，翌年葡萄牙和法國就簽訂了軍事協定。

但是此時，貴族階層已經開始對卡斯特羅·麥略爾表示不滿，因爲他固執地堅持進行戰爭，而他們對戰爭已感到厭煩。同時還傳聞國王無能，國家的獨立可能面臨危險，因爲王位沒有繼承人。當時國王有位胞弟D·佩得羅，如果國王沒有後嗣，他就是王位繼承人。他週圍已聚集了一幫貴族，並迫不及待地想結束這位殘疾人的政權。

國王成親後，危機也開始了。王后和D·佩得羅很快就串通一氣，迫使國王解除了卡斯特羅·麥略爾的職務。不久之後，王后離開王宮，宣佈在一個修道院避難，並要求里斯本大教堂主教解除她同國王的婚姻，理由是國王生理上有缺陷。D·阿豐索六世孤家寡人，沒有人爲他辯護，只好簽署了一份文件，聲明"永遠不再料理國事，把政權讓給王室的合法後嗣D·佩得羅王子及其子女。但每年要從他們優厚的俸祿中提取十萬克魯扎多。"他們用一艘船把國王弄到亞速爾島，讓他在那裏過了幾年監禁生活。阿豐索六世最後死在辛特拉的一所王宮裏。在國王被囚禁期間，里斯本主教宣佈他的婚姻無效，因爲沒有既成事實。D·佩得羅同王后結了婚，以攝政者的身份執政，直到他的兄長去世（1683年）爲止。

這次事件歷史上稱爲"法國的陰謀"。因爲當時陪同王后來葡萄牙的政治謀士們在這次事件中起了極爲積極的作用。這次

事件，引起了各種猜測，但是只要看看當時的表面原因就無須再談其它問題了：這就是人們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卡斯特羅·麥略爾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以後剛剛執政的貴族之間的對立情緒。

1668年，葡西兩國進行了一次忽忽忙忙的談判，談判中那些曾被卡斯特羅·麥略爾拒絕了的條件現在都被接受了，然後簽署了確立和平的協定：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分批釋放被捕人員和歸還被佔領的村鎮。西班牙只保留塞烏塔城，葡萄牙未能恢復對這座城池的統治，因爲1640年當時在該城執政的貴族表示自願歸順菲利普四世。

57 光復外交

國家雖然統一了，但葡萄牙卻常常地捲入了歐洲的政治漩渦。

同西班牙的聯合發生在歐洲分裂爲兩大對立政治集團的時期，一個是法國王室集團，另一個是奥地利王室集團。這兩股對立勢力從16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形成。這種對立引起了卡洛斯五世和法國國王之間連年戰爭，使整個西歐都陷入了戰火之中，但是葡萄牙卻有幸立足於戰爭之外。

1580年，葡萄牙成爲奥地利王室集團的成員國，這樣也就是加入了對立集團的一方。光復運動就是在30年代戰爭中進行的，這場戰爭是對立集團力量對抗的新階段。葡萄牙的外交方針是：退出以西班牙爲首的奥地利王室集團，加入它的對立面法國集團。

實現這個目的並非易事。對於我國的外交官來說，似乎西班牙的敵人理所當然地應該接受我們爲同盟者，因爲我們正在

同西班牙打仗。但是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把我國作爲敵人比把我國作爲友邦更爲有利可圖。我國在歐洲的作用是無足輕重的，然而我們擁有能夠控制海外貿易的商業港口以及極爲重要的戰略要塞。當時歐洲各國已經在爲此進行爭奪。這樣作爲敵人而不是朋友他們就更容易從我們手中奪取這些戰略要地。光復外交總的結果是：我們脫離了一個集團，但是並沒有能夠進入另一個集團。我們爲在歐洲獲得政治上的好處所付的代價是：讓出了我們在東方的一些重要地位並在經濟上做出了重大讓步。

外交鬥爭比軍事交鋒開始得更爲早些，1641 年初，葡萄牙就向羅馬、法國、荷蘭、英國、丹麥和瑞士派出了外交使節。

派往羅馬的使者一無所獲。西班牙國王，即奧地利王室集團的首領。同時也是正在同基督教進行競爭的天主教的政治支柱。因此，教皇拒絕在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之前承認葡萄牙獨立，直到 1669 年教皇才接見了葡萄牙的一名特使。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爭取英國的支持。1641 年，我們曾提出同英國結成軍事同盟，但是最後只是簽訂了一項友好貿易協定。協定規定雙方保證不參加任何針對另一方的戰爭，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在葡萄牙的海外領地經商，享有同葡萄牙人同等的權利(1642 年協定)。但是，不久之後，英國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鬥爭加劇，查理一世被處決，並成立了共和國，接着便是克倫威爾獨裁統治。葡萄牙國王想保持中立，但是有一支忠於英國國王的艦隊在特茹河灣避難並以此爲基地襲擊英國船隊。戰爭迫在眉睫：英國派艦隊封鎖了特茹河並切斷了通往巴西的海上通道。在東方，英國人支持波斯人把霍爾木兹海峽從我們手中奪去。爲了恢復友好關係，我們不得不接受 1654 年協定；爲換取和平，我們將巴西、非洲及東方領地的貿易市場向英國開放，並規定葡萄牙進

口的英國商品或產品的稅率爲 23%,同時還規定葡萄牙需要租賃外國船隻時只能向英國租賃。所有條款中,最使葡萄牙感到爲難的是允許在葡萄牙定居的英國商人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由於葡萄牙遲遲没有批准該協定,克倫威爾便派遣了一支艦隊開進特茹河對我施加壓力。1660 年,西班牙在結束了它同法國之間的多年戰爭之後,便集中全力來對付我們。我們只得再次要求同英國結成軍事同盟。當時還醞釀把 D·若奥四世的女兒 D·卡塔琳娜公主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葡萄牙把非洲的丹吉爾和印度的孟買讓給英國。英國商人還被允許在葡萄牙的各個領地建立公司,協定上特別提到果阿、科欽、第烏島、巴依亞的聖薩爾瓦多、伯南布哥、里約熱内盧等城市。葡萄牙還答應把荷蘭從我們手中奪去的印度領土讓給英國,如果英國能夠把這些領土重新奪回的話。同時還表示,如果英國能把錫蘭島重新奪回,葡萄牙願與其平分該島上的肉桂貿易。做爲交換,英國將向葡萄牙派遣兩個騎兵團和兩個步兵團;在葡萄牙遭到入侵或遇到海盜襲擊時英國將派遣艦隊進行援助;同時英國願意出面調停葡萄牙和荷蘭之間的糾紛,促成和平(懷特霍爾協定,1661 年)。這個協定是英國對葡萄牙進行經濟滲透並在葡萄牙擁有外交特權的開始。主要是由於英國人的干預,七年後,葡萄牙又同西班牙簽訂了違背法國外交官意願的和平協定。

同法國的談判也是相當困難的。1641 年我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還比較樂觀,而且胃口很大:即建立一個多國集團,對西班牙發動一場全面戰爭。但法國人對此避而不提。對於建立“形式上的聯盟”這樣的最低要求(即要求法國承擔這樣的義務:如果西班牙不同葡萄牙和解,法國就不同西班牙和解)也不予理睬。30 年戰爭已到最後階段,做爲同西班牙的交戰國,我們

要求在和平談判中佔有一個席位，這樣就等於全面承認了我國的獨立，就意味着戰爭的結束。然而，我們未被接納參加談判，我們被排除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外。甚至法國也不支持我們同西班牙直接談判的立場，而這種談判正是比利牛斯條約所規定的。我們成了别人交易的籌碼。讓葡萄牙聽天由命，就是法國向戰敗的對手做出的少數讓步之一。盡管如此，卡斯特羅·麥略爾公爵仍然試圖爭取法國的支持。爲此，他讓葡萄牙國王同法國的一位公主結了婚。但是軍事援助從未兑現，因爲盡管實現了和平，同法國的政治聯盟卻並持續多久。

對於荷蘭，我們也提出了和平建議，其中包括歸還菲利普執政時期被荷蘭佔領的葡萄牙領地，以及聯合對付西班牙等。但是兩國之間的和平只維持了十年，而且只是在歐洲範圍内，因爲同荷蘭的鬥爭在巴西和非洲一直没有間斷。休戰剛剛結束。荷蘭艦隻就幾乎佔領了所有尚在我們手中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幾處領地。只是到了 1661 年兩國間才建立了持久的和平：荷蘭保持它的佔領，葡萄牙放棄對這些地方的權利並給予賠款，讓荷蘭商人在葡萄牙的貿易中得到好處。

當時的形勢幾乎到處都一樣，我們信賴的國際援助都没有兑現。歐洲其它國家乘機奪取了我們的殖民地位。把葡萄牙帝國垮臺歸咎於西班牙統治的説法，只有一半是事實，因爲這次光復運動的代價是極爲慘重的。

58 文化：大迂迴

1. 衰落

17 世紀是思想和現代科學發展的決定性時期。這個世紀中

出現了加利略、笛卡兒、帕斯卡、斯賓諾莎、培根和牛頓。這個世紀也是文學和藝術的繁榮時期，許多優秀的繪畫及著作都是在 1600 年至 1700 年間出現的，如倫勃朗、凡戴克、委拉斯開兹的繪畫及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高乃依、莫里哀、拉辛的戲劇。與這一光輝的創作興旺時期相對的則是葡萄牙的低沉時期，没有傑出的畫家、作家、劇作家或思想家，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空白時期。

在歐洲的偉大人物中間，有幾個人同葡萄牙有着血緣關係。斯賓諾莎就是一個葡萄牙猶太人的兒子，由於當時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而逃往荷蘭。委拉斯開兹的父親是波爾圖人，爲謀生計才到了塞維利亞。這種情况純屬偶然，但這兩個偶然事例卻説明了葡萄牙衰落的兩個基本原因：宗教迫害以及由此造成文化活動與世隔絶和停滯不前；政治和經濟危機最終使國家喪失獨立，導致國家衰亡與消沉。這種情景，同文學藝術的光輝是無法並存的。

但是文化並没有消失，而且 17 世紀也決非是一個没有文化的時期，只能説是一個低産時期。這個時期，人們偏重於思考（這個時期我國出版哲學著作之多是任何其它歷史時期所無法比擬的），偏重於研究和偏重於文學，偏重於詩歌創作和上演劇目。然而問題是這個時期的文化脱離了生活，脱離了當時的現實問題。文藝創作迴避了可能引起葡萄牙宗教裁判官或西班牙總督注意的容易引起爭論的題材或改革主張；爲了生存，它只能在格式、故事情節、反理性主義及藝術手法上採取隱晦的辦法。

2. 耶穌教士興辦的教育

16 世紀的文化，在思想領域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耶穌會教

士的活動。他們興辦教育，並從事各種文化活動。耶穌會同宗教裁判所之間形成鮮明對照的許多方面之一就是前者是要促進文化的發展，而後者則是要阻礙文化發展。耶穌教會興辦文化教育的目的，在於抵制改革思想。在許多有耶穌教的國家，教士們把教育作爲己任，興辦教育甚有成效。在葡萄牙，當時在里斯本（現在的聖若澤醫院就在聖安唐中學大樓內，爲了把它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彭巴爾以國王的名字重新命名。）埃武臘、布拉加、布拉甘薩、安格拉、豐沙爾、法魯、波塔萊格雷、德爾加多角、聖塔倫、波爾圖、埃爾瓦什、奧爾塔、錫圖巴爾、波蒂芒、貝雅、帕爾乃什、維索沙鎮都設立了學校。在巴西、非洲和印度也開辦了學校。在葡萄牙領土上廣泛興辦中學教育這還是第一次。教科書是精心編寫的。編寫得比較好的，直到今天還在葡萄牙發行的教科書是科英布拉學校的那本厚厚的活頁教材。它彙集了所有正統知識，即在反對改革的環境中能夠被認爲是同信仰一致的知識。這些用拉丁文寫成的書作爲基礎教材，一直持續到彭巴爾時期被禁止使用爲止。在一個半世紀裏，只有這麼唯一的一種教科書，這就是我國教育固步自封和落後的一個嚴重因素。葡萄牙的學生直到 18 世紀還在閱讀反映 17 世紀初期思想的講義。另一方面，耶穌教士辦的教育是一種灌輸式教育。這是一種反對異教和反對改革精神的手段。改革只能在思想自由，在每個人都有權獨立思考的情況下才能出現。而這一點正是教會學校所力圖避免的。教會學校的目的，是要使它的教義被人虔誠地信仰而不致受到批評，因爲批評的結果將肯定要導致教義的結束。因此，教會教育不是訓練人的思考能力，而是給人奠定信仰的基礎。這種教育產生了效果，17 世紀的葡萄牙人盲目信仰者居多，而認真思考者寥寥無幾。

但是這些學校也出了不少有學問的人。在校學習的都是些貴族和資產階級子弟以及一些耶穌教士對其天賦感到驚訝的普通人。耶穌教士對於新教徒的態度同宗教裁判所不同，他們允許新教徒進入他們的學校（葡萄牙知名的耶穌教士安東尼奥·維埃拉神父就是一個新教徒，他因爲爲猶太人辯護，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學生們學習拉丁文、語法、修辭學、哲學，然而他們對新的科學知識和現代語言卻一竅不通。1640 年以後不久，D·若奥四世曾爲派遣一名駐法國大使而犯難，因爲他周圍的貴族中竟沒有一個人會講法語。

3. 形式上的信仰與神秘哲學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運用所學的文化，但是這種運用，由於宗教裁判所對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種干預而受到限制。世俗文化活動的範圍是極爲狹窄的。發表對立的言論是要冒風險的，而越軌行爲則會被投入監牢。因此人的思想只能朝着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信仰宗教，這表現在爲上帝進行辯護和歌功頌德的文字中；另一個則純粹是形式上的信仰，他們使用的語言只是其本身的含義，和思想完全脫節。兩位被稱爲葡萄牙 17 世紀文學界最傑出的作家，曼努埃爾·貝爾納德斯神父和安東尼奥·維埃拉神父就代表了這兩種傾向。前者畢生把自己關在修道院裏，以優美的散文語言撰寫教化的範例和天真的奇迹；後者則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提取語言的精華，寫出了葡萄牙語言文字中從未有過的最優秀的作品。其實他們都是以優美的文字爲外表，以隱蔽的手法爲其思想服務。是用語言而不是思想作爲素材來表現其創造才能的。諸如誇飾文體、文學格言、貢哥拉文風等等，就是文史學家以表達思想來爲形式服務而使用的文體。

歐洲的哲學流派在葡萄牙幾乎沒有引起反響。但是，神秘哲學卻是個例外，盡管它本身并不是一門哲學，而只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及彌賽亞教義的泛濫，是一種介乎於語法和巫術之間的東西。D·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麥洛在笛卡兒寫《方法談》的前後期間寫了一本《神秘科學論》。作者是一個很巧妙的諷刺家,但在這本書裏卻沒有任何諷刺語言,看來相信神秘哲學,並想表明神秘主義和天主教義並非不能併存。按照天主教人士的説法，真正的神秘哲學是一種對未曾揭開的奧秘的深入思考，是從聖書的名字、文字、數字和形象中推論而來，而假神秘哲學則是一種臆想，只是通過空洞的觀察，毫無把握地推斷未來。神秘哲學並非始於葡萄牙，而是從國外傳進來的。但有意思的是，其它學科卻没有傳進來，既没有方法論也没有對數（另一種對數字的深入思考，是以思維而不是以信仰爲基礎）也没有物理學。還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我國 16 世紀文化界兩位最有智慧的人物 D·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和安東尼奥·維埃拉神父也對神秘哲學堅信不移。

4. 離奇主義

這個時期思想上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離奇主義，它已相當普遍地做爲一種方法論來解釋當時存在和發生的一些現象。不僅有始於 17 世紀以前，後來又流傳很久的民間離奇主義，而且還有滲透於各個方面的、在文學上很有修養的離奇主義。對一些獨特的現象都有神奇的解釋。如果一個教會的信徒選擇了一塊美麗的地方建造教堂，這就會被説成是由於奇迹所致，因爲上帝想用這塊美麗的地方向人們顯示天堂的美麗；壽命的長短，身體健康或體弱多病，遠航平安或沉船失事，總是能夠找到先驗

的理由來加以解釋。一些關於修道院的報道（在該世紀是頗多的，而且通常文字相當出色）都含有大量的離奇故事，當然不僅僅是關於修道院的報道。葡萄牙的第一份期刊是《本宮及來自其它國家的新聞專刊》。該報的第一期於 1641 年 12 月出版。下面是該報第一期刊登在頭版的一條新聞："在貝拉某地，據說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成千上萬的民衆在歡呼國王登基時，上帝在衆目睽睽之下使教堂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呈現了奇迹。當一個人在朋友們的談話中聽到此事時說：難道從耶穌像上能掉下一隻胳膊來？他剛剛說完這句話，一堵牆便倒塌下來把他砸死了，而站在牆邊談話的其它人卻安然無恙。"這是用一個奇迹去肯定另一個奇迹。實際上，事情是這樣的：在民衆歡呼 D·若奧四世登基時，耶穌受難像的一隻胳膊從十字架上脱落，但并未掉下來，而形成了好像耶酥在向人祝福似的姿勢。這件事被説成奇迹。當時一個貝拉人不認爲是奇迹，反駁説：這可能純係偶然。剛剛説完，一堵牆倒塌下來壓在此人身上，將他砸死。

5. 愛國主義與歷史

任何愛國主義感情的表現，不僅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宗教檢查，而且還要受到西班牙當局的政治檢查。因此文化人士都把自己的愛國思想隱蔽在作品中，特别是在歷史著作裏。一個不願冒風險的愛國者表現其愛國主義的方法之一就是閲讀《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這部詩歌鉅著是整個 17 世紀最受人們歡迎的作品。在 1580 至 1640 年間，卡蒙斯的作品再版了二至四次。古爲今用，這對歷史學似乎是一條出路。作家們都毫無例外地去尋找歷史題材。在這類歷史著作中最有名的代表作是《葡萄

牙的君主政體》一書。該書共分八個部分。整整延續了一個多世紀（1597 年至 1729 年）才全部出齊。這是繼 15 世紀上半葉費爾南·羅帕斯所編撰的《王國通鑒》之後的第一部葡萄牙歷史鉅著。其中最顯著的章節是由弗列依·安東尼奧·布朗道編寫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歷史著作家。現在人們之所以能夠瞭解早期王國的許多史實，大部分要歸功於他。但是最爲普及的還是前兩本書，這是弗列依·貝爾納多·德·布里托的功勞。他的描述從創世之前開始，當時世界在創世主的心目中還只是一個空洞的設想。葡萄牙的存在從一開始就包括在上帝的設想之中（葡萄牙作爲獨立國家的存在就是由此而來的，並非是歷史的恩賜，而是上帝的宇宙計劃的需要）。上帝降臨到地球上來建立新的國家，并親自同 D.·阿豐索·恩格斯在奧里克進行了這樣的談話。貝爾納多·布里托清楚地知道任何歷史都應以文獻記載爲依據，但是在這裏他卻像在文學作品中那樣，虛構了一些東西。應該是文獻產生於歷史，而決不是歷史產生於文獻。爲了使他的虛構有根有據，貝爾納多·布里托費盡心機地編造了這個故事的始末。他的最爲著名的僞作之一就是拉麥戈議會記錄，這是奧里克奇迹和葡萄牙獨立的法律基礎的正式憑證。這份假造的文件在葡萄牙曾名噪一時，甚至沒有任何一份真實的文件有過這樣的盛名。在整個 17、18 兩個世紀中，這份假文件尤如葡萄牙古代自由大綱之類的文獻一樣深受重視。1820 年，里斯本人民法官在奉命歡呼革命運動準備起草的憲法時，由於口誤而高呼："拉麥戈議會萬歲！"

語言學中的愛國主義同歷史學中的愛國主義是密切相關的。語言，無論是口語還是文字，不能只被看作是簡單的交際工具，而應作爲財富加以培育。當然那時候有許多人講西班牙

語，用西班牙文寫作。在菲利普時期，葡萄牙語仍然是官方語言，但統治者講話時，並不一定講葡萄牙語，兩種語言同時流行，即便是在里斯本人民中間也是如此。戲劇幾乎都是西班牙文而且不用翻譯。盡管如此（也許正因爲如此），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即葡萄牙語是一種財富應當受到保護。語言學研究因此而流行起來（從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以費爾南·德·奧利維拉和若奧·德·巴洛斯爲主要人物）。一些作者相繼發表了正字法手册。這場運動中一個令人感到奇怪的方面是對民間口語的重視。語言單調貧乏的現象在民間找到了新鮮血液，使用成語、格言、民間諺語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頗爲時髦。第一部葡萄牙語成語詞典就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當時一本頗有名氣的書是《口語表達集錦與葡萄牙語格言》，作者是本托·佩雷拉神父。一些語言學者至今還在參閱此書，盡管他們忌諱承認這個事實。

另一本可以表明當時崇拜語言的書是《鄉間王室》，作者是羅德里格斯·羅博。本書的用意是極爲清楚的，由於里斯本已無王室，王公貴族紛紛移居鄉下，在那裏修建官邸，他們“常常懷念過去”，或者説緬懷國家獨立時的生活。他們在這些鄉村宮殿裏不斷提高語言修養，他們聊天、討論、演説、接待客人和寫作。

6. 廟宇、瓷磚和木雕藝術

美術方面是單調的。那時候大部分樓房都是耶穌教士修建的，因而被稱爲耶穌會式建築。這種説法至今尚有爭議（據專家們説，耶穌會式，只是歐洲舊式建築中的葡萄牙形式）。但是毫無疑問，17 世紀我國宗教建築藝術受耶穌會的影響是非常之深的。教堂就像一個大演講廳，像一個大課堂，講課就像佈道，

教堂的結構形式必須是：講道人要讓大家都能看得見，他的聲音在各個角落都能聽得清楚。這時的教堂已沒有室內立柱及寬大的凹間的凸間。前一時期常常以這種建築藝術來體現運動感和顯示氣勢。現在的樓房正面平整、高大，佈局合理，給人一種嚴肅、避邪和戒律嚴明的感覺。因此廟宇建築都具有這種森嚴、幽靜的氣氛。但是這種陰森的建築很快就消失了，而代之以瓷磚和木雕作爲裝飾。這種瓷磚和雕飾在藝術上的作用，使人們能夠聯想到民間格言對於文學的價值。

瓷磚和木雕是葡萄牙17世紀藝術上的偉大創舉。那時候我們没有外國匠人。陶瓷匠人和雕刻匠人都是些民間藝人（其姓名已很少爲人所知）。這類藝術的發展反映了當時的民間文化及其對於節日氣氛和東方藝術的愛好。人民的天才爲國民生活提供了新的條件。瓷磚代替了教堂和宫殿牆壁上懸掛的價格高昂的壁毯，這些壁毯以前都是來自比利時和荷蘭，後來由於西班牙人在那裏打仗，而且持續了幾乎整整一個世紀，壁毯的進口被迫中斷。專家們稱瓷磚爲“地磚”或“瓷壁毯”，這種叫法十分形象。木雕代替了大部分石雕（60年代的雕像幾乎都是木雕，但前期的雕像多爲石雕），而且也取代了其它貴重材料，如黄金和鍍金白銀。許多祭祀用品（如聖骨盒、神龕、七星燈座、蠟燭燈臺以及講臺書架），以前都是用金屬做的，而現在都是木製的，塗以金色，加工後幾乎和金屬一模一樣。由於原材料便宜，所以這些匠人的生産規模不斷擴大。廟宇的内裝修越來越富麗堂皇，金色的雕飾加上藍色的瓷磚達到了驚人的裝飾效果。由於這種裝飾工藝來自民間，又是葡萄牙獨有的格式，所以它的成就是鉅大的而且經久不衰，幾乎是世代相傳，並被移民帶往巴西，在那裏紮了根。巴依亞今天仍然是葡萄牙雕刻藝術之鄉。

一般情況下，雕刻用的木料都是栗木。在這個盛產藍花楹屬木材的國家裏。葡萄牙的雕刻家們總還是懷念他們家鄉的栗子樹林。

1668～1777年

君主專制制度

59　君主專制制度

我國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一般說是在D·佩得羅二世時期，因爲葡萄牙議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這個時期舉行的。

君主擁有無限權力的趨勢——這種權力被說成是神的賜予，因而凌駕於任何其它政治權力之上——從D·若奧二世開始就在葡萄牙發展起來，到了D·塞巴斯蒂昂時期，這種傾向已佔據主導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講，塞巴斯蒂昂已經成爲至高無上的國王。但是這種趨勢在菲利普統治時期受到抑制。菲利普二世在托馬爾會議上曾許諾尊重憲章。該憲章規定給予葡萄牙以行政和財政自治的權利。這項規定極大地限制了國王處理葡萄牙事物的各種權力。幾十年來國王一直信守諾言。菲利普四

世時期，西班牙政府面臨鉅大的經濟困難，於是開始違背1581年所做的許諾，結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對並導致了1640年革命。

君主制度的恢復中斷了極權主義體制的發展，而且君主專制政體賴以存在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當時也不具備。新國王並非王室後裔，他在被起義者選中之前，只是一名貴族，其他貴族也只是把他看成是自己階級的一員。1640年的起義者曾威脅他説，如果他不接受王位，他們將成立一個貴族共和國。此外，國王不能不顧全國的願望，他們在財政上的合作對維持戰爭和獨立是必不可少的。這種登基理論同專制主義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理論認爲，選擇國王的權力屬於人民；如果國王實行暴政，人民可以罷免他（菲利普三世就被指責爲暴君）。這些原則，D·若奥四世登基時曾於確認，後來又出版成書，光復運動時曾以此爲理論依據。

從理論上講，這些特殊的條件本來可以導致建立一個特殊的、以各階級在議會所佔的比重爲基礎的政治體制。但是，如果説當時有建立這種制度的時機，然而卻没有能夠使其成爲現實的必要的社會力量。1640年，經濟實力主要集中在教士和貴族手裏，而他們對改變政治結構則毫無興趣。那時候擁有鉅大財富的商人，幾乎全是新教徒，他們被剝奪了參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有幾個向D·若奥四世提供經濟幫助的資本家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因此，他們想要“恢復”的君主政體只能是傳統的君主政體，即1580年危機時被破壞了的貴族的君主政體。D·若奥四世在位的十六年中，曾四次召集議會，每次會議都批准制定國家新的税收政策，但其結果只是討論了一般政治事務。議會總是謹慎地一成不變地因循舊的規矩，即由國王決定召集議會，議會只起純粹的咨詢作用，對於已表決的提案，國王有

最後決定權，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及第三等級）的代表還要分別在三個地方開會。D・若奧四世執政期間，英國國王和議會之間的鬥爭激化，國王被判處死刑。這一先例使若奧四世對議會的政治作用倍加審慎。

第三等級的代表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這些代表中的許多人也是教士和貴族。城市平民在議會中没有任何代表，即便是商人也難得有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1674 年，議會上曾有過一些反對賦稅過重的意見；盡管戰爭已於 1668 年結束，但賦税並未減輕，同時對於國王處理新教徒問題的方式也提出了批評（民衆代表指責國王同猶太人的後裔勾結，事實上也確有其事）。對於這些批評，一位當時的作家稱之爲“幾乎是全面起義”。國王指責議會干預與其無關的事務，並因此解散了議會。

議會的政治作用每況愈下的趨勢到 1698 年才告結束。這一年議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會議的目的只是爲了修改王位繼承法，以便使繼承人 D・佩得羅二世，即以後的 D・若奧五世可以直接繼承王位而無需經議會宣佈(按照法律，鑒於 D・佩得羅是國王的兄弟而不是國王的後嗣繼位，因此必須由議會宣佈)。從此以後，直到自由主義革命結束，議會才重新聚會。然而，君主政體初期一直沿用的“議會”一詞，此時的含義已完全不同了。

議會不再開會而由國王行使權力，這并不意味着王權擁有絶對權力。這種專制權力只是爲了對付第三等級，因爲只有他們的意見不受重視。但是另外一些能夠限制王室權力的勢力仍然存在，這就是貴族權力和教士權力。宗教裁判所的活動長期以來不許王室干預。D・佩得羅多少年來一直在政治上進行鬥

爭，企圖改變宗教裁判法庭對新教徒判處没收財產的制度，但始終没有成功，因爲葡萄牙的宗教法官毫不妥協地反對王室干涉。D·若奥五世也進行過同樣的努力，只是因爲他擁有鉅大的財力並在羅馬上下通融，才取得了部分成功。這位國王在執政初期曾打算密而不宣地走遍歐洲諸國，以便認識他生活的這個世界。但是大臣們和上層貴族認爲這項計劃是不明智的，因而國王未能如願以償。好心的國王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對付貴族和教會的反對，但始終未能把他們壓下去。此外，君主政體權力的脆弱還表現在下面幾件事情上：D·若奥五世一直没有能夠使一個輔佐王室的行政機構行使權力；盡管王室擁有鉅大的財力，但財政上卻經常發生困難，因爲，正如當時一位法國外交官所説的，這些錢在到達王室銀庫之前，已被人從中間渠道挖走了。D·佩得羅二世多年來一直住在一座從追隨西班牙人的貴族那裏没收來的宮殿裏。這座宮殿據説比王宮還富麗堂皇。D·若奥五世住在里貝拉王宮的菲利普城堡中。1755 年大地震後，重建這座城市時，没有再修建王宮。

18 世紀下半葉，彭巴爾侯爵執政時情況有了變化。他對貴族進行了嚴厲的清洗，驅逐了耶穌會教士，將宗教裁判所改變爲國家工具，殘酷鎮壓民衆的游行示威，從而消除了對國王絶對權力的實際限制。作爲這個政權精神支柱的政治哲學，就是極權主義，其推行者就是彭巴爾侯爵本人。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説是歐洲式的極權主義侵蝕了葡萄牙的政府機構，不如説是極端的個人獨裁更爲確切。因此，彭巴爾剛一被免職，極權主義便銷聲匿迹了。以前的幾支政治力量又重新復活，君主政體的權力又重新受到這些力量的限制。

60 西班牙王位爭奪戰

1671年，同西班牙簽訂和平條約才剛剛三年，又有了新的戰爭迹象。路易十四決定對荷蘭開戰，並想把葡萄牙包括在他的盟國之中。葡萄牙當時以及後來很長一個時期，都在用錫圖巴爾的鹽支付荷蘭一筆相當大的戰爭賠款。此外，荷蘭對我們的凌辱也還使人記憶猶新，它還佔領着我們在太平洋上的最後幾塊領地和印度洋上的一些地盤，收復這些領地的希望並未消失。

但是，西班牙將在未來的衝突中支持荷蘭，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同法國 結盟就意味着同西班牙重新開戰。所以這種顧慮在葡萄牙產生了强烈反應。一個當時路過里斯本的西班牙修道士，在形容該城市的氣氛時這樣寫道："那些天，關於同西班牙打仗的傳聞引起了一些不安。貴族希望打仗，因爲據説這樣他們就有了糧食。但人民不同意，教會更不贊同，許多修道院都在佈道，反對那些不安分的人。在聖多明戈斯，我聽國王的懺悔神父索蘭諾神父説：'天使一定不贊同我們，因爲這場戰爭事出無因。'"

最後，葡萄牙還是保持了中立，因爲貴族内部也出現了分歧：一派認爲同强大的法國結盟才能解決葡萄牙的問題；另一派則十分留戀同西班牙結盟時的太平盛世。從1679年開始，兩派的對立主要集中在攝政王D·佩得羅的獨生女兒的婚姻問題上（由於D·阿豐索六世没有後嗣，她便成了葡萄牙王位的繼承人），即她應該同西班牙國王結婚還是同法國王子結婚？1683年在葡萄牙料理此事的法國大使曾這樣描寫葡萄牙貴族的精神狀

態：

“許多貴族是西班牙的黨羽，他們對於重新接受西班牙的統治並沒有反感，他們期望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比在葡萄牙能夠謀求到的更加優越的職位。然而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是真正的葡萄牙人，他們不願意重新套上那副歷盡艱辛才得以擺脱的枷鎖。不過西班牙君主政體的衰弱，使他們對於這種可能已不那麼擔心。這種信心迅速增長，一種自然的自負感使他們認爲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比葡萄牙人更爲英勇善戰。這種自負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懶懶散散，從而很少關注自己的事業……既然葡萄牙人生性活躍，這種自負的心情就不足爲奇了，他們不接受任何教育，由於他們不學習其它國家的長處，談起話來就是他們的住房如何寬敞，他們祖先之業績如何偉大，他們認爲，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葡萄牙貴族更爲顯赫的貴族了，也没有任何國家有過這麼多的偉大人物。”

18 世紀初，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終於得到解決，但我們卻再次被捲入戰爭。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二世於 1699 年去世，而没有留下後代。他的死是人們盼望已久的，但同時也産生了誰來繼承西班牙王位的問題。

D·佩得羅二世提出由他來繼承王位的要求，其理由是：他是天主教國王第六代後裔。但是真正的衝突是在兩位毗鄰的而且是實力最强大的王位謀求者之間。卡洛斯二世有兩個妹妹，一個同路易十四結了婚，另一個嫁給了德國皇帝利奥波德。這兩個君王都宣稱要繼承西班牙王位。歐洲的平衡再次瀕於危境。西班牙的出路不是重建奥地利王室，就是隸屬於法國王權。

卡洛斯二世在遺囑中指定路易十四的孫子菲利普爲繼承人。新國王在馬德里宣誓登基，但是德國皇帝拒絶承認，他認

爲應由他的兒子，卡洛斯大公爵（卡洛斯三世）繼承王位，於是爆發了奧、法戰爭。

起初葡萄牙加入了法國集團，並答應參戰，以換取法國的軍事援助和收回印度洋上的幾塊領地。但是就在此時又組成了包括英國、低地國家及奧地利在內的反對法國的大聯盟。於是葡萄牙外交界開始猶豫了，因爲同英國和低地國家打仗似乎比同法國和西班牙打仗要冒更大的風險。經過兩年的談判，葡萄牙加入了大聯盟，並答應兼併沿西班牙邊界的大片領土。這一外交上的轉向，大大擴大了英國在葡萄牙的影響，代表葡萄牙就參戰條件進行談判的大使同時還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即麥村協定(1703 年)，這次協定由於給葡萄牙帶來了嚴重後果而出了名。

戰爭從 1704 年開始，歷時八年。奧地利的王位謀求者以葡萄牙爲基地入侵西班牙，此時法國人已經進入西班牙領土並佔領了大片土地。1706 年，英葡聯軍攻佔馬德里並擁立卡洛斯三世爲國王，但是時隔不久卻在阿爾曼沙戰役中被擊潰。此後雙方又打了幾年消耗戰，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是法國在另外的戰場上遭到了幾次慘重的軍事失敗。烏特勒支和約(1713 年）結束了這場衝突。英國取得了勝利，從而得到了法屬美洲的大片領土，同時在西班牙殖民地進行貿易的權利也得到了保障。然而對葡萄牙的承諾並未兌現，盡管葡萄牙也是戰勝國，所得到的好處只是在巴西的邊境地區：葡萄牙在北部對亞馬遜河兩岸的所有權得到了承認，使法國的企圖遭到破滅；在南部，確定了銀河河口的邊界綫，打消了西班牙對薩克拉門托殖民地（相當於現今的烏拉圭）的領土要求。

61 經濟衰落

17 世紀中葉，葡萄牙經濟急劇衰落。1657 年的一次財政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以低沉的筆調描寫了當時的形勢：

“印度……今天已不幸地淪落到六大市場之地位。這六大市場是：没有設防的莫桑比克，安全毫無保證的果阿，岌岌可危的第烏，全靠國王的友情來維持的科欽，已爲荷蘭人所侵佔的科倫坡以及貿易已基本停止而且前景十分黯淡的澳門……安哥拉是巴西工廠（經濟活動）的神經，必須防範西班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將那裏的黑人從我們手中弄走，送往印度、巴巴多斯和其地方的企圖。聖多美島，這裏曾經是靠紡織品彙集資金，擴大安哥拉貿易的地方，現在似乎已不再屬於葡萄牙王室，因爲我們同該島已無任何貿易往來。幾内亞海岸，那裏擁有的財富曾使它享有礦産市場的美名，但現在已全部屬於其它國家了。這些國家同我們打仗時僅用這裏的礦産就足夠了。佛得角是各條航綫最爲重要的中轉站，一旦遭到襲擊，則毫無抵抗能力。巴西，葡萄牙王室的主要支柱，已發出呼救，這種援救對巴西來説是至關重要的。馬拉尼奥本打算成立新的帝國，但卻無法實現，一方面自己尚無力維持，同時又受到外部貪婪要求的威脅。附近一些隸屬該王國的島嶼（佔該國領土的三分之一）處於無設防狀態，而且由於印度總公司奪去了他們的貿易而使他們處於前所未有的貧困境地。葡萄牙終於感到力不從心，無力支持，這是因爲王室的收入完全消耗於支付利息、俸祿、年金和其它公共項目的開支。不僅無力支付大宗款項（鉅額開支）和正當費用，甚至也無力支付必要的零星開支。有許多次甚至拿不出

15000 或者 20000 雷伊斯來支付帕德梅拉送來的加工木材的運費！又有多少次甚至拿不出 15 或者 20 個托斯通來支付運送餅乾的船費！幾乎沒有錢來支付國庫官員們的薪俸了！盼望發放薪俸只不過是夢想。

對已經交納稅賦的平民已不能再加重負擔了，更爲糟糕的是："他們已無可奈何地失去信心悲傷而失望。國王陛下忠實的大臣們四面楚歌，到處都被強大的敵人所包圍，陸地上没有軍隊，海上没有兵艦……他們看到議會曾四次開會，然而形勢愈加困難，議會也束手無策。復蘇已毫無希望，而且他們也知道，陛下的大臣們並無信心，也不打算尋求解決辦法。他們認爲，名譽已經掃地，既然已經丢失了名譽，對手也就不再害怕我們，中立者也不願意再同我們交朋友。没有人來保護我們的事業，在他們看來，我們在世界上只是依賴其他民族而生存的。

這種形勢一直持續到巴西的黄金進入我國爲止。國內生産的收入不斷下降，王室的收入大部分依靠海關稅收和經營巴西産品合同的提成。由於國際競爭和海盜襲擊，同巴西的貿易成本不斷上升，此外還必須建立艦隊護送商船。但是既没有資本也没有企業家願意出面。根據安東尼奥·維埃拉神父提出的計劃，曾經打算把歐洲各地猶太人的資金引進葡萄牙，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是從葡萄牙逃出去的。爲此，必須向他們保證，凡用於上述用途的投資，宗教裁判所不得没收。然而這個問題在內部遭到了激烈反對。僑居國外的猶太人提出了他們參加這項事業的條件，但是没有被接受。巴西公司在經營了 13 年之後，終於被收歸國有。

62 貿易改革的嘗試

國外流行的東西在葡萄牙愈來愈受到賞識，因此，葡萄牙擴大了進口。凡是先進技術所需要的東西，由於葡萄牙不能生產，都得靠進口。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認爲，葡萄牙商業逐步形成的這種不平衡是國家貧困的根源之一（而不是其結果）：爲了支付進口，黃金不斷外流，因而使國家更加貧困。

18 世紀初，甚至進口舊衣服（外衣、牀單、襯衣、假髮）。里斯本議會對此十分氣憤，他們認爲這些衣服或許來自結核病患者或者麻瘋病患者，這對於健康是極爲有害的。議會還說，整個城市充滿了“鑲金邊的鏡子，碗櫥，算盤、寫字臺、桌子、貨架、鍍金刀具，家用裝飾品，以及其它小型製品，例如用其他金屬鑲嵌的金盒子和銀盒子，有的還鑲着寶石；鑲銀的馬鞭子，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東西在商店和公私商行中出售。”不僅城裏闊老競相購買法國製品，這種興趣已經擴展到民衆階層，並蔓延至全國。1723 年議會還表示：“經驗説明，由於街上充滿了外國人，他們使用的水晶玻璃器皿，澳門、熱那亞及英國瓷器，匈牙利茉莉花油，油脂、皇后香水及其它小製品；許多年輕人都臉上抹粉，鞋上擦油，在奢侈品上耗費了許多開支。這些東西，如果不是送貨上門不是挨家挨户去推銷就不可能那麼弔人胃口，就不可能使那些家中没有傭人，不能到公共場所去購買這些奢侈品的人得到滿足，也就不會這麼輕而易舉的奢侈起來。”爲逃避宗教裁判所迫害而離開葡萄牙的利貝洛·桑舍斯在 1726 年曾經説過，在科英布拉鮑塔仁大街有“12 或 15 家外國商店，學生們在那裏購買襪子、皮帶釦、手套、小刀、剪刀以

及其他從法國和英國進口的東西。他們在這裏學到並養成了非國外產品不穿的習慣。大學畢業後，他們成了醫生、文學家、神父、主教、法官、行政官員，但總是力求保持着那種生活方式，并且那樣生活下去。他們把這種奢侈生活習慣帶到全國各地，使許多人都模倣和追求異國生活方式。”

進口時髦商品的傾向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隨着國際交往的加强，也由於生產國爲取得市場而不斷施加壓力，以及光復運動之後，葡萄牙對外國商人的忍讓，工業產品的進口急劇增加，葡萄牙人的衣着歐洲化了，生活方式也歐洲化了，但是享受上的歐洲化並不等於生產技術的變化。葡萄牙的商品生產仍然沿有着陳舊的程序和方式，其產品主要是供應國内農村市場。農民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愈加明顯。

對於比較瞭解國外情況的葡萄牙人來説，由於他們能夠進行比較，葡萄牙經濟的落後自然十分明顯。因此，重商主義甚爲流行。這種經濟理論從收支平衡中看到了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任務：黄金對每個國家來説都是寶貴的財富，所以國家的政策應該是爭取黄金的流入量大於黄金的外流量。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擴大進口商品的生産，從而不再需要進口，避免黄金不斷外流。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一位在法國任職多年、對那裏情況十分熟悉的外交官，杜阿爾特·里貝洛·德·馬塞都於1675年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關於王國技術引進講話》。

文章説：“對任何國家來説，貨幣猶如人體的血液。血液的作用是向身體各部位提供養料，爲此，就需要不停地循環，在人體没有完全喪失功能之前，循環是不會停止的。貨幣也是這樣，它能使窮人產生需求，也能使富人產生欲望和虛榮。它通過技術（即通過工業）到達商人手裏，又通過商人轉到各種工

廠作坊，原材料在這裏經過技術加工；又從這些人手裏轉到靠耕種土地養家糊口的農民手裏，再由農民手裏轉到農場主手中，最後又以賦稅的形式從大家手裏變成王室的財產。然後又經過發放薪俸、年金、軍餉，購買武器，開辦造船廠，修建樓房，構築工事等項活動，重新從王室拋出來。只要貨幣在國內循環，就能向國家提供養料。但是一旦貨幣流到國外，國家就會有一種像人體失血那樣的感覺。”

進口就相當於失血，爲了避免這種長期失血，里貝洛·德·馬塞都建議要引進技術。就是說要建立工業，並特別強調要建立羊毛加工和絲紡工業。他認爲，進口這些產品是我們收支失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關於王國技術引進講話》一文的觀點，在葡萄牙得到廣泛支持。在歐洲資本主義形成的過程中葡萄牙處於極爲落後的地位。必須認識到這種經濟現實，同時還必須具有愛國主義感情，才能通過引進工業，找到擺脫外國殖民經濟的出路，因此，《關於王國技術引進講話》的設想便立即被納入國家計劃。埃里塞拉大公三世，D·路易斯·德·麥內澤斯是這個計劃的堅決執行者。在國家的支持下，他大力促進國產紡織品、玻璃、皮革製品以及鑄鐵的生產，並禁止這些產品進口。絲紡織業和推廣桑樹種植受到了特殊的重視，因爲絲紡織品的進口曾造成大量外匯外流。庫維良的羊毛加工業就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爲此還從英國招聘了紡織和圖案技工。

17 世紀經濟改革的嘗試未能堅持下去，也沒有達到目的。已經建立的工業既缺乏資金和原材料又缺乏組織管理。葡萄牙產品的質量劣於國外產品。因此，雖然下了不准進口的禁令，外國產品仍源源不斷地運進葡萄牙。在參加爭奪西班牙王位戰爭

的前夕，英國展開了外交活動，迫使葡萄牙放棄對毛紡工業的保護政策，因此英國的棉毛紡織品生產有了鉅大發展。由於他們同法國交戰的前景樂觀，英國人又開始尋求新的市場。在葡萄牙，酒的生產大大發展，遠遠超過了國内消費的能力。酒的經濟收益及廠商的盈利情況都依賴出口額的大小。由於我們限制了英國產品的進口，英國也對進口我國的產品進行了限制。根據麥村協定，葡萄牙被迫允許英國毛織品進口，英國則答應，對進口葡萄牙酒徵收的關税，比對進口其它國家同類產品減少三分之一。

放寬對紡織品的進口，很快就擴大到荷蘭紡織品和法國紡織品，然而這一變化并没有使葡萄牙的紡織作坊停業，只是阻礙了它的發展，使它只能生產低級產品。但是，平民百姓仍喜愛穿由小商販帶進市場的庫維良和波塔萊格雷的紡織產品，而上層階級則仍然穿戴從城市商店裏購買的英國呢絨。

麥村協定還產生了另外一個重要後果：即增加波爾圖酒的產量。年產量從 18 世紀初的大約一千桶增加到 18 世紀末的四萬四千桶。擴大葡萄種植是爲了增加出口，但是其結果是英國辦事處幾乎壟斷了波爾圖酒的貿易。進口英國產品要根據酒的出口數量而定，因爲英國只用實物而不用現金支付葡萄牙出口的酒。運送紡織品到葡萄牙的船隻返回時再將酒帶回英國，這樣不論是出口的利潤還是進口的利潤，都由外國貿易代理人獲得。1754 年，釀酒者抱怨説：英國人在波爾圖花一萬雷伊斯買一桶酒，但他們在英國卻以每桶六萬七千雷伊斯的價格出售。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儒里奥狄尼斯的小説《一個英國家庭》和拉馬略·奥爾蒂崗的《投槍》雜誌，都描寫了這方面的情況。

63 巴西的黄金

這時候，巴西發生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即發現了黄金。一個多世紀以來，經過長期的尋找和勘探，終於在17世紀末葉，在距沿海四百公里的内地，發現了豐富的黄金資源。這個地區就是今天的米納斯吉拉斯州，過去稱爲里約達斯維利亞斯。這是一種幾乎可以從水面上淘取到的沙金，用最原始的辦法就可以開採。

這一發現吸引了巴西各地、葡萄牙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冒險者。這個過去幾乎是荒無人烟的地區迅速繁榮起來。一些所謂的歷史名城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奥洛普列托，沙巴拉，瑪利亞那，聖若奥德萊依）。勘察繼續在巴西其它地方進行，並且又在戈亞斯（距今巴西利亞不遠）和同玻利維亞交界地區的馬托格羅索找到了另外一些大面積的金礦區。於是，這些地方出現一些新興城市和行政中心，後來便形成了兩個州。這樣殖民者的佔地面積便大量增加，同時，國家的經濟軸心也從沿海轉到内地，從北向南轉移。由於資本都集中於開發新的財源，以往的農牧業經濟趨於衰落。里約熱内盧這個彙聚米約斯吉拉斯黄金的港口，迅速發展，使以前的首府巴依亞的聖薩爾瓦多大爲遜色。18世紀的下半葉里約事實上已成爲巴西的首府。

1699年，第一批重達500公斤的黄金運抵里斯本，以後又逐年增加，1720年已達最高額25000公斤。由於缺乏統計資料，歷史學家在估計運往葡萄牙的黄金總額時出入甚大。據説有1000～3000噸。黄金進口一直繼續了半個世紀，其數量之大，足以影響歐洲的黄金價格。從1730年起又發現並開始開採鑽石

礦，到該世紀末生産已達 200 萬克拉。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生産急劇上昇，使歐洲的鑽石價格下降了約 75%。因此開採鑽石向王室上交的利潤大大低於黄金。

這些礦産的開採是由私人進行的，國家只是徵收稅賦，納稅率開始只規定爲開採額的五分之一。《巴西五分之一》這個詞就是由此而來的。但是應向國家交納的這部分稅收愈來愈難以保證，因爲採礦者有許多辦法蒙騙監督人員，逃避納稅。於是又制定了新的稅收形式；由市議會規定交稅金額（每年 100 阿羅巴——一阿羅巴相當於 15 公斤——譯者），由當局在鑄造車間截下部分黄金。這些企圖防止走私和保證稅收的辦法和强制性措施，常常引起採礦者的極大憤懣；這種對葡萄牙當局的不滿情緒，從開採黄金的時期開始，就在巴西不斷增加。

64 D·若奧五世時期

巴西黄金大規模流入時，正是 D·若奧五世統治的漫長時期。D·若奧五世在位近五十年（1706～1750 年）。但是國家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並沒有使我國的經濟水平發生決定性的改變，也沒有使葡萄牙的社會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黄金浪潮像陣風一樣從我們身邊吹過，國家卻依然如故。

對於這種現像最爲普遍的回答就是 D·若奧五世本人應對此負責。他揮霍了來自巴西的財富。事實確實如此，國王耗費了本應屬於國家的來自巴西的礦産收入；他用這筆收入供養豪華的宮廷以及支付維護王室聲望所需要的鉅額費用。

但是，巴西黄金只有五分之一上交國家，除了黄金收入，還有烟草（1716 年烟草佔王室收入總額的 20%），食糖，巴西木

和販賣非洲奴隸的收入。然而這些收入的大部分都在私人手裏。國內的商品貿易，特別是波爾圖的酒以及食鹽的出口，也是重要的財源之一。

但是金錢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如何用錢反映了用錢人的思想方法和素質。D·若奥五世時期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企業管理人員寥寥無幾，訓練有素的能夠利用原有財富做爲工具去創造新財富的人才極端缺乏。

當時的一位葡萄牙外交官若澤·達·庫尼亞·布羅啥多在描寫住在法國的地位優越的葡萄牙人的思想狀態時這樣寫道：

“在葡萄牙沒有科學，沒有政治，沒有經濟，沒有教育，沒有貴族，也沒有王室。文學已被置棄，教堂只知道做禮拜，誰也不會更不精通聖經史或其他聖書，神父本人（教堂裏的大哲學家）以及他們的教務會議鮮爲人知。人們對歷史，甚至他們自己的歷史都毫不瞭解。他們不瞭解自己的起源，也不瞭解自己祖先在海外的業績，不知道什麽是自己的利益，也不懂得應當信守什麽準則。對於他們（即葡萄牙人）什麽和平、戰爭、中立、奥地利王室或法國王室都一概不問不聞，他們不研究如何做生意，不懂得這是盈虧之道。有人受過一點神學教育，卻只是熱衷於詭辯理論及毫無價值的繁文縟節。大學裏學生最多的學科是民事法律，這門科學此時不僅無大用處，而且帶來不少弊病。法官和不學無術的文人充斥各地，他們誇誇其談，危害被告和原告雙方的利益。貴族階級狂妄自大，自視神聖，寡言少語，輕視經商；他們總是擔心陷入有關聲譽的糾紛之中（家庭聲譽），其實他們並不那麼神聖。他們十分清貧，從不拜謁王宮，不同人交往或者學點騎士風度，他們一竅不通，猶如村夫一般。沒有人教給他們自由派的生財之道，他們同一般資產階

級也沒有共同語言，他們的子女既沒有家庭教師也沒有人指導。如果他們之中有人試圖講一點科學或政治，就會有人譏笑他們，稱他們是'成人學生'，是不明智的瘋子。在他們的家庭裏也不像一般有錢人家那樣奴婢成群；即便有幾個僕人，也沒有明確的分工，也沒有那麼多規矩和禮儀。至於城市經濟（公共經濟）他們則漠不關心。他們能賺多少就花多少，從不考慮能否發大財，或者能否生活得更好一些。"

從 17 世紀初到 18 世紀中葉，有許多訪問者和外國駐葡萄牙大使的報告都有類似的看法。"黑種人"這個詞似乎被普遍用來形容葡萄牙人。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曾寫道，我們被認爲是歐洲的黑人。杜阿爾特・貝里洛・德、馬塞都在《關於王國技術引進講話》中指出，如果他提出的計劃能夠實行，"外國人就再也不會譏笑我們，就會把我們尊稱爲歐洲的印第安人"。路易斯・安東尼奧・維爾内則把印第安人同卡菲爾人聯係起來。他說："許多人從課本中學了點知識往往就被看成是大法學家，其實他們是如此粗俗，好像是剛剛從巴拉圭或者好望角來到這裏似的。"

在文化、藝術、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都缺乏有才幹的人。由於缺少有活力的企業家，使我國在黃金時代沒有出現能夠進行財富再生產的企業。特茹河只是成了這些財富的中轉站，這些財富都流向經濟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就是葡萄牙人只知消費而不會製造的產品的產地。英國就是這些地區中受益最多的國家。

豐富的黃金資源吸引了大批的外國人，他們打算在葡萄牙建立自己的工業或者在葡萄牙政府的鼓勵下在這裏生產從前需要進口的產品。但是這些活動，多半由於經營管理不善而告失

敗。1732 年，列日的一位冶金專家尼古拉烏·拉瓦什在里斯本附近的聖克拉拉村興建了一個大型鑄造廠，他到葡萄牙是爲了給瑪夫拉修道院鑄造大鐘。1734 年一位法國企業家羅伯特·戈丁以股票的形式把一些葡萄牙資方組成一家公司，也在里斯本開辦了一個絲織廠。技術人員從法國派來並按照法國的貨樣生產錦緞。但是這家公司不久就感到資金不足，而股東們又拒絕投入新的股份。1750 年國家不得不接管這個面臨破產的企業。

許多企業都同外國技術人員或企業家有關。1716 年，在一個熱那亞人的倡議下在洛烏沙修建了一座造紙廠。1718 年，我國駐法國大使克服了法國政府不允許技術人員出國而設置的重重障礙，終於使一位著名的鏡子製造商人來到葡萄牙經營一家玻璃廠，但這家企業沒有維持多久就癱瘓了。

D·若奧五世本人最主要的功績之一就是完成了一項宏偉的建築，即瑪夫拉修道院，其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了葡萄牙當時所有的宮殿。但是搞這樣大規模的建築葡萄牙並沒有相應的技術和人力。因而不得不從國外招聘大批的工匠和進口大量葡萄牙不能製造的藝術品。

圖紙是一位德國建築師路德維克設計的（在意大利他以路多維賽得名）。這個設計包括一座宏偉的王宮，一個能容納 300 人的修道院和一個天主教堂，總面積約 4000 平方米，共有 1300 個建築單元，其中包括大廳，房間及修士卧室。工程於 1717 年開始，直到 1750 年才結束。國王要求主教堂於 1730 年他生日的時候竣工。爲了按時完工，從全國各地强行徵集身强力壯的工人，繩捆索綁地送往瑪夫拉。這樣共徵集了 45000 名工人，他們在 7 千名士兵的看押下，被强制勞動。除了石頭之外（松梨山的黑色大理石從此而聞名），其餘材料完全是從國外運來的。

大部分石雕是在意大利製做的；裝飾板，祭祀用具，蠟燭架，鐘琴等是在羅馬、威尼斯、米蘭、法國、荷蘭、熱那亞及列日定做的。甚至連工人用的松木腳手架的木料及工棚木料都是從北歐買來的。瑪夫拉有一個意大利匠人叫嘉斯蒂，他在這裏幹活時帶了一幫徒弟，其中有意大利人也有葡萄牙人。繪畫都是特列維沙尼、邊堤、吉拉德、馬蘇西、科拉多和貢卡的作品。一代葡萄牙藝術家在這裏受到外國鉅匠的培養。其影響在後一世紀已十分明顯。所謂“彭巴爾風格”實際上就是葡萄牙藝術家將外國名師傳授的技藝葡萄牙化了。

還有一些藝術家來自國外，他們被招聘到葡萄牙搞豪華建築，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叫尼古拉烏·納索尼的意大利人。他於 1731 年在波爾圖定居，在這裏他先後設計并指導修建了許多著名建築（其中有塞利戈斯教堂及塔樓，慈善院，埃皮斯科帕爾王宮，弗萊索宮等等）。他的影響遍及整個米紐地區。這時期在北部修建的最漂亮的別墅在結構上都受到他的影響，而這種別墅的修建又同由於波爾圖酒的出口量的增長所創造的財富不無關係。

里斯本自由河引水渠也是在D·若奥五世時期修建的。但是這一工程既非王室倡議，也未得到王室的慷慨贊助。將貝拉斯—坎內薩斯地區的自由河水引進變都的計劃由來已久。最初的嘗試應歸功於羅馬人。D·曼努埃爾曾打算自由河水引到羅西奧，但是盡管在販運香料初期財源充足，然而仍然無力實現該項計劃，缺水現象仍然是里斯本曠日持久的災難。一位議員提出了修建引水渠的倡議，國王下令研究由全市市民集資解決經費問題的可行性。經過長期醞釀，市民們同意對在里斯本銷售的生肉、酒類、橄欖油、食鹽和稻草等徵收附加稅；然而政

府進行干預，不許對食鹽和稻草徵收附加稅。工程於 1731 年開工，由 20 名葡萄牙石匠組成公司負責施工。原計劃引水渠只修到城市東區，但後來一直修到該城高地勢區，因爲這個區的缺水問題尤其嚴重。

引水渠工程被里斯本市民看作是全民的光輝業績。1748 年在桑樹街街口修建了一座紀念牌樓，上面用拉丁文刻寫着："1748 年在仁慈的、吉星高照的、慷慨仗義的國王 D·若奧五世在位時期，里斯本議會和人民，靠該市人民自己的力量終於將盼望了兩個世紀之久的自由河水引入該市。這項工程長達九千跨步，開山鑿洞，經過 20 年的不懈努力才建成的。"彭巴爾侯爵對這些話的真正含意十分清楚。於是 1773 年 3 月 20 日他下令推倒紀念牌樓，以使人們不再知道有上述碑文的存在。原碑文被彭巴爾改寫爲："在葡萄牙公認的、最卓越的國王 D·若奧五世的領導下，清澈的河水經過長達九千跨步，堅固無比的並將留芳百世的引水渠道，流入市區；這項工程得到了公衆力所能及的資助和全體人民真誠的贊譽。1748 年"。

65 文化交往及改革要求

在整個 17 世紀，葡萄牙這種落後狀況使其與歐洲其它發達的文明國家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特別是同英國、荷蘭和法國的差距。這個差距最突出，最明顯地表現在科研和經濟方面。17 世紀曾經出現過要求改革的傾向，並在以後的一百年中繼續發展。這個運動主要是僑居在國外的葡萄牙人發起的，其中一部分是外交官員（如庫尼亞·布羅啥多，卡瓦萊羅·法、奧利維拉，D·路易·斯·達·庫尼亞，亞力山德烈·德·古斯芒及彭

巴爾本人)；另一部分人則是爲逃避宗教裁判所繼續對知識分子進行的迫害，尤其是擔心被譴責爲猶太分子而遷居國外的人(如雅哥布・德・卡斯特羅・薩爾曼托，里貝洛・桑舍斯)。對這些在國外受到啓發並主張倣效外國的思想、方法及文學流派的知識分子通稱爲“模倣國外派”。

模倣國外派思想上的特點是開明，重視經驗和實利主義。他們認爲葡萄牙之所以落後，是由於缺少文化。爲了取得進步，就必須傳播現代思想的光輝，即進步與開明——兩者實際上難以區分。另一方面他們還認爲缺少文化應該歸咎於葡萄牙學校現行的理論教育、思想教育和教條式教育。因此，模倣國外派成了耶穌教士的敵人，因爲耶穌教士壟斷了人文教育（即大學預科）並繼續忠實於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和理性教育。模倣國外派認爲科學的進步，并不是由於消極地接受了某些原則和教條，而是因爲注重對實際的觀察，注重科學實驗，注重通過歸納提出定律。培根、牛頓因此而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地位，實驗室當時成了一處時髦和思想解放的標誌。1725 年一個英國科普學者在里斯本散發一種講義，稱爲現代科學教程 30 講，說他有望遠鏡、顯微鏡、光學儀器、溫度計及濕度計，並保證通過現代化實驗在一個小時內學到的東西比通過幾個月的理論講解學到的知識還要多。

對實驗及歸納法的興趣吸引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在一些文學會議上也進行物理實驗。這個時期已開始安裝避雷器，巴托洛梅・德・古斯芒神父發明了飛艇就是這次科學熱潮中的插曲之一。1776 年，葡萄牙當時最大的青銅鑄像 D・若澤塑像揭幕時，人們對冶金工程師而不是對雕塑家表達他們的敬意。因爲是他解決了從泥塑到銅鑄過渡的技術問題。技術比藝術天才更

加受到尊崇，發展科學的目的還是用於實踐。這種態度在向19世紀過渡時逐漸減弱；19世紀知識界的傑出人物又重新崇尚理論教育，他們思考問題的方法也是由理論到實踐。

路易·安東尼奥·維爾內是教育改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父親是法國人，他本人的大半生是在意大利度過的。他的最主要作品《真正的學習方法》(1746年)包括了各個科學領域深入改革的指導思想，完全撇開了古代哲學家的權威。他寫道："這些哲學家沒有望遠鏡來觀察星球，沒有顯微鏡來觀察肉眼看不見的物質，也沒有這麼多的儀器，這些儀器通過現代方法，大大豐富了物理學。這些儀器，有的是上世紀發明的，有的是本世紀製造的；而現在每天都有新的發明。這些實驗提供了多大的使用價值啊！通過這些觀察我們解除了多少疑難啊！過去，自然科學家在動物身上看到的只不過是連屠夫也能看到的東西，他們在樹上觀察到的，木匠也能看得到；對於金屬他們所發現的東西並不比鑄造工瞭解得更多。但是今天自然科學家可以對這些物質進行剖析，就像解釋鐘錶的構造那樣來解釋這些東西的組織結構。這種觀察自然界的方法打開了自然科學家的眼界，同時表明，一些不明原因的運動就起因於各種物質的自然構造。"他還主張用這種方法進行教育。他說："如果我同一個人談論物質形式，貧困，第一行爲，第二行爲，教育的作用等等，這只是一盤大雜燴，我相信他什麼也聽不懂，相反，如果我將這種或那種物質做些實驗給他看，並向他講解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我相信他一定能聽得明白。"

官方的文化政策，對於新思想是極爲敏感的，盡管並未涉及大規模的改革。大的改革還是從彭巴爾上臺才開始的。奧拉托利會的教士受到到了保護，因爲他們在當時代表了現代教育，

並在乃塞西達德斯修道院開設了一個教育中心，裏邊還有一所物理實驗室。1735年，曾經在英國居住過的猶太人醫生雅哥布·德·卡斯特羅·薩爾曼托應葡萄牙當局的請求開始翻譯現代科學思想的主要著作、培根的《新工具》一書，但是翻譯工作没有進行到底。這些書例外地受到國王保護。根據國王的命令，建立了雄偉的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和瑪夫拉宮圖書館。葡萄牙外交人員得到指示可以購買駐在國出版的書籍並寄回葡萄牙。在D·若奥五世的倡議下，還創建了"葡萄牙皇家歷史學會"，更新了我國歷史研究的方法，並寫出了第一批具有科學性的以文件史料爲依據的作品。

66 彭巴爾的改革

1. 彭巴爾侯爵

D·若奥五世在執政的最後幾年，中央集權已處於解體和運轉不靈的狀態。巴西的收入急劇下降，並造成國家財政的衰竭。由於在海外任職而大發横財的貴族的權力和獨立性日漸增强。國王在最後幾年卧牀不起，大臣們也像他一樣年老力衰；只有亞力山德烈·德·古斯芒是個例外。他是一個模倣國外派，當時已經看出葡萄牙陷入"迷信與無知的浪滔之中"，然而他也終於被這些浪滔所淹没，不再進行任何改革的嘗試。

D·若奥五世於1750年逝世。他的繼承人D·若澤（1750～1777年）組建了新的政府。他任用已經年過半百、新近結束使命剛剛從奥地利首都回國的外交官塞巴斯蒂昂·若澤·卡爾瓦略·依·麥洛擔任外交和國防大臣，此外還負責全部重大政治決策。在此之前，他曾擔任葡萄牙駐英國代表多年。他近40

歲才開始擔任公職，以前一直默默無聞。他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同文化界有過聯係，因爲他曾是葡萄牙歷史學會的成員，并在該學會有過一段短期的平凡的經歷。

他是一位不受貴族遺老歡迎的人物。他本人也是一個内地官宦的後裔，其家庭成員不乏官吏，而且收入甚爲可觀，在里斯本福莫薩大街（現爲世紀大街）建有一座官邸，他就出生在這裏。這些貴族遺老之所以不歡迎他，也許出於以他那生氣勃勃的才幹和强硬手腕的畏懼。他是由葡萄牙駐法國大使智慧敏鋭的D·路易斯·達·庫尼亞，推薦給D·若奥五世的，因而後來被招入政府。亞力山德烈·德·古斯芒在彭巴爾參與政權後離開政府，他感到新大臣將進入自己的歷史時期。“巴沙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人民定將得到好處，他將流芳百世，他在許多方面的主張所取得的成就將受到贊頌。”

事實上，這位新的掌權者立刻控制了其它各部。1751年，奥地利大使在他的報告中寫道：“國王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獵、騎馬、打牌、聽音樂或進行其它消譴，對卡爾瓦略十分信賴，讓他掌握了大權。”在同一個報告中又説：“一些貴族盡管具有卓越的才幹而且人品出衆，卻不能在宫廷謀到一官半職，更不用説外交職務了。”

於是，一場反對對仁慈的國王當政時期擁有絶對權力的貴族勢力的鬥爭終於展開了。與此同時貴族勢力反對彭巴爾的鬥爭也開始了。爲了貶低他，貴族叫他塞巴斯蒂昂·若澤，像稱呼平民那樣稱呼他，但是他並沒有以這個名字出名。1759年國王晉昇他爲上等貴族，封號爲奥埃拉斯伯爵。1770年再次對他嘉獎封他爲彭巴爾侯爵。

2. 地震與新里斯本

1755 年 11 月 1 日，一次可怕的地震震撼了里斯本。有一萬幢樓房成爲廢墟，其中包括許多教堂。因爲這一天正好是聖日，而且正是做彌撒的時間，教堂里擠滿了人，所以死亡人數甚多。但是貴族卻得以幸存，因爲他們去做彌撒的時間一般都比較晚。

地震以及地震後的火災使里斯本市中心區遭到嚴重破壞。一些老區（阿爾法馬區，莫拉里亞區，聖母區，沙布列加斯區）受害較小，一些新區（耶穌區，拉托區，莫康博區，聖若澤區，塞巴斯蒂昂·達·佩德來拉區，阿羅尤斯區）也幸免於難。既是在遭到破壞的地區内也還有許多房屋得以幸存。

這次災難爲這位大臣提供了顯示才能的機會，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簡化對盜賊審判的法律手續。凡在廢墟上謀財者就地槍決。地方軍團奉命開往里斯本，强制擁擠在城外道路上的驚慌失措的人群返回市内。緊接着就是重建首都。房主們想重建自己的住房，但政府下令在總規劃公佈之前不得動工，於是在公佈之前新建的房屋都被推倒，房主們還必須承擔拆除的費用。

新的城市規劃於 1758 年 6 月 12 日公佈。不論原房屋是否倒塌，房主都得根據新規劃進行重建。五年之内不建房者將失去建房權利，地皮將出售給有錢購買者。這樣許多地産便從經濟拮據的貴族手裏轉到了擁有財産的商人手裏，因爲他們能夠付得起多種罰金。1763 年已經建起了許多樓房，但是這些房子大部分都還空着，因爲没有人願意住。里斯本人習慣住在簡陋的房舍裏。後來一道新的法令規定：所有的平房一律拆除，借口是這些房子都是在禁止建房時期蓋起來的。

里斯本的重建方案是葡萄牙建築師設計和領導施工的，他們是：歐仁尼奥·多士·桑托斯、曼努埃爾·達·瑪亞，後來

還有卡洛斯·馬德爾。但是從各種有關重建的命令來看，大臣的參與起了决定性作用。這座新城市的規劃反映了這位社會活動家對整個國家的設想；平面圖呈直綫幾何圖形，所有大樓的立面圖都是相同的，沒有宮殿，也沒有任何表明樓房主人貴族身份的外部標誌，大門也無一例外。爲了防止不統一的現象，甚至下令不許在窗子周圍建造花池或放置石竹花盆。對教堂建築也有嚴格規定，其高度應和其它建築一致，建築圖也應由國家建築師設計。按照彭巴爾的設想主廣場上應該集中國家的機構；上層是政府的辦公機關，下面則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支柱——商店。國王的雕像就像在閱兵一樣，坐騎向前，蹄踩毒蛇（即奸佞之人）。過去的王宮已片瓦無存，王宮的所在地，——王宮廣場也已改爲商業廣場。改變名稱並非爲了反對習慣勢力，而是因爲這是在地震之前就决定了的。

3. 清除敵對勢力

在地震之後的二年中間，這位大臣利用已經鞏固了的權勢，行使絶對權力，無情地鎮壓所有反對派的勢力，或者在他看來會反對他的勢力。

1756年，一起企圖成立包括上層貴族代表在内的新政府的陰謀敗露了，所有受牽連的人都被充軍到安哥拉。兩年後，一次謀殺國王的計劃又爲他提供了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的借口。一千多人因此而被捕，犯人的供詞都是以酷刑逼供的辦法取得的。但是這種做法是合法的；然而對原告、見證人用刑卻是違反法律的。法官們還受權可以創造新的刑罰對被告用刑，因爲法律規定的刑罰似乎都不夠嚴厲。結果被告人的手臂或雙腿的骨骼被錘子敲碎，然後被活活燒死。阿維羅公爵就是遭受這種

刑法上層貴族中的一個。此後，對貴族的迫害仍未停止。當彭巴爾離開政治舞臺的時候，有 800 名政治犯獲釋，但是死在監獄中的人數多達 2400 人。

耶穌會被認爲同這次謀殺國王的行動有牽連。耶穌教士當時有着極大的政治影響：他們是國王及王室的懺悔牧師，也是貴族家中的家庭教師。他們被驅除出境，驅除出海外領地，財產被没收。因此連續幾年，强大的耶穌教會同這位大臣之間進行着一場殊死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彭巴爾巧妙地爭取到了法國和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他甚至建議如果耶穌會未被消滅的話，就對教皇採取軍事行動，佔領羅馬及其屬地。這場鬥爭中有個插曲，就是葡萄牙出版了《年代學推算》一書，在歐洲引起了反響。這是一本反耶酥會的諷刺文學，它把葡萄牙歷史上的所有災難都歸罪於耶穌教會，並且認爲耶穌會是世界進步和人民幸福的主要障礙。這是一本道地的雄辯的傑作，其中一部分好像是彭巴爾自己撰寫的，整個書反映了他的思想觀點。這本書震動了教皇的顧問們，他們感到羅馬元老院對耶穌會的保護使教會的威望下降。這場鬥爭以彭巴爾大獲全勝而告終。新教皇克萊曼特十四世於 1773 年取消了耶穌會，事前曾將取消耶穌會的手諭初稿交給這位葡萄牙政治家過目。直到 1814 年，聖依納西奥·德·洛約拉教堂才得以恢復。1760 年教皇的使節被驅除出葡萄牙，同年，宗教裁判所總裁判長（他是 D·若奧五世的私生子）被捕，甚至議論要將他處以死刑。從此以後，葡萄牙教會完全成了這位大臣手中的馴服工具，不少人主張應建立獨立於羅馬教庭的盧濟塔尼亞人教會。

1757 年，波爾圖爆發了反對上杜羅酒類農業總公司的群衆騷動。該公司於 1756 年成立，壟斷了波市圖市的全部酒店。它

利用手中的特權不僅關閉了許多小酒館，而且在營業的酒店裏提高零售價格。人民群衆被激怒了，於是成群結隊走上街頭，高呼口號："人民萬歲！打倒總公司！"

彭巴爾認爲這是一場平民叛亂，他在談及此事時說："任何可能被認爲是不忠於國王的行動都會引起整個葡萄牙民族的恐懼。"因此，這次騷動便成了彭巴爾殺一儆百以消除民衆反抗危險的一個極好機會。(其實那時人民已不再構成對王室權力的實際限製，但是傳統觀念依然認爲對王室權力的限制來自三個方面：教會，貴族和平民。前兩個已被制服，最後一個也必須摧毁。) 於是，城市被軍隊佔領，一個法官委員會受命審理參加騷亂的人，委員會可以採取"即席判決的程序。根據這種程序只考慮犯罪事實，不必拘泥於民事手續。"法官們忠實地執行這一指令：將30多人處以絞刑，其中包括城市人民法官和幾名婦女。

1755年至1758年，教會、貴族和平民都接受了教訓，這位大臣在以後的20年中再也没有遇到什麼麻煩。

4. 改革

這20年中進行了廣泛的建設。總的方針是重建國家機構，繁榮經濟，改善教育方法和改組教育機構。

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就要不斷集中權力和提高公務機構的工作效率。爲此還建立了一些新的機構（如貿易委員會，王室金庫，教育委員會)。改革國家收入上交辦法，改組海關機構，改寫高級法院刑法，改建軍事組織及檢查機關（此前一直是由宗教裁判所進行檢查，從此時起改由王室檢查委員會負責，其任務是保衛政權而不是維護宗教的正統觀念)。1769年法律學家的"一切機智的詭辨，臆造的抽象理論，及狡黠的才思"都

被禁止，即禁止解釋法律，同時禁止使用羅馬法典和教會法規。每當對法律條文的含義有分歧時，由上訴法院（由國王挑選法官組成）確定其準確含義。這項法律是爲了保障一切法律行爲都服從政府的意志。然而結果卻是出現了一個重振法律的運動。促使現代化的措施還有：消除新舊教徒之間的差異，制定有關巴西印第安人的法律，承認他們的人身自由，宣佈奴隸可以自由生育，可以從事各種工作，得到各種榮譽並享有個人尊嚴。

商業的發展有賴於資本主義企業結構的形成。彭巴爾力圖達到這個目的，組織了一些私人集資的公司，國家保證其壟斷地位，從而也就保證了他們的收益。這些公司的業務活動也要聽從國家的指導。因而出現了"亞洲公司"（1753年），帕拉及馬拉尼奥公司（1755年）捕鯨公司（1756年），伯南布哥及帕拉伊巴公司（1759年）。商業被認爲是高尚行業，過去只有貴族才享有的長子繼承權，現在擴大到商人。爲培養商業職員，開辦了商業培訓班，課程包括數學入門，會計，兑換業務。

爲促進工業的發展，繼續執行以前的政策，招募外國技術人員並給予特權，鼓勵他們開展活動。因此促進了絲織品、毛織品、氈帽、象牙梳、清漆、臘光漆、膠、鈕釦、陶瓷、鐘錶、鑲嵌寶石以及紙牌的生產。工廠大量增加。1788年全國有425家工廠（大多數都還是簡單的手工業作坊）。還沒有一家工廠有蒸氣機，而這種設備在英國已普遍使用，因此我們的工業產品根本無法同英國人競爭。

教育改革在驅逐耶穌會教士之後變得極爲迫切，因爲這些教士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學校中，掌握着中學教育和大部分小學教育。早在1759年宣佈取締耶穌會學校的同一法令中還宣佈"拆除學校中教會的紀念性標誌，就像它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

在各重鎮首府開設拉丁語語法課程和修辭學課程，未經官方許可不得私自辦學。1761年，在里斯本創辦了貴族學校，從課程安排來看，對自然科學（數學、幾何、三角、微積分、積分學、機構學、靜力學、流體靜力學、水力學、光學、屈光學、反射光學、天文學、地理學及航海學）極爲重視。幾年之後，發現這種要求同學生的年齡不適應，因此後來的教學、只局限於文化課程。

1772年公佈了關於設置教授讀書和寫字教師職務的法律，第一次確立了我國總的教育方針。基本思想是教育應當根據每個人將來所從事的社會職能來施教。對於那些將來從事農業和當工人的人則不必要求學歷，只要有神父的教誨就足夠了。對於將來擔任高級職務的人應分爲二類：一類是只要求會讀、寫、計算；另一種則要求繼續深造，昇入大學；大學教育則是“爲國家培養棟梁之材”。對於這些人設有中學教育，課程包括拉丁語語法，希臘語，修辭學和哲學。全國有479名教閱讀課的教師的編制、236名拉丁語，修辭學，希臘語和哲學教師的編制。彭巴爾的這種教學設想（即；小學基礎教育、培養精華的高等教育及不分科的中等教育，因爲中等教育主要是爲高等教育做準備）作爲全國教育機構的基本規劃幾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新的大學教學章程也是在1772年頒佈的。當時的大學執行的還是D·若奧三世時期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非常落後，對於近兩個世紀哲學和科學的變革一無所知。在科英布拉，幾乎無人知曉牛頓、笛卡爾、萊布尼茨和洛克。教育方面只是掌握亞力士多德的理論，死背硬記。這種教育不僅過時而且非常浮淺。彭巴爾的改革不僅在課程安排上同時在改變教學方法及教學思想上都是比較徹底的。新設立了兩個系，數學系和哲學系。如

果要讀數學系就必須選修其它課程。哲學系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系，包括自然科學，實驗物理和化學。推理和實驗是它的主要方法（至少在大綱上是這樣規定的）。禁止沿用抄寫講義的習慣；翻譯了一些外國的教科書，並規定必須使用這些課本。在法律學和醫學方面的改革尤爲重要。在法律學方面，擯棄了含糊不清的文本，採用了歷史的方法（即通過研究其歷史形成來解釋法律制度），結果促進了對葡萄牙歷史的學習。在醫學方面，注重實踐教育，重視讓學生接觸大學附屬公共醫院的病人。建立了物理實驗室、植物園、解剖室，天文臺及學校印刷廠。招聘了外籍教員（只有五例）來教授那些完全沒有人能夠承擔的課程。在仍然保留舊教育結構的學校裏，一些老教授仍然留在現在的教授職位上。

從總體來看，彭巴爾的大學改革的確是有膽識和進步意義的，即使同當時歐洲的其他大學相比較也是如此。盡管這樣，科英布拉的創造發明活動 後來的年代裏並沒有太大的成就。1800年，學校當局又建議在學生宿舍進行搜查，收繳禁書。在1778年，幾位比較有名望的教授曾受到迫害；幾何學家若澤·阿納斯塔西奧·達·庫尼亞被逮捕，他的罪狀之一就是贊賞伏爾泰（法國作家、哲學家、啓蒙思想家——譯者）。同一年，阿維拉爾（布洛特羅）神父爲擺脱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而逃往法國。

67 關於彭巴爾的爭論

彭巴爾侯爵其人是我國歷史上爭論較大的人物之一。這種爭論當他在世時就開始了。他有許多崇拜者，如教皇克萊曼特十四世在談到他時曾經説過：“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但

是他也有許多反對者，伏爾泰把他處決馬拉格里達神父一事稱之爲一場荒誕可笑、粗暴野蠻的鬧劇。直到今天，一個經常提及的問題就是問你是贊同還是反對彭巴爾。

這場爭論包含有兩個主要矛盾：傳統與革新；專制與自由。所以無論是傳統的獨裁制的擁護者還是主張自由派改革的人，都不容易作出判斷。

在他上臺之後，對歐洲的發展瞭如指掌的知識界，尖銳地意識到葡萄牙的落後。利貝洛·桑舍斯明確地指出：在他那個時代還在葡萄牙當道的“哥德式君主制度”，同他在國外，特別是英國和荷蘭看到的、不是以特權而是以貿易和工業爲基礎的“現代君主制度”的對立。曾經在國外生活過並瞭解這種狀況的彭巴爾，決定結束哥德式君主制度，代之以現代君主制度。爲此，他對舊的君主制度賴以生存的特權階層採取了嚴厲打擊的政策。當這些受害者從監獄裏出來并企圖恢復舊的秩序時，首先開始散佈反彭巴爾的言論；在他們眼裏，這位大臣只不過是一個血腥的暴君：他的統治是一個漫長的黑夜；他的所做所爲背離了以憐憫爲本的正統的葡萄牙傳統，因此，成爲我國歷史上一個可恥的污點。主張維護傳統觀念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沿用這一觀念反對彭巴爾。

隨着追求另一種君主體制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現（盡管渠道不同），這位國家要人的形象又有所恢復。恢復他的名譽，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舊制度的捍衛者，他們曾經是彭巴爾的敵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同恢復彭巴爾的形象是有矛盾的。但是有一點使這位候爵得到了自由主義派的極大同情，這就是他同教會的鬥爭，特别是同耶穌會的斗鬥爭。教會的影響是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嚴重障礙；這個曾經戰勝教會勢力的人，現在在敵視

他的政權中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人物。共和主義者曾多次利用彭巴爾的名字進行宣傳。在他逝世一百週年的時候，一些政治勢力大搞慶祝活動，這一切都表明這位獨裁君主制度的代表人物在何種程度上被自相矛盾的推崇爲自由主義思想的維護者。

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引起了第二次反彭巴爾的浪潮。一些比較苛求的自由主義者（像卡米洛，奧利維拉·馬爾建斯，盧西奥·德·阿澤維多，安東尼奥·塞爾吉奧）認爲彭巴爾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暴君，這是彭巴爾其人最突出的一面。

但是用自由主義的信條去評價彭巴爾是一個不易覺察的時代錯誤；就像評價 D. 阿豐索·恩裏格斯，說他不是一位共和主義者一樣。D·若澤的這位寵臣，出生在 17 世紀，他曾經到過科英布拉，那時候，啓蒙主義尚未傳到那裏。盧梭的《民約論》第一版出版於 1752 年，這時候已經開始出版《法國百科全書》。當時已年過五十的彭巴爾還在臺上。亞當·斯密發表他的經濟自由論思想的時候，這位政治家已處於政治生涯的末期，自由主義精神的各種表現對他來說是一種陌生的東西，對他那一代人所具有的整個信念則是一種挑戰。他把這些稱之爲“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墮落的哲學家們”的作品。因爲這類事歸王室檢查委員會管轄，因此他把這件事交給了這個機構處理。

他本人對這些新思想的立場在 1774 年公佈的官方文件中說得非常清楚。這是侯爵起草的一封“信”，據說這封信是寫給一位上年紀的商人的。這位商人想用自己的積蓄在里斯本購買地皮，修建房屋，但是，在敵視政府的人的挑撥下又打算放棄這個念頭。他們對他說：“如果你這樣做，今後你就没有自由來處理本來是屬於你的財産了（這種說法也是對的，因爲彭巴爾禁止 60 歲以上的人進行饋贈）。”他在這封“信”中寫道：“自

從人們決定結社生活以來，就沒有，也不可能再有那種超越法律所允許的自由，這些法律是由最高當權者（即國王）發佈的。而最高當權者本身以爲他所決定的任何事情，對他的臣民都是有用並且有益的。只是這些有用的法律在公衆的眼裏尚不被重視。一個熱愛并遵守道德的好人，不能夠也不應該要求其它自由。”這就是說：對於彭巴爾，人民唯一的自由就是服從的自由，把人民的好壞同國家的利益混在一起。

在1769年的一道法令中，流露了他對宗教裁判所的看法：各主教兼有那麼多的職務，使他們無暇顧及保衛宗教純潔之大事，然而，宗教之純潔至爲重要。君主制度必須設立能夠履行其公共職責的機構，爲此D·若奧二世建立了宗教裁判所，這個法庭曾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然而由於一些作家不明白這個道理，不瞭解這些事實，“盡管他們博學多識，好心好意而且深受教會賞識，在他們的著作中還是發表了一些如果他們當時在場肯定不會發表的評論。”他下令沒收非難宗教裁判所的這些作家的全部著作，並將那些敢於閱讀和擁有這些書籍的人判以徒刑。

這就是18世紀中葉對葡萄牙社會進行改革的人的思想狀況，他的全部活動都是爲了維護政府的權威，而不是臣民的自由。在他成長和受教育的年代裏佔主導地位的政治信條就是獨裁。他所追求的正是實現這個信條。然而，獨裁可以是進步的，也可以是反動的；它可以用於革新也可以用於保守。對於他那個時代，尤其對葡萄牙當時的形勢，彭巴爾的所做所爲還是有進步意義的。光復運動之後逐步形成的新的分封制度被徹底鏟除了。建立資本主義企業基礎對於發展經濟是極爲重要的，制定這方面的政策將對以後的繁榮產生了影響。高等教育的改革

同當時代表進步思想的精神是相吻合的。總的講，變哥德式君主制度爲現代君主制度的目的已經達到，17世紀的落後狀態在他執政的27年中已基本改變。

1777～1820年

古代政權的結束

68　復舊運動　D・瑪莉婭時期

D・若澤卒於1777年，他的女兒即同D・彼得羅王子結婚的D・瑪莉婭一世繼承了王位。彼得羅事實上是她的叔父，因爲他是D・若澤的兄弟。女王及其丈夫一直不理政務，但誰都知道他們對彭巴爾沒有好感。在彭巴爾執政期間被壓制的力量迅速復活並力圖恢復過去的勢力。大街上曾經發生過反對"暴君"的示威游行，刻有王宮廣場雕像的特製銅質勛章被拋棄或者被隱藏起來。800名政治犯離開臨獄，要求爲他們恢復名譽，並要求懲辦彭巴爾。他除了被指責爲暴君之外，還被指控有含污行爲（前大臣在他多次辯護中從未說明他在任期間積累鉅額財富的來源）。這段混亂的、怨聲載道的時期被稱之爲復舊運動。

但是復舊運動同彭巴爾的敵人的期望和要求相差甚遠。政府重新改組，增加了兩名高級貴族的代表（安熱嘉侯爵和塞爾維拉新鎮大公，只是他們的作用都無關緊要），但仍保留了兩位彭巴爾時期的大臣。指責大學搞思想自由後反對在大學進行改革的意見未受置理。盡管校長一直公開强調，他對彭巴爾極爲崇拜，但他仍然繼續留任。對於因謀殺D·若澤而被處決的貴族恢復名譽問題，謹慎地進行了研究。阿維羅公爵的罪行被確認。侯爵被驅出宫廷，被勒令定居在彭巴爾鎮。他曾被立案審查，後被女王赦免。他的貴族頭銜及大臣俸祿，甚至連同有爭議的財産均准予保留。這種寬大處理的後臺可能是女王的懺悔神父弗萊易·依納西奥·德·聖卡埃塔諾。他是彭巴爾扶植起來的人，但在彭巴爾倒臺之後，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

政府的政策已有所改變。壟斷巴西貿易的大公司被取締了，後於1780年宣佈所有商品一律自由貿易。但是上杜羅葡萄酒公司盡管曾遭到過激烈的反對，還是保留了下來，只是取消了一些極不得人心的特權。總的來説，彭巴爾的經濟管制政策被拋棄了，許多由國家經銷的産品交由私人集團去經營。但是彭巴爾發展資本主義形式的主張被保留下來，並産生了一些效果。當時的國際形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極爲有利。美國的獨立戰爭（1776～1783年）是向英、法海上勢力的挑戰，切斷了英國在大西洋上的貿易，我國的産品因此而得到極大的好處。甚至在歐洲聯合反對法國革命的時期，我們做爲英國商品供應國也大獲其利。葡萄酒的出口大量增加，而從英國的進口卻減少了。那幾年在我國同英國的貿易關係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順差。

到這個世紀末，由於國内政治形勢比較穩定，貨幣充足，各種國家和私人的文化生活也有了發展的可能。1779年，頒佈皇

家科學院章程，目的是爲了促使科學研究，爲葡萄牙經濟發展服務。《科學院經濟回顧》(1789～1815年）與《農業回顧》，發表了許多有關經濟技術現代化的論文。科學院的這些著作，從總體上講，是該院成立初期知識界對國家發展所做的極爲重要的集體貢獻。科學院享有的比較突出特權之一就是其著作出版可以不受檢查。其它文化機構還有波爾圖的公立美術學校，里斯本的皇家美術學院，海軍及城堡建築學院，炮兵測繪學院及皇家圖書館。該圖書館建於1796年，次年向公衆開放。

在這一時期（即1780年）建立了里斯本慈善院。這個慈善院的建立是同警察總監皮納·馬尼克的名字分不開的。這家慈善機構發展很快，後來甚至在幾個國家建立了學習中心，其目的只是爲了維護治安（收容乞丐，當時里斯本街頭的乞丐比比皆是），救濟並收養孤兒，發展文化事業（舉辦技術學校和職業教育中心）。在那裏可以傳授技術、初級文化知識、語言、解剖學、藥劑學及産科學。照拉提諾·科埃略的說法，這是一所貧民大學。

當時修建的歷史性建築是這個令人尊敬的富足的貴族統治時期的一面鏡子。漂亮的法國式的格魯斯宮就是這個時期修建的。大地震後國王曾居住在木結構的住宅裏，後來木屋被燒，格魯斯宮就成了王宮。當時還計劃修建一座里斯本還未曾有過的宏偉王宮，但是，君主專制時期的大規模建設此時已處於尾聲，這座由意大利人設計的龐大的宮殿只建成了一小部分（即現在的阿茹達宮)。這個世紀末的危機以及後來的自由主義革命和外部入侵，使得這項工程不得不半途擱淺。按照女王旨意。爲了紀念王位繼承人的誕生，又修建了巴劑利卡·達·埃斯特列拉教堂。這座教堂同瑪夫拉教堂極爲相似，能使人聯想起D·若奥

五世時代；高高聳立於城市樓群之上的鐘樓與屋頂，這在彭巴爾搞統一高度建築的時期是不允許的。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大建築是拉梅戈的列麥迪奧斯聖主教堂。布拉加的聖耶穌教堂及孔德鎮的聖克拉拉修道院。在資本家集團的倡議下，在里斯本還修建了聖卡洛斯大劇院，該劇院倣照了納波列斯的聖卡洛斯劇院。在波爾圖修建了聖若奧劇院，是由意大得人設計的。作爲出口葡萄酒而獲得鉅大財富的見證還有根據英國領事的建議，在英國設計的紀念性建築波爾圖的聖安東尼奧醫院以及波爾圖的聖弗朗西斯科教堂。

69　葡萄牙與歐洲危機

1789 年爆發了法國革命。歐洲各國王室受到震動，他們從這場革命風暴中看到了一種對他們現行政治社會制度的威脅。正如當時我國外交大臣所說的：這是一場“總暴動”。

葡萄牙最初對這場革命持反對態度。葡萄牙外交官認爲必須同西班牙和英國政府一起聯合對付法國。然而，這些國家不願意聽取我們的意見，而且竭力擺脱我們。1793 年協約國家派遣了一名代表到里斯本，要我們在即將發動的入侵中採取回避態度。我國政府拒絶承認他的證書，並命令他離境。

1794 年，葡萄牙的一個軍在加泰羅尼亞登陸，聯合少數西班牙部隊在法國的比利牛斯地區開始了戰鬥（即羅西良戰役）。我國的艦隻也交給英國旗艦指揮。

戰爭進行得很不順利，1795 年西班牙背着我們同法國簽訂了和平協議。次年又同法國談判結盟，把他們的對外政策協調一致，轉而對付英國，而葡萄牙仍然處於戰爭狀態。

當時的形勢對我們是極爲不利的。出路只有兩條：要麼納入法國的軌道，要麼與英國結盟。如果納入法國的軌道，就意味着同英國進行海上戰爭，結束兩國之間的貿易，從而失去與國家命運攸關的經濟基地——巴西。如果保持原有的盟約就會引起法國集團的敵視，招致西班牙人的入侵。他們在歐洲危機期間一直伺機破壞葡萄牙的獨立，葡萄牙進退維谷：要麼被扼殺，要麼被佔領。

國内輿論也有分歧。知識界和進步人士組成“法國派”。對他們來説法國政權不是一種威脅而是一種希望；他們懷着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希望法國軍隊能在政治上爲被壓迫民族帶來自由黨人革命的政治成果。“法國派”的代表人物、才華横溢的博卡熱的詩句在這些年代裏廣泛地爲人傳誦。相反，那些比較固守傳統的人卻十分懷念侯爵上臺前那種君主制度。在他們眼裏，法國不僅是敵人，而且是雅各賓分子和無神論者；應該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只有這樣保衛自己的獨立，才能回到從前那種由貴族和教會執政的君主制度的時代。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這些都是意識形態問題，於是政府加强了對新思想的鎮壓。1801年，科英布拉的一些學生被迫停課，並被關押在一所修道院裏，其罪名是：“異教徒，自然神論者，自然主義者，百科全書編纂者，主張信教自由者，教條主義者，以及叛教者。”在新一代人的眼中，舊制度就是愚蠢。1784年有一篇匿名諷刺詩：《愚蠢王國》，這個王國就是指葡萄牙，首都是科英布拉。

這時候，女王患了瘋病，她的兒子D·若奥王子接管了政權（他後來的封號是攝政親王，女王去世以後改爲D·若奥五世）。他的政權在兩種對立的勢力中間艱難地漂泊，這兩種勢力在宮廷裏都有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法國及新思想派的敵人不信任攝

政親王，而聚集在已經同他結了婚的D·卡洛塔·若阿金娜的週圍。他們陰謀發動政變廢掉攝政王。從這時起卡落塔·若阿金娜在反自由主義派的勢力中已佔有突出的地位。親法派則聚集在法國大使的週圍。在法國大使的要求下，政府不得不將警察總監皮納·馬尼克免職，因爲他對鎮壓新思想和截獲來自法國的報刊十分積極。這些出版物在城市中特別是在里斯本和科英布拉擁有大批的讀者。

但是對於商人和許多貴族來說，因爲他們的財富依賴於商品貿易，所以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和平。他們的觀點贏得了勝利。1795 年至 1807 年葡萄牙的外交活動就是爲爭取和平而進行的一場戲劇性鬥爭，葡萄牙願意爲和平付出任何代價。爲換得和平，葡萄牙甚至願意每年向法國交付 1600 萬克魯扎多的貢稅，單這筆鉅款就可以表明葡萄牙當時貨幣之充足。但是要取得和平還有相當大的障礙。法國表示願意接受葡萄牙在英法衝突中保持中立的立場，只要這種中立是實實在在的，就是說只要英國人不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對法國作戰。但是英國不接受這樣的條件。葡萄牙的港口對於英國是極爲重要的，葡萄牙甚至沒有力量阻止他們繼續使用這些港口，而且也不願意同他們鬧翻，因爲這樣做就等於結束兩國之間的貿易。葡萄牙的想法是：中立只限於軍事方面，而不妨礙葡萄牙履行以前與英國的條約所承擔的義務。但當時被稱爲“和平王子”的戈多易領導的西班牙政府則竭力使法國相信，解決葡萄牙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兵佔領葡萄牙。

1801 年，一道最後通牒强迫葡萄牙在法國和英國之間做選擇。但是葡萄牙没有這樣做。葡萄牙仍希望繼續談判解決問題。西班牙軍隊已侵入葡萄牙。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人們並未認

真看待它。在民間，這場戰爭被詼諧地稱爲“柑橘之戰”(因爲西班牙政界實力人物戈多易在埃爾瓦斯城牆附近摘了幾支長滿柑橘的樹枝，做爲光榮的戰利品送給他的情婦西班牙王后卡洛塔・若阿爾娜的母親。“柑橘之戰”就是因這段可笑的插曲而得名的)。和平很快得以恢復，但葡萄牙爲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2500 萬法朗的賠款；將巴西北部一些領土交給法國，將奧利文薩城及其所轄領土交給西班牙，並對英國艦隊關閉所有港口。

但是最後一個條件並未執行，緊張的外交鬥爭還在繼續。

1806 年，拿破侖在打敗龐大的軍事强國普魯士，成了歐洲大陸毫無爭議的主宰之後，決定消除英國的抵抗勢力。爲此，他下令“封鎖大陸”，對英國船隻關閉所有歐洲港口。葡萄牙也接到了封鎖令：關閉港口並對英國開戰。葡萄牙本想試圖闡明不參加敵對行動的立場，但在最後一刻又改變了主意並對英國宣戰。但拿破侖沒有當機立斷，葡萄牙的獨立不在他的歐洲改革計劃之內，根據他同西班牙的協議準備將葡萄牙肢解爲三個小國。阿連特如和阿爾加維組成一個獨立小國，由曼努埃爾・戈多易治理，以獎賞他把西班牙的政策納入法國事業的軌道；杜羅河以北，是南盧濟塔尼亞王國，其王位交給了埃特盧利亞國王（他是西班牙國王的孫子，當時還是個孩子，拿破侖授予他托斯卡納大公爵封號，稱埃特盧利亞王國，1807 年該王國領土被法蘭西帝國兼併，而把盧濟塔尼亞王國交給他作爲補償)。埃斯特列馬杜拉和貝拉斯王國暫由法國人佔領，歸屬待定。葡萄牙的殖民地包括巴西，由西班牙和法國共同瓜分，這個秘密協議籠統地稱之爲豐泰內布老協定，看來拿破侖從來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協定付諸實施。

1807 年末，法國軍隊在茹諾將軍的指揮下進入葡萄牙，當

時帝國官方報紙《規勸者》報曾發表消息，稱布拉甘薩王朝已不復存在。報紙先於法國軍隊到達里斯本，英國大使把報紙拿給攝政王看，這時他才知道自己已被拿破侖廢黜。

70 法國入侵

攝政王、女王及其家屬搭乘停泊在特茹河上的輪船移居巴西。許多貴族、富商、政府高級官員，高等法院法官，以及全體王宮侍從隨同王室遷移。總人數將近一萬，幾乎包括了國家機關的全體官員。

向巴西撤退的計劃早在一年前就同英國商定了。在法國人逼近的時候，英國大使就要求國王登程，並揚言如果繼續拖延，將把停泊在里斯本海域的葡萄牙船隻扣押。將葡萄牙政府所在地遷往大西洋彼岸的設想由來已久。好像1580年就有人向克拉托修道院院長提及此事，認爲這是挽救國家獨立的一個辦法。光復運動之後，當時里斯本似乎隨時都處在敵人的襲擊下，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也曾提出過類似的方案。駐法國大使D・路易斯・達・庫尼亞也曾提出讓葡萄牙國王遷居巴西的計劃，用阿爾加維換取“智利王國，一直到麥哲倫海峽”地區；國王使用“西部皇帝”的稱號。在七年戰爭前夕，彭巴爾也不止一次地想過到巴西避難的問題，這種想法可能還是來自當時的外交及國防大臣D・路易斯・達・庫尼亞。

攝政王在動身前曾告誡，要和平地迎接法國軍隊。任何反抗拿破侖軍隊的企圖似乎都是徒勞的，他的龐大的軍隊已在整個歐洲取得勝利。法國軍隊橫穿葡萄牙領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既没有有組織的抵抗，也没有自發的抵抗。茹諾就像一個盟國

的將軍到達里斯本。對有些人來説，他像救星一樣來到這裏，革命將隨着他的來到而降臨葡萄牙。值得指出的一點是：法國人侵成了葡萄牙國内專制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鬥爭的第一個回合。

茹諾在里斯本駐紮下來以後，馬上拉開一副國民生活改革者的架式。他宣佈一個自由與進步的新時代已經到來，允諾修建公路和水渠（這是葡萄牙最落後的方面），進行有效管理，監督財政，救濟貧民，以及爲老百姓興建學校。他曾大聲疾呼道：也許有一天阿爾加維和貝拉斯也會産生自己的卡蒙斯！

重要人物都加入了他的行列，但小人物們都還在觀望。一位當時住在里斯本並在街上看過熱鬧的作家記述了許多細節；在聖若爾熱城堡上，昇起了法國國旗，軍隊在羅西奥集合，茹諾向士兵發表演講，最後喊了三聲拿破侖萬歲，但週圍的人群中“並没有任何反應，只有一陣凄楚的低語。這充分説明有一種憤慨和不滿在攪動着他們的心靈。這一切都表明他們都義憤填膺，但是在這幾分鐘之内，又顯得十分平靜，因爲没有一個人有足夠的勇氣試圖打破這種平靜。”茹諾同一些將軍及當局頭面人物從這裏前往宴會廳，“當斟滿美酒的酒杯把歡樂送進他們大腦的時候”，不安的氣氛已在整個城市蔓延開來：“男人，婦女和兒童都在大街和廣場上高呼葡萄牙萬歲！國旗萬歲！法國該死！”法國人擡出大砲，開始射擊，槍砲聲一直持續到晚上，但是傷亡不大，因爲警察還是葡萄牙人，“他們珍惜自己同胞的鮮血，所以只是朝天開槍。”第二天，一切都結束了，“我看到街上擠滿了人，他們望着天空，指着一顆發亮的星星，説他們看到了某種徵兆。照他們的理解，這是上天要對法國人進行報復的信號。如果當時有一支葡萄牙軍隊或者一位能幹的領導人

物來率領這群手無寸鐵的民衆，並把他們聚集在自己的週圍，投入這場並非有準備的、自發的民衆運動的話，這一晝夜的流血就會成爲一個信號。

茹諾輕而易舉地弄了一份由知名人士聯名寫給拿破侖的信，請求任命葡萄牙國王。這封信是由三個階層——教會，貴族和平民的代表所組成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代表團送往巴昂那去的。教會代表是有名的主教，貴族代表包括八名大貴族，平民代表是里斯本議會參議院的兩名議員。茹諾懂得這封信有了高級官員的簽名，就使它具有代表全民的性質。人民法官就是這批高級官員中的一個。

當時發生的一件事，被認爲是在葡萄牙實行立憲制度的第一次嘗試。人民法官被帶到"高等法院院長弗朗西斯科·杜亞爾特·科埃略家裏，并被帶進他的書房，秘密團體的頭面人物幾乎都在那裏。在場的人告訴他："既然我們的權貴們不懂得利用D·若奧四世國王登基這個時機，那麽造福國家的重任就落在你身上了"。要做的事其實很簡單：當茹諾要求得到他的支持時，只要他把陰謀集團起草的一份文件交上去就行了。於是好心人照這樣做了。這個文件就是憲法草案。草案開頭有一段有關葡法關係的絶妙的前言："葡萄牙人不會忘記他們來自法蘭西，是1147年第一批征服這個美麗國家的人的後裔，他們應當把1640年以來做爲一個獨立國家而存在的好處，奉還給他們的祖國——法國……"。華沙大公國憲法中所體現的（文件中説）基本原則是：由各鄉鎮選舉議員，這正是葡萄牙的傳統；天主教、各種信仰自由、同羅馬教廷的協議，就像在法國那樣：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國分爲八個區；將殖民地的地位提到省或區一級，並在議會中有代表席位；設公共教育部；出版

自由；行政權力由部長組成的國務委員會行使；立法權力由兩個議院行使；司法權獨立，論功選拔公職人員；將教會財產還俗；按財產比例徵收稅賦；調整國家公債，重組行政機構，“壓縮龐大的公職人員編制”，但均保留原有薪俸。科埃略院長可能是這次事件的主使人。他在1821年出任財政大臣，並在1827年領導過葡萄牙銀行。1808年草案中的許多條款在1822年的憲法中保留了下來。

但是，茹諾並沒有將這個草案送往法國，事態的發展也沒有使法國的突然佔領變成自由主義派的革命。幾個月後，西班牙突然從法國的無條件的同盟者變成拿破侖不共戴天的仇敵。整個國家拿起武器反對法國軍事佔領和“巴昂那的叛變行爲”(這裏的西班牙國王和他的兒子被迫讓位)。做爲法國人的盟軍進駐葡萄牙的西班牙軍隊也響應了這次起義。西班牙軍隊在離開波爾圖之前，指揮西班牙軍隊的將軍把當地的知名人士召集在一起，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要獨立還是要法國佔領？葡萄牙人當然選擇獨立。但第二天，由於沒有西班牙人的支持，葡萄牙又沒有力量對抗法國人，因此他們又迎接了茹諾。但是起義又在布拉甘薩燃燒起來，並從這裏擴大到整個北方。波爾圖主教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最高政府臨時委員會。在全國其它地方（除里斯本以外）起義在蔓延。有時候，成群的農民甚至將法國人的小股部隊繳了械；納扎列城堡被佩德內拉的漁民佔領；菲格拉達福茲城堡被科英布拉的學生佔領。但是人民運動遭到了殘酷鎮壓，羅遜將軍（因爲他只有一隻胳膊，所以人們稱他爲“獨臂人”)，在這次鎮壓活動中尤爲殘酷，以致他的行爲在人民的語言中都留下了痕迹（俗話說：“見獨臂人去”即“死亡”之意）。

這時，一支英國軍隊從海上開往加里西亞，準備支援西班牙起義。然後從這裏駛向波爾圖，同這裏的臨時委員會取得聯係並在菲格拉達福兹登陸。戰事迅速展開，英國軍隊於8月1日登陸。法國軍隊企圖阻擋英國軍隊前進，但在洛里沙（8月17日）和維梅羅（8月20日）被擊潰。第二天，法國人要求停火，並在簽訂的協定中寫上以下條款："無論是葡萄牙人，還是法國盟國的公民或者法國人，均不得因參與政治活動而受審訊。"最後的協定是在8月30日在辛特拉簽訂的，没有葡萄牙代表在場。英國人答應將茹諾的部隊及其行李、武器運往法國，英國人得到好處是：法國人獻出里斯本，不得抵抗。在這個協議的條文中又一次强調不得迫害在政治上傾向法國的人。

但是在軍事形勢穩定之後，緊接着便開始了政治上的清算。戰爭的暴力把人民對法國人的冷漠變成了復仇的欲望。對那些同侵略者合作過的人，甚至對那些過去自稱是自由黨人的人開始了一場名符其實的圍攻。在波爾圖設立了一個革命法庭。在里斯本，當局鼓勵這種懲罰，並保證對揭發者保守秘密。愛國主義同反對自由黨人混爲一談。這種情況是由當時的形勢造成的，但在葡萄牙人的思想意識中留下深刻的記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愛國主義思想同傳統思想混爲一體，任何進步意識都被懷疑是反民族傾向。

西班牙形勢更加惡化，以致拿破侖親臨指揮作戰。茹諾以爲事情很簡單，皇帝的親征將以里斯本爲終點，甚至已做好準備讓他在格魯斯宫下榻。但是帝國軍隊進入半島後困難重重，拿破侖把重新佔領葡萄牙的任務交給了索特將軍。索特從後山省邊界入境，但初次交火並未取得成功，於是便繞道米紐，一直打到波爾圖。同第一次入侵時相反，第二次入侵遭到了葡萄牙

人民和軍隊的激烈抵抗。關於這一點，北方軍區司令貝納丁·弗雷列·德·安得拉德將軍之死最能説明問題。他想阻止手執長矛和鐮刀的農民去迎擊索特的軍隊，結果被指責爲叛逆，被押往布拉加，並在這裏被群衆處死。這種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指揮官身上也發生過，因爲所有戰略撤退都被視爲軍官的背叛，愛國民衆對他們是不信任的。

索特進入波爾圖，遇到了葡萄牙軍隊、民兵和居民的抵抗，他們在街道上設置了路障。法國軍隊很快就被英國軍隊擊退。這時英國軍隊已武裝了一支强大的葡萄牙部隊，訓練、裝備和指揮全部由英國軍官負責。

第三次入侵發生在1810年，由馬塞納元帥指揮。他們從貝拉入境，攻陷了阿爾梅達要塞（葡萄牙要塞司令因沒有堅持抵抗而被英國人槍斃），並向里斯本進發。英國人企圖以布薩科之戰來阻止法軍前進，但是法國人盡管吃了敗仗，卻繼續向首都挺進；一直到了里斯本北部，才被英國人設在托雷斯維德拉斯的防綫所阻擋。馬塞納無力越過這道防綫，終於於1811年4月後撤。盟軍乘機追擊。戰爭一直持續到1814年3月。但後來的戰爭是在葡萄牙領土以外進行的。

這場戰爭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一直打了7年，造成了鉅大的破壞。農田由於大批農民傷殘而荒蕪。英國當局曾强迫這些人集中在一起。沿海地區本來有些比較富裕的城市，而且，除了邊境縣份以外，一般地說這些城市在以往的戰爭中都沒有遭到什麼破壞。但現在這些地區卻遭到了嚴重災難，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掠去，以滿足拿破侖徵收的戰爭賦税。當然，這種徵税往往同暴力與掠奪連在一起。教堂、修道院、宮殿被洗劫一空，許多藝術珍品都在這個時期不知去向。戰爭傷亡和

報復性屠殺中死亡的人數超過 10 萬人。饑荒也造成不少人死亡，因此這個時期人口急劇下降。

此時人們已經懂得把戰爭和貿易協調進行。向英國出口波爾圖酒即是在法國佔領時期也没有停止過。這些酒由葡萄牙船隻運載，但懸掛克尼法贊船旗。這是“在埃爾巴河口發現的荒涼的小港口”，因爲誰也不知道克尼法贊是什麽地方。因此，他的旗幟無論是對法國人還是英國人都不在禁運之列。

茹諾以此爲條件，每桶酒獲得 6400 百雷伊斯。英國人之所以放行則是因爲他們可以以此打破封鎖。這樣總共出口波爾圖酒三萬桶。但是後來工廠遭到破壞，國内貿易大量減少，有錢人家相繼逃離農村而遷居城市。

71 巴西王室

由於中央機關遷往巴西，里約熱内盧事實上成了葡萄牙的首都，因此，對巴西的政策就完全改變了。自彭巴爾時期以來一直遵循的舊的“殖民地盟約”的條文被廢除了（根據這個條文殖民國家有權壟斷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出口，以補償它對殖民地國提供的保護）。

第一個經濟上非殖民化行動就是 1808 年 1 月 28 日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同對待葡萄牙人一樣向外國船隻開放巴西港口，允許進口各國商品。這項措施是巴依亞商人在攝政王前往里約路經此地時向他提出來的。但這也就等於他履行了他對英國許下的諾言，因爲在 1807 年的談判中，英國曾提出過這個要求。從此時起，對巴西以前隸屬於宗主國時所制定的各種限制和約束就一個一個地被取消了。廢除了不許建立加工工業的禁令，鼓

勵開辦工廠，進口英國機器，還成立了貿易委員會貨幣局、巴西銀行（當時在葡萄牙還沒有銀行機構）、保險公司、船塢，還計劃修建公路，允許出版報紙（過去禁止出版），建立各種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包括軍事學院，該學院爲後來巴西獨立培養了許多領導人。

經濟活動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1815 年，巴西已上昇到王國的地位。這種榮譽上的昇級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從經濟觀點上看，巴西事實上已不再是一個殖民地了。但是隨着經濟上的逐步獨立，政治分離的傾向開始强烈，這是受到了北美獨立範例的鼓舞。當幾千人隨着王室在巴西登陸時，就已經開始引起了不滿。政府機關和貴族住宅都要求有現成的房舍，原有的住户被迫搬出。負責徵房的官吏們將他們選中的房舍寫上 P·R（“攝政王”的縮寫）做爲記號，但里約熱内盧人卻把它讀成“你滚出去”。新遷來的人和較早的定居者之間對立逐漸加劇。1817 年在累西非爆發了一場反對葡萄牙人的起義。在這次起義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國的思想，提出了同美國建立經濟聯係及抵制葡萄牙產品（葡萄酒被甘蔗酒代替，小麥被木薯代替）。起義遭到血腥鎮壓。

當時巴西是葡萄牙經濟的主要基礎。葡萄牙的出口貨物（波爾圖酒除外）基本上全部運往巴西；我們進口的貨物也幾乎全部來自巴西；一些熱帶地區的原材料經里斯本再向其它國家轉口，整個商業貿易都依賴於這種方式。我們的商船隊也是依靠這種貿易而生存的。因此巴西經濟的解放對葡萄牙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從前的殖民地在短短的幾年之内，從一個收入的源泉變成了支出的源泉。許多住在里約王室的貴族仍然靠他們在葡萄牙的財產過日子。爲了征服東部沿海（今烏拉圭），又

開始了軍事討伐，從葡萄牙來了兩個師的兵力，結果這次出征又引起了抗議的浪潮。

在葡萄牙，由一個各總督組成的委員會管理政府，一切都按照里約的指示進行。由於没有中央權力機關，所以政府的權威性就削弱了。在國家這種全面解體的情況下，真正的力量是以軍隊爲代表的勢力，而軍隊的指揮權卻在英國人手裏。戰爭結束後，英國人仍然讓我國處於總動員狀態，使將近十萬人留在軍隊裏。根據1820年政府委員會遞交給D·若奧五世的報告中披露，軍隊消耗了四分之三（即75%）的公共收入。君主制度的政治結構由於没有自己的辦事機關而變得十分脆弱，因此被强大的軍事組織所取代，這個軍事組織成了國家政治威懾的真正工具。

軍隊勢力和文職人員之間關係惡化；在軍隊内部葡萄牙軍官和英國軍官之間也有矛盾。因爲前者抱怨他們在提昇時常常被後者遺忘。1817年英國指揮官貝列斯福特接到報告，稱葡萄牙軍官中有一個陰謀集團，他把這件事報告了政府，並以異乎尋常的嚴厲手段鎮壓了這次圖謀。所有被牽涉到的軍官均被處以絞刑，其中包括戈麥斯·弗雷列·德·安得拉德將軍。他在軍界威望極高而且同情新思想。這次訴訟程序的某些奇特現象以及其它一些迹象使人感到政府本身也同這次陰謀有牽連。

72 自由主義運動

1820年，葡萄牙在國民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潛伏着危機：由於没有國王，政府機關又設在巴西而引起的政治危機；城市中出現了新思潮，認爲君主獨裁制是一種過時的、鎮壓性的制度，

隨着這種思想逐步蔓延而造成的思想危機；由於巴西經濟解放而造成的經濟危機；由於英國軍官佔據軍隊高級職位以及葡萄牙軍官在提昇中被排斥而引起的軍事危機。

政府已經認識到必須進行認真的改革，否則將面臨爆發革命的危險。1820年6月2日，政府在給D·若奧六世的一份報告中寫道：葡萄牙已經瀕臨危機的邊緣：或者遭受一場所有制變革，秩序變革，無政府狀態以及其它使自己失去公衆信任的災難；或者不失時機地注意提高收入，不要增加目前形勢所不許可的新稅賦，緊縮開支，減少不必要的甚至一些必要的開支。經濟形勢正在全面衰退："謹請陛下聖察。葡萄牙是一個面積小，人口少的王國，農業也不發達，農民身上壓着沉重的苛捐雜稅。農業中最有利的一項收入就是酒，但由於巴西港口已對其它國家的酒類開放，葡萄牙酒的生產已開始衰落；由於英國勞動力以其無法與之相比的價格自由地進入葡萄牙和巴西，致使我國工業嚴重停滯不前；貿易急劇下降，這不僅是因爲上述巴西口岸的開放，奪去了葡萄牙同這個王國的獨家貿易，而且也是由於各國家在海上的競爭；令人擔憂的是，如果這樣長此以往，過不了多久，葡萄牙國旗將會從海上消失；巴西每年要耗費這個王國一筆相當可觀收入，單是國家房產的收入，王室及教會的房產收入就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這些錢正是國內流通所缺少的，這使我們變得愈加貧窮。"

西班牙的政治局勢也是這些不穩定的內部因素之一。在反對拿破侖的戰爭期間，西班牙抵抗者曾通過一個憲法（即1812年的加的斯憲法），並在拿破侖垮臺後一直執行到費爾南多七世國王返回西班牙；費爾南多是個專制君主，回國後即廢止憲法。但是1820年加的斯爆發了一場軍事暴動，並很快得到了各省的

響應，迫使國王重新回到立憲制度（1820 年 3 月）。

葡萄牙 1820 年革命也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這場革命是由波爾圖的一個資產階級組織發起的，這些人在政治上頗有素養。他們於 1818 年組織了一次政治座談會，即協議會，目的是保持接觸，討論葡萄牙和西班牙形勢的發展。這個小組的突出人物是費爾南德斯·托馬斯。他出身於靠海上貿易起家的小資產階級家庭，並在其官職生涯中出類拔萃，其間還發表過幾本法學著作。

這個協議會的一名後補委員沙維埃爾·德·阿拉烏若在談到他參加的一次會議時這樣寫道："費爾南德斯 ·托馬斯的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主持會議，並用他那慷慨激昂的聲音描繪了國家的現狀：國家沒有國王；軍隊的主宰是一個外國將領，各個省份也是由外國人執政；經濟上依賴巴西；最後，西班牙革命，費爾南多七世終於宣誓忠於加的斯憲法，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嗎？我們就應該這樣屈辱地生活下去嗎？他多次强調地重複着這句話。"他的講話歸納了革命的直接原因：沒有國王、經濟形勢、英國的干涉及西班牙的先例。

協議會中的知識分子輕而易舉地就使北方的許多駐軍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820 年 8 月 24 日，一個砲兵團離開軍營，列隊參加露天彌撒，後來鳴砲二十一響，宣佈革命。一位上校宣讀了一項聲明，其中寫道："讓我們同我們的戰友們一起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呼吁議會制訂憲法；我們的一切災難的根源都是因爲沒有憲法。"

向里斯本進軍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政府在首都集中了兵力，準備對付波爾圖革命。但是在 9 月 15 日里斯本的軍隊也反戈一擊加入了起義的隊伍。

革命没有遇到什麼抵抗，而且掀起了鉅大的浪潮。人們覺得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似乎覺得有了未來的憲法，葡萄牙的全部問題都可以奇迹般地解决了。在無數以詩歌和散文形式歡呼革命的小册子中，有這樣一段話："人們正處在整個葡萄牙民族充滿如此輝煌成就的時期，很難通過語言的描繪使後世相信這些成就，因爲就連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這次事件的人看來，也好像夢境而非現實。這些日子爲我們展現了未來的光輝前程，這就是英明的法律爲我們許諾的東西。"

這場革命在巴西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原因不同。當地人從王宮官吏的身上感到一種令人厭煩的異國的存在。許多商人則大都是葡萄牙人，他們感到從革命中可以重新得到葡萄牙過去那種貿易特權的機會;没有這種特權他們很難同 1808 年以後在這裏興建的大批外國企業開展競爭。因此，巴西人和葡萄牙人聯合起來支持自由主義革命。帕拉、巴依亞和里約熱内盧都爆發了自由主義者的起義。里約熱内盧的起義是在當地葡萄牙駐軍中發生的。王位繼承人 D·佩得羅親王充當了國王與起義軍隊之間的傳 話人。國王終於答應接受里斯本議會頒佈的任何一種憲 法（1821 年 2 月 24 日)。從此時起 D·佩得羅親王就在巴西爭取政治獨立的各種運動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國王尊重里斯本議會的要求，加上英國人的一再勸告，開始準備返回葡萄牙。而英國人則從王室遷移的空虚中看到了擴張自身利益的有利因素。

協議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同商業有着某種聯係，因而許多作家認爲 1820 年的革命是一場資 産階級革命。這種論斷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正確的。衆所週知，是資産階級這個上昇的力量掀起了偉大的歐洲自由主義運動。他們在擁有經濟力量之後，便

開始奪取政治權力。然而在葡萄牙卻是另一回事。1820 年，資產階級處於低潮時期，中層階級的主要成分是農業主，部分貴族以及一些只追求舒適生活、對於能使人聯想起法國革命的任何革命都沒有興趣的人。事實上，如果說協議會中的一部分人是商人，那麼另一部分則是產業主，還有一部分是軍人貴族。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都是有文化修養的人，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不是建立在他們的經濟基礎上，而是來自閱讀外國書籍，大學校園生活和共濟會的集會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說 1820 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這是一場知識革命，是在知識幾乎被資產階級獨家壟斷這一時期發生的。

這種理論導致了極爲嚴重的後果。這場革命就是產生於理論，而不是產生於實踐。政治從那時起往往只是一種理論之爭，只是一種政治辨論而不是尋求直接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形成了兩種對立的政治態度：一種是只思考問題而不解決問題；另一種則是因爲忙於解決問題而無暇思考問題。卡布拉爾思想就是這第二種態度的初期成果。

這種理論造成的另一後果則是阻礙人民群衆參與自由黨人的國家事務，特別是農民群衆。其理由是現在不是提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而是在評價政治文化的新作用，老百姓對此一竅不通。農民差不多全是文盲，他們身上只有一些傳統的宗教文化。把全體老百姓組織在一起並同他們保持長期接觸的是教會。但 1820 年自由黨人的理論宗旨則是反教會的，所以從一開始，它就造成了一種衝突的形勢，致使教會宣佈革命是“王室和教會的敵人”。

1820～1910年

君主立憲

73　20年代革命與1822年憲法

革命後掌權的臨時委員會下令召開國民議會，議員是經過三級非直接投票選舉産生的，教區推選教區選舉人，教區選舉人再確定地區代表，地區代表選舉議員。

最後選出的議員全部都是自由黨人，其中激進派佔絶大多數。所謂的理論家和有大專文憑的人佔大多數，也有許多商業資本家和農業資本家。因此議會的任務一方面是要建立一種真正的立憲制度，不妥協也不讓步；另一方面則希望重新與巴西建立殖民地保護國的關係，恢復農産品貿易和原來價格，而不考慮農民的命運，這樣就把農民群衆推向革命的邊緣。所有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議員幾乎都是學法律的；形式主義使存在服從

於意識以及用法律塑造國家的幻想在他們的法學著作中都有所反映。他們最終只是一些浪漫主義的思想家，有時還帶有神話誇張的色彩，并用這種神話來代替他們處理政治矛盾時的無知。在他們制定的憲法中所表現的過激情緒，國王回國時他們對待國王的態度，他們同被驅除出境的里斯本大主教的衝突，以及拒絕採用兩院制議會的態度（這是一些溫和的議員的主張，他們想用這種辦法減少特權階級的對立情緒），就是這種理想主義的某種產物。

1820 年革命的發動者和 1822 年憲法起草人，後來被統稱爲 20 年代革命派。這個新詞在西班牙稱爲擁憲黨人，即 1812 年憲法的擁護者。在很長一個時期裏，20 年代革命精神曾經是立憲主義最大膽、最熱烈追求的思想主張。

在加的斯憲法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憲法，符合下列思想：民族至上的思想——唯一的真正的至高無上的形象是民族，而不是國王。表達共同願望的權利歸國家，因這種願望則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表達的。爲此，國家必須選出自己的代表，只有這些代表才能制定法律。議會權力高於國王的權力——議會由一個院組成，任期二年，由全國直接選舉產生。文盲、婦女和出家人不得參加選舉。議會獨立行使權力，國王無權停止、解散議會或干涉議會行使權力。法律草案中規定，法律的批准，公佈權力歸國王。如果法律草案被國王拒絕，草案應重新退回議會進行討論。如果得到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國王就必須批准；限制王權——國王原則上只擁有國家根據憲法授於他的權力。國王是行政權力的首腦，他通過由他任命的國務大臣來行使權力；但是當國家的自由和立憲制度受到威脅時，議會可以任命國務大臣。國王的決定只有經有關大臣簽字後才能生效，無論

國王還是大臣都沒有任何立法權力。

74 巴西獨立

1821年當D·若奧六世從里約起程返回葡萄牙的時候，分裂主義運動已控制了巴西整個知識界和經濟界，爭取獨立的潮流已經勢不可當。

當時，不包括印第安人在內，巴西共有350萬人口，以後的40年增加了50萬人。這部份人口幾乎全是葡萄牙人，而且，大部分出生在葡萄牙。因爲18世紀下半葉，移民急劇增加。巴西的經濟形勢正處在繁榮時期，同葡萄牙的衰落形成了對照。這時候巴西在這個古老的宗主國面前有着一種優越感，D·佩得羅曾經說過：葡萄牙是“四流國家和窮國”，應該併入“一流國家”巴西，而不是巴西併入葡萄牙。

各派政治勢力都渴望獨立，但是葡萄牙人及其近親等階層則希望能像若澤·博尼法西奥說的那樣，兩國結成聯邦，就像英國同愛爾蘭或者奥地利同匈牙利之間存在的那種關係；但其它階層則主張完全獨立，同過去的宗主國脫離一切關係。

若澤·博尼法西奥·德·安得拉德·依·席爾瓦是巴西獨立過程中最爲突出的人物，巴西“獨立運動的元老”。他出生在桑托斯（聖保羅），就讀於科英布拉。在歐洲科學發達的國家靠獎學金留學十載，後來回國擔任過高級行政職務，曾在里斯本科學院做過許多工作，1813年他就主張採用米制計量單位，但是直到1852年我們才最後決定使用。“也許對於那些心胸狹窄的人似乎是有傷民族自尊；但是真正的和有用的東西是沒有祖國的”。若澤·博尼法西奥於1819年4月回到巴西，他的計劃

是利用王室的威望爲巴西政治統一服務，以免這個國家分裂成若幹小國。歷次地方分裂主義運動都帶有這種傾向，而且里斯本議會爲維護地方機構的利益曾揚言要鼓勵這種傾向。

這一切都表明，不管葡萄牙的政治如何發展，巴西將在王室離開之後宣佈獨立，但這次分裂的近因卻是由 D・佩得羅和議會之間的衝突引起的。

D・若奧六世回到里斯本後就向議會提出報告，稱他已將巴西的攝政權力交給了王位繼承人。議員們不承認國王有權任命攝政王，並責令 D・佩得羅返回葡萄牙。這樣政府就應該由巴西各省產生的委員會共同負責，而這些省則是直接隸屬於里斯本的。在此之後又相繼採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由 D・若奧六世在巴西設立的最高法庭；後來又組織軍事討伐以結束葡萄牙政權在巴西遇到的越來越强烈的反抗。保熱斯・卡爾内羅在議會的一次會議上説：“巴西需要一種獵狗，用以維護秩序”。一位巴西議員在談到葡萄牙議員的這種態度時説道：“我們的表現説明我們對於立憲問題是多麼無知！”

D・佩得羅在收到里斯本議會要他返回的命令之後，宣佈同葡萄牙徹底決裂：“誓死保衛獨立”就是後來向他歡呼的浪漫主義口號（又稱爲“易皮蘭加的呼聲”，1822 年 9 月 7 日）。

宣佈獨立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宣戰。戰爭狀態一直持續到 1825 年，但是除了在葡萄牙軍隊佔領的巴依亞有過幾次戰鬥外，其它地方並沒有什麼軍事行動。然而這幾年的貿易卻受到極大影響。在巴西獨立初期，反葡萄牙情緒甚爲高漲；這是一種頑固的感情，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除。

75 專制制度的恢復

西班牙政局的發展，決定了葡萄牙立憲運動初步嘗試的成敗，它促進了葡萄牙立憲運動的發展，也導致了它的滅亡。1823年，一支執行神聖同盟反對自由主義政治綱領的法國軍隊進入西班牙，打敗了1812年憲法的支持者，恢復了君主專制制度。這次事件不久就在葡萄牙引起了反響。

在里斯本，王宮對新的政權機構做出了反應。陰謀分子聚集在D·卡洛塔·若阿金娜的週圍。她是西班牙國王的妹妹，一直同自由黨人作對。D·米格爾王子成了她玩弄反革命伎倆的工具。與此同時期待憲法產生奇迹的熱情漸漸冷了下來，教會和貴族公開敵視革命和議會制政府，政府的法令已不容置疑地表明教會和貴族的特權已經結束。商業資本家對政府在巴西問題上所採取的方針感到失望。

1823年5月27日，米格爾王子在佛朗卡鎮宣布起義："已經到了打破屈辱枷鎖的時候了"。所謂枷鎖即自由主義制度。里斯本衛戍部隊加入了叛亂的隊伍，議會没有力量進行抵抗，被迫宣佈解散。國王接受既成事實，停止了1822年憲法，並答應頒佈新的基本法，以保證"人身安全，財產和就業"。這場叛亂標誌着第一個憲法時期的結束。歷史上稱爲"佛朗卡鎮事件"。

但是，無論在葡萄牙還是在西班牙，反對立憲制度的人都分爲兩大派：溫和派和激進派。D·若奧六世屬於溫和派；"佛朗卡鎮事件"之後，他任用的幾名大臣都介乎於寬宏的妥協專制主義與保守而膽小的自由主義之間。卡洛塔·若阿金娜率領着激進派，他們要求毫不妥協地實行專制主義，并嚴厲鎮壓新

思想。一年之後，她又組織了一次新的暴亂；D·米格爾宣布國王生命受到威脅，率領軍隊逮捕了所有大臣，並準備接管政權。但外交使團進行了干預，他們將國王從被囚禁的王宮裏解救出來，送往一艘停靠在特茹河上的英國船上。D·若奧六世因此才得以重新控制局勢。D·米格爾被勒令出國。溫和派繼續掌權。這次暴亂發生在 1824 年 4 月，所以被稱爲“4 月叛亂”。

但是兩年之後國王就去世了。卡洛塔·若阿金娜向英國大使抱怨說，國王是被自由黨人毒死的，而自由黨人則認爲她是兇手。從這時起政治問題同王位繼承問題便交織在一起；D·若奧六世有兩個兒子，一個是D·佩得羅，代表立憲派，另一個是D·米格爾，是專制主義者的代表。

按照正常的接替辦法，應該由D·佩得羅繼承王位，因爲他是長子。但是專制主義認爲他既然已宣佈巴西獨立，成了一個外國的君主，他不僅没有權利接替王位，甚至連葡萄牙的國籍都已喪失。除了這個法律問題之外，另外一個問題是誰也不知道巴西國王是否願意回來住在里斯本，否則就將意味着政府又要回到里約熱內盧去辦公。這種解決辦法將會給人帶來痛苦的回憶，没有人願意這樣做。但是選擇D·米格爾也會遇到困難，鑒於他在“4 月叛亂”中的所做所爲，他對卡洛塔·若阿金娜極端派政治上言聽計從，不僅自由黨人，連溫和派都不願看到他上臺。此外還要考慮到巴西人的意見；兩個朝政的分離是肯定無疑的，他們決不會同意一個國家的國王去充任另外一個國家的君主。因此D·佩得羅必須作出選擇：返回葡萄牙或者留在巴西。

在里斯本，國王駕崩前夕任命的攝政議員認爲D·佩得羅是合法的國王，並派出代表向他致意。D·佩得羅認爲這個問題

可以通過妥協的辦法來解決，他認爲他能得到自由黨人，溫和派和專制主義三派的支持。妥協辦法就是把王冠交給他七歲的女兒瑪麗婭 ·達·格羅莉婭。他放棄王位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在葡萄牙頒布新憲法即憲章；另一個是D·米格爾必須同他七歲的女兒結婚。

1822年憲法是由全民制定的，是強加於國王的，而新憲章則是由國王憑着“國王的智慧”寫成的，並做爲一項禮物贈送給國民。20年代革命派的觀點是：因爲有憲法才有國王；但在憲章派看來則是因爲有了國王，才有了憲法。在向全國公佈憲章時曾竭力強調這個差別：“本憲章從根本上有別於1822年革命派那部流產的憲法。這不是一種由革命精神強制的讓步，而是國王陛下合法權力的自然恩賜。”根據憲法，國王就是溫和政權的工具，該詞係指國家真正的有威望的首腦。國王有權召開、推遲或停止議會會議，拒絕發佈議會決定，任命和罷免大臣，而不以議會的信任表決來決定是否留任。另外，議會的構成，也要進行根本的變改。議會由兩個院組成（衆議院和貴族院），貴族院議員由國王任命，爲終身議員並可以世襲，而且名額不受限制。

D·佩得羅的計劃得到了英國的支持，並開始付諸實施。D·米格爾慶祝了他的訂婚紀念並宣誓遵守憲章。但各派政治勢力對這種解決辦法都不滿意。專制主義者歡迎組成D·米格爾政府，希望立即恢復專制制度。20年代派的自由黨人不同意這個憲章；而溫和派則感到反革命力量日益增長，西班牙則千方百計支持恢復君主專制制度，爲此，他們施加政治壓力，提供現款、武器乃至直接入侵，他們已越過邊界深入我國領土。

D·米格爾於1828年在一片歡呼聲中和對自由主義者的

大肆迫害中重新返回葡萄牙。議會按照君主專制制度的古老儀式舉行會議，宣佈廢除憲法，承認D·米格爾爲合法國王。極端的專制主義派完全控制了政府。自由黨人被戴上了“烏斑派”的帽子。這個詞的由來是：D·米格爾有一輛馬車，拉車的馬身上有烏斑，有一次，D·米格爾坐車外出時出了事故并受了傷。對“烏斑派”的迫害使成千人受到冤枉，掀起了一股恐怖的浪潮，許多人因此而逃往國外，參加了在英國、亞速爾甚至巴西的流亡組織。

76 國內戰爭

1828年至1834年，內戰形勢籠罩全國。反對新專制主義的第一次武裝暴動發生在1828年。這次起義以波爾圖爲中心，由於一些軍官率部加入起義，很快便發展到蒙德戈以北的各個城市。這時候逃亡在英國的自由黨主要領導人有：帕爾麥拉，特塞依拉和薩爾達尼亞。當他們得知葡萄牙事變之後，便租了一艘老式汽船貝爾法斯特號回到波爾圖，並在那裏成立了臨時政府，這條船在米格爾的軍隊逼近時，又把他們載離波爾圖，這一行動爲這次起義贏得了一個綽號，被稱爲“貝爾法斯特事件”。自由黨人的軍隊撤離波爾圖，最後抵達加里西亞，從這裏一部分人乘船到了英國。對於起義者殘余勢力的鎮壓，第一次充分地暴露了米格爾的恐怖手段：有一千多人被捕並被立即判決，不少人被判處絞刑，但是其中只有12人被執行，因爲大多數被判絞刑者已到了英國。被處以絞刑的人的職業清楚地表明自由黨人的社會構成：4名法學家，4名公職人員，4名軍人(3名軍官，1名上士)。1820年以來，自由主義思想征服了許多

人，現在不僅限於知識界，而且已經滲透到人民中的各個階層，1828 年至 1833 年巴拉的聖茹里昂監獄關押的 618 名政治犯的名單很能說明問題：227 名軍人，93 名學生、教授和大學教職人員，87 名商業界人士，78 名普通老百姓，52 名公職官員，44 名教職人員，31 名地主和農民。

普通老百姓中按人數從多往少排列順序爲：海員（9 人），傭人（8 人），裁縫（8 人），理髮師（6 人），鞋匠（5 人），步兵（4 人），鐵匠（3 人），製球匠（3 人），白鐵匠、細木工匠、馬掌匠、糖果廠工人（各 2 人），製臘工人、木工、弦琴製造師、鐘錶工人、造槍工人、製繩工人、面包師、鑄造工、製帽工（各 1 人）等，還涉及到 2 名“勞工”和 1 名臨時工，在軍人中間有 12 名士兵，28 名士官。這個數字表明新思想已相當普及。

此時，馬德拉島和特塞依拉島也舉行了起義，支持自由黨人，馬德拉起義被米格爾分子鎮壓下去，但特塞依拉起義卻堅持了下來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原來逃往英國的自由黨人在遇到英國政府製造麻煩時便來到該島。於是受迫害的自由黨人分散在各地的力量便在這裏聚集起來。

但是 1830 年歐洲政治發生了轉折。在巴黎，七月革命一舉推翻了以查理十世的貴族專制主義爲代表的舊制度，神聖同盟已喪失了反革命營壘的全部力量，自由主義運動之火在歐洲又重新熊熊燃燒起來。1831 年里斯本發生過兩次起義，其中一次是由士官發動的，經過激烈戰鬥才被鎮壓了下去，死亡 200 余人。在巴西，刮起了 1830 年的革命之風，人民反對帝王政府的活動逐漸增加。1831 年 4 月 7 日，D·佩得羅在一陵墓前摘下王冠，乘船到了英國，看樣子是想恢復他在葡萄牙的王位。但是，法國和英國均未給予政治上的支持，他只好以布拉甘薩大公的

頭銜做葡萄牙的攝政王，直至女王——他的女兒能夠獨立執政。

D·佩得羅在倫敦停留了幾個月，藉到一筆錢，購買了軍艦，武器，并招募了一批僱傭軍。第二年他到了亞速爾，並在這裏組織了一次遠征，於1832年7月8日在距波爾圖市大約三海里的一個偏僻的海灘明德盧登陸。

D·佩得羅原期望他會像救星那樣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第一位派上岸去勸降米格爾部隊的軍官遭到了被處決的威脅，並在叫囂聲和“米格爾萬歲”的歡呼聲中回到船上。他們在這裏登陸遇到了抵抗，於是這支征伐軍轉向波爾圖進發，在這裏米格爾的部隊棄城逃走，没有進行抵抗。

在這一年裏，戰事僅僅限於對波爾圖的包圍。雙方力量十分懸殊，米格爾方面有八萬人，而自由黨人只有7500人，但是城市週圍佈置了一條巧妙的防綫，米格爾軍隊屢次攻城不下。自由黨人的艦隊始終控制着海上通道，因此能夠從英國和法國購買武器、物資以及招募兵員。波爾圖人堅決支持D·佩得羅。他們捐錢，出勞役並爲他徵集兵員。但是形勢卻越來越糟，失敗厄運看來已不可免，於是又開始設法爭取英國出面調停。

1833年6月，一支部隊被派往阿爾加維，迫使專制主義政權的軍隊分散兵力，以減輕對波爾圖的壓力。南方各省由於没有戰斗準備，這一小股部隊幾乎没有遇到什麼抵抗就佔領了阿爾加維地區，而後又向里斯本進發，並於7月24日未經戰鬥便進入該市。

佔領首都決定了戰爭的勝負。英國和法國承認了自由黨人政府。這場流血的戰爭打來打去又持續了一年。專制主義分子由於士氣不振，士兵開小差和連打敗仗而無力抵抗，終於在1834年5月繳械投降（埃武臘山協議）。D·米格爾在民衆的嘲

笑聲中，在勝利者的一支騎兵監護下，乘船離開葡萄牙，被流放到國外。

77 1834年的葡萄牙

立憲制度建立初期，國家的形勢極富有戲劇性。

1808年巴西的解放摧毀了葡萄牙貿易賴以生存的支柱；在以後的26年中，法國的入侵，英國的勒索，20年的動亂，1828年至1834年內戰，使國家難以恢復元氣，甚至無法適應新的生活條件。

由於生產設備和專業人員極端缺乏，根本不可能生產出口商品。還在1840年，當歐洲的紡織業已經全部實現了機械化時，一位名叫弗朗濟尼的葡萄牙經濟師還反對安裝現代化紡織機，理由是沒有人會操縱。這個人就是後來的葡萄牙紡織部部長，負責分析葡萄牙經濟形勢的人。没有勞力，没有機器，没有資本，没有企業家，自然就不會有工業。土地可以說是唯一的財源，靠土地的稅收和租金來供養上層階級。

這種經濟上的不景氣從公佈的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來：1828年國家收入約一千萬埃斯庫多，支出爲1390萬埃斯庫多。30年後，收支數字幾乎沒有變動，分別爲11489000埃斯庫多及13944000埃斯庫多。而這30年卻是歐洲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

人口，1801年爲2931000人，1821年爲3026450人；1835年爲3061000人（均爲估計數，不是統計數，因爲1864年才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這種增長率比歐洲的平均數字要低得多，原因是人們貧困，衛生狀況差。後半世紀，增長速度有所提高。1854年爲350萬人，1878年爲416萬人，1900年則爲5016000

人。這個世紀中，人口增長了約70%，同一時期，歐洲人口則從一億五千萬增長到四億（增長速度超過160%）。

自由黨人勝利後，政治上的突出問題是政權不穩。各黨各派都没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排斥民衆階層，部隊軍官紀律松弛而且到處插手。

政權的首腦是國王，但是國王的作用是通過D·瑪莉婭二世行使的，1834年她才15歲。1834年D·佩得羅去世，國家權力落到了没有經驗的女王手中，由王宮顧問們輔佐。這些謀士大都是上層貴族，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利用王室作爲盾牌來反對革命。

當時的政治派别主要有兩派，即主張1828年憲章有效的溫和派和擁護1822年民主憲法的激進派。但是兩派都没有形成一定的組織，都對王室没有好感，政治信念也極不明確，有幾位著名的政治家甚至從憲章派轉到20年代革命派，又從20年代革命派回到憲章派。趕浪頭，搞投機。

以耕耘爲生的民衆，多數都没有參加政治派别，只有當他們被捲進某一個起義派别的行列時才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基本上都没有受過教育，都是文盲，因而没有任何黨派對他們的參與真正有興趣。小學由市級政府部門管理，而市政機關既無資金又缺教師，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葡萄牙創辦了第一批師範學校。只有在城市——主要在里斯本和波爾圖，小資産階級和工人在政治上才有某種程度的覺悟。但是，資産階級政黨認爲這種覺悟是危險的。1836年把左派推上臺的群衆組織，不久之後，就被該黨内部的“維護秩序”派所搞垮。

内戰中出現了幾位偉大的軍事領袖，戰爭的勝利提高了他們的威望，他們很自然地産生了一種傾向，認爲政權就是爲他

們而建立的，他們有權發號施令。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國家的大政方針主要聽命於軍營，而不是根據憲法。君主立憲制政權初期不穩定局面，主要歸咎於內戰時期的英雄們的冒險行爲，特别是他們中間最爲著名的人物薩爾達尼亞大公元帥。

這種經濟、政治、思想以及軍事方面的危機使新政權難以穩定。直到自由黨内部左、右兩派經過十八年的激烈鬥爭之後，穩定局面才得以實現。兩派勢力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經過了這段動蕩的試驗性的時期之後，隨着復興黨的出現，國家才有了一個妥協和疲憊的和平，使得資產階級君主制度得以和平地行使權力。

78 自由黨人的立法 廢除舊的法律

從立法觀點上來看，君主立憲制時期最爲重要的改革是莫濟諾·達·席爾維拉的立法，廢除教會體制，試行地區自治以及頒佈民事法。

1820 年革命時期，經濟關係大多是依靠法律規定和習慣做法進行調整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些規定已完全過時。國家、教堂、市政廳及産業主規定的税收和收費各地都不一樣，甚至保留着中世紀的痕迹。立憲議會以及後來的立法議會，在 1821 年至 1823 年間，曾公佈過一些法律，取消了這些殘存的舊章法（關卡税、個人捐税、對商業的限制等），但是後來由於專制制度的恢復，這些法律成了一紙空文。

1. 莫濟諾·達·席爾維拉立法

莫濟諾·達·席爾維拉（1780～1849 年）是位經驗豐富的

行政人員，1823年被任命爲財政大臣，專制主義制度恢復之後，曾留任一段時間；“一個正派人，既用不着替掌權者操心，也用不着爲社會擔憂，誰掌權誰管事”。他會玩弄政治手腕，並爲了公衆利益而不惜採用任何政治手段，這一才能使他超脫了許多棘手的政治問題，因此，誰也不喜歡他。開始是專制主義者認爲他有互助會會員的味道；後來是自由黨人又認爲他太刻板，缺乏煽動性，“如果你認爲衆望是與法律和道德無關的事，那你就錯了”。這是1833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政府任職時寫給他的繼任者的話。在以後的16年中，他既不屬於9月革命派，也未加入憲章派，臨終前他曾這樣寫道：“1月的天氣太美了！如果有道德和正義的話，這該是多麼好的國家啊！”

莫濟諾執政10個月（開始在德爾加達角，後來在明德盧，最後在波爾圖），起草了一系列法律條文，這些條文後來成爲自由黨人唯一真正革命的立法核心。與當時的政治家們相反，他認爲政治家的思想來自以他的生活爲基礎的社會經濟現實。他曾寫道：“如果没有自由的土壤，要求政治自由就毫無意義。”因而他所制定的法令都是爲了把經濟從受束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爲建設一個現代化和進步的國家創造基本條件。他取消了小額財産的長子繼承權（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保留了鉅額財産的長子繼承權，後來於1863年取消）；把房産税限制在5％以內；取消了十分之一收入歸教堂的規定；廢除了向領主交納的各種苛捐雜税；把出口税減少到1％之內；不再徵收營業税和葡萄牙本土上的商品流通税；從而在中央權力參與自治機構事務的基礎上，爲建立新的行政組織創造了條件；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和徵税機構；在地方政府中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開；把商業和小工業從阻礙它們發展的困難中解放出來；禁止某些壟斷。

例如對肥皂和銷售波爾圖酒的壟斷。根據他的著作擬定的法律條文，總的方針就是：取消特權，機會平等，經濟自由化和提高政府機構辦事效率。在自由黨人取得軍事勝利之後，這些法律開始生效，這套立法事實上宣告了舊制度的滅亡。

2. 結束教會體制、變賣教堂財產

當莫濟諾·達·席爾維拉還在亞速爾群島的時候就將幾所修道院還了俗。但是，這是根據 1834 年法令，結束教會體制而將其財產收歸國有的。這件事應歸功於若阿金·安東尼奧·德·阿吉亞爾。取消教會體制，没收教會財產的過程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1864 年在確立了共和國制度之後，又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非教會化運動。

教會財產在 1820 年還是十分龐大的，而且早在君主專制制度之前就已形成。19 世紀大片收歸國有的土地，在西哥特時代就已屬教會所有，以後世世代代通過饋贈和遺產捐獻，教會財產不斷擴大。因爲許多世紀以來，忠實的信徒們都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所給予教堂的一切，在他們死後受審時將用於贖買他們的罪過，從而使他們有資格在天堂佔有一席之地。從 D·阿豐索二世起，歷屆國王都曾反對過這種財富的聚集，但始終未能完全制止這種行爲。這些財富一旦進入教堂就再也退不出來了，因爲天主教教規禁止出讓教堂財產。在自由主義革命開始時候，教堂和教會的不動産的價值没有精確的估計，但大約佔全國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左右。此外還有幾百幢樓房和鉅額動産，例如藝術珍品。國家的藝術財富都是在修道院和教堂裏，而不是在貴族的宫殿裏。

所有這一切都被拍賣和出售。在經濟危機時期，成千上萬

件大大小小的家具，涌入市場，引起了家具價格的急劇下跌，其收入比預計要少得多。有錢購買的人很少。1837 年，有 7500 幢樓房出售，但買主的數目只有出售樓房數目的十分之一，沒有達到原來所預期的效果。原以爲這種拍賣會引起一些變化，使貧窮的農民擁有財產，因而引起土地改革。但是窮人實在是太窮了，他們無力購買。這種拍賣爲擁有金錢，特別是能搞到貸款的投機者提供了方便，使他們因此而擁有大量財產。即便是這樣，房產也沒有能全部出售。許多年來，已歸國家所有的教堂的財產成了一種儲備，國家在財政困難時往往求助於這種儲備。而財政困難卻經常不斷，例如：當需要向里斯本市政廳交納一萬六千埃斯庫多、購置在里斯本修建國家劇院的地皮時，政府爲了弄到這筆錢，只好下令賣掉埃武臘的卡爾圖修道院及阿連特如的三個大莊園，但所得總數還不足一萬五千埃斯庫多；最後，仍爲國家所有的只剩下一些大的修道院，而這些地方又被駐軍、行政機關和法院所佔據。

這種變賣教會財產的經濟及社會效果究竟如何，至今尚未進行過認真的研究，但是使歷史學家們感觸最深的卻是當時一些政治家們所進行的大規模私下交易的不法行徑。有些人認爲，房產主是修道院或者一位屬自由黨派的男爵，這並沒有什麼關係；而另一些人則認爲，財權轉移的結果造成了農業的崩潰；因爲教士管理農業時，安排緊湊，而且精耕細作；後來的新主人卻看不起農業，一般情況下他們都不直接參加管理。由於不瞭解農業生產，所以認識不到這種衰退。應該指出的是，土地作爲生產工具已不再掌握在具有傳統精神並靠土地收入維持生存的人的手裏，現在土地是由企業家經營，而他們則是以賺錢爲目的。這個事實加上 19 世紀下半葉修建鐵路和公路，加劇了農

產品商業化的進程，資產階級越來越富，而貧苦農民的處境卻並未得到改善。

3. 市政問題

自由主義體制的第一項行政改革就是1832年提出的高度權力集中制，這項改革也要歸功於莫濟諾·達·席爾維拉。其內容是：中央政權任命它在各自治區的代表，由這些代表真正行使管理權。而原來選舉產生的機構被降到次要的配角地位。這項制度被指責爲拿破侖集權主義的翻版。這種指責是有一定道理的。1832年的法律公佈之前，曾事先對各市區的形勢進行了研究，這是一個現實的解決辦法。

當時有過一場爭論，這場爭論至今尚未結束。從具體實際上看權力必須集中，但從一般原則上講，權力又要求分散，而且權力分散又被認爲更符合民主之思想。此外，還有人認爲這是葡萄牙的傳統的解決辦法。1808年在交給茹諾的第一個憲法草案中曾要求由議會選舉議員，"以更好地適應我們過去的風俗習慣。"這是一個神話般的傳統，它的來源也許要追溯到我們民族初期鄰里之間或作坊内部一些權力的古老遺風。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從發現殖民地之後，市政自治問題就像鄰里間的問題一樣少得多了。亞力山大·埃爾庫蘭諾曾經以他的全部威望和全部智慧證實了中世紀傳統的實質是民主。"爲了使代表制度成爲現實，爲了使選舉從根本上不至於鬧成一場卑鄙的鬧劇……我們應該使政治生活貫穿到國家機體的各個角落。應使地方生活成爲現實，以便中央政府能夠代表全國的意志。"

但是這個問題卻成了真正令人頭痛的事，沒有哪一個問題經過這麼多次的立法。1832年的權力集中之後，緊接着在1836

年就是帕索斯・曼努埃爾的權力分散。爲了使它得以貫徹，必須解散466個鄉（佔總數的一半以上）；原因十分明顯，因爲在一些小居民點，那裏既沒有資金，也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不能行使地方政府的權力。但是權力分散只經歷了6個年頭；1942年，科斯塔・卡布拉爾又建立了新的集權制度。卡布拉爾主義，盡管一直遭到激烈的反對，其法律還是保存了下來。後來又有過一些修改方案：阿爾梅達・加列特，安塞爾莫・布朗康普，馬爾坦斯・費朗，狄亞斯・費雷拉都曾在這方面做過努力。1878年，在一片經濟復蘇的氣氛中，羅德里格斯・桑帕依奧再一次下令將權力分散：選出的機構擁有廣泛的權力，包括徵稅權。但市政會議制度很快就崩潰了；1886年又制定了新的權力集中法。

在共和時期，矛盾和經驗同時保留了下來。盡管許多人對此並不理解，但問題還是自行解決了。國家財政機構以現實主義原則爲基礎，同時考慮到效果，還是和平地行使權力。這個機構以集中財政收入而後集中支出爲基礎。自治機關沒有自身的財源，它是依靠資助和分成來維持其存的。在此之後仍然有人談論地方政權獨立，這只能被看作是習慣勢力的原因。

4. 民事法

1820年的法律仍然是菲利普聖諭中的規定，雖然後來補充過許多條文，但從未編輯成書。當時的情況很糟糕，改革現行法律并其系統化的要求早就提出來了。光復之後曾考慮過這個問題，在D・瑪莉婭一世時期也討論過此事，但並未實施。1822年，議會曾設置一筆獎金，獎勵向議會提交民事法的優秀方案；但是這種立法思想使得舊政體的維護者感到不快。因爲這時候

法學家們感興趣的法典是法國 1804 年的民事法,這個法律被認爲是新思想的勝利。所以專制制度重新建立之後,再也未收到過任何方案。直到 1850 年法院仍然執行菲利普聖諭的條文(1603 年),其實這些條文還是經過簡單的改頭換面的曼努埃爾聖諭(1521 年)。

1850 年,前自由黨黨員,後來成爲人民黨黨員的波爾圖法院法官安東尼奧·路易斯·德·塞亞布拉奉命起草法案,他在這一年寫了《屬性——法律哲學》一書,使他獲得了法律哲學家的聲譽,他起草的法案於 1867 年通過,從而誕生了葡萄牙第一部民事法。

新法律並未使以前的司法制度發生太大的變化,一般地說仍是維持原狀,只是改掉舊條文中的一些年代的謬誤。自由主義革命的政治變革也只是表面文章,並未攪動水的深處。盡管如此,塞亞布拉的著作仍然是傑出的。在這種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照抄外國模式的時代,民事法畢竟完全是自己的東西。法律的作者感到最困難的問題是系統分類。這部法律包含的條款有上千條,分類也極不相同,從國籍到遺囑,從離婚案到抵押債權。歐洲各國法官曾反復討論過對這類案件進行邏輯排列的準則。他們的理論可以分爲兩派;一派主張用羅馬人在“民法大綱”中已經使用過的解決辦法;另一派則主張採用德國大法官所使用的準則。所有法典中採用的解決辦法都是這兩種辦法中的一種,或者是兩種辦法的折衷形式。一個案卷書寫上千頁,這是上個世紀歐洲法律中心題材之一。這兩種辦法塞亞布拉都沒有採用。他寫道:最好是“關上書本,來看看事情的本質”。對他來說,所謂本質就是一個產業主的全部生活。這激發了他編寫法典藍圖的靈感。這部法典共分爲四部分:人;人爲獲得財

產而進行的奮鬥；財產及財產保護（法律術語稱：法人；獲得權利；財產；傷害與賠償）。

因此，葡萄牙的法典不同於其它歐洲各國的法典，任何歐洲國家的法典都不曾使用這樣的資產階級法學觀的表達形式，其編纂的文體十分考究，新法律整整實行了一個世紀（1867～1967 年）。一個法律條文取得如此長期和廣泛贊頌還從來沒有過。

79 不穩定：9 月革命與憲章運動

實行立憲政治的頭兩年，政府與議會之間的分歧便明顯暴露出來。女王四次更迭政府，並最終解散議會，下令重新進行選舉。當時實行的立法條文就是憲章，反對派從憲法條文中覺察到政府軟弱及政治惡化的原因，因而要求恢復 1822 年憲法體制。

1836 年 8 月西班牙爆發了一場士兵暴動（格朗哈暴動），迫使政府重新執行 1812 年憲法。葡萄牙與西班牙政治上的密切關係再次得到證明。這一年 9 月，里斯本也爆發了一場革命運動，迫使女王起用 1822 年憲法。

9 月革命不像以前的革命那樣由軍隊將領發起。這是一場人民運動，軍隊後來才參加。這個事實引起了歷史學家們的極大注意，並從這場革命中看到了工人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鬥爭精神的初次表現。按照這個論點，9 月革命是一場人民革命，後來被資產階級政客所利用。人民動員起來的戰鬥精神和能力在 1836 年再次顯示出來；正是人民挫敗了伯倫扎達企圖在 11 月發動的政變。但是自此以後人民動員便無聲無息了。這種情況

是無法解釋的。如果説人民的動員推動了一個社會階層的崛起，但這個階層的問題後來並未得到解決。然而，1836 年根本不具備發動一次强大的能動的階級覺悟所需要的基本經濟條件。當時既沒有工業，也沒有工人階級；工廠（兵工廠和蔴繩廠）的大部分職工都是公職人員。必須找到另外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就是 1836 年的起義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不久前退役的自由黨人軍隊中的士兵。他們大批擁向里斯本，因爲只有首都，特别是國家機構能夠爲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他們的信條仍然是過去戰爭年代在軍隊裏得到的那點知識，後來又在地方的政治俱樂部中繼承了下來。這個事實有助於瞭解他們在 1836 至 1838 年期間所表現出來的軍事活動能力，以及他們在軍隊中的團結精神，同時也説明了里斯本人民運動本來並沒有什麽傳統：這是一種臨時形勢造成的，而不是社會機構的條件所造成的。

革命後成立的政府被稱爲 9 月革命派政府，“9 月革命派”一詞直到該世紀中期一直被用來表示自由黨的激進派。他們的政治壽命不長，僅僅從 1836 年到 1840 年，而且這個時期還曾幾次被激烈的反抗所中斷。1836 年王宫内曾發生過一次政變，試圖恢復憲章。這次政變的背後有比利時和英國的支持。做爲對這種支持的交换條件是：如果政變成功，葡萄牙將把自己在非洲的一個海外省奉獻給他們。女王宣佈解散政府，一支英國部隊甚至在我國海域登陸。但是發動 9 月革命的人民力量拿起了武器，並揚言要向女王所在地貝倫宫進軍，從而挫敗了這次政變。這次事變也稱爲“伯倫扎達事變”。

1837 年許多城市的兵營又發生“騷亂”，並宣佈擁護憲章。薩爾達尼亞和特塞依拉領導了這次運動，所以被稱爲“元帥暴動”。9 月革命派認爲這是英國人的陰謀，是由於制定關税法引

起的。這項法律試圖通過加重關稅來減少進口，這次騷亂從 7 月開始一直到 9 月，雖經過多次血戰，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

但是發動革命的民間組織對這樣的革命感到失望，並準備進行新的革命，國民衛隊所轄兵營（準軍事組織，有自己的武器裝備，包括砲兵）是這次革命運動的主力。其中最爲積極者是由兵工廠工人組成的兵工廠兵營，指揮官是在 9 月革命中當過真正平民領袖的蘇亞雷斯·卡爾德拉。當時的政府說他們是無政府主義，但卡爾德拉是議會議員，他的演講並未表明他的任何政治觀點或政治綱領，而只是激進。但不管怎樣，兵工廠的活動分子驚嚇了資產階級。當時一位作家曾寫道：他們把鬍子留得長長的，“以便進一步嚇唬首都手無寸鐵的者百姓。”1838 年 3 月 13 日晚上，政府部隊在羅西奧包圍了兵工廠的工人，並慘無人道地向他們開槍掃射，目擊者在描述這段情節時，因政治態度不同而說法各異：有人說有幾百人死於非命；也有人說只不過有十幾個人喪生。這段歷史在自由黨人的歷史記載中總是被說得含糊其辭。“羅西奧屠殺”對 9 月革命黨人來說是致命的，因爲這使他們失去了中堅力量。里斯本這個短暫的人民運動便從此轉入地下並銷聲匿迹了。而其它政治力量則多傾向於保守。

9 月革命派在政府中在立法方面最突出的改革是在文化領域：創辦中學，建立里斯本和波爾圖美術學院，波爾圖外科醫學院和里斯本工學院。繼續執行既定的海外政策，在非洲建立第二個巴西；在安哥拉高原已開始開拓殖民地，並於 1836 年禁止向赤道以南輸出奴隸，這種措施是爲了把用於奴隸貿易的投資轉到提高經濟效益的事業方面。

議會重新有了立法的權力，並起草了一部新憲法（1838

年)。這是憲章和1822年憲法的折衷產物。重新實行三權分治，取消了國王的仲裁權，但是國王仍然擁有否決權並加强了執行機構的領導權。議會同憲章時期一樣由兩院組成，但是上院是由選舉產生的參議員與臨時參議員組成，不再像憲章時期那樣是終身制並且是由國王指定的。

1838年憲法壽命不長。1842年，科斯塔·卡布拉爾在波爾圖發動政變之後，女王便下令再次把憲章作爲國家的政治大法。

科斯塔·卡布拉爾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曾是兵工廠兵營的一名軍官。短短的幾年中間他從一個激進的左派轉向憲章右派。1839年他已經是政府的一位實力人物，成爲所謂“秩序派”的代表。由於他的這種變化，再加上他反戈一擊，推翻了他自己也在其中任職的政府，從而造成了從未有過的形勢，成了當時的一大醜聞。但是，來自各方面的對於這位部長的嚴厲譴責，既不能說他是在玩弄政治伎倆（例如，薩爾達尼亞一生中就曾幾起幾落），也不能說他的所做所爲只是打破了指導政治行爲的浪漫主義觀念的框框。科斯塔·卡布拉爾成了第一位政治現實主義派的代表。他像其他現實主義者一樣，只注重事實而不注重原則，只關心現在，而不着眼將來；他提出的目標是要恢復國内秩序，提高辦事機構的效率和加强對政治輿論的控制。對稅收制度，財會制度，衛生機構及行政組織都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在行政組織方面他拋棄中世紀傳統的主張權力分散的浪漫主義思想，而主張將各自治機構隸屬中央政權，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兩條路綫之間一直存在着鬥爭。

80 瑪利婭·達·芳特與人民黨

同9月革命時期不同的是，這些改革並不只是停留在公文紙上或者只是在縣級首府試行。改革已在全國各地貫徹推行。因此就同農村地區的傳統制度發生了矛盾。一項不准在教堂領地下葬的決定引起民衆極端的不滿。在野地裏挖坑埋葬教徒被認爲是褻瀆神明和侵犯人的尊嚴，簡直是把人當畜生對待。與此同時，在農村開始進行財產登記，這是設立房產税的必要基礎。登記要求對房產進行估價，因而謠言四起，說什麼政府在對每個人的地產作價，以便賣給英國人。這種强烈的不滿導致了1846年4月中旬的一場暴動，同這個月初發生的一次震撼加里西亞地區的農民運動遥相呼應。

米紐農民起義被稱爲“瑪利婭·達·芳特起義”，因爲婦女們起了極爲突出的作用，而且最初的事件是發生在波沃亞·德·蘭紐佐鄉的芳特·阿爾卡達教區。成群的農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手持長槍、短槍、長矛、鐮刀和鋼叉”，衝進鄉政府所在地，燒毁房屋登記本和財產帳簿，打開監獄，甚至向駐紮在布拉加的軍隊發起了攻擊。起義者之一，著名的卡齊米洛神父後來曾就此事發表了一篇報道。在他看來，起義領袖認爲他們是米格爾主義者，但是他們的米格爾主義並不是支持米格爾稱帝，而只是强烈地反對貧困，反對沉重的苛捐雜税和反對外國日益嚴重的入侵。

9月革命派作爲反對派巧妙地利用農民的憤怒情緒，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起義發生後，幾乎所有的縣區首府和其它主要城鎮一些政治家或軍人紛紛發表聲明表示聲援。但這場運

動並未波及首都。9月革命派的願望就是要科斯塔·卡布拉爾下臺。當時有一首詩寫道：

萬歲！瑪利婭·達·芳特，
緊握鋼槍在手，
處死背叛民族的僞君子，
卡布拉爾之流。

這位有爭議的大臣因此而被罷官，但没有過幾個月，女王又組織了一個由卡布拉爾分子的親信組成的政府，這又一次引起了騷亂並導致了人民黨的内戰。人民黨一詞來自西班牙文，原指一些軍紀松散的雜牌部隊，當時已成爲一種政治俚語，卡洛斯派用它稱呼政府軍。

人民黨同瑪利婭·達·芳特運動的關係極爲密切，但其性質則完全不同。人民黨原來是受法國運動1848年革命和建立第二共和國的小資産階級思想影響的政治家和軍人組織。但是這一次他們的基本條件仍然不盡相同；在法國，工業生産在1830年至1848年間增長了10倍，而葡萄牙經濟增長没有起色。人民黨只是理論上的自由主義思想對卡布拉爾主義支持的貪贓枉法的新貴族階層的一種反抗，但並未形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民運動。

一個臨時政府在波爾圖成立，並準備向里斯本進軍。雙方都在進行强制徵兵，士兵們没有什么信念，戰鬥中不只一次發生士兵從一方跑到另一方的情况。無論是波爾圖的軍隊還是里斯本的軍隊都聲稱自己是爲女王而戰。波爾圖的軍隊説是要爲解放女王而戰鬥；而里斯本的部隊則説是爲維護女王的自由而

鬥爭。起義者和米格爾派的政治家們一齊加入了人民黨；這種結盟是一種思想上空虛的徵兆，但是他們的軍隊把戰爭推向全國各地，造成了數千人死亡。

當里斯本失去對全國的政治控制，而求助於外國干涉之後，和平才得以恢復。一支英國艦隊和一支西班牙陸軍俘虜了人民黨的艦船及其精銳部隊，迫使波爾圖政府代表簽署了一項協定。其條件是繳機投降換取赦免（即格拉米多協議，1847 年 6 月 24 日）。

81 政治穩定 復興，輪流執政及權貴政治

激烈的內戰之後是國內政治上的一段消沉和平穩時期，1847 年至 1851 年間未曾發生過什麼大事。議會既沒有制定什麼重大法律，也沒有發生什麼嚴重衝突，議會開會只是老生常談。1849 年曾被稱爲“四輪馬車年”，因爲那一年議會中揭露的一起貪污案件成了當年的一起主要的政治事件。科斯塔・卡布拉爾以一枚勛章換取了一個商人饋贈的四輪馬車。在這種氣氛中曾發生過一次似乎不十分激烈的革命嘗試，因爲這次革命既無指導思想，而且也没有結黨，也没有對立面。過去擔任軍隊司令官、同人民黨打過仗的薩爾達尼亞元帥因爲他的宮廷大臣職務被人取代，而心懷不滿，他在辛特拉的一個兵營裏宣佈起義，但没有人響應。他離開辛特拉到瑪夫拉去搜羅追隨者，但一無所獲。後來又先後到過科英布拉、維塞烏和波爾圖兵營，但都大失所望。後來當他得知波爾圖的幾個團的士兵決定參加時，他已逃到了加里西亞。不久他又回到波爾圖市，在聖若奧大劇院慷慨激昂地大聲疾呼。一位演説家曾經説過，這已不再是一

次革命，而只是國民生活復興的開始。在遭受内戰蹂躪之後，這種思想符合全體民衆願望。因而這次運動被稱爲“復興運動”。

里斯本政府的反應是決定嚴厲鎮壓，但執行時則軟弱無力。曾經組成了一個强大的軍團準備同起義者作戰，這支軍隊由女王的丈夫，陸軍司令D·費爾南多率領。很可能D·費爾南多秘密參與了這場陰謀，因爲薩爾達尼亞同女王丈夫的私人圖書館館長之間就此事曾有過多次接觸。D·費爾南多對科斯塔·卡布拉爾甚爲反感，後者對他也抱有同樣的情緒。他是一位機敏的政治家，他懂得既然革命已無法避免時，最好是進行疏導，免遭其害。因此，本來是維持秩序的部隊卻没有越過科英布拉，據説D·費爾南多曾邀請他的軍官們選擇支持對象。他回到里斯本後，女王不得不給波爾圖過信説："我要爲薩爾達尼亞元帥的感情主持公道，我請他馬上到里斯本來”。並把政府交給他治理。

葡萄牙的政治從此進入了策略上共處時期。國内普遍的想法是盡快求得物質進步；而這些進步又主要是在交通運輸方面。在此以前，任何階級都不可能實現過富足和舒適生活的願望。資產階級社會各派政治勢力都傾向於放下奪取政權的武器，在改善物質條件的前提下而相互諒解；憲章繼續有效，但修正條款滿足了9月革命派的某些要求：議員由直接選舉産生；議會有權任命委員會對政府的活動進行調查。這些改變使憲章派和反憲章分子停止了對立行動。保守勢力以復興黨的面貌出現，這是一個溫和的憲章派；而民主勢力則成立了歷史黨，後來改名爲進步黨，是9月革命派的翻版。這兩個黨無論哪一個都採取了中間立場。都聲稱他們忠於國王，都是真誠的自由主義派，都建議重建國家經濟，着手解決不斷惡化的財政問題。

這種思想上和綱領上的接近，就有可能使政權從一個政黨

手裏轉到另一個政黨手裏，而不致於引起暴力危機。從而出現了輪流執政的局面，並一直持續到該世紀末。

在歐洲，兩黨輪流執政是典型的議會自由主義的機械形式。先例是由英國開創的。每次選舉之後國王便將政府交給選舉中獲勝的政黨，這樣執政黨就代表了公衆輿論的大多數。但是葡萄牙的輪流執政則正好相反：在這裏不是誰在選舉中獲勝誰上臺，而是誰上臺誰就能贏得選舉。政府和選舉結果之間取得一致的辦法是，每當國王任命新政府的時候，都要下令解散議會議院，並決定新的選舉日期，選舉獲勝者總是屬於國王授權組織政府的黨。

這種辦法遭到了激烈的批評，詩人若奧·德·德烏斯有一首詩在當時極爲出名：

> 國王與人民之間，
> 一定存在着某種永恒的協定；
> 每當國王組成新的政府，
> 按照那個永恒的
> 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協定，
> 人民立刻就成爲政府的附庸。
> 多虧這種和諧一致。
> 但這的確是一個“謎”。
> 盡管黨派林立，
> 政府及其各部，
> 却總能贏得選舉！

這個“謎”就在於國家的社會條件，被直接選舉制度帶到

票箱跟前的絶大多數人，他們政治上並沒有覺悟，經濟上也不能自立；各個黨派也没有專門機構進行選舉活動。因此要行使選舉權利就得利用地方上的權貴人物（這個詞是從卡拉依巴經西班牙引進我國的，意思是土著居民村落的首領）。權貴政治在選舉制中起着主要作用。這些權貴同人民進行接觸，他們指揮人民進行選舉；然而這些權貴又依附於某一政治領袖，由他出錢來爲他的黨活動選票。作爲報答他們可以得到一官半職，得到保護或者得到某種恩惠。除了選舉中的弊病之外，這也説明了爲什麽政府總是能贏得大選的勝利。權貴政治事實上是凌駕於直接選舉權利制度之上的一種非直接選舉。

建立在這種環節基礎上的政治生活是無真實可言的。選舉成了全國嘲笑和諷刺的話題之一。埃爾庫蘭諾把這種選舉稱之爲“可悲的喜劇”。對政府機構和政治團體的代表性的信任已不存在，國家政治機器在人民中没有根，而所謂人民的國家在政治上也無從體現。輪流執政的格局逐漸失去生命力，到本世紀末由於意見分歧而開始解體；也就是説，黨内團結無法維持，因而這一情況促成了一些新的黨派的誕生。兩黨制變成了多黨制，使輪流執政制度無法繼續，從而導致了君主立憲制度的垮臺。

82 經濟發展、進步與挫折

1. 發展階段

19世紀葡萄牙經濟的發展像政治發展一樣很不平坦，大體可分爲下列幾個時期：

1. 1800年至1808年，這是彭巴爾政策的積極因素繼續發

展的時期，盡管有英法戰爭造成的困難。

2. 大衰退時期：包括與巴西經濟分離，法國入侵，英國的貿易控制，專制主義與自由黨人之間的衝突和內戰，以及自由黨人勝利後的幾年政治動亂。這個時期是從 1808～1850 年。即使在 1820～1824 年和 1834～1838 年進行恢復經濟的努力時期也是如此。這二次恢復經濟的努力均無建樹，政治條件不具備，資本缺乏，設備陳舊以及外國競爭的壓力。所以 19 世紀上半葉，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歐洲是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但在葡萄牙則是停滯和衰退時期，嚴重地加劇了葡萄牙的落後。

3. 恢復和發展時期：由復興黨發起，私營經濟積極參加，國家干預，並承擔了大規模修建公路的計劃。

4. 停滯與衰落時期：從 1891 年危機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由復興黨開創的經濟發展時期具有重大意義，因爲正是在這一時期加劇了或重新產生了一些結構上的不平衡，導致了後來政治上的爭議。這是一個新時期，成爲各界議論的題目。這一發展時期的主要特點有：①國家集中力量實現交通規劃；②在交通設施所能提供可能性前提下，由個人集中力量發展貿易；③農產品在貿易中佔優勢；④由於農產品商品化，農村生產率提高；⑤由於農產品商品化，中產階級的地位有所提高；⑥提高了中產階級的消費和生活水平，並相對增加了工業品的進口；⑦由於依賴進口工業停滯不前，發展緩慢，工廠被遺棄或停產；⑧僱農依靠土地的收入減少，農業勞動者生活條件惡化；⑨農民移居國外的人數劇增，形成了一項新收入來源：移民匯款；⑩建立新的收支平衡，因中產階級消費增長而引起的赤字，由移民的匯款做了補償，其結果是推遲了國內生產資料的建設。

2. 方特斯主義及交通政策

19 世紀中葉，葡萄牙還沒有公路。唯一的一條近期修建的道路還是從里斯本通往科英布拉的碎石路。這是在法國入侵之前 D·瑪莉婭一世時期修建的。隨着這條道路的修建，出現了第一條貿易通道。四座馬車每周往來兩次，但到了 1804 年，由於沒有旅客而停駛。40 年後，有人設想在里斯本和波爾圖之間修建一條鐵路，但被認爲是胡思亂想，其理由就是沒有乘客。政治家們早就認爲經濟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因爲缺乏交通工具；1821 年費爾南德斯·托馬斯這樣寫道："沒有道路，水果及工業品幾乎全部損失，因爲運輸的費用往往超過商品的價格。"還有許多這樣類似的描寫。一些外國游客都對葡萄牙的道路狀況表示驚訝，其中一位在 1860 年這樣寫道："在外國誰也不會因爲看到駛過一列火車而感到驚奇；但是在這裏看到一輛駛過的馬車也會使人感到激動。"

1852 年曾發佈過一道命令，招標修建里斯本至聖塔倫的鐵路，工程由英國技術人員承辦。第一段綫路（里斯本至卡列加多，共 36 公里）於 1856 年竣工，然後工程又繼續進行，1864 年里斯本與波爾圖連通，這條路綫一直通到加亞爲止。大橋於 1877 年竣工。1900 年已經有 2371 公里長的鐵路，運送了 1200 萬旅客和 270 萬噸的貨物。隨着鐵路的興建，還修建了上百座鐵橋（這是國家的第一批鐵橋），幾十條隧道，近五百個火車站。其中一些建築被稱爲真正的技術創舉，像羅西奧隧道，埃菲爾設計的波爾圖 D·瑪利婭·皮亞大橋，以及塞堤爾大橋。這座橋在一段很長時間裏曾經是半島上最長橋梁。

1849 年開始修建公路網。修建鐵路一般都靠貸款（以稅金作保和出讓經營合同的形式）。公路的情況則相反，要邊修邊付

錢，因此一些藝術建築（橋梁、通道等）都比較簡單。該世紀末，公路網已達一萬公里。盡管由於財政困難，中間有過幾次停頓，但築路工程一直在繼續，平均每年修建公路二百公里。

1853年,印製了第一枚葡萄牙郵票。1855年有了第一個電報局。電報通訊和郵政通訊的數量只是在19世紀下半葉才在葡萄牙的社會生活中起了變化。1860年售出郵票價值15.5萬埃斯庫多;發出34895張匯單,總金額爲34.5萬埃斯庫多;發電報6.2萬封。1859年售出郵票89.7萬埃斯庫多,發出311549張匯票,共計374.6萬埃斯庫多,電報數量已上昇爲104.5萬封。

這項龐大公共工程計劃的最積極的實施者方特斯·佩雷拉·麥羅是位工程師，畢業於里斯本工業學校，方特斯主義一詞就是因其交通政策而得名。當時對這項政策是有爭議的，直到今天還有人誹謗他。事實上，方特斯是一位工業技術人員而不是一位學究。他的班子是由工程師組成而不是由空想家組成，他認爲只能靠開發財富的工具才能迅速地獲得進步，絶不能靠思想家的空談。他所追求的目的大部分都達到了。國家開始擺脱了幾世紀以來的停滯狀態,並在許多方面接近了歐洲水平。國家財富大量增長，促使國家發展的自由主義哲學思想在使國家致富的同時也加劇了原來就存在的不平衡狀態。

3. 農業商業化及中產階級的壯大

按自由黨人關於國家職能的理論，國家不得干預商業活動的自由開展。國家認爲修築道路屬於它的職權範圍，但指導經濟則是侵犯自由。修建鐵路和公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個體經濟活動的自發性。個體經濟很自然地朝着比較容易的方面發展，用現有的或比較容易弄到手的財富做生意，因

爲他們已擁有下列因素：土地和勞力。

所有來自土地的產品及自我消費後的節餘都裝車運往城市、市場或河岸碼頭。方便的交易迅速促進了生產的增長。產業主千方百計擴大種植面積和提高原有土地的生產效率。

爲了擴大種植面積，開始佔有荒地和山坡，甚至是只要能夠種植的陡坡。1875 年的統計數字表明，“40 年前的種植面積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幾年前還是獵獲野豬和駝鹿的叢林越來越少了”。佔領荒地從 18 世紀就開始了，但在 1850 年之後更加嚴重。阿爾貝托・桑帕奧寫道：直到前不久這個省的大部分山區還是荒地，或者是附近教區或地方的公用地，大家都可以在這裏放牧牲畜或者砍柴。後來就被分掉了，每人都得到一塊土地，標上記號；而後主人把這塊地圍起來成爲永久性的個人私產。民事法（1867 年）從法律上取消了公社財產，並制定了有關圍地權利的細則。這是個新詞，單就從這一點上看，圍地在傳統上是不存在的。

商業對農村的壓力所產生的另外一些後果是，以物易物作爲支付工資的形式減少了。長期出租土地被比較短期的合同所代替。三年休耕期被用來種草，因而牲畜的存欄數有所增加。耕作的機械化還只限於個別農業資本家，和一些受當時報刊及展銷大肆宣傳所驅使的先行者，一般來說，當時所依靠的動力仍然是靠人的雙手和牲畜。那時候比較廣泛採用的一項技術改造就是用金屬犁代替木犁。由於這種犁能夠深耕因而生產效率提高了，盡管這一革新還沒有普及到所有地方。直到今天，在貝拉和山后省一些地方的農具室裏，還可以見到本世紀初期還在使用的羅馬前期或羅馬時期的犁。直到現在還有人使用原始牛車，就是我們在中世紀繪畫上看到的那種牛車。

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商業的發展，使土地主得到好處，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小土地主的生活水平。小土地主脫離了農民群衆，形成了“中產階級”。而以前省吃儉用的中等地主現在則過着“老爺”式的生活，搬入了城鎮，成了富翁。

中產階級的增長指數和繁榮程度都是很高的。該世紀上半葉還局限在彭巴爾的規劃圈子裏的里斯本，人口從 1864 年的 16 萬人增加到 1890 年的 39.1 萬人，城市規模明顯地反應了這個飛躍。19 世紀擴大了半個里斯本，戈麥斯·費雷列，安若斯，埃斯特方尼亞，公園街，埃斯特列拉，歐利克廣場，拉帕；阿爾坎塔拉，貝倫，那時都已佈滿了建築物。其中大部分都是供出租的房屋，不是私人住宅，但都是豪華的高屋樓房；方石基礎，外面是瓷磚牆面，大量使用鑄鐵器件，室內是抹灰牆面，寬敞的走廊，房間也很多。19 世紀的建築在波爾圖也佔有很大的比例，這個城市中出現過所謂“島嶼”區，即在不斷擴大的城市市郊有些比較集中的貧民住宅。這種全國到處都在進行的建設（但在阿連特如地區則非常少）的形勢表明，無論在 19 世紀還是在 20 世紀，民用建築爲私人投資者所歡迎。葡萄牙人始終認爲“尚無把握，莫下基礎”。與此相對照，公共建築則非常之少。國家的一些機構——營房、醫院、學校——都設在過去的修道院內。里斯本監獄是由國家出面興建的少數重要建築之一。由私人出面修建的代表性建築就是游藝場和小廣場地區的鬥牛場。

第一批浴場也是在那時候開辟的。這是一些修建在古老的漁村並連成片的別墅。出現了溫泉旅館；在山后地區偏僻的山村建造了兩座旅館，展示了皇宮的豪華氣魄，“宮殿式旅館”是

當時極爲流行的形容詞。在里斯本彭巴爾時期的公共游樂園(周圍是鐵欄杆，在燈火輝煌的夜晚，用布罩起來，以免老百姓窺視)，變成了自由大街，這是在一位議長的提議下改建的。這位議長靠賣糕點起家，他的糕點是採用傳統的配方用進口面粉製做的。

有了新的階級就興起了新的習俗。外國的棉花代替了亞蔴布，煤油燈取代了油燈，進口洋蠟取代了土蠟。一些新的嗜好和新的消費的事例，辭書上都有記載。那時候有一大批外來詞滲入我們的語言，因爲城市、家庭、旅行、食品、衣着等都要用新詞來表達；如大街、旅館、俱樂部、飯店、廁所、媽媽、爸爸、嬰兒、火車站、鐵路、車箱、郵船、碼頭、乳酪、豆蓉、攤鷄蛋、牛排、布丁、嚼烟、罩衣、花邊、文件夾等等，都是過去不存在的新詞，而且是在很久之後才傳入鄉下。

新的消費同新的生産並不協調，而是靠進口來滿足的。"一切都靠進口，法律、思想、哲學、事務、美學、科學、風格、工業、時髦、方式、詼諧，一切都被郵船用箱子運了進來。我們用海關權利爲文明付出了極爲高昂的代價。文明對於我們只是二手貨，它不是爲我們創立的，我們穿戴起來袖子顯得短了。" 1888 年埃薩在《瑪婭人》一書中這樣寫道。在此以前，即 1881 年奥利維拉·馬爾廷斯説過："外國人帶走並帶來了我們通過海上運出來和運進來的東西，難道只有土地才屬於我們？只有農業收入能使我們致富？當然不是，里斯本及北部城市那些没有什麽文化但善於鑽營的資産階級的富有，加上農村無知百姓的富足，農莊加銀行，這就是葡萄牙人的葡萄牙，但是車間在哪兒呢？"

這個問題指出了經濟上表面繁榮的根本弱點，在富足和富

有之上并没有商品生産,而富足又不可避免地增加商品消費。商業財富導致了不動産的資本化。酒的出口使得許多樓房拔地而起,但是工業資本化卻非常緩慢而且不被重視。當然也有一些發展:1840年葡萄牙已有四臺蒸汽機用於工業生産(在歐洲已有成千上萬臺);1881年有328臺;但是這也表明每年平均只購進了八臺機器;因而形成一臺機器對幾百幢大樓的局面。工業就業人數增加了(1820年1.5萬人;1887年達18萬人)。這種增加是由農村經濟貨幣化引起的。葡萄牙的工業産品只是在農村和它的殖民地才有市場,因爲産品質量還不能適應中産階級的要求還達不到能夠代替進口商品的水平;質量低劣的原因是由於同其它工業化國家相比,工藝水平明顯落後。葡萄牙資本主義形成的某些趨向(也很薄弱)的基礎是商業,而不是工業。在該世紀中葉,只有八家無名公司,就是説其資本是由許多私人的小股節餘湊集起來的。1875年,已有136家公司,但都比較單薄,因爲只有很少幾家維持了較長的時間。1858年只有3家銀行,1865年12家,1875年已有51家,但仍然没有和工業企業掛起鉤來,其業務主要是向建築業和種植業貸款和方便移民儲蓄。

4. 農民:流入城市並向巴西移民

農業的變化使没有土地的人的生活趨於惡化。

在大變革之前,大部分土地均係公有。即使是無地的農民也可以在這些地裏放牧、積肥和砍柴,可以養羊積肥,可以割草鋪牀,可以砍柴取暖或者做飯。土地私有以後,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過去没有錢,但用不着買什麼東西,因爲大部分工資是以面粉、食油及豬肉等實物支付的。現在,實物就是商品。

土地的主人必須盡可能多的賣掉他的産品，這部分産品已經不是他向傭工分配的東西了，而是商品的一部分，即用貨幣購買的東西，用雷伊斯的支付的工資的絶對值提高了，因而引起了許多土地主的抗議。但是相對值卻下降了，因爲越來越多的東西成爲必需品而且只能用錢才能買到。特别是各階級間的不平衡擴大了。當大家都貧窮的時候，貧窮的感覺就不明顯，而現在許多人都富起來了。在農村宅院同草屋形成了對照；在城市，樓房與棚舍有了對比。富餘農民用起了懷錶和金錶鏈（這種鏈子實際上是階級的標誌）。他們請醫生，到藥房買藥，把孩子送進學校，在地下室存放糧食以應急需，甚至在經濟緊張時向銀行借債（因此使許多人失去了土地，因爲産業資本家通過銀行提出訴訟而將其土地吞併）。

貧窮的農民没有儲備，没有學校，也無處借貸。他們流離失所，他們不屬於任何地方團社，他們聚集的中心就只有酒店。擔心工人們酗酒成了資産階級慈善機構的課題之一。兩個社會階層——一個是有産者，另一個是無産者——開始發生衝突，在農村聖經上説的那種和平已陷入階級鬥爭之中。兩個階級都認爲自己被人剝削；勞動階級這樣認爲是因爲他們得到的與他們需要的相差甚遠；而有産者則認爲，對他們的要求超出了他們的能力。1887 年的一份報告中説："這種情緒在下層階級中孕育着一種對社會上層的無聲的仇恨，這就是爲什麽在他們眼里搶掠并不是過失或者犯罪，而只是一種報復"。

19 世紀勞動者對新的生活條件的反應同 14 世紀一模一樣：逃離農村，在城市尋找工作。但是就業的機會不能滿足就業人數的要求，一部分人在鐵路、公路以及里斯本和波爾圖的幾千幢樓房的建築工地上找到工作，新的工業企業也吸收了一

部分人。他們開始形成一個具有自己獨特習慣和思想方法的階級。最初的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了，這是在城市工人階級中尋找聽衆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書信中提出來的。聽衆不多，因爲新的階級只是葡萄牙社會的兩個基本方面——農民和資產階級——過渡階段。1850 年創刊的我國第一份社會主義刊物《工人回聲報》曾經寫道："没有哪一個人（工人）會不想方設法用他們的節餘變成資本家。"它的創刊號有過這樣的話："現今的制度是財產受到尊重，社會主義要接替這個制度，它不能不把財產看作未來一切進步的基礎，事實上，作爲繼承者的社會主義只是離開農村的一些人想成爲合法遺產繼承者的願望，或者説是希望有資格進入資產階級社會的願望。一般的説，他們達到了這個目的，工人子弟在城市都有較好的前程，而這種前程在農村則是屬於富家子弟的；他們學會了閱讀，帶上了領帶，或者在國家機關，辦公機構，鐵路部門找到了工作；或者當上了小學教師，成了資產階級金字塔的最下層。這個階層除了這部分處於上昇狀態的人之外，還包括另一部分可悲的處於下降狀態的人。他們從資產階級社會中分化出來，在儀表上、思想和裝束上還像資產階級，但實際上在家裏卻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農村當農民是一個永久性的職業，在城市當工人則只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貧苦農民的曾祖父是貧苦農民，他們的曾孫們仍然是貧苦農民;但是第一批工人的父輩都是農民,而他們則爲了使自己的子女成爲有產者而拼力奮鬥。與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則倒退爲共和思想，他們只是追求國家在形式上和人事上的改變而不主張改變其社會結構。

農村世界向資產階級世界過渡是艱鉅而困難的：有了許多高樓大廈，但工廠卻寥寥無幾。與此同時，女傭人找活路輕而

易舉，男勞力卻無工可做。農村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仍然是葡萄牙勞工的主要場地。1900 年農業勞動者佔人口的 61%，而從事工業勞動者只佔 18%。進口影響了城市就業的機會，在農村没有前途，在城市又找不到工作，農民只有到國外去謀求生路。從這一點上看，現在又在重複着中世紀的歷史。但是，因爲現在没有主人的世界已不復存在，所以這種外流現在稱之爲“移民”。

1873 年葡萄牙勞工外流足以構成一個政治問題。這一年議會進行了第一次移民調查，調查報告的結論是：外流原因不是因爲貧窮而是由於貪婪。官方機構注册的出走人數到該世紀末平均每年約 20000 人，20 世紀上半葉，外流人數急劇上昇，1930 年至 1950 年有所下降，但以後又重新回昇。

19 世紀的移民，幾乎全部移居巴西，特别是里約熱内盧，20 世紀的一份統計材料（1913 年）可以清楚的表明移民的社會結構：28000 名農民，20000 名無業者，5000 名手工藝人（瓦工、木工、鐵匠），工廠工人只有 200 人。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業務專長。他們一部分人待在里約，這裏的零售攤幾乎全在葡萄牙人手裏。但大部分人住在内地，頂替了根據 1888 年法律解放了的奴隸的勞動力。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和以前的奴隸没有什麼差别，他們被僱爲開墾新荒地和大規模擴大咖啡種植。

住在城市裏的葡萄牙人，組成了鄉會團體，慈善團體或文化團體。同其它外國殖民地相反，巴西的葡萄牙人没有建立永久性的經濟企業（有少數人例外），然而卻超越他們的能力建立了一些社會機構：大型醫院和其它文化機構，像里約的葡萄牙慈善院，聖保羅醫院以及里約熱内盧葡萄牙人讀書會等，就是

這一時期的紀念碑。巴西最著名的體育俱樂部之一，瓦斯科·達·伽馬俱樂部是葡萄牙移民的成果之一。它的歷史是極有意義的。這是一些缺乏經驗的人組成的俱樂部，開始無人理睬，因爲足球是紈袴子弟的運動，專供上等資產階級人物娛樂的。對這個俱樂部的最激烈的指責就是葡萄牙人在他們的球隊中塞進了黑人，但是也正因爲如此，他們贏得了巴西第一屆冠軍賽的勝利。瓦斯科俱樂部因而成了最大的群衆性俱樂部。就連英國的比賽也對所有球隊敞開了大門。從而使這項運動迅速成爲人民群衆最喜愛的體育運動之一。

移民中返回葡萄牙的人爲數不多。絕大多數移民來時一貧如洗，在這裏又在貧困中死去。有人說：巴西是“葡萄牙人的墳墓”。國內輿論對從巴西回來的人進行挖苦和諷刺，“巴西人”成了諷刺文學偏愛的題材。這種諷刺倒是及時地爲一部朦朧的集體史詩主持了正義，它非常明確地肯定了當代葡萄牙人的品德。

移民一般發生在擁有少量財產的居民地區；移民中幾乎見不到阿連特如人。理由之一就是要這樣遠涉重洋，必然還需要一筆錢。因而這種情況只能出現在大多數人都還有一些財產的農村地區：如米紐，杜羅，上貝拉，濱海貝拉。移民們賣掉自己的耕地，或者法定土地即根據民事法只能繼承的那部分財產。他們離開的時候幾乎總是獨身一人，把家庭和債務留在故地。爲了幫助家庭償還債務，也爲了能夠買點土地，他們把所有省吃儉用的節餘寄回葡萄牙。移民通過銀行的匯兑成了國家鉅額收入的來源。埃爾庫蘭諾曾經寫道：巴西從來没有過像這樣不再是殖民地之後，這麼有利可圖。1873 年根據他的估算，移民匯款每年有 300 萬埃斯庫多。根據奧利維拉·馬爾廷斯 1981 年的

估計，有 1200 萬埃斯庫多。從當時的價值看這是一筆可觀的數目。移民勞動者寄回的匯款，相當於房產主向國家交納稅收的總額。

這筆意想不到的收入使國家的收支得以平衡，從而掩蓋了經濟上的不平衡。國家的消費大於生產，移民支付了這個差額。"移民拯救了我們。"1911 年阿豐索·科斯塔在他晉昇教授學位的政治經濟學論文中這樣寫道，"是移民扶持了國家，而不是國家扶持了他們；是貧窮的貝拉人和米紐人，他們缺衣少食，不得不背井離鄉，但是他們卻從遙遠的巴西來支付這些年國家處於崩潰中的賬款。"所謂崩潰指的是兩年前才結束的君主專制體制。但是，他認爲解決辦法是國家要"認真地調整"移民事務，"親切地幫助移民"，就是說，要把最有利的生意留給他們。他最後寫道："但願移民問題成爲歷屆新政府復蘇祖國事業中的試金石。"

事實上，移民一直在繼續。由於移民問題没有解決，建立生產性結構的問題就一直處於停滯狀態。

83 城市和山區文化

1. 浪漫主義

隨着自由主義派的勝利，葡萄牙的文化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出現了新的思想，新的興趣和新的語彙。城市中的變化更加明顯和迅速。山區仍然是文盲之鄉，但是現在被權貴政治、公路、火車，以及一些混得不錯的移民返回故地修復教堂和興建別墅之舉動所震動。

羅馬人之前的田園派詩人——克魯斯·依席爾瓦，菲林托

・埃里西奥，托蘭廷諾，托馬斯・貢扎加和博卡熱都在1820年之前先後去世。他們死得正是時候，因爲他們那種精雕細琢，誇張而費解的詩句已不再像革命前那樣受人尊崇。但他們的作品仍可謂不無價值的優秀文學之作：他們對於新生資産階級進行詼諧幽默的評論，表明他們追求的是浪漫主義的原始思想，不過用詞十分含蓄，並且忸忸怩怩地加以掩飾，文字充滿了具有神話色彩的詞藻和啓示，只有瞭解内情的人才能懂得其真正含意。博卡熱的文字在他們中間可謂最大衆化了，但也使用了像zéfiro abafatdo，plǎcidas camenas（都是古希臘詩歌中的用詞，一般人是不用的——譯者）及 margens do Letes（列特斯河岸，出自神話，列特斯河爲地獄五條河流之一——譯者）來表示用極簡單的詞語即可表達的“微風”（Vento）“詩歌”（poesia）及“死亡”（morte）。這是没有公開闡明自己理想的一代，盡管就他們個人來説都是自由主義者，都把自己的大量的詩作獻給了對自由的追求。當然，維護舊制度的詩人不在其中，若澤・阿庫齊奥・達士・内維斯悲慘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證。他把自己的天才用來爲米格爾主義效勞，當自由主義者贏得戰爭的勝利之後，他四處流亡，最後由於恐懼和饑餓慘死在一個荒涼的堆放乾草的棚子内。他是那樣徹底地離開了人間，直到今天，盡管人們對他還懷有興趣，然而他的作品卻没有留下來。《法國人侵史》是他在舊制度下寫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葡萄牙史學著作，書中彙集了一些經濟統計表格并對民族心理進行了描述。

但是，這個時期的名人就不同了。他們之中名氣最大的當推加列特和埃爾庫蘭諾，他們的名字直到今天還銘記在人們心中。此外在他們週圍還有一大批二流作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他們參加了自由主義者的隊伍，打過仗，失敗後移居國外，後來又回到葡萄牙參加戰鬥，最後成爲勝利者。他們在流亡期間觀察到其它國家文化發展的形式和基本觀念較之我們國家要先進得多。加列特和埃爾庫蘭諾是葡萄牙第一代浪漫主義的領袖。當他們在英國的時候，英國第二代浪漫主義派偉大詩人都已經去世。但是他們學習了英國浪漫派詩人的經驗，並把浪漫主義的配料裝在士兵的背袋裏帶回葡萄牙。

浪漫主義是資産階級意識的一種生動的文學表現方式。它立足於進步，因爲進步是資産階級經濟的活力；它歌頌自由，因爲對於資産階級來説，顯然，自由就是由它行使權力；它崇尚感情，反對清規戒律的羈絆，因爲感情就代表它自己，而清規戒律則是殘存的社會阻力，阻礙社會順利發展；他們想象出了一種所謂民族之魂或者説是民族精神，認爲他們才是這些神話的真正代表；他們編造歷史，因爲這可以使他們共同取得貴族地位，以真正的貴族身份出現，成爲幾個世紀以來開辟自由之路的幾代人的代表。

加列特和埃爾庫蘭諾的功績是鉅大的，他們才華横溢，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會有輝煌的文學生涯。孩提時期他們就被視爲神童，後代人對他們的崇敬遠遠超過了對其他偉大自由主義者的崇敬。他們想方設法把葡萄牙的素材運用到從歐洲引進的模式中。加列特的歷史小説，甚至都帶有他在英國讀過的小説的味道。他從葡萄牙的古代歷史中，尋找浪漫派話劇的題材（終於完成了他的傑作《弗列依·路易斯·德索扎》），對那時尚不爲人所認識的民間傳説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類似英國小説及詩歌中所描述的傳説那樣豐富多彩的我國自己的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的第一部選集就是他的《小説集》（1843 年第一

卷)。埃爾庫蘭諾首先收集的是中世紀的傳說。他從英國帶回了一種華麗的文體，並用聖經上的語言加以修飾，使人聯想到浪漫派歌劇裏一開始那種威儀的場面。他莊嚴地以時代的名義，以良知的名義並以祖國的名義講話，很有說服力。他致力於文學，他的兩本以寺院爲題材的小說一舉成名。這是描寫教士生活的故事，一個發生在西哥特人時期，另一個發生在阿維斯時期，主要表現教士獨身生活的不幸，但小說卻把讀者帶進歷史。他的另外一部對葡萄牙文化影響深遠的著作就是《葡萄牙歷史》(1847～1859年)，介紹了葡萄牙中世紀歷史。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民衆階層發展緩慢”，就像法國歷史學家對他們自己國家所作的判斷那樣。在這裏，他把人民同好人，即農村有產者，把民衆階層同資產階級等同了起來。

這個世紀中上層階層的文化的特點就是浪漫主義。一些文學作品(特別是1870年一代人的文學作品)試圖超越這種浪漫主義，但是因爲他們自己也帶有許多浪漫主義的東西，所以這一嘗試終未能推廣開來。所有帶有社會弊病的東西已經使人厭倦，因爲它們無一例外地都是不安定的因素。超浪漫主義(卡米洛，蘇亞雷斯·德·帕索斯，托馬斯·里貝洛，布廖·帕托)引起了極爲廣泛的反響。葡萄牙文學創作中空前引人入勝的作品就是《墓地婚禮》，它是描寫墓地一對骷髏的愛情經歷。女孩子們常常在鋼琴的伴奏下唱述這個故事。

鋼琴，以及做金裝飾品是從舊社會邁向新社會的標誌。鋼琴成了重要的文化工具，是資產階級家庭裏高尚的音樂享受。在上個世紀它還只是教堂或宮殿裏才擁有的東西。1848年，一位在教堂裏學會了演奏技巧的青年鋼琴家，同一個資本家聯合在里斯本成立了沙塞提之家——它的經營業務就是音樂。當時鋼

琴這種樂器極其昂貴，因爲葡萄牙還不會製造。從 1848 年到 1899 年這位鋼琴家去世，沙塞提一共進口了幾千臺鋼琴，這是保存完善並流傳至今的少數企業之一。開始鋼琴只有貴族家裏才有，沒過多久就成了中産階級家庭的裝飾品；從該世紀中葉起，隨着這個階級的迅速發展而逐漸普及。做金裝飾品是資産階級物質文化發展的另一個典型特徵。這個詞來源于英文，是一個英國工人的名字，他發現了冶煉銅鋅合金的方法。這種合金色彩似真金，而它的作用也正在於此，類似而不是，使得一些中産者可以冒充富豪。於是一種新的職業迅速興起：從裝飾紐釦，馬車用的車燈到室内裝飾；屋子裏到處是耀眼的金屬器件，家俱的鑲邊、壁燈以及嵌有假寶石的手鐲。除了這種合金之外還有許多其它東西：人造大理石，石膏塑像，裱屋頂和牆壁用的絹紙和倣製的波斯地毯。有産者家庭的佈置能夠使人想到過去貴族的住宅。到該世紀末，大資産者感到有必要使自己有别於小資産者，他們開始在鄉間别墅中和在教堂財産拍賣時買下的房舍中擺設老式家俱，以顯示過去的榮耀，甚至把與自己毫不相干的照片擺在鏡框裏掛起來，當作自己的祖先。其實也不算錯，即使不是他們自己的，至少也是他們所參與構成的這個社會的祖先。後來這股崇古風由於 20 世紀初中産階級的危機而衰落。但在五十年代以後又重新高漲起來，甚至發展到許多部門。隨着搶購古董浪潮的興起，一些生産更爲“古董”的老式家俱、畫框以及燒瓷工業相繼産生。

2. 新聞

幾乎在整個世紀中，文化活動最爲顯著的一個方面便是新聞事業。新聞事業的第一次大飛躍是在 1820 年革命之後，這一

年里斯本發行了六家日報，而且都是政治性報紙。當時一位記者曾經指出："現在所有的理髮館、鞋店，所有的貨攤，酒吧或其它店鋪都變成了議員的會場。就在這些地方，他們很有權威地決定着國家大事。有些小理髮師是如此善辯，在他們磨刀的時候還可以同時爲 12 位部長塗肥皂。"在極權制度恢復以後，這種激情逐漸消失，報紙數量大大減少。光復之後，在那個世紀的下半葉，報紙作爲群衆文化的工具，其作用越來越大。1861 年至 1890 年間，發行了 3300 種報刊，其中大部分出版不久即告停刊或者只出了幾期也就無聲無息了。其原因是競選時的熱情已經消失，或者是出版社的財力已經枯竭。許多報紙都是鄉村報紙，由於某種政治主張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於一些地方上的小團體出於一時熱情而辦起來的。他們使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印刷設備，因爲現代化印刷設備只是在比較晚的時候才引進葡萄牙。《泰晤士報》在 1814 年就有了蒸汽印刷機，每小時可印數千份，而我國大約在 1860 年才開始使用蒸汽印刷機，印數也非常少。但是有些報紙，如《九月革命報》對公衆輿論之影響則十分大。1865 年出現了一種新型印刷機，這是商業和電報業發展的產物。商業上的競爭產生了有代價的宣傳和廣告。由於城市人口的增長，諸者也隨着逐漸增多。這兩個因素（再加上在短時間內可以大量印刷的技術條件）使報紙發行業務成爲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在這種新形勢下，原來以發表評論爲主的報紙漸漸發展成爲以報道新聞爲主了。辦報紙的目的像做生意一樣，是在爭取讀者市場。由於讀者政治傾向不同，因而只有不帶政治傾向的報紙才能獲得較大的發行量。因此讀者的主要興趣便由政治轉到國際新聞，國際消息是由專門經營新聞出口的代理機構用電報傳遞的。由於廣告收入補充了部分生產

成本，因而報紙版面擴大，價格下降。這一發展席捲了整個歐洲。在葡萄牙，第一家新型報紙《消息報》在它的發刊詞中寫道："不談論政治也不主張爭論"。價格定爲十雷伊斯，而其它政治性報紙則爲 40 雷伊斯，（一個農民每天收入只有 80 雷伊斯；里斯本的工人，每人每天收入也只有 300～400 雷伊斯）。這種措施獲得了迅速的成功；該報開始只發行五千份，到了年底達到了一萬份，26 年後印數增加到二萬六千份。其它報紙也競相效倣《消息報》。讀者大量增加，特別是在小資産階級層中。從此，新聞比政治報刊産生了更加廣泛的政治效果。

3. 教育與掃盲

教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就是興辦中學。

1836 年實行的還是彭巴爾的政策。平民只讀一些專爲他們編寫的基礎讀物，大學是爲上等資産階級中的佼佼者而開設的，没有中等教育（只有高等預科），因爲當時國家的社會結構没有中間階層，即没有小資産階級。小學和大學之間的教育不是中等教育，只是過渡教育，爲進入大學作準備。自由主義革命改變這種狀況，在平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加進了新的教育階段。

革命成功之後，即 1823 年中等學校開始出現。根據路易斯・莫濟紐・德・阿布格爾克的計劃，準備建立高中（通往大學的渠道）及職業中學（就業渠道）。這個計劃只是根據設想而没有以社會實際爲依據。這是引進法國的解決辦法（1792 年，孔多塞報告）。因此，這個設想拖延了很久才得以實現。1820 年的自由主義革命没有能夠將這個設想變成法律。1836 年 9 月革命之後，根據帕索斯・曼努埃爾法令各省都建立了中學，課程設置參考法國學校課程安排，包括有：人文學、法語、英語、德

語、化學、物理、自然、數學。但是，由於既缺乏師資也没有學生，計劃未能實現。幾年後語言課和自然科學課目相繼取消，數學課也停止了。新的教育機構逐漸失去作用而倒退成爲彭巴爾時期大學教育的職能機構，因爲擬定成立的機構尚未組成。各社會集團只是借助於鐵路與公路才獲得了生機，才能夠將子女送進中學。因此直到 1854 年才恢復了數學課，1863 年才真正重開了語言課和自然科學課，這時候的中學教育才開始了有當今這樣的面貌。

大學變化不大。自由黨人的政府尊重大學過去的特權，盡管他們另外又成立了一些高等學校，如里斯本和波爾圖醫科學校，里斯本高等文學院（該學院成立後大大促進了人文學教育），以及工業學校（這個學校在培養技術人材，完成豐特斯時期的各項公共建設項目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初等教育的發展十分緩慢。在自由主義浪漫派的思想中小學是佔有特殊地位的。所有的政治家在他們的演說中都感到必須對小學教育加以贊揚和重視；但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言論和行動卻是脱節的，而事實則總是事實。人們學會了讀書和寫字之後，便不再願意靠拿鋤頭生活。立法者往往都是有産者。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了，他們的確找到了既能保持農村平靜生活而又不致破壞初期那種安樂環境的形式。憲法“討論草案”中曾經規定要在各市、鎮和地方興建學校、教授讀書、寫字和算術課，也教授宗教和公民義務的基本常識。爲了落實這些原則，還作了如下規定：“學校教師的工資從優，以便使這些能夠勝任這種重要職務的人樂意從事這項工作”。（第 251 條）這個條文寫入了 1822 年憲法，但是取消了有關工資的規定。

1834 年全國有 1000 所學校，30 年後才達到 2000 所，到了

1910年也不過才有4500所。學校的教育水平很低，沒有校舍，沒有訓練有素的教師，也沒有教學器材。在沒有舊寺院可以利用的地方，往往是租用民房，一般都是租用商店的底層做爲校舍。埃薩·德·凱依羅斯曾形容爲“糧倉和畜欄之類的房間”。爲小學校蓋的第一批校舍的費用出自費雷拉公爵1866年的遺產（144康托，建造了120所學校）。公爵過去曾僑居國外，在巴西和安哥拉發了家，他對那裏的葡萄牙移民缺乏文化素養感觸很深。1910年有專門校舍的學校還不到學校總數的四分之一，而且還沒有教科書。1863年還在爭論最好的教科書究竟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呢，還是托馬斯·里貝洛的詩歌《D·扎依麥》。儒里奧·狄尼斯作品中的一個女主人公就是靠教讀《路加福音》來維持生計的，這是一種很少見的情況。各地都缺乏教材，必須在全國範圍内加以解決。應里斯本一位出版商的要求，一貫生活簡樸但在文學上卻有點紳士派頭的詩人若奧·德·得烏斯編寫了一本《母語入門》，提出了一種學讀書的新方法。這種方法簡單易學，幾乎是幼兒式的，所以很快就被一般沒有受過什麼培訓的教師接受。1888年法律規定該書爲全國通用教科書。該書作者1896年去世時，被埋葬在專爲埋葬歷史偉人的熱羅尼莫斯教堂。

從教師的物質待遇上看，他們都處於半貧困狀態。1872年埃薩曾這樣問道：“你知道小學教師的收入嗎？年薪120康托，每天只有260雷伊斯！他們要吃飯、穿衣、交房租，而且往往要給學校買紙，鉛筆等等，而每天只有13個文坦斯（1文坦斯等於20雷伊斯——譯者）！”當時教授的年薪爲800康托，里斯本中學正式教師的年薪爲400康托。師資培訓水平是和他們的報酬相適應的；從當時調查的1687名教師來看，只有263人具

有文學修養，這些人中只有 172 人熱愛教育事業。

根據法律，當時的學校應爲義務教育，但是埃薩曾這樣說過："七歲到十歲的孩子已經開始放牛，看牲畜，撿柴，拉車、鋤草，幫家裏種地，他們只有鋤把高，但已經當大人使用了。凌晨離開家門，直到教堂的晚鐘敲過才回到家裏。"他提出辦夜校教育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晚上，孩子們可以從田野回到學校。"夜校教育曾試辦過不只一次，在城市只有得到工人們的支持時才有一點成效，但在農村則完全失敗了。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農村的文盲狀況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相當長一個時期。1900 年文盲所佔比例爲 80%，就是說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有閱讀能力，這部分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和一部分城市居民。在農村只有少數幸運者或有相當才能的貧窮青年才能夠逾越這個障礙。這些人中，很少人願意繼續留在農村，他們或者遷入城市，或者移居巴西，因爲他們看到里斯本的收入要比農村地區高出四五倍。

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因此而變得比以前更加大了。鄉村有自己一成不變的風俗習慣，有自己的民間歌曲，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來自佩得羅·依斯潘諾書籍中自己的醫道遺迹；現在這些東西都成了科學家們好奇的課題和文學家們產生靈感的動力。1866 年儒里奧·狄尼斯在波爾圖一家報紙上發表了連載小說《校長的養女》，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是一部描寫農村真實情感的小說。年輕醫生、一個富裕農民的兒子，把外面的進步氣息帶到了農村。小說對這裏貧困只有五行字的描寫："這時候幾個孩子的聲音把她吸引到窗前。窗外，四個全身一絲不掛的孩子圍在一個衣衫襤褸、臉色憔悴的貧苦女人的身邊，孩子們雖然光着屁股，而且面黄肌瘦，仍然圍在母親身邊嬉笑玩耍，然

而母親卻没有面包給他們。”作者擔心：“進步的浪潮迅猛發展，過不了多久將淹没農村，那些想瞭解古老農村風俗習慣的人要趕快抓緊時機。”許多人也都有同感，於是開始收集民間故事、傳説和民間偏方。編寫人種誌在19世紀末成了一種時髦的學科。整個歐洲也都經歷了這種演變。當這種演變在葡萄牙開始發生時，歐洲已處在更爲進步的時期了。

4. 藝術

藝術的發展反映了社會和經濟總的發展變化情況。

在自由黨人的軍隊取得勝利以前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藝術可以説是貧乏的。政府要員出逃，加上負債累累，直到該世紀末也未能將阿如達宫建成。這座宫殿是自D·曼努埃爾在16世紀下令修建里貝拉宫以來的第一座大宫殿。當時，有錢人惶惶不可終日，不願意進行大規模工程投資。教堂歷來都是葡萄牙最大的承建者，這時候也没有進行什麼工程建築。在北方老百姓的篤信宗教的精神比較强烈，捐贈款項源源不斷，因而陸續修建了幾座民間大教堂，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傳統的工藝裝飾。教堂建築的綫條仍然是沿用彭巴爾時期的模式，具有新古典主義的特色，簡樸而堅實，没有醒目的雕塑。畫家中值得一提的是多明戈斯·塞格拉，他的個人天賦使他在複雜的逆境中成功地獨樹一幟。

在自由黨人最初執政的20年中，即政治鬥爭階段，直到復興時期爲止（1834年至1851年），只能用“藝術在葡萄牙”這個説法而很難用“葡萄牙藝術”這個詞。勝利者一方總是善於利用失敗者的廢墟站住腳。這種情況最明顯、最富有戲劇性的例證就是D·費爾南多國王修建的佩納城堡。D·費爾南多是

德國人，D・瑪莉婭二世的丈夫。他是一位藝術家、浪漫主義者、一位有教養的人。他到達葡萄牙後不久就買下了辛特拉山頂上的熱羅尼莫斯教堂的遺址，修建了一座城堡，彙集了所有他認爲是最美的建築藝術形式；有封建時期的城池，托馬爾基督教教堂的造型，阿拉伯的色彩和曼努埃爾時期的裝飾。他把這一切融爲一體，從遠處看就像一幅日爾曼傳統中的畫面。城堡設計圖紙的作者（圖紙上的作者并非D・費爾南多本人）是另外一個德國人，一位軍事工程師埃什維格男爵。這件作品的效果是外國形式與民族風格的結合，强調了親王的民族主義精神。據親王講：他熱愛葡萄牙，把她看作是他的第二祖國。盡管如此，似乎不能簡單地認爲這是一件引進的作品，因爲還没有類似的創作像這樣富有表現時代的傾向。這是上個世紀中葉葡萄牙建築藝術的最主要的紀念碑，是現在所説的哥特式復興時期即有意恢復古代風格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哥特式復興精神并不是葡萄牙獨有的，這是歐洲浪漫主義的組成部分；它不僅表現在建築藝術上而且表現在歷史小説、裝飾藝術、甚至政治生活中（浪漫主義的城市自治思想就同復興中世紀風格的主張有關）。新興的社會尚未形成自己的建築藝術形式，但又不樂意接受舊的藝術風格。歷史風格或者説想象中的歷史風格便成了新的社會與前一時期決裂的一種表現；另外哥特式建築藝術的效果微妙地成了新的權力——金錢封建主義——的代表。資本家若譯・馬利亞・歐仁尼奥修建了一座哥特式馬廄，并爲他的帕良旺花園修了一條帶有城垛的圍牆。再次興起哥特式建築的重大行動之一就是修復了一大批歷史建築，例如巴塔利亞修道院和熱羅尼莫斯教堂，這些多年來被人遺棄、幾乎成了廢墟的建築，現在又被修葺一新。熱羅尼莫斯教堂的

情況是很有代表性的。教堂的修復工程是由兩位意大利頗有名氣的戲劇佈景畫師設計并由他們親自負責施工的。工程包括建造一個具有英國風格的羅馬式塔樓。但是由於他們只是佈置設計師而不是建築設計師，因此塔樓在施工中倒塌，還砸死了正在現場幹活的一些工人。

除了哥特式建築之外，還有新曼努埃爾式建築（如 1888 年修建的布薩科飯店），新阿拉伯式建築 1887 年修建的羅西奧車站和 1888 年修建的小廣場鬥牛場）和新羅馬式建築（新街官邸，正面均爲拱式門樓，完全是模倣布拉甘薩公館的風格）等等。這些把古代和現代建築藝術結合爲一體的建築風格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初，但是並沒有牢固地紮下根來。還在上世紀末，就已開始感到應該有一種“真正葡萄牙”的建築形式。於是一些藝術家們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內地的大型別墅上。從而出現了拉烏爾·利諾的“葡萄牙住宅”的構思。這完全是一種傳統的風格，有屋檐、百葉窗、瓷磚和庭院。批評家們對這種傾向甚爲嚴厲，然而這種格式卻爲一般資產階級所接受。全國到處都出現了門前有彎曲屋檐和方形石塊的住宅建築，力圖模倣“葡萄牙古建築”。

隨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生活的復興，藝術活動也逐漸增多，出現了幾位著名的藝術家。在雕塑方面有蘇亞雷斯·列依斯，他曾在羅馬和巴黎學習過，他的最有名氣的作品是“出土”，被認爲是 19 世紀葡萄牙雕刻藝術的代表作；特舍拉·羅佩斯在上個世紀末已有許多創作，被認爲是當代最偉大的雕塑家。但是資產階級階層對繪畫比對雕塑更有興趣。這說明當時爲什麼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畫家，如席爾瓦·波爾圖、馬爾格斯·德·奧利維拉、恩里格·帕桑、馬略亞、賁德沙、卡洛斯·

列依斯、科隆巴諾。家庭住宅大廳中懸掛的自我尊崇的畫像成了畫家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只有高貴的資產階級才能得到這些大師們的作品。這些畫家生前已頗有名氣，但仍然常常抱怨他們的畫没有買主。從國外回來的畫家則不斷指責政府没有對藝術家進行保護。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拉法埃爾・博爾達洛・皮涅羅。他是位漫畫家和陶瓷塑造家。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衆喜愛並被大量復製，成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最爲有效的工具之一。他的作品比拉馬略・奧爾蒂岡的《投槍》和費亞略・德・阿爾梅達的《貓》等刊物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這二位作家試圖用散文的形式進行類似的批判）。1855 年他在拉依尼亞溫泉創辦了一座陶瓷廠，他以獨特的形式，依靠葡萄牙工匠的手工技巧，生產出了許多產品。這樣，通過他的手使藝術進入了人民的家庭，成了大衆的藝術。普通家庭幾乎家家都有的藝術品就是掛在牆上的掛盤，或者是滑稽的小胖人、士兵或洗衣姑娘。有文化的階層對於這些東西不屑一顧，但這並不影響這些製作的迅速發展。在拉法埃爾・博爾達洛・皮涅羅去世之後，一些老工匠或者一些模倣者繼續製作"溫泉瓷"，并以拉依尼亞溫泉爲起點發展了許許多多陶瓷中心。這些制作中心爲那些未經學校培訓的人提供了顯示才能的機會。拉馬略・奧爾蒂岡曾經寫道：這是"最純真的、最優美的、最動人的、最有 19 世紀藝術代表性的作品"。

5. 70 年代派

文學史專家們對於 1860 年至 1880 年間在葡萄牙文學思想及文學形式方面出現的革新運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原因是這個運動的發言人都是上個世紀葡萄牙的著名作家：安特羅、埃

薩·德·凱依羅斯、拉馬略·奥爾蒂岡、奥利維拉·馬爾廷斯、特奥費羅·布拉加（以他們爲核心連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貼上了“70年代派”的標簽）。從他們的活動的政治效果來看，尤其從他們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所取得的成果來看，“70年代派”的作用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這部分人中間，後來對一些政治事態的發展影響比較大的正是從文學角度看不太出名的特奥費羅·布拉加。

所謂“70年代派”運動最初是在科英布拉興起的。開始只是爲了反對大學裏陳舊的校規。特奥費羅本人曾經説過：校長越來越令人生厭，他强制年輕人把長衣的鈕子扣得整整齊齊，襪子一定要拉到膝蓋以上，鐘聲響過以後必須就寢。但是學生們都閲讀了列南的《基督教起源》，米切爾的《法國史》，以及雨果的詩。他們通過法文譯本或者只是一些摘錄，盡管還不十分明確，然而卻懂得了一點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學校裏的宗教法規，對他們來説是可詛咒的，簡直就是以往那種暴政的殘余。因此，1862年在頒發各項獎勵的莊嚴的儀式上，當校長剛剛説了一句“年輕的學員們”之後，學生們便都背過身去，然後成群地走出會場到校院中大聲喧嘩。

政治報刊對這次事件極爲重視。資産階級感到不安，因爲大學及其校規是未來既定秩序的一種保證。輿論界開始譴責學生，一名學生（一個名叫安特羅·德·肯塔爾的年輕人，他在學生中間享有比較高的聲望）發表了一篇聲明，解釋學生們這樣做的理由。

“大學的學生們需要什麼呢？正義！我們也要得到陽光，自由的陽光，讓它照耀整個世界的進步。不應該讓我們總是待在過去的黑暗之中，在保障自由的宴會上也應該有我們的一個席

位，因爲爲了這種自由，我們的父輩們付出過血的代價，這也是我們的鮮血！”

聲明中那强烈但比較空洞的追求——自由的陽光、世界的進步（這裏的世界應理解爲整個歐洲），就是“70年代派”的特徵之一，即理想主義的、革命的、文學的，但是從本質上看則完全脱離了葡萄牙社會結構的具體問題。

這個組織只是在文學方面的作用比較顯著。1865年安特羅·德·肯塔爾發表了一部詩集《現代贊歌》並附了一篇散文説明（再版時取消）。其中寫道：“現代詩就是革命之聲，因爲革命是歷史的教士，而時間則是刻在我們這個世紀具有先見的前額上的名字”。後來他又預言：“革命者”這個詞對於尊崇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學領域來説將不再富有詩意。基於這種態度，他發動了“科英布拉問題”大辯論，這純粹是一次文學爭論，並因此而引出了許許多多作品。一方面是以安東尼奥·費利西亞諾·德·卡斯蒂略爲首的尊古派，另一方面是在科英布拉發表批評性文章的青年學生。前者認爲必須保持對所謂文學美感的尊崇，而後者則譴責這種既定幫派的守舊態度。這場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充滿了衝動和激烈的謾罵。今天重讀這些小册子可以使我們從根本上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關於文學風格的學術爭論，在我們知識界引起的深刻反響，超過了任何一個真正阻撓和妨礙葡萄牙人民進步的問題。

安德羅·德·肯塔爾終於發現了這場脱離實際的學術之爭的弱點，並打算以過去的經驗爲起點重新開始生活。他先在國家出版局學了幾個月印刷技術，以後便到巴黎從事印刷業務。他對自己這種態度的解釋很有啓示性：“長時間以來，我感到失望、灰心。安閑使我感到厭倦，我終於決定用最大的努力去贖回我

自己也已意識到的過去那種毫無希望的但不容忽視的權利，我想讓事實給予我疲憊的心靈以理智，或者使它完全復蘇"。他還到美國旅行，在那裏考察了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在里斯本他擴大了自己的接觸範圍，他同巴塔利亞·列依斯住在一起。他們的小組就在他們住的房間裏集會，參加活動的人并非都受過大學教育，像奥利維拉·馬爾廷斯的文化才能完全是從艱苦的生活經歷中獲得的；另外還有若澤·豐塔納，他是瑞士籍的社會黨人，也是自學成才。這個晚餐會小組中有幾個人是安特羅在科英布拉時的朋友。文學仍然是他們的話題的一部分。拉馬略·奥爾蒂岡曾經這樣寫道："在葡萄牙從未有過這種情緒，從未有過這麼多的幻想，從未有過這樣的創作熱情，從未有過這樣的幽默才能，也從未有過這麼多的喜劇作品"。

但是，這已經是 1871 年了，第二帝國的滅亡及巴黎公社震驚了各國政治集團，社會主義已經從烏托邦王國走向具有威脅性的王國，改變國家體制的可能性對許多人來説似乎已經具體化了。晚餐會小組所進行的努力就是要在里斯本市的里斯本俱樂部組織一系列講座，他們的宗旨是："研究葡萄牙社會政治變革、經濟變革、以及宗教變革的可能性"。

政府禁止舉行這類講座，爲此晚餐會成員試圖組織一次大規模抗議活動，但是没有成功。就連埃爾庫拉諾本人，在徵求他的意見時，也表示得十分含糊，這是"70 年代派"最後遇到的一次大挫折。原來的成員相繼離開，此後在葡萄牙的社會生活中，已不再可能成立這種有綱領，或有自己意識觀念的團體了。這個運動是由一群出類拔萃的人物搞起來的，他們受到國外輿論流派的影響，然而這些國外流派是在一種完全不同於葡萄牙的社會條件下産生的，因此這個運動只能是曇花一現。這

個小組由 11 位文化名人組成，他們把自己稱爲“生活的失敗者”，每周在布拉甘薩旅館晚餐聚會一次，這些人都是悲觀主義者，最後終於議論起國家大事了。

“70 年代派”一詞，意思比較廣泛。安特羅在科英布拉的伙伴們組織的這個小組不只是具有某種天賦，不單是在詩歌和 小説方面出現了極有成就的人物。19 世紀下半葉文化方面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只有 16 世紀可以與之相比。到了 20 世紀興旺景象很快就衰落了，然而在建築學、歷史學、教育學、法學、醫學、地理學及語言學等許多方面的發展至今都尚未被超越。這一時期成立了許多學術團體，出版了許多種雜誌（其編寫水平至今還令人贊嘆），還建立了一些文化娛樂團體來彌補公共設施無法滿足的文化生活。這些活動頻繁的原因部分是因爲自由主義革命之後大學生的來源更加廣泛。但是這一時期的許多文化活動家，甚至一些著名學者仍然是自學成才的。一個新制度取代舊制度的社會變革大概就是由於 19 世紀這種頻繁的文化運動所促成的。

84　最後的帝國

1. 帝國的最後一項計劃

葡萄牙在巴西獨立之後還能不能做爲一個獨立國家繼續存在？

奧利維拉・馬爾廷斯曾經這樣説過：“無論誰只要略加思考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都完了。”但是這種説法太過分了，因爲也有人在經過思考之後認爲這倒是一個從頭開始的機會。莫濟諾・達・席爾維拉曾經認爲：“巴西的獨立，其結果也可能

是比對它在發現更爲有利的事件。”葡萄牙可以“通過勞動實現它的殖民地的那種生活方式”。但是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從經濟觀點看，巴西是葡萄牙生活的基礎；從聯合的意識來看，巴西是我們民族最後的驕傲；它的遼闊使我們顯得既貧窮又弱小。葡萄牙没有巴西，就像一棵樹只有樹根沒有樹幹；葡萄牙的未來似乎只能是在黑暗中無聲息地消亡。“葡萄牙的喪鐘已經敲響”，這也是奧利維拉·馬爾廷斯的一句話。伊比利亞式聯合的思想作爲葡萄牙問題的可能的和恰當的解決方式就像在阿爾卡塞爾·吉比爾戰役之後出現的那種情況一樣又産生了。

1838 年 9 月革命把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巴西不是失去了嗎？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是重建一個巴西。地理基礎已經有了，這就是非洲沿海的屬地。這項計劃早在 1836 年 12 月 10 日的一份報告中就曾透露過：“爲了估價葡萄牙的海外屬地，不應該只看到那些現有的，而且還要看到那些可能成爲它的屬地的地方。目前的情況是，不單是宗主國管理不善而是它把注意力幾乎只是集中在巴西。非洲人被搶掠并運往大西洋的彼岸，去使另外一個大國富有起來，而該國的居民卻拒絕這樣的文明……海外各省都有豐富的金礦、銅礦、鐵礦和寶石礦……在非洲，我們可以種植在美洲種植的一切。爲了經營這種種植就需要有工業，需要利用它的資金，它的組織形式，這樣在短短幾年内我們就能收到極大的效益”。

從此，一項建立非洲帝國的計劃以及協調國内及海外經濟的方案一直被列入國家的議事日程之中。

那時候，葡萄牙在非洲控制的地域，還只限於沿海和海運發達地區的小片地段。自從發現非洲以後，我們就到了那裏，但是由於移民的方向只是面向巴西，加上非洲難以適應的氣候條

件，使這裏的居民點無法像巴西那樣向內地擴展。在羅安達這個葡萄牙人於 1575 年建立起來的城市，白人的壽命平均還不到 10 歲，直到 19 世紀中葉，這裏出生的白人嬰兒幾乎没有一個成活下來。

當葡萄牙根據這些歷史留給我們的地盤，提出在非洲建立帝國計劃時，歐洲的殖民化運動已全面展開。該世紀初英國工廠每年加工的棉花毛重約五千萬磅，1890 年至 1895 年則上昇爲七億磅。非洲顯示出它具有種植棉花的優越條件。葡萄牙的擴張必然會首先遇到英國的激烈競爭。其次還要遇到其它試圖在非洲進行經濟開發的國家的競爭。19 世紀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突出事件就是在這場大國競爭中，葡萄牙終於使自己得到了瓜分的權利，而且獲得了大片遼闊的地域。

2. 奴隸制度的廢除

英國的進攻開始是對奴隸制度施加壓力。蒸汽機的力量使英國能夠解脱奴隸的勞動；在過渡階段，婦女和兒童勞動力比奴隸勞動力還要便宜，因爲他們不需要企業主爲他們提供住房。兒童被安置在礦井下幹活，因爲在狹窄的坑道裏幹活，兒童要比成年人更爲方便。正是這種時候，英國資本主義的慈善家們發動了一場要在其它國家廢除奴隸制度的運動。這場運動使英國除了得到明顯的道義上的好處之外，還可以阻止來自其它地區的競爭危險。因爲英國已經廢除了奴隸制度、而其它地區的奴隸制度還繼續存在。

反對奴隸制度的鬥爭并不是原則上聲明，它的直接後果是英國當局將在他們認爲尚未徹底消除販賣黑奴的地方建立英國管轄區。繼續販賣黑奴的結果就等於將會失去殖民地。9 月革命

中產生的政府採取了極爲現實的理想主義政策，并於 1836 年禁止在赤道以南的殖民地進出口奴隸。這項政策引起了激烈反對：有些人認爲這是在遭到野蠻入侵之後，最爲嚴重的一次損失；也有人認爲從道義上講奴隸制度使黑人養成了有效的勞動習慣，從而使他們的面包有了保障。廢除這種制度就等於關閉了貧窮的土人可能從愚昧向文明過渡的唯一大門。但是法令仍然有效，並且在復興之後又相繼制定了一系列立法條文。直到 1869 年法律生效奴隸制度徹底廢除。當時發生了一件震動葡萄牙輿論的查理和喬治號輪船事件。該船停靠在莫桑比克時，被英國的聲明弄得驚慌失措，葡萄牙當局發現這艘船上有一百多名黑人，其中有人被捆綁着。黑人們一致聲稱他們都是被强行抓來的。這樣葡萄牙當局就將船長逮捕，並將這艘船押送至特茹河。但是法國政府出面干預，要求立即放人放船並賠償損失，否則將採取軍事行動，派艦隊到里斯本，於是葡萄牙政府讓步了。

3. 扎伊爾河口問題

仍然是由於奴隸制度的問題，我們第一次同英國發生了衝突。英國人指責我們在羅安達以北各港口（安布里兹、莫蘭博和卡賓達）没有取消奴隸制度。1855 年里斯本政府下令在這些被遺棄的港口重新駐軍，因爲這些地方可能成爲秘密登陸的地點。但英國反對在這些地方駐軍，因爲這些地方靠近扎伊爾河口。當時扎伊爾河口被認爲是戰略要地，控制住這個地方就可以控制赤道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的經濟。關於安布里兹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好幾年，英國終於承認了既成事實；條件是我們不再在該地區擴大佔領。英國巡洋艦則對我們的行動進行監督。

自從 1870 年法國和普魯士戰爭之後，對非洲的爭奪進入了

更加激化的階段。德意志帝國的形成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平衡，各强國都在力圖加强自己在非洲的經濟地位。小小的比利時隨着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再加上有了俾斯邁爲鄰居，也着手創建帝國並選中了剛果盆地。對出海口的競爭就像體育比賽那樣激烈。斯坦利當時率領了一支爲比利時效勞的派遣軍於 1881 年到達該地區，但是他十分厭惡地發現一支由一個意大利人布拉柴率領的法國遠征軍已先於他到達該地區。由於法國國旗插在右岸，比利時人就在左岸昇起了國旗。這樣就產生了布拉柴維爾和斯坦利維爾；而這兩個地方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曾經是葡萄牙的領地。

此後，英國人對葡萄牙的態度有了轉變，英國的觀點是：既然英國失去了扎伊爾河口地區，那麼寧願讓該地區留在葡萄牙人手裏，因爲葡萄牙人是他的盟國，軍力也不强。1884 年英國和葡萄牙一致同意簽署扎伊爾協定，承認葡萄牙對該河兩岸的主權，但是必須保證國際航運自由，並給英國以優惠。

其它有關國家提出了抗議，認爲這個協定是英國的陰謀，是利用葡萄牙人過去的權利來控制扎伊爾河口，從而阻止大陸內地國家由此出海。協定尚未批准，葡萄牙人建議舉行國際會議進行磋商，有關國家均可參加，這次會議就是柏林會議（1884～1885 年）。

4. 柏林會議與粉色地圖

柏林會議的參加者並不都是同扎伊爾有關的國家。除了葡萄牙、法國、比利時、英國之外，參加會議的還有德國、奧地利、丹麥、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瑞士、挪威、土耳其以及美國。事實上會議不是要討論某個具體衝突而是要決定歐洲各

國對非洲關係的準則。

對葡萄牙來說，最爲重要的就是關於有效佔領的原則："本文件的簽字國承擔義務，保證在非洲大陸沿海各佔領地區維持其現有政權，尊重其既得之權利"。尊重就是以武力强行統治。美國代表這時第一次提出了問題："土著民族自身擁有的權利以及他們對自己祖傳土地的權利"的問題，但這個問題遠不是與會的政治家們所關心的問題，所以他們根本未予討論。

葡萄牙幾個世紀以來傳統的依據和曼努埃爾原則被埋葬了。對非洲的權利要按目前軍事佔領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而不是根據歷史文件。葡萄牙接受了棋盤上新的布局，着手有效佔領從安哥拉到莫桑比克之間的領土，這些地方歷史上已經屬於葡萄牙。於是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國家規劃：粉色地圖規劃。

這種顏色標誌後來具有了複雜的諷刺含義。事實上1886年葡萄牙與德國簽訂的一項協定的附圖就是用這種顏色標誌的。同年早些時候一個葡法協定的附圖也使用了這種顏色。當時爲了使法國人同意這張地圖還不得不將幾內亞的卡薩曼沙地區割讓給法國人。但是這兩個協定的附圖都還不是最早使用這種顏色的，它們都是沿用了里斯本地理學會1881年一份告葡萄牙人民書中所附的地圖的顏 色。這份告人民書建議搞一個全國簽名運動以便"在非洲葡萄牙統治區及其毗鄰地區建立文明點"。該學會成立於1875年，是一些關心非洲問題的學者們倡議成立的。他們當中有些是歷史學家，從歷史的記載中吸取了這種思想。事實上這種設想由來已久，遠在16世紀，狄奥戈・多・科托就曾提議建立從印度洋到大西洋的帝國。18世紀D・路易斯・達・庫尼亞大使就曾指使在巴黎繪製以這種設想爲基礎的地圖並寄給里斯本政府。1884年葡萄牙的當政者以爲時機已到，

就試圖把紙上的設想變成現實。

當英國得知葡萄牙同德國簽訂協定的附圖之後立即提出了抗議。抗議説：着色地圖包括了“對英國有着特殊利益的地區”。這些地區幾乎就是今天的羅德西亞和贊比亞。因爲英國也有自己的粉色地圖：一片從埃及直到好望角的遼闊的統治區（從好望角到開羅的平面圖）。爲實施這兩種方案，葡萄牙和英國一直爭執不休。

這是上個世紀葡萄牙外交上的最大的一次戰役。我們堅持以歷史權利作爲有效佔領，其證據就是那些古堡的遺址。在一份後來甚爲著名的文件中，英國人反駁説：那些已經成爲廢墟的古堡只能證明那些已經消亡的統治權利。但是當政府之間還在談判的時候，我們在非洲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軍事佔領。我們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發動了幾次軍事行動，一直深入到非洲內地，這些軍事行動前鋒所處的位置在 1890 年初已彼此相距不遠。

5. 最後通牒

1890 年 1 月 11 日凌晨，英國照會里斯本政府，要求在當天下午以前撤出進駐希雷河谷的葡萄牙軍隊。一條巡洋艦在等待葡萄牙的答復。里斯本政府只好讓步了。

這次通牒是 19 世紀末葡萄牙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葡萄牙非洲政策的推行不斷受到强國的挑戰，刺激了公衆輿論。葡萄牙政府的非洲政策得到了全國廣泛的支持而没有遇到任何反對，反對派只是説在這方面要適可而止。因此，最後通牒在葡萄牙引起了沉痛的反響。榮格羅的《英國贊歌》吸引了廣大聽衆，在這首歌的歌詞中，他把英國殖民化的目的同葡萄牙的殖民化作了對比。

啊！厚顏無耻醉態百出的英國，
你爲黑人和奴隸們帶來過什麼好處？
花布與僞善，福音與烈酒。
在整個陰暗的大陸上，
只能分享纏裹基督遺體的棉布。

當時在駐巴黎領事館任職的埃薩·凱依羅斯在給他的朋友奧利維業·馬爾廷斯 的信中寫道："我不認爲應該考慮喚起這種愛國主義，這種大喊大叫，這種到處高舉卡蒙斯畫像，這些向世界各地學術團體的呼吁，這種抵制英貨的勇敢行爲，這些由女士們捐贈給祖國的珠寶，這種向伯尼和莫塞爾家人跺脚的方式，這種共同想法的産生，所有這些感情衝動的大喊大叫，我都感到有點像中學的學生和零售商人突然之間掌握了葡萄牙這艘破舊不堪的航船……這種聰明的愛國主義使報紙不再接受英國的報刊，教員不再願意教授英語，實業家不再願意讓英國人進入他們的經營範圍，旅館老闆不再願意讓英國人住進他們的房間，我覺得這好像是英國人狄更斯的發明。"但是這種幽默並沒有妨礙他對葡萄牙這種反應的深切理解。他寫道："我相信，當代的葡萄牙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如此覺醒和認真的時刻。""或者是我過於天真，或者肯定是成千上萬的葡萄牙人希望得到某種他們也說不出的什麼東西。"

埃薩承認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能夠期望些什麼，因此在信中要求奧利維拉·馬爾廷斯寫篇文章進行説明。同一時期，阿列格里亞劇院上演了一家政治刊物上發表的喜劇《臭名遠揚》，門票全部銷售一空。這個劇就是針對最後通牒和君主政體的整

個政策，因爲這種政策要對在非洲的失敗負責。劇的結尾，阿爾弗列多·克依爾爲它配了一首愛國戰鬥進行曲。該劇作者、海軍軍官、文學院成員 羅佩斯·曼東薩配的歌詞是："今天要重新恢復葡萄牙的榮譽!"這首歌聽起來就像馬賽曲，使人感到鼓舞。觀衆們走到街上放聲歌唱，重新恢復榮譽之途徑對於小資產階級來説比對駐巴黎的領事更爲清楚：那就是共和國。

1910～1974年

共 和 國

85 共和運動

在葡萄牙，共和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20年的激進思想家的時期。由於1848年法國革命的影響和爲了抗議君主制在1846年對人民黨的野蠻鎮壓（有外國軍隊參與），從1848年到1851年，葡萄牙的共和思想非常强烈，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最有代表性的事實，是《共和國》和《工人的回聲》這兩種葡萄牙早期的共和黨人和社會主義刊物的出版，特別是恩里格斯·諾格伊拉編寫的《關於葡萄牙改革之研究》一書的問世（1851年）。但是這只是一小部分先行者的思想傾向，在人民群衆中並沒有强烈的反響。到了1870年左右，共和制才成爲葡萄牙政治選擇中的一大問題，因爲這時國內和國外的條件已經成熟：歐

洲的榜樣（1868 年和 1870 年西班牙和法國分別宣佈爲共和國）；國內有了一代政治上成熟的大學生。因爲他們是在長期的和平環境裏培養的，所以充滿了和平的思想；葡萄牙已經開始有了一個不大的、處於上昇時期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在城市。

共和運動追求的目標是什麼呢？

自然是共和國。但這不過是人事的變更和政體的變換。共和國是一種追求，並不是預先制訂好的計劃。保皇黨發現了這一點，所以指責共和黨人没有綱領。一些明智的共和黨人承認没有綱領，並且認爲也只能如此。1905 年，一個才華橫溢而且善于辭令的共和黨人巴齊利奥·特列斯寫道："你們有什麼權力質問共和黨的綱領？在葡萄牙，君主政體可以歸結爲無能、無耻和壓迫。就這三條就可得出結論：人們對君主制太仁慈，没有看清要反對的目標，卻急於推翻整個制度。"撇開這些不談，這句話指出了共和運動的最大弱點：人們没有看清要反對的目標。之所以没有看清目標，是因爲他們的目標和君主制的基本目標没有多大差異，都是資本、土地、自由和祖國。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個人就是瑞士工人若澤·方坦納。他在葡萄牙定居，並在第一次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整天不辭勞累地向人們宣講，説在他的國家雖然成立了共和國，但是勞動人民的狀況和處境依然如故。他説問題不在於改變政治制度，而在於改變經濟制度。但是共和黨人不願走這條道路，而且從一開始，共和黨的宣傳就避開了制度的問題。這種作法並非疏忽大意，而是參加共和運動的各個社會階層的力量對比的必然結果：復興黨播下了共和思想的種子，接收共和主張的是些新生的資產階級階層，或者正在資產階級化的階層。

共和思想不複雜，主要是愛國主義和反對教權主義。

第一次愛國主義的宣傳高潮發生在1880年卡蒙斯逝世三百週年的時候。在共和黨人的倡議下，高等文學院葡萄牙文學教授特奧費羅・布拉加想出了一個英明的主意：把卡蒙斯說成是主張共和思想的偉大人物。對特奧非洛・布拉加來說，卡蒙斯既然代表祖國，自然也象徵着共和國。

紀念活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最隆重的是全國對卡蒙斯的致敬儀式。一列彩車在這位偉大詩人的塑像前徐徐通過。第一輛是志願消防隊員的彩車，在陽光的照耀下，車上的消防器材閃閃發光。消防隊員們冒着生命危險從火口裏搶救無數的生命和財產，他們的彩車排在第一位是當之無愧的。接着通過的是一艘發現時期的大帆船，船上林立着許多基督的十字架，彩車向前行駛時風把船帆鼓得非常飽滿。隨後是商業和工業的彩車（兩個部門共用一輛車），車上既沒有機器，也沒有工人，只有一座高大雄偉的城市凱旋門。農業的彩車別具一格，一則消息說："有一種迷人的農村和農業景象"。但是最引人矚目的，是一輛殖民地的彩車，上面"是些戰利品：非洲和亞洲的武器，稀奇古怪、千姿百態的兇猛的偶像。這是極其獨特的一幅畫。"這是當時最偉大的畫家科倫班諾的作品。接着是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城堡，這是對"我們古代騎士"的敬意。在這些顯赫的祖先們之後，是未來的英雄——軍事學校的學生通過卡蒙斯的塑像，他們的汽車顯示了軍人的氣質。此外，再沒有接收學生或者學校參加儀式。最後通過的是一輛印刷業的彩車，"古滕貝格的塑像傲然挺立在彩飾叢中"。

人民、進步、機器、科學、公共建築這些概念沒有用圖像表示，這是因爲彩車向觀衆表達的是形象的語言，即卡蒙斯、大

帆船、戰利品、殖民地、黑人、士兵、英雄、迷人的農村生活，這種語言比共和黨說的話更容易爲人接受。

反對教權主義是宣傳的另一個基本內容。但是，和愛國主義相反，這個內容不但不能吸引聽衆，反而爲淵驅魚，特別是在農村以及城市和農村的婦女當中引起了對共和運動的對立情緒。但是這種局面是難免的。一方面這是 1820 年雅各賓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也是共和運動的領導人的哲學觀點所造成的。在葡萄牙，實證論的主要代表是特奧費羅・布拉加。他擔任過第一任共和國政府的總統。而反對教權主義就是具有戰鬥性的實證論，實證論的擁護者認爲超驗論的代表——教士是危險的對手。正是這種理論上的衝突，而不是實際上的需要，導致了 1910 年共和國剛一成立就同天主教教會發生了嚴重衝突。

1890 年，英國的最後通牒使全國大爲震驚，這是普及共和國理想的新的階段。樂觀的愛國主義遭受到嚴重的挫折，政府，尤其是國王應對此負責。被迫對英國武力的讓步是由於腐敗而造成的叛國行爲。這時愛國主義的熱情變成了一股强勁的風，鼓滿了共和黨的船帆。英國最後通牒的第二年，在波爾圖爆發了 1 月 31 日的起義。這次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第一批先烈爲共和國的事業獻出了生命。

擁護君主制的政治力量是各級政府機關、教會、地主、軍官、農民和城市裏的上層資產階級。擁護共和制的政治力量有富有朝氣和戰鬥性的知識階層的精英、大部分記者、學生、軍曹、一部分城市裏的小中產階級和工人。一開始雙方力量懸殊，但是到了 1910 年，它們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輪流執政的論調逐漸失去市場，政治伎倆也不得人心，許多人已經認識到政權從進步黨人手裏轉到復興黨人手裏，或者從復興黨人手裏再轉

到進步黨人手裏，都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差不多一直到最後，君主政體仍然遵守極爲開放的自由主義政策的各種規定，保持新聞自由。共和黨人的報刊加强了攻勢，在揭露和推翻舊制度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7年，國王企圖採取專制獨裁的手段，阻撓事態的發展。保皇黨和共和黨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獨裁者若奧·弗朗哥。這個獨裁者不甘示弱，他頒佈法令，規定對政治罪處以流放非洲的懲罰（罪行極嚴重時才用）。在群情激奮的情況下，這一措施激怒了兩名共和黨的激進分子，他們在王宮門前的廣場開槍殺死了國王和王位的繼承人（1908年）。這場弑君的背景從來没有徹底查清，但是共和黨人的組織没有能夠利用國王的死所造成的危機，這一事實說明刺殺國王係狂熱分子的孤立的行動。D·卡洛斯的死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後果。國王在軍隊中享有威信，在大部分人民中享有威望，是君主政體的唯一支柱，對他的謀殺使整個政治機構癱瘓，並陷於恐怖和驚慌之中。人們認爲若奧·弗朗哥應對國王的死負主要責任，因此將其免職。這是一種緩和政策，即以保皇黨的合作和妥協爲基礎來解除壓力的政策。但是没有過多久，又回到原來動亂的局面，以致D·曼努埃爾在兩年的統治期間不得不七次改組内閣。

86 從10月5日到5月28日

1910年10月3日夜晚到第二天爆發了推翻君主制度的革命。捲入這場革命的有陸軍、海軍和共和黨的各個革命組織。在最後時刻，大部分軍人未能趕到，革命的成果處於得而復失的危險之中。革命的領袖雷伊斯海軍上將感到絶望，因而自殺。但

是各種民衆組織堅持鬥爭，停泊在特茹河上的軍艦參加了革命，使共和運動取得了勝利。國王找不到任何人替他賣命，於10月5日悄悄地乘船逃亡國外。共和國宣告成立，在全國各地未遭到任何反對。按照當時的一種説法，共和國在農村是以電報的形式宣告成立的。

特奥費羅·布拉加主持的臨時政府接管了政權。在新的憲法未制訂之前，由臨時政府執政。臨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頒佈家庭法、離婚法、教會與國家分權法，並且創辦了里斯本和波爾圖大學。

1911年7月19日，第一次召開了立憲會議，8月21日制訂了憲法。第一部共和國憲法是1822年憲法精神的恢復，是共和運動傳統的反憲章精神的產物。當然，由於新的制度和新的時代的關係，憲法作了一些修改。共和國議會是制訂各項政策的立法機關，由參議院和衆議院組成。參議員和衆議員都由直接普選産生，參議員任期六年，衆議員任期三年。議會有權選舉和罷免共和國總統。至於地方政府，規定了分權的原則："中央政權不干預地方政府的生活。"這是共和思想體系的另一内容。鑒於税收的權力仍由中央政府統一掌管，所以地方政府的獨立是有限的。雖然没有任何條款這樣規定，但是各届政府執政的時間都取決於議會信任的程度已成爲執行憲法的慣例，因爲這種信任是總統任職的基礎。這種情況爲其他造成政局的不穩定的勢力的活動提供了方便條件，因此，16年内，共和制度更换了8個總統，内閣變换了50次。

共和黨取得政權後，便分裂成許多的派别，所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内，國内充滿了派别鬥爭。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共和運動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推

翻君主制度。這一目標保證了它內部的團結統一。但是君主制度垮臺以後，沒有具體綱領的後果便立即暴露出來。一派要求用徹底的方式進行徹底的改革，並且得到了一部分民意的支持，他們强烈地反對教權並希望要求盡快行動起來。另一派則比較溫和，主張採用讓步和調和的政策，維護既得利益，這種主張得到了資産階級共和黨人上層的擁護。前面的一派組成了民主黨，後面的一派成立了進化黨（以安東尼奧·若瑟·德·阿爾梅達爲首）和聯合黨（以布里托·卡馬紹爲首）。除了思想的對立和階級的對抗之外，還有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民主黨的領袖阿豐索·科斯塔有非凡的才能和活動能力，因而使他高居於新政權中其他政治人物之上。但是他的這種優勢卻招來了政治上的嫉恨。1913 年，民主黨領袖主持政府，暫時抑制了管理上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解決了君主制度遺留下的難題——使預算達到了平衡。從此以後，其他政黨開始猛烈地反對他，但是與此同時人民群衆卻熱烈地擁護他。

第一共和國政治歷程的第二階段遇到了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葡萄牙的政治勢力發生分裂。民主黨主張葡萄牙參戰，最常用的理由就是這是保護殖民地的唯一途徑。據說，1913 年英國和德國已準備簽訂一項秘密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兩個列强準備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雙方各一半。戰爭的爆發中斷了他們的計劃，但是不管誰打贏，勝利的一方將獨佔原先已分成兩份的殖民地。除了保護殖民地這個理由之外，參戰的目的還希望把葡萄牙納入歐洲的範疇，這是爲了國家的進步所必需的。但是他們辯論的基點卻是思想上無法調和的東西："左派"主張聯合協約國，他們認爲協約國代表了自由的事業；"右派"主張聯合德國，他們說德國代表着權威和秩序。

民主黨有雄厚的人民基礎，它的到國外參戰的計劃並未遇到强烈的反對。要克服的主要是國外的困難：英國不同意葡萄牙以同英國聯盟爲理由參戰。如果我們要參戰，應當有我們自己的理由，而不應該以同英國聯盟爲藉口。直到 1916 年，我們俘獲了德國的船舶，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戰爭一開始，大約 70 艘德國商船開進特茹河避難，企圖逃避英國艦隊的攔截，因爲特茹河口當時是中立的港口。由於英國需要船舶，要求我們截獲這些貨船，然後交給他們使用。我們這樣做了。不出所料，德國對我們宣戰。1917 年初，我們向法國派了兩個師，共 55000 人。這些士兵一直待到 1918 年 11 月停火爲止。另外，我們還向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派遣了部隊，因爲它們同德國的殖民地有邊界，而且也遭到了入侵。戰爭給我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大約有 5000 人死亡。這次參戰使我們除了有權分得德國人對協約國支付的鉅額戰爭賠款之外，還使我們在和平會議上有權與戰勝國平起平坐，並且得到這些國家對我國在非洲地位的承認。

由於參戰，各個對立的黨派攜手成立了跨黨政府（神聖同盟），但是安定的時間不長。到 1917 年底，反對葡萄牙參戰的勢力（一般來說，是些右派的勢力）舉行了西多尼奧・帕伊斯的革命，建立了獨裁政府。一道獨裁的法令改變了國家元首的選舉方式；西多尼奧・帕伊斯通過直接普選當選爲共和國總統。第一次總統制的嘗試歷時不長；1918 年底，西多尼奧・帕伊斯總統在里斯本被暗殺。隨後國內形勢動蕩不安，擁護西多尼奧的分子和保皇黨的黨羽都想奪取政權。在波爾圖甚至宣佈了君主制度，人們稱這種曇花一現的君主制度爲北方的君主制。保皇黨的這種舉動激起了共和制感情的再度興起，致使民主勢力獲得勝利（建立了老共和國，以區別於西多尼奧的擁護者建立

的新共和國)。

1920年到1926年是第一共和國歷史上最動亂的階段。僅1920年一年，就八次更換内閣。1921年，發生了10月19日的流血夜晚，有幾位傑出的政治家遭到殺害，其中包括内閣總理安東尼奧·格蘭若。他的政府在這一天，被一場民主革命所推翻。各黨派互相推卸責任，或者指責對方參與暗殺陰謀，引起了全國强烈的憤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葡萄牙的經濟、財政和社會問題愈加嚴重,但是經常不斷的政治危機又妨礙這些問題的解決。貨幣貶值，1919年1英鎊值7.4埃斯庫多，到1924年1英鎊值127.4埃斯庫多。飛速的通貨膨脹使小額存款蒙受了鉅大損失；他們大多是以購買國家債券、國庫券的形式儲蓄的。現在這些證券一文不值，國家的信譽和求助於國内借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1924年，政府不得不拋售白銀。在此之前，白銀代表了流通貨幣中的重要部分。國家的收入並没有隨着貨幣的貶值加以調整，因此造成國庫空虚，使靠工資收入維持生計者日益貧困。參加了工會，大多是無政府主義工會組織的工人常常利用罷工作爲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武器；多次罷工都同政府的軍隊發生了衝突，政府軍經常使用炸彈鎮壓工人。

這一切從思想上使小資産階級大爲震驚，而當時的現實則是這種小資産階級思想正是共和國的基礎。民主黨發生危機，分裂成許多對立的派别。阿豐索·科斯塔對此感到厭煩，退出了直接的政治活動，隱居國外。輿論界普遍認爲，黨派活動並不是實行某一項進步政策的過程，而是實現這種政策的障礙。“只有獨裁專制才能拯救我們”，這是1924年的普遍看法。這一年《新收獲》上刊載的一篇文章説：“不要講什麼什麼專制，不要

講某某人的專制，不要講什麼專制的目的或者什麼專制的做法，也不要講什麼依靠這種或那種階級、超集團或者超黨派的民族力量的專制。就直截了當地說專制。”

以安東尼奧・馬利亞・達・席爾瓦爲首的民主黨政府執政達22個月之久。其他政黨急於輪流執政，已經無法再等待了。民主黨内的不同政見者決定發動軍事政變。1926年5月28日，戈麥斯・達・科斯塔在布拉加宣佈起義，並立刻得到了所有北方部隊的響應。因爲他是少數幾位參加過弗朗德勒戰鬥的將軍之一，所以在陸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變的計劃本來決定在里斯本同時起義，由參與政治活動較多的海軍司令官卡伯沙達斯指揮，但因里斯本響應者寥寥無幾而告失敗。但是爲了對付北方的局勢，共和國總統召見了海軍司令卡伯沙達斯，任命他爲内閣總理。但是第二天，總統宣佈辭職，這樣就維持了立憲法制的虛僞性，因爲當國家總統停止行使自己的職權時，代替他的應當是整個内閣（因此，卡伯沙達斯被任命爲各部的部長，即接受了整個内閣的職權）。

但是對這次革命感興趣的不只是民主黨内的不同政見者，右派勢力也對這場革命頗感興趣，而且立即行動起來對軍隊首腦施加壓力，不僅要他們推翻民主黨的統治，而且要推翻任何政黨的政府。共和國總統辭職後，也就是說政變達到了初期的目的之後，軍隊仍然繼續向里斯本前進。藉口是要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進行閱兵。但是閱兵後，這些軍隊駐紮在里斯本的近郊不走。6月17日，他們再次入城，强迫舊制度的最後一名代表——内閣總理辭職。從此，開始了軍事獨裁（1926～1933年）。

對於第一共和國的評價，衆説紛紜。有些人認爲這個時期應該完全否定，因爲它用蠱惑宣傳代替了權威，打亂了國家的

機器，使其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使國家陷後窮困，阻止了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國家對英國的半殖民地性質的依賴，導致了一些不負責人的議會空談和流血的事件。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爲，這是一個孕育着成效和創造性的動蕩時期，是民主執政的第一次嘗試，使人民開始關心政治進程，在對家庭和教育的立法方面邁出了決定性的革新步伐，爲了保衛海外殖民地的統治，使其免遭列强的吞併，果敢地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培養了像《新收獲》的知識分子所表現的那種文明和進步的政治思想方法。這兩部分人的看法截然對立，反映出他們之間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思想衝突，妨礙他們對第一共和國有一個全面的、有説服力的和不帶偏見的看法。然而對於葡萄牙近代歷史，一種普遍的傾向就是有人用感情代替科學，喜歡衝動、誇張和粗野的謾駡，不願意根據事實，獨立地、嚴肅地、經過調查研究做出判斷。

87 獨裁專制和新國家

獨裁專制建立後的頭幾年裏，局勢更加惡化。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完全集中在軍人手裏。1927 年 5 月，一個法國記者訪問葡萄牙時，對這個時期做了這樣的描繪："這種獨裁制度有其獨特的特點，指揮是自下而上的，是'尉官蘇維埃'對將軍們發號施令和決定政策。在國内，每個軍官食堂就是一個議會，在這裏有權威的並不是軍銜最高的軍官。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下級軍官拾級步入内閣大樓。看來他們洋洋得意。這就是尉官委員會的軍官去那裏發號施令的。這就是現行的'專制'制度。"

這群軍官認爲，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社會公共秩序。在他們

看來，任何政治分歧都是對公共秩序的破壞，同以前的執政者的任何接觸都是可疑的。設立了新聞檢查制度，由軍人委員會負責。1927 年，原來失敗的那派政治勢力企圖東山再起，重新掌權，也採取了軍事政變的手段（2 月 7 日的革命）。但是大部分陸軍擁護軍事專制，經過幾場激烈戰鬥之後，起義失敗，並且遭到殘酷鎮壓。軍事費用大幅度增加，赤字已十分驚人。新的執政者認爲解決葡萄牙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借用外債。但是英國和國際聯盟不願意貸款，他們提出的條件有損於國家獨立。

財政問題的尖銳化促使政府把科英布拉大學經濟學教授安東尼奥・德・奧里維拉・薩拉查招入內閣。就職的時候他曾說："我十分清楚我要幹什麼和向何處去。"他上臺後，預算平衡，埃斯庫多穩定，財政管理井然有條。這使他贏得了崇高的威望。1929 年，在獨裁政府中薩拉查被認爲是智囊和最强有力的人物，因爲不經他的批准，任何部長不得採取可能加大開支的措施。1932 年，薩拉查被任命爲部長會議主席，他挑選文官，組成了一個文職人員佔多數的內閣；從此以後，將軍逐漸被科英布拉大學的教授取代。在他執政的 40 年中間，科英布拉大學成了選拔高級政治人材的重要基地。

新政府首腦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遵循憲法的新秩序來代替專制獨裁的動蕩局面。1933 年，政府擬訂的憲法草案交付公民投票。對政治的淡漠反映在投票上：5505 票反對，580379 票贊成，427686 票棄權。普查登記的選民總數爲 1014150 人（1933 年 3 月 23 日《消息日報》的數字）。事先政府已經預見到大家對此事不感興趣，所以公佈了一道法令，棄權票按默許贊成票計算，盡管把贊成票和默許贊成票分開統計。新的憲法生效後，專制獨裁宣告結束，開始了新國家時期（1933

～1974 年)。

1911 年的憲法體現了 1822 年憲法的思想，同樣，1933 年的憲法也恢復了憲章的政治觀點。新的憲法條文受到反議會主義潮流的强烈影響，這在 30 年代，是非常時興的。新憲法規定，最高權力在國家（這種思想與 1911 年的憲法一致），但同時又規定最高權力通過三個機關（立法、行政和司法）實施，而 1911 年的憲法規定最高權力通過四個機關（國家元首、議會、政府和法庭）來實施。這 樣，國家元首就不再是執行機關的組成部分，開始具有獨特的、淩駕於其他三種權力機構之上的權力。它實際上是一種調解權，這種創新就是 1826 年憲章的核心。國家元首每隔七年選舉一次，由直接普選產生。立法權只能由議會行使，議會議員每四年選舉一次，也由直接普選產生。總統有權任命政府，政府是“共和國總統絶對信賴的機構，它的執政期限不取決於議會的任何表決（第一百一十二條)。共和國總統有權解散議會。

政黨活動遭到禁止。爲了動員選舉輿論，成立了全國聯盟，以便把願意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組織在一起。初期，許多人踴躍參加，特别是農村的領導人；但是由於多年不舉行選舉活動，這個組織很快便無聲無息，失去了政治生命力。國家元首的選擇不取決於他是否屬於全國聯盟，甚至也不徵求該組織的意見。活躍的反對派轉入地下，他們的活動遭到鎮壓。新聞檢查依然如故。這樣，實行新聞檢查加上禁止政黨活動，就等於完全取消了政治對話。其後果之一，就是阻撓吸收第一共和國時期培養的人員。然而，實際上這些人並不是保守的知識分子階層。這樣，大多數知識分子被擯棄在政權之外，一部分人敢怒而不敢言，另一部分人則公開反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對

的情緒十分高漲。由於新政府不任用第一共和國時期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因而極大地妨礙了政府的思想革新，使其對新鮮事物持懷疑態度，因循守舊，拘泥於30年代制定的條條框框，禁止反對派組織活動，實行新聞控制，以及薩拉查博士牢固的地位，這三個因素是政府的人員和方針長期穩定的原因。卡爾莫納將軍從1928年起擔任共和國總統直到1951年逝世。接替他的克拉維洛・洛佩斯將軍在位七年直到任期期滿。新國家的第三任總統是阿梅里科・托馬斯海軍上將。他連任三屆，在擔任總統的第16個年頭，被4月25日的革命推翻。薩拉查博士擔任政府首腦36年之久，直到1968年疾病使他不能再擔任此項職務爲止。他的接班人馬爾塞洛・卡埃坦諾教授主持政府五年多，直到爆發4月25日的革命爲止。

葡萄牙的這段歷史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就國內而言，最突出的方面是全面改組政府部門、實行獨裁統治、推行公共建築計劃和發展經濟。在國際方面，突出的是面對國際上的各種爭奪利益的陰謀，努力維護葡萄牙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和爲保衛海外省而進行的軍事和外交鬥爭。

最初的20年内（1933～1952年），政府工作的中心是整頓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門，以及實施公共建築計劃。財政和稅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技術部門工作的改進，爲公共建築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在第一階段，公共建築是主要的投資場所。公路網從方特斯時期開始就一直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1928年只有1.3萬公里。爲了適應日益增多的汽車運行的需要，現已增加到將近3萬公里。政府機關有了自己的辦公大樓，原來它們大多設在自由主義革命時期被宣佈爲國有財產的修道院裏。還進行了廣泛的植樹造林，修建了一些大型的水電站大壩。在整個新

國家時期，公共建築一直在堅持進行，其中最宏偉的建築工程要算是自行設計和依靠自己的技術力量修建的杜羅河大橋(1963年)、1966年由美國設計的特茹河大橋、國家圖書館(1968年)、里斯本法院（1970年）和小學建校的百年計劃（2500間教室)。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之前不久，部長會議主席薩拉查兼任了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兩個要職。陸軍重新進行了裝備，並向當時具有非常重要戰略意義的基地——亞速爾群島派遣了駐軍，同盟國原來擔心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國家靠攏軸心國，曾計劃佔領這些島嶼。在外交上，面對世界大戰，葡萄牙堅決奉行中立政策，並盡一切努力避免西班牙由於意識形態上的接近而站在意大利和德國一邊參戰。美國參戰以後，當時同盟國似乎已勝利在望，這時葡萄牙才向同盟國提供了亞速爾群島的基地。

整個大戰期間，葡萄牙向交戰雙方提供了原料，特別是鎢的出口。葡萄牙因此而大獲其利；這是從18世紀末葉以來，葡萄牙的貿易第一次有了順差(1940～1943年)。國家的財政狀況有了好轉，個體的經濟也蓬勃發展。但是第一個公開譴責政府的運動也在這個時期出現，許多人都指望同盟國勝利以後會在葡萄牙建立一個民主的局面。這個運動發展的高潮是提出諾爾頓·德·馬托斯爲國家總統的候選人。反政府的運動要求推遲選舉，制訂新的選舉日程，並附有十萬餘人的簽名。政府拒絕接受這些要求，諾爾頓·德·馬托斯將軍退出競選。但是這個事實表明了一個廣泛的反政府運動的存在，同時也説明政府不能適應戰後的政治形勢。不少的簽名者遭到了迫害，政府內部也産生了分歧：50年代派不像30年代派那樣認爲任何政治分

歧就是旨在顛覆政權，也不認爲維護公共秩序是國家的首要任務。費雷拉·狄亞斯工程師在《方向性的路綫》一書裏說，國家的工業化是當務之急，是全面進步的唯一道路。他的這種主張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此之前，“葡萄牙基本上是個農業國”的觀點佔據統治地位，並且掀起了種植小麥運動，小麥産量增加了兩倍。但是這種看法現在被排擠到次要地位，只有比較保守的階層和大地主仍舊抱着這種觀點不放。

1950～1975 年發展規劃中擬行的全面發展經濟的政策對於國營部門來說，這是指令性計劃，但對於私營企業來說，則純粹是指導性的計劃。盡管私人企業一直没有完成下達給他們的指標，但是在發展規劃的推動下，國家的經濟狀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的收入反映了這種變化：從 1928 年到 1950 年，國家的收入增加緩慢，從 200 萬康托增加到 500 萬康托；但是 1960 年增加到 1000 萬康托，到 1970 年，上昇到 3000 萬康托，已經不需要向國外索求大量借貸。國内的總産值（國民總産值）盡管上升緩慢，但是持續遞增。國民産值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工業的發展，其中主要是先進技術工業部門的發展，尤其是化工和冶金部門。這兩個部門，1970～1973 年，年增長率達 20%。在這幾年内，整個工業部門的增長率爲 36%。

這種發展速度甚至比歐洲的平均速度還要高。可惜基礎部門，尤其是農業的發展趕不上這種速度，農業上幾乎没有什麼增長。主要的原因就是沿用傳統的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缺乏經過技術培訓的管理人材，以及對個體農業的純指導性計劃。同工業相比，農業的停滯不前可從下列數字中得到證明：1956 年到 1971 年，農業産值從 1600 萬康托增加到 1800 萬康托，與此同時，工業産值從 1900 康托飛躍到 6400 萬康托（1963 年的

價值)。這樣,國民總產值的總增率最快時爲 7.5%(1971 年的國家決算報告)。和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相比,這種增長速度都是驚人的,但是還不足以克服葡萄牙同歐洲的發達國家相比較的落後狀態,因爲這些國家的起點比我們高得多,他們的發展更爲迅速。對葡萄牙取得的成績,有兩種評價:那些把這些成績同國家以前的發展階段相比較的人認爲這是突飛猛進,但是那些把它同歐洲其他國家的發速度相比較的人則認爲葡萄牙更加落後了。

由於工業化的間接原因,幾百年遺留下來的農村和城市的落後面貌部分地得到改觀。農村和工廠的工資收入相差十分懸殊。20 世紀這種差距所造成的後果與 19 世紀完全一樣:受歐洲大陸鄰近勞動力市場上高厚薪俸的引誘,許多人紛紛移居國外。移民的高潮是在 1960~1970 年之間,目的地主要是法國。

移民的結果對農村生活產生了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在某些貧窮的地區造成土地荒蕪;另一方面則由於勞動力缺乏,工資有所增加,農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特別是那些移民的家庭,生活水平已相當於產業工人的水平。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應用加速了農村的變化。農村風光畫的收藏家把農婦剪短髮或者用高音喇叭代替進香時的樂隊看成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居民的結構發生了變化。1900 年,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佔全國勞動力的 61.4%(從事工業生產的佔 19.4,從事服務性行業的佔 19.2)。到了 1970 年,從事農業勞動的佔 31%,從事工業的佔 34%,從事服務性行業的約佔 35%。然而 31%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僅佔全國總產值的 19%,而 34%的從事工業生產的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卻佔總產值的 46.4%。勞動力和產值兩個百分比之間的懸殊差別反映了兩個產業的生

產效率之間的差距。葡萄牙永遠不再是一個“基本上的農業國”了。

經濟變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中產階級。企業的數目急劇增加；1970年大約有十萬家企業，其中絶大多數是只有五個工人或者不足五個工人的小企業。有幾家新的企業，如汽車運輸、小汽車修理，以及其它發展較快的企業如民用建築等等，這些企業的主人從前都是工人，現在已成爲第一代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發展的最明顯的反映，就是里斯本市的擴大和學校的激增。首都的面積增加了一倍，郊區市鎮20世紀初期還是農業區，如今已成爲鬧市。里斯本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即中世紀、彭巴爾時期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革命時期。現在是第四個時期，數以萬計的小資產階級的樓房拔地而起。在教育方面，受既非義務又非免費教育的人數從1950年的16.8萬人增加到1970年的48萬人。在同一時期，入學者的百分比由89％增加到177％。但是，無論是城市的發展還是學校的增加，都不是葡萄牙發展的獨特現象，而是歐洲的普遍的傾向。葡萄牙國內的現代化只能說是由於歐洲發展的形勢所迫。

反對政府的情緒與中產階級的發展同步增長。在經濟衰退的時期，農業中產階級曾經希望對政治權利加以限制，後來也容忍了這種限制（他們認爲這種限制是維持秩序的政策），但是在新的的工業和商業中產階級處於發展壯大的時期，他們開始感到這種限制是無法容忍的。在新價值表中，秩序的概念已被自由的概念所代替，安全的概念已被進步所代替。從1945年起，不管是擁護還是反對現政權的資產階級，都渴望自由；擁護政府的資產階級希望有一個自由化的方案，而反對政府的資產階級則希望進行一場革命，盡管這種資產階級的革命不過是恢復

民主議會制的形式和保證集會及言論自由的政治權利。1958年，在洪伯托・德爾卡多將軍的競選運動中，這種自由觀念贏得了大部分城市中小資產階級的熱烈贊同。現行制度受到强烈的震動，以致在競選之後，修改了政府憲法，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改爲由一個人數有限制的選民團選舉產生，以避免今後出現危機。政府的這項建議在議會裏曾遭到反對，但是它並不因此而不被通過。

1968年，馬爾塞洛・卡埃坦諾教授接替薩拉查博士主持政府。他的綱領可以歸結爲在持續中發展的方針。這一綱領採納了兩派資產階級的主張：主張自由化的資產階級認爲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保守的資產階級則只强調持續。這樣，工業化的速度加快了，社會救濟措施第一次擴大到農村居民。馬爾塞洛・卡埃坦諾執政期間開始修建的一個新的海港和一個對南方工業發展有重要意義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錫尼希工程），是他最突出的建樹。

與此同時，海外省的問題日益嚴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獲得勝利的大國把各國人民要求自決權的聲明寫入聯合國憲章。歐洲的殖民主義者相繼承認過去的殖民地的政治獨立，他們採用經濟和技術合作的形式代替了從前的統治，繼續保持其利益。葡萄牙政府看清了大國關心小國獨立的陰謀，他們企圖重新劃分非洲和亞洲國家的勢力範圍和原料產地，以求從中撈到好處。葡萄牙政府拒絕加入非殖民化運動的行列，並且提出葡萄牙是一個多大陸和多種族的國家，這是數百年歷史的發展造成的。它的歐洲大陸之外的領土並非真正的殖民地，而是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因而不容分割。這種看法只具有葡萄牙憲法權利，沒有得到國際輿論的通過。國際輿論認爲葡萄牙政府

稱之爲海外省的領土是地地道道的殖民地。因此，葡萄牙的立場在聯合國大會上開始時是受到警告，而後又遭到日益强烈的譴責。

就葡萄牙待在印度果阿、第烏和達茂三座城市的問題，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外交衝突。印度聯邦企圖結束葡萄牙的主權，在施加了多年的壓力之後，最後終於舉兵佔領這三座城池（1961年）。葡萄牙本想依靠國際保護對抗軍事入侵，但是没有如願。

1961年，在安哥拉爆發了游擊戰爭。接着在幾內亞和莫桑比克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除了幾內亞之外，游擊戰爭既未使這些領土擺脱葡萄牙政府的有效統治，亦未影響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相反，它們的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比從前更快的發展階段。但是游擊戰爭卻迫使葡萄牙在非洲保持了龐大的兵力和花費了鉅大的開支；這筆費用耗費了國家的大部分收入。反對在非洲進行戰爭的呼聲成了反對政府的主要話題。青年階層，尤其是大學生積極參加了這場反對政府運動。海外政策曾經是有助於第一共和國的誕生的民族之理想，現在成了將使第二共和國沉淪的政治問題。

1974年4月25日，爆發了武裝部隊運動，推翻了政府，開創了第三共和國。從此以後，作出了許多決定和選擇，在葡萄牙的歷史過程中造成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對於這些變化，因爲時間太短，還不能做出歷史的評價，何況我們是身在其中。即便想客觀，想超脱，然而任何解釋和評價都必然帶有政治色彩。

所以，這段歷史只有以後才能寫。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着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并爲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鬥爭中無比堅强，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

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灕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爲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均爲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爲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説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爲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盡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衆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葡萄牙简史
作者＝Ｊ·Ｈ·萨拉依瓦
页数＝３６２
ＳＳ号＝１０６８３６９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